

葛荣晋学术论著自选集 第二卷

道学智慧与21世纪

葛荣晋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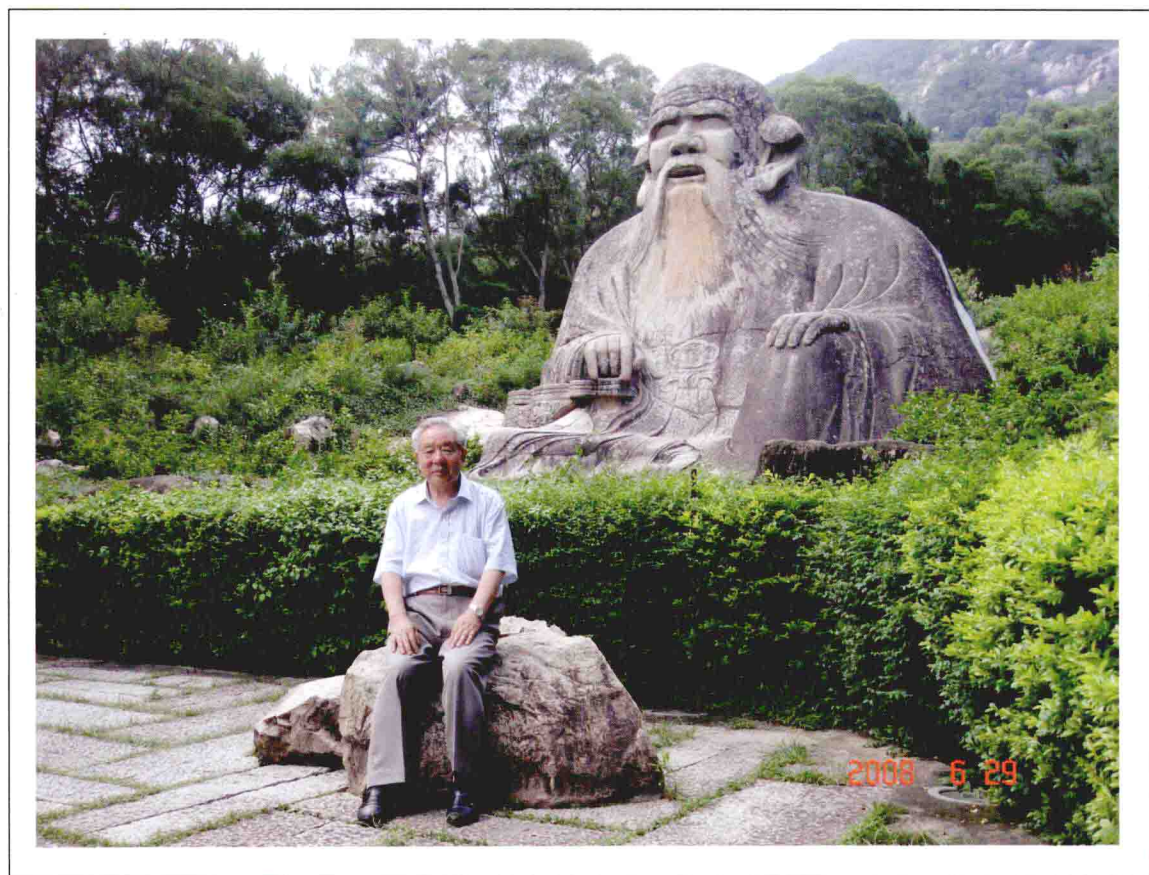
葛荣晋学术论著自选集 第二卷

道学智慧与21世纪

葛荣晋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2008年6月29日摄于福建省泉州市清源山老子像



《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1991年第1版、1997年第2版）和日文、韩文译本以及台湾简装、精装繁体字本

目 录

第一章 21 世纪将是回归《道德经》的时代（上）

——外国人眼中的《道德经》	(1)
（一）时代呼唤《道德经》回归	(1)
（二）《道德经》与治国之道	(4)
（三）《道德经》与经济发展	(5)
（四）《道德经》与“道商”文化	(6)
（五）《道德经》与科学技术	(8)
（六）《道德经》与世界哲学	(11)
（七）《道德经》与人生真谛	(13)

第二章 21 世纪将是回归《道德经》的时代（下）

——中国人眼中的《道德经》	(15)
（一）《道德经》与和谐社会	(15)
（二）《道德经》与现代“道商”	(18)
（三）《道德经》与潇洒人生	(23)

第三章 “上善若水”的理想人格

（一）“善利社会”而不“争私利”	(25)
（二）以“居下流”为“善地”	(28)
（三）心境如渊的清静心态	(30)
（四）做“仁商”而不做“狼商”	(32)
（五）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	(34)

(六) “治大国若烹小鲜”	(35)
(七) 做事要遵循“因势随形”原则	(36)
(八) 做人应做到“动静有时”	(38)
第四章 “逍遥游”与人生境界	(40)
(一) “游方之内”的有限自由	(40)
(二) “游方之外”的绝对自由	(44)
(三) 通往“逍遥游”的“坐忘”之路	(47)
第五章 “上德若谷”与和谐人生	(56)
(一) “无弃人，无弃物”	(56)
(二) 败莫败于不自知	(64)
(三) 宽容他人也是善待自己	(67)
(四) “宠辱不惊”	(70)
第六章 “光而不耀”与低调做人	(77)
(一) “光而不耀”	(77)
(二) 低调做人	(81)
(三) 高调做事	(86)
第七章 “人生三关”与潇洒人生	(89)
(一) “身重于物”的生命观	(89)
(二) “少私寡欲”的情欲观	(91)
(三) “以死为乐”的生死观	(93)
第八章 道家智慧与成功人生	(98)
(一) 解读张良“忍之术”的秘诀	(98)
(二) 道家的“不言之教”	(102)
第九章 道学智慧与快乐人生	
——葛洪的心灵养生论	(107)
(一) 养生是一种人生价值选择	(107)
(二) “养身”是一种“减法哲学”	(110)
(三) “养心”是一种“加法哲学”	(112)

第十章 “为而不争”与“舍得之道”	(115)
(一) “为而不争”	(115)
(二) “舍得”是一种人生价值选择	(117)
(三) “舍得”是一种成功之道	(120)
(四) “舍得”也是一种老板哲学	(123)
第十一章 “柔弱胜刚强”与人生谋略	(127)
(一) “柔弱胜刚强”是一种人生智慧	(128)
(二) “柔弱胜刚强”也是一种人生谋略	(133)
(三) 弱势企业如何变成强势企业	(143)
第十二章 “方而不割”与“方圆之道”	(150)
(一) 做人要圆，做事要方	(150)
(二) “内方外圆”的圆通境界	(155)
(三) 胡雪岩的“方圆人生”	(157)
第十三章 “大智若愚”与糊涂哲学	(164)
(一)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164)
(二) 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167)
(三) 难得糊涂	(168)
(四) “大智若愚”是一种高明的处世之道	(173)
第十四章 “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	(176)
(一) “道法自然”的生态价值	(176)
(二) “道法自然”的两层含义	(177)
第十五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与崇尚简单生活	(181)
(一) “治人事天莫若嗇”是一种生态环保思想	(181)
(二) “崇尚简单生活”是一种幸福快乐的美德	(183)
(三) “崇尚简单生活”是一种绿色生活	(186)
第十六章 道家哲学智慧与科学技术发展（上）	(190)
(一) “道”的智慧与当代物理学发展	(190)
(二) “崇尚自然”与“有机建筑”理论	(196)

第十七章 道家哲学智慧与科学技术发展（下）	(199)
（一）“道法自然”与“自然农法”	(199)
（二）道家哲学与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	(204)
第十八章 “自胜者强”与管理者的“无为”品格	(215)
（一）“四不”美德	(216)
（二）“三宝”之说	(216)
第十九章 “无为而治”与现代企业管理	(220)
（一）“无为而治”的含义	(220)
（二）“无为而治”管理的三层意义	(221)
（三）“有为”与“无为”	(225)
第二十章 “无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227)
（一）“侮之”管理境界	(227)
（二）“畏之”管理境界	(229)
（三）“亲而誉之”管理境界	(231)
（四）“不知有之”最高管理境界	(234)
第二十一章 王屋山与全真教	(238)
（一）全真教在王屋山的传播和发展	(238)
（二）重建和修葺道教宫观	(241)
（三）全真教与编纂《大元玄都宝藏》	(244)
（四）全真道士与王屋山代祭以及投龙简	(246)
（五）高道辈出与皇室支持	(247)
第二十二章 王屋山道教文化的社会价值	(249)
（一）道教文化是一种“软实力”	(249)
（二）开发道教文化是一项文化工程	(252)
（三）田野调查与旅游开发	(254)
附录一 深入挖掘与复兴王屋山的道教文化	
——葛荣晋教授访谈录	(256)
附录二 《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引论	(265)

第一章

21 世纪将是回归《道德经》的时代（上）

——外国人眼中的《道德经》

（一）时代呼唤《道德经》回归

20 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和物质财富上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也造成了生态环境、价值迷惘和心灵污染三大危机。生态危机、资源枯竭、气候异常、艾滋病、疯牛病和人口的恶性膨胀等现状，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生化武器、核武器、战争频发；各国屡见不鲜的贪污腐败、毒品走私、恐怖犯罪、金融诈骗、唯利是图等丑恶现象以及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人类普遍缺乏安全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极大地削弱了人的独立人格，将个体的人禁锢到群体的机械化的程序之中，使人完全失去了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紧张的社会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畸形人格和道德沦丧，使人们身心交瘁，幸福感和快乐感极度下降等。这些都是 21 世纪全人类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

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人类不能不对西方文明的弊病进行反思，开始从东方文化，特别是道学中去寻求一种哲学智慧，解决这些现实的社会问题。1959 年，英国剑桥大学查尔斯·斯诺就发现西方文化中“科学的”要素和“人文的”要素的相互分裂和对抗造成了社会危机。这种社会危机使人类不能对“过去”作出正确判断，不能对“现在”作出合理解释，也不能对“未

来”作出有效预测，从而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西方某些科学家终于发现：西方机械论的主客二分法、物理还原、静态分析法和孤立实证等形而上思维模式日益陈旧过时，他们不得不开始从东方道学文化中寻找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出路。

从 17 世纪开始，《道德经》进入西方世界后，老子及其《道德经》逐渐地引起了西方人的兴趣，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弘扬东方传统文化的热潮中，《道德经》一书引起了外国人的普遍关注和推崇。老子及其道家对和谐自然、和谐社会、和谐生命的关注，更为全世界的人所瞩目。美国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尔顿在题为“东方和西方”的演讲中预言：文明最早开始于东方，西方人应该警惕，以免过分骄傲以致忘记了他们的成熟思想的东方起源，新的启示可能还会出现，而这一新启示一定会来自东方。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在老子选入《历史上最有影响的 100 人》后的评语是：“假如老子的确是《道德经》的作者，那么他的影响确实很大。这本书虽然不到六千字，却包含着许多精神食粮。在西方，《道德经》比孔子或任何儒家的作品更流行。”美国科学家威尔·杜兰在其《世界文明历史》中指出：“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要将焚毁所有的书籍……老子是孔子之前最伟大的哲学家。《道德经》出自何人手笔，倒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乃是它所蕴含的思想，在思想史中，它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最迷人的一部奇书。”

人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满目疮痍、颓败不堪、精神悲观的世界，他们在痛苦中终于发现：最好的拯救良方莫过于一位东方哲人老子和他的《道德经》。在 1996 年 8 月召开的“北京道家文化国际研讨会”上，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舟人说：“道家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这对西方文化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能使西方文化得以更新的动力和活力的源泉。”美国学者蒲克明曾预言《道德经》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他说：“当人类隔阂泯除，四海成为一家时，《道德经》将是一本家传户诵的书。”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在谈到这本书时说：“（《道德经》）许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床头伴侣。其意义永无穷尽，通常也是不可思议的。例如，当我研究心理学时，它是一本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作为一个研究组织机构

的专业人员，我从这本书学到了许多有关政治和领导的知识。我把它作为最喜爱的礼物送给企业家和高级经理的朋友们。这本书道出了一切。”

《中国文物报》2002 年 7 月 5 日报道：老子仅凭五千余言的《道德经》，被美国《纽约时报》列为全世界古代十大作家之首。从 1870 年第一部德文译本以来，《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多达 82 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多达 700 余部。据赵毅衡先生统计，“自 1886 年到 1924 年，光《道德经》英译本就有 16 种之多，而从 20 年代到 60 年代，有 40 多种英译本”。1963 年，美籍华人学者陈荣捷先生在《老子之道》中指出：“《道德经》已 44 次被译成英文，特别是过去二十年里（1943—1963），几乎每隔一年都有一种新译本出现。”1977 年，美籍华人学者林振述在《老子〈道德经〉及王弼注英译本》序言中指出：《道德经》各种外文译本已有 70 种至 80 种之多，而且是世界上每一种语言就至少有一种译本。据河南省社科院丁巍先生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英译本《道德经》182 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各国，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西方的《圣经》以外，就是东方的《道德经》。

《道德经》之所以受到世人如此重视，被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因为它是人类最古老的、最系统的一部“大成智慧学”。道学是一种以“自然无为”为核心价值、以“反者道之动”为思维方法、以构建“逍遥游”人生境界为目标的文化。它充分地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哲学智慧。道学文化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道学文化也是一种具有超前意识的智慧宝库。道学的哲学智慧不仅能反观人类乃至宇宙创生之初的过去，而且也能预见和创造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道学文化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重新融汇为一体，打通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伦理之间的壁垒，填平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将人类创造的所有知识变成一门“大成智慧学”。

道家哲学虽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但它在当代科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与使用价值，越来越重要。正如德国人尤利斯·噶尔在 1910 年写的《老子的书——来自最高生命的至善教诲》中所说：“也许是老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人真正理解老子，或许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到来。老子已不再是

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

从上述西方人关于东西方文化转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预言：21 世纪将是寻找老子、回归《道德经》的时代。

（二）《道德经》与治国之道

中国古代发展史特别是汉代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等，证明《道德经》是一本“救世书”。当人类步入 21 世纪，人们面对着市场自由经济和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要想构建“和谐心灵”、“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就必须善于从老子《道德经》中寻找治国救世的政治智慧。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针对现代德国人的思想困惑，曾在电视上大声呼吁：每个德国家庭应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的这些困惑。

1987 年，美国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了《道德经》六十章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以治理困境中的美国。他在任美国总统期间，以《道德经》的智慧迅速地扭转了美国经济乃至国运的颓势，降低了一度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最高的增长率。因此，里根先生不仅赢得了“美国最伟大的总统”的赞誉，而且也引发了美国人民对老子及道学的浓厚兴趣。

2010 年 6 月 19 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与会者建议：“遵循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的教诲，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按照梅德韦杰夫的说法，“如果我们遵循中国哲学家的遗训，我认为，我们能够找到平衡点，并成功走出这场巨大的危机”。当天早晨，在网上翻阅《道德经》时，他又看到了老子《道德经》四十四章中的一段话：“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梅德韦杰夫认为在当今世界，《道德经》是人类驶出社会经济发展迷途的指明灯。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极力推崇老子的《道德经》，一再强调在其工作中要运用老子的道学大智慧。他根据老子“以柔克刚”的理念，按照“低调、温和、照顾面子、幕后斡旋”的行事风格，成功获得连任，得到一个“泥鳅秘书长”的绰号。据联合国官方网站消息，联合国大会 2011 年 6 月 21 日通过决议，任命潘基文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第二个任期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潘基文在随后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对会员国的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承诺将秉承《联合国宪章》中的神圣原则，加强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应对全球挑战，使联合国更好地为世界人民服务。潘基文表示：作为秘书长，他将在会员国之间、联合国系统内部以及联合国与诸多国际伙伴之间，发挥一个协调员和建桥者的作用。他援引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哲学名言，强调要把这种不朽的政治智慧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在“百家争鸣”的气氛中，努力找到行动上的统一性。

（三）《道德经》与经济发展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道教）思想被认可的时期（例如唐初），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道家重生，不仅体现在看重个体生命，也体现在看重社会整体的生计发展。”

老子的《道德经》不仅在古代社会推动着农耕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即使在当今经济自由市场里，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说过：“现代经济自由市场的原理，就是源自《老子》的无为而治。”他还进一步认为：“道家在西方的发展，可能与佛教、印度教不同，它不会表现为宗教运动，而会体现为挑战过头的启蒙理性精神、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原则，提供新话语、新洞识、新范式，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个人选择与生活方式，替代唯物主义与彼岸宗教信仰，并

引导我们树立生态化精神的态度，有助于西方人灵肉二元论的克服和整体精神状态的转变。道家治疗性的哲学对西方人有关真理观、自我、性别认同等反思有积极作用，对诊治西方虚无主义的顽症具有显著疗效。因此，一般性地对西方反思启蒙的后现代计划有着重要意义。”

英国学者 J. M. 霍布森在他的《西方文明的东方来源》一书中，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 ”

美国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卡托研究所副总裁邓正莱，在 1998 年发表的《中国的前程：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前程，在于通过信奉和拓展老子的天道思想而回到本国的自由传统。《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老子关于天道、自由与无为的思想，跟亚当·斯密的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实用的。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阐发的那种自发秩序。中国的出路，是通过缩小政府的规模、扩展市场的规模，走向天道自由主义政治秩序。我认为这个答案，就是天道自由主义。”

1999 年诺贝尔奖得主、加裔美籍教授罗伯特·蒙代尔先生，他享有“欧元之父”的称号。他说：“中国人相信的是‘道’，这种道教的思想，实际上在中国的三种主要的思想流派中都存在。道是宇宙运行的方式，是自然的规律，是一种统一的和自发的行动。世界万物和每一种变化，都有它内在的必然性，都是部分的协同的合作来促进一个整体。”他充分地肯定了老子道学思想的理论价值。

（四）《道德经》与“道商”文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使西方商人逐渐认识到《道德经》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悄然地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经济文化群体“道商”。所谓“道商”，就是以道学的人生价值观、辩

证思维和哲学智慧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走向成功的商人和管理学家。

当代世界具有卓越影响力的企业家、法国阿尔斯通总裁安南·博格先生公开声称：“在中国做生意，要懂《老子》。”老子的《道德经》不仅在中国适用，而且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曾担任财富五百强公司高级执行官的詹姆斯先生把《道德经》尊为新世纪的商业理论。

美国微软帝国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如何做富人的问题上，根据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的思想，视财富若浮云，从事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努力做一个“富而好德”的企业家；在微软企业文化中，力求注入以人为本、“无为而治”、平等自由的道学精神。

美国 GE 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也极力推行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有人请教杰克·韦尔奇：“什么是优秀的管理理念？”他依据老子的“为道日损”和“无为而治”的思想，针对西方的繁琐的“制度化管理”回答说：“简单的管理。”这个有趣的“简单的管理”回答，揭示了现代管理的真谛。

美国管理学大师艾博契特，在所著《二十二种新管理工具》一书中，谈到管理的过去与未来时，他引用了《道德经》第六十八章中的“善用人者为之下”的不争之德，并评论说：“这几句话至今已有两千年历史，它代表见识不凡的管理者长久以来都在努力，但仍未有人能够趋近这种道的境界。从某种意义来看，管理者的历史，也就是试图实践这项基本观念的历史。”

芬兰前诺基亚总裁奥利拉，他自称以老子为师，并经常引用老子的“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话，一生都在努力追求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管理境界。

日本学者伊藤肇先曾经指出：“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和《道德经》，孔、老的思想给他们的激励，影响至巨，实例多得不胜枚举。”

松下商业帝国的缔造者、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在松下公司花园里，塑了一尊老子的铜像，下面石座上刻着中文：“道可道，非常道。”他在回答“你的经营秘诀是什么”时，说：“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

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松下幸之助的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对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的充分肯定。

把老子的“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思想，自觉地运用于企业管理，从而完成由硬性管理向软性管理的转化，使许多企业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已是不争的事实。

（五）《道德经》与科学技术

老子的道学思想，不仅推动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如古代化学等）的发展，而且也登上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殿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从老子的《道德经》中汲取智慧。

从 1948 年开始，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即开始研究和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信仰上，他自称是“荣誉道家”，自号“十宿道人”。他曾这样评价儒家与道家：“后来的儒家思想变得僵化，成为一个经院哲学的东西，而道家反对他们的那些主张。……许多科学史家发现，炼丹术起源于道家的巫术，探求长生不老药。”“说道家思想是宗教和诗人的，诚然不错，但是它至少也同样强烈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同时，李约瑟博士早在 1957 年就明确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人类将如何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盒子（魔盒）？我再次要说：按东方的见解行事”。

英国天文学家沙里斯，在 1985 年出版的《新科学的诞生》一书中，认为“前进的唯一道路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向东方，带着对它的兴趣以及对其深远意义的理解离开西方的污秽，朝着神圣的东方前进”。不管是李约瑟博士还是沙里斯先生所讲的问题，都是科学研究方向的转换。

英国科学家霍金提出的“宇宙创生于无”的理论，从现代科学角度证明了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猜想。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说：“现代物理学大厦就建立在一无所有上，从一无所有导出了现在的所有，没想到的是，近代西方历经数代、花费大量物力财力才找到的结论，在中国的远古早已有了思想的先驱。”这里讲

的“在中国的远古早已有了思想的先驱”，即是指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伟大的“道”的思想。惠勒教授提出的“质朴性原理”与老子所谓“道”的质朴性，也是不谋而合的。

苏联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的林德先生曾说过：“宇宙创生于无的可能性，是非常有趣的，应当进一步加以研究……这个问题似乎是绝对玄学的，但是，我们有关玄学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类玄学问题有时却由物理学给出答案。”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证明道家所谓“道”的观念与现代物理学所谓“场”的观念是极为相似的，充分肯定老子关于“道”的观念是一个“非凡的智慧”，为克服当代物理学危机提出了新的世界观。

美籍华人学者李政道教授在多年的物理学研究中，发现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与中国古代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也有相吻合之处。

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是协同学的创始人。他在《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的序言中，公开承认：“协同学含有中国基本思维的一些特点。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道家）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

法国科学家勒内·托姆，是突变理论的创始人。他在《转折点》一文中指出：“在老子的理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突变理论的启蒙论述。我相信今天中国许多喜欢这个学说的科学天才，会了解突变理论是如何证实这些发源于中国的古老学说的。”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学者普利高津指出：他的耗散结构理论“对自然界的描述非常接近中国道家关于自然界中的自由组织与和谐的传统观点”，“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性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

奥地利社会经济学家哈耶克，是景气循环理论的创始人、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他看来，道家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正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的经典表述。

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是互补理论创始人。在王室授予他勋章时，他说：“我不是理论的创立者，我只是个（道家）得道者。”“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的表现中国古代（道家）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玻尔认为道家的“阴阳图”是“互补原理”的最好标志，他把“阴阳图”作为丹麦哥本哈根学派的标徽。

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由于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公开承认他提出的“空域概念”是受到唐代道家信奉者李白的思想启示。他在基本粒子研究中，为了探索基本粒子“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曾试图以老、庄的“混沌”之说揭开这一科学奥秘。汤川秀树赞赏道家的现代性，1968年，他在《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中指出：“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并批判今天人类文明缺陷的先知。老子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体人类的最终命运。”

同时，美国卡普拉指出：“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乱了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道德经》除了对于现代物理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外，在农学、医学和建筑学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农学家福冈正信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提出了“自然农法”的构想。福冈正信说：“自然农法就是在老子‘道法自然’这一伟大命题的启发下提出来的。”他还说：“如果我们早听老子的话，也不致使科技的发展对人类自然环境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在当代医学模式的转换中，《道德经》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建筑学家赖特先生根据老子的“有无相资”思想，提出的“有机建筑”理论，完全反映了当前人类回归自然的需求。

由此可见，现代科学证明，当代科学技术的大厦，不只是建立在西方古典原子论和近代牛顿力学基础之上，同时它也是建立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

道家哲学的基础之上。随着当代文明危机的暴露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向道家哲学寻求新的哲学智慧与思维模式，以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道家哲学正在当代物理学中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它不仅对当代物理学用以摆脱西方原子构成论思维模式所造成的困境提供启示，而且对现代物理学的新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对开拓当代物理学研究的新领域，都是极为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道家哲学必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六）《道德经》与世界哲学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的某些哲学家总是以高傲的态度，否定《道德经》的社会价值和历史地位。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和对话，世界各国哲学家在深入研究和探讨《道德经》的基础上，正在逐步地理解《道德经》的真正价值和它在世界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1. 《道德经》的社会价值

有人考证，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师承康德，并读过由法国汉学家莱莫萨翻译的《道德经》一书，尽管他把《道德经》贬为“尚处在初级阶段的著作”，把“东方思想排除于哲学史之外”。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启示和影响。他把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段式，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哲学逻辑合理，充满生气，理论新奇，论述动人。他研究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创立三段式解读法。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盛赞“中国人不仅在忠孝方面，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大大超过了近代人”。他认为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之父。

德国哲学家谢林在《神话哲学：中国哲学》中指出：“道不是人们以前

翻译的理性，道是门。”老子哲学是“真正思辨的”，他“完全地和普遍地深入到了存在的最深层”。

德国哲学家尼采在评论《老子》一书时，说：“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 1957 年出版的《语言的本》中说：“老子的‘道’能解释为一种深刻意义上的‘道路’，即‘开出新的道路’，它的含义要比西方人讲的‘理’、‘精神’、‘意义’等更原本，其中隐藏着‘思想着的道说’或‘语言’的‘全部秘密之所在’。”

荷兰著名的汉学家、欧洲汉学会会长许理和指出：“《道德经》在西方人眼中，无论从任何西方的思想派别看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典籍，也最富于中国智慧，或甚至更广泛而言——东方智慧。”

2. 《道德经》与世界哲学

俄国汉学家海澳基也夫斯基说：“古代哲学家老子的学说，是中国一切哲学发展的出发点，所有其他中国哲学家的体系，都是在道德哲学体系的各个部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伏尔泰早就告示人们：“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

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赫伯特·曼纽什，在《中国哲学对西方美学的重要性》中指出：“中国哲学是我们这个精神世界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公正地说，这个世界的精神孕育者，应当是柏拉图和老子、亚里士多德和庄子，以及其他一些人。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哲学著作总是习惯于仅提欧洲古代的一些哲学家，却忽视了老子的《道德经》，从而很不明智地拒绝了一种对欧洲文化的极为重要的源泉。”

法国传教士马若瑟，从《道德经》第十四章中发现了“视之不见名曰夷(yi)，听之不闻名曰希(xi)，搏之不得名曰微(wei)”。所以，他认为：“yhwe(雅赫维)等于‘夷希微’，就是上帝耶和華的名字。”

法国传教士傅圣泽认为：“真正的儒教就是《道德经》的教义。”他还提出了“神道教”的观点，“是否可以说在中国古经中唯一真实的‘道’，即代

表着基督信仰的神？答案是肯定的。‘道’是神，是救世主”；“‘道’是唯一，是宇宙之创造及保存者，在本质上与宇宙真主合而为一”。

法国第一位汉学家雷慕沙认为：老子的思想与稍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派所提出的学说“有无可争辩的共同之处”。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亲近自然的思想，与中国的老子思想有关”。

1891 年俄国圣彼得堡一位出版家询问托尔斯泰：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影响最大。他回答说：受中国的孔子和孟子的影响“很大”，而受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

不管是西方的哲学家还是神学家，不仅充分地肯定了老子的《道德经》与世界各国哲学有相通之处，而且还公开地承认《道德经》是“一种对欧洲文化极为重要的源泉”。

（七）《道德经》与人生真谛

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曾指出：“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这一评价真可谓是入木三分的警世之语。

德国诗人柯拉邦德在 1919 年写的《听着，德国人》一文中，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他公开号召德国人应按道家的“道法自然”的生活方式改造欧洲人，争做“欧洲的中国人”，推广“简单生活”的方式，因为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在 1884 年 3 月 10 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在这里，托尔斯泰不仅要求西方人按照老子的“上善若水”理念塑造理想人格，而且还要学会以“方圆之道”待人处世。他曾经说过：“我的良好精神状态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要是《老子》。”

在今天物欲横流甚嚣尘上的市场经济社会，品读《道德经》，更有着一种特殊的精神需求和人生意义。放眼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难发现：钢筋水泥构造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日益增多的小汽车在加宽的高速公路上喷云吐雾，豪华装修的住宅中充满着各种电磁波和毒气，高度的机械化层层包裹着不同的人群，蓝天白云、绿树红花日渐远离我们而去，大自然日趋枯萎，人类日益远离自然、自我封闭，人格渐趋异化。在当今社会，由于过度的欲望，选择多，压力也大，竞争使人们疲惫不堪，毫无快乐和自由可言。如何才能使“疲惫的人们”在人造的“第二自然”环境中过一种潇洒的生活呢？应从老、庄的道学中寻找智慧。日本当代学者卢川芳郎说：“《老子》有一种魅力，它给在世俗世界压迫下疲惫的人们以一种神奇的力量。”不管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为道日损”、“身重于物”、“少私寡欲”、“上德若谷”和“知足常乐”理念，还是《庄子》中的“以死为乐”、“坐忘”之道和“逍遥游”的理想境界，都是构建潇洒人生的精神文化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家哲学是一种自由快乐的人生哲学。我们的时代急需这种自由快乐的人生哲学，把全世界的“疲惫的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第二章

21 世纪将是回归《道德经》的时代（下）

——中国人眼中的《道德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世界风云的变化，中国人逐步认识到在复兴儒学的同时，只有从儒道互补的深层文化结构中，进一步揭示道学文化的意蕴及其现代意义，才是中国人的最佳选择。于是，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召开各种有关道家、道教文化的学术会议，创办有关道家、道教的各种学术刊物，并相继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道学文化的学术专著。由于人们对道学文化的广泛重视，“儒热道冷”、“重儒轻道”的局面正在改变。由儒学研究转向道学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深化的表现，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重视《道德经》及其价值呢？因为道学是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文化根基，也是世界各种异质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点。道学文化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所谓最大的包容性，是指它不仅包容中国诸子百家、儒释道思想的精华，而且也融汇东西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思想。

因此，我们可以预言：21 世纪将是人类真正理解老子的时代。老子不仅是中国的，同时也是全人类的。

（一）《道德经》与和谐社会

古今中外的治国史，证明道学智慧与治国成败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每

当面对治国困境，治国者只要能够从道学中吸取哲学智慧，大胆地进行社会改革，国家必然走向富强。不管是汉代的“文景之治”，还是唐初的“贞观之治”，都是历史的见证。所以，中国近代思想家魏源在《论老子》一文中，指出：《道德经》是一本“救世书”。

步入 21 世纪后，中国人面对着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就必须善于从老子《道德经》中寻找政治智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邓小平、胡锦涛的治国之道中，都包含有《道德经》的“无为而治”管理智慧。按照胡适先生的解释，“无为而治”就是国家少干涉主义，即政府少干涉社会，让社会按照自然规律发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治理国家。

邓小平在执政时期，即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道家管理思想，具有明显的道家倾向。美国著名华裔学者杨炳章写的《小平大传》（1998 年英文版），认为要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挖掘邓小平这个人物的特色，邓小平是“属于道家的”。

在经济改革上，邓小平的道家倾向主要表现为逐步放权和少干涉主义。1980 年左右，邓小平将土地使用权承包给农民家庭，分散经营。家庭自主经营是“无为而治”思想在当代农村成功运用的一种新模式。邓小平又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中央对特区放权，减少行政干涉，让市场经济活跃起来。

在政治改革上，他借鉴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政治理论，实施分权主义，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府少干涉企业，实行精兵简政，大力精减党政机构与人员。他借鉴道家的“功成身退”原则，废除国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政治体制上具有进步性。根据老子的“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的哲学智慧，他主张在“姓社”、“姓资”上“不搞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的不争论，与道家的“不争之德”是不谋而合的。为而不争，多干实事，少说空话。虽然他不争，但天下没有谁能与之争锋。邓小平 1992 年春天视察南方，发表了著

名的“南巡”讲话后，“姓社姓资”的争论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经济继续高速发展，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在外交政策上，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他针对西方国家集体对华制裁的严峻形势，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 28 字外交方针，其核心思想是“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由此他被世人誉为具有“在历史转折关头过人的政治智慧”。“韬光养晦”即《道德经》第五十六章所言“和其光，同其尘”，隐藏锋芒，以柔胜刚；“善于守拙”即《道德经》第四十五章所言“大巧若拙”，大智慧者好像笨拙，但却能以拙胜巧；“决不当头”即《道德经》第六十七章所言“不敢为天下先”，遇事不可逞强出头。28 字的外交方针，反映了邓小平一贯的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的作风。依靠这一方针，中国政府不仅破解了“对华制裁”的种种困难，而且也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胡锦涛吸取了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七章的“三宝”思想，即“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慈爱），二曰俭（俭朴），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谦下）”的管理智慧。他以人为本的亲民政治，完全符合道家的“慈”的理念。他把以人为本的亲民政治概括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句话，完全符合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治国理念。“俭”就是节约，胡锦涛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与廉洁政府的国策，符合老子的“治人事天莫若啬”（《道德经》五十九章）的治国理念。节约资源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要节约土地、能源、淡水、矿产资源，建立一个节约型社会。他告诫各级国家干部：“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胡锦涛提倡节约廉洁，完全符合《道德经》第二十九章提倡的“去甚，去奢，去泰”（不过分，不贪大，不奢侈）的精神。胡锦涛谦下柔性的外交风格，完全符合道家的“不敢为天下先”的核心理念。他的谦下柔性外交，看似不敢为天下先，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后发制人，其效果远胜于咄咄逼人的刚性外交。中国当前的柔性外交成绩卓著，既与美国、欧盟建立了相当稳定的合作关系，又与东盟、拉美、非洲多国建立了良好的经贸互利关系。

老子的“知和曰常”（《道德经》五十五章）治国智慧，提出了天人和諧、社会和谐、身心和谐的理想社会。2005 年 9 月中旬，胡锦涛在联合国

大会的讲话，针对当前世界的严重冲突与战争，提出了“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的观点。200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中国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2008 年 12 月 18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时，使用了“不折腾”这个词，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热议。这是对《道德经》的“清静无为”思想在当代政治上的最好的诠释。由此可见，胡锦涛建立和谐社会的理论，与《道德经》的治国之道是不谋而合的。

（二）《道德经》与现代“道商”

《道德经》不仅在构建和谐社会上，而且在当今市场经济中，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悄然地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群体——“道商”。所谓“道商”，就是“道魂商才”或“道体商用”，就是以道学的辩证思维和哲学智慧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取得成功的商人。简言之，就是以“道”经商的商人。

中国道商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的范蠡。他本是楚国宛邑人，曾向战略经济学家计然学习“计然七策”。传说计然的老师是老子，他从计然那里学到的是老子道学。范蠡曾经是越王勾践的重要谋士，在勾践发动对吴国的战争失败后，范蠡劝勾践夫妇“君后勿悲”，让他们“卑辞厚礼”以求先活下来。范蠡运用道学“示弱”的策略，使吴王夫差渐渐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放心地放勾践君臣回国。范蠡运用他学到的“计然七策”，帮助越国发展经济，最终越国以弱胜强，吴王亡国，越王称霸。在成功之后，范蠡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知道越王勾践这个人只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富贵，他没有被越王勾践准备与他平分天下的“美言”所诱惑，携带着属，一叶扁舟飘然而去。范蠡首先去了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取老子“虚其心实其腹”之意，在齐国从事沿海经济开发，搞“海产养殖业”和“鱼盐业”，没几年就发了大财。齐国国君又请他做齐国的相国，三年期满，范蠡将相印往

相府梁上一挂，将家财分散给乡邻，又飘然而去。到了鲁国的陶地，改名叫“陶朱公”，取老子“功成身退”的“逃”意，范蠡再操计然之术，从事“生态农业”、“养殖业”、“陶瓷加工业”等“产业开发”，没几年又资财巨万。范蠡再次将财富分与当地百姓，几次散尽家财最后又几次奇迹般地重新获得富贵，用他的话说，“我不求财而财自来”。范蠡善于“以道经商”，达到了“道商合一”的境界，被世人尊奉为“文财神”和“道商始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成功的“道商”人物，主要代表人物有张瑞敏、薛永新、张德赛、潘石屹、冯仑、陈永明、郑南雁、丁磊、朱铁玉、李兆基等人。

中国海尔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先生，曾将《道德经》的哲学智慧应用于海尔的经营管理中，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张瑞敏说：“我最崇拜的人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老子，一个是国外的德鲁克”，“《道德经》当中所讲的无为而治，我经营海尔主要是无为而治。我只抓大事，企业的大事就是文化、组织和战略”。2004 年 12 月，张瑞敏在海尔创业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谈到海尔之所以取得成绩，是因为海尔把握住了“无为”和“有为”的关系。张瑞敏称：“无为和有为的关系，不光对企业，对所有部门都一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所谓无为，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它是无形的，但非常重要。如果把企业当成一个人的话，它就是一个人的灵魂；如果把企业比作一艘船的话，它就是罗盘。在这个无形价值观的指导下，可以产生有形的成果，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为无为，则无不治’。如果能做到‘无为’，则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有形的东西生于无形的东西。”张瑞敏先生有一篇短文《海尔是海》，充分展现了张瑞敏崇尚老子的“上善若水”的“水性哲学”。张瑞敏最信奉老子的一段名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张瑞敏奉行“做大事，不做大官”的人生格言，主张企业家要恪守自己的本分。张瑞敏说：“真正的企业不应该发生激动人心的事情。”一个健康的企业拒绝神话，拒绝传奇，拒绝戏剧性，应该平淡、自然而然，这也就是张瑞敏所崇尚的“平常心”。在企业经营上，海尔按照老子的“图难于其易，图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人生智慧，创立了“OEC 管理法”。所谓的“OEC 管理法”，就是

“日事，日毕；日清，日高”，尽可能地划小核算单位，将所有的管理内容精细化到每一个人、每一天，实际就是对老子理念的最好诠释。在企业管理上，主要靠企业文化的管理，即无形之手的管理。正如老子所说：无为而无不为。在硬件建设上，海尔大厦高 12 层，整体建筑是外方内圆，体现了海尔“思方行圆”，即思想的方正要与行为的圆通互通的核心理念。在市场战略上，张瑞敏根据“市场唯一不变的就是它一直在变”的原则，坚持以变应变，以变制变，这成为张瑞敏的制胜法宝。在发展战略上，张瑞敏按照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原则，提出了“以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海尔的发展，主要的不是靠有形资产，而是靠道学的无形资产。

四川恩威集团董事长薛永新曾出版过《大道无为》的道学著作。恩威集团的“洁尔阴”配方为道教秘传药方，薛永新的师父为道士李真果。薛永新曾投资 3 亿在四川鹤鸣山修建“道源圣城”。他一直把老子的“不争之德”作为最高经营理念。在经营品牌上，就是选择目前市场还没有出现任何竞争的商品；等到许多竞争者出现，他会慢慢退出，再去选择新的没有竞争的商品，做别人没有做的、带有独家性的产品。“洁尔阴”就是薛永新最感到自豪的“不争”的事例。在“洁尔阴”开发之前，市场上没有相同的药物，薛永新就针对人们一直难以启齿的隐疾药品进行研制开发，也正是由于“洁尔阴”这种带有独家性的创新产品，使恩威公司很快发展起来了。

薛永新先生在他的《大道无为》一书中对“商场如战场”的观点有自己的看法，他写道：“因一个‘争’字，就把人们带到了邪路。所谓商场如战场，你死我活，不择手段，尔虞我诈，这种血淋淋的经济对社会无任何好处。我认为，应该把竞争变成竞赛，来一个市场大竞赛，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市场自然会和谐地繁荣。”“做生意难免会有竞争，谈判中合作者不让步或是表现得很强势，这也是家常便饭。别人可能会竭尽所能谋求胜利，但‘道商’却不这么做。”薛永新资助“美好家庭”评选，举办“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家庭文化知识大奖赛”，恩威每年都要向社会各界大量捐款，平均每年达上千万。用薛永新自己的话说，就是“向那些修赌城、建妓院者的一种文化抵制，恩威公司所倡导的是一片净土，让世界人在这里将思想冷却一下，顿悟自己的人生”。

武汉某电力公司总裁张德赛，曾在大学教过书。张德赛说：“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总在高楼大厦里，拿着‘俸禄’而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我想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希望知识分子能跟社会结合，即使我失败了，我也想做这条新道路上的铺路石。”他告诉记者说：如果遇到“吃亏”这种情况，“开始我会以宽松的态度面对，可能会吃亏，但是无所谓，下次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最有可能的是，我结交一个好朋友，在交朋友的过程中，我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他。下次、下下次我们就会有更好的合作”。张德赛的许多客户都是他的朋友。“我虽然在做生意，实际上我是在跟人打交道，最后他们跟我之间是朋友关系。虽然我的价格要比其他地方贵一些，他们也不在乎，会跟我合作，他们的忙我也是会去帮的。所以说，从长远看是不会吃亏的，你可能是赢者。”这些都是来源于老子的“舍得之道”思想。在管理员工上，张德赛也用了“无为”思想。他说：“我不具体管理员工，而是要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反而更容易。我就发现员工的优点，有的人抽象思维比较好，有些人具体的事情做得比较好，任何一个人，只要你发挥了她的积极性，他一定有他的特点。”他认为“无为”管理思想会成为今后商界的趋势。“这要看大环境和管理者本人有没有达到修为程度。管理是分层次的，‘无为’的管理进入到最高的层次。它最符合人的本性，你信任、重视一个人，他会有更大的积极性投入到企业。”在做人的上，张德赛主张构建“上善若水”的理想人格，让“道商”心善如水；“无为”的信仰，让更多“道商”懂得“无为”即是“大为”的道理；“与人为善”，使他们与天下人为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思想，让他们知道回馈社会的重要性。所以，君子在钱财上，“取之有道，用之也有道”。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自称，在古代先哲中，只有两个人的思想能对他产生致命诱惑，那就是中国道家的老子和列子。潘石屹说：“对我来说，财富是场游戏，关键不在于能够赚多少钱，钱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大问题了，从中寻找人生的价值才是我现在最大的目标。”

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在《大象与小鸟》一书中称：“做企业，第一是不争，不要企图吃掉别人。我们不去寻求垄断的机会，不把自己的存在建立在

别人痛苦的基础上，而是力求让所有消费者、股东、员工及社会各界都喜欢我们，认为我们是个不错的公司，大家都需要你。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就是这个道理。”

武汉房地产商人陈永明，在房地产业打拼多年，后来他开始读《道德经》，并将《道德经》中的道家思想，应用于经营房地产业，他自己说：“这样做效果很好。”争地是做房地产生意经常要遇到的问题。过去的手段，往往是找关系，波动价格，想办法压住对手，比如说他出 1 100，我就出 1 150。陈永明说：“现在我就不是这样”，“我总认为别人这样做别人也苦，要替对手着想。我现在就是与竞争对手交朋友”。有一次六家开发商共同争夺武汉常青花园这一块地，开始先互相打压对方，使得该块土地的价格不断上升。这时，陈永明按照“与人为善”的价值观，开始与其中一个竞争对手做朋友，谈合作，两家联合做成一个项目公司。陈永明的房地产公司先用八千万买下了该地，拿地作价入股，总共拿出一个亿。另一家公司同样拿出一个亿，作为后期开发，包下了所有的建筑工程。最后，根据当初的项目注册资金分得利润。陈永明先生笑称：这是“有财大家发”。

7 天连锁酒店集团创始人郑南雁，骨子里带有卓尔不群的傲气，爱骑马，好收藏黄花梨、紫檀家具，极少应酬，不会疲于奔命地工作，他具有真正的道家思想的魅力。郑南雁的枕边常放着一本老子的《道德经》，有事无事翻一翻，既钻研又身体力行。他推崇的管理方式也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在 7 天酒店内部悄然而行的也是充满着“道商”智慧的“放羊”模式。

河南鑫山公司董事长朱铁玉也是一位“道商”。他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归于以下几条传统文化的影响。第一，家庭环境的影响。对朱铁玉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母亲朴实、善良的性格和“不争”的思想教育，对他个人性格的历练和做人准则的形成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学文化的影响。道学文化讲究“自然”，当让则让、顺其自然，管理企业和管理家庭一样，必须“以和为贵”，“以和生财”。鑫山公司始终恪守“顺其自然、以和为贵、科学管理、和谐发展”的理念，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第三，坚持“以民利为利”的不变准则。鑫山公司发展的 17 年，始终铭记着一条不变的准则——“以民利为利”，也就是鑫山公司“合力、和谐、

共创、共享”的发展方向。在传播和推广道学文化上，河南鑫山公司除了设立道学文化网站外，还与学者合作成立了中国道学文化研究会和河南省道学文化沙龙，举办多种道学文化研讨会（如2009年11月，承办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首届国际老子道学文化高层论坛”。之后，在河南郑州举办“老子道学文化高层论坛”）。

香港“楼神”、亚洲“股神”李兆基的经营秘诀，简单地说，就是“右手常拿《道德经》”。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声称：“我要做一名道商。”

南方李锦记总裁李惠森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他说：“我待在办公室的时间，每个月平均只有1~2天，这归功于‘无形领导’的原则。”

盛大网络董事长陈天桥说：“我读的最多的书是《老子》、《庄子》，管理10万人以下的网络社区可以用儒家的思想，10万人以上则需要用道家的思想。”

网易创始人丁磊先生，低调朴实，不重虚名。丁磊在一次对大学生的演讲中透露，自己喜欢的图书已经从国外的《基业长青》、《从优秀到卓越》变成了中国老子的《道德经》。

（三）《道德经》与潇洒人生

在当今社会里，由于过度的欲望，过多的选择，精神压力也大。无情的竞争使人们疲惫不堪，毫无人生幸福自由。

那么，如何才能使“疲惫的人们”过着一种潇洒的生活呢？只能从老、庄的道学中寻找。老子《道德经》是保持人的良好精神状态的一剂良药。不管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为道日损”、“身重于物”、“少私寡欲”、“上德若谷”和“知足常乐”理念，还是《庄子》中的“以死为乐”、“坐忘”之道和“逍遥游”的理想境界，都是构建潇洒人生的精神文化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家哲学是一种快乐自由的哲学。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么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

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许什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在我们的时代，只有这种自由快乐的人生哲学，才能把“世俗世界压迫下疲惫的人们”从人性异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第三章

“上善若水”的理想人格

在《道德经》一书中，虽有“善人”之说，但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圣人”。在《庄子》一书中，虽有“至人”、“真人”、“神人”、“天人”诸说，但出现频率最高的也是“圣人”。可见，在老子、庄子心目中，“圣人”是他们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老子在《道德经》第八章中，全面地阐述了圣人理想人格的文化内涵，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一章是以水比喻圣人之道，认为圣人的最高德性应如水一样，只要能做到“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就可以达到“几（接近）于道”的圣人境界。“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是“上善若水”理想人格的核心价值观理念。文中其余七种美德都是由它推演出的具体德目。

老子以水比喻圣人之道，人的理想人格也应是“上善若水”。“上善若水”的圣人之道，对于塑造“道商”的理想人格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善利社会”而不“争私利”

所谓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是说水虽是生命之源，施利于宇宙万物，

即水普遍地滋润宇宙万物，但从不为私利而争取回报。“善利万物”与“为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是“道”的一体两面：对“万物”来说，是“善利”；对“道”而言，是“不争”、“处恶”。这是一种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崇高品格和“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道德精神。

“道”对于万物虽不索取，但是也能从宇宙万物那里获取最丰厚的回报。由于水以善行恩惠于广袤土地上的花草树木，从而造就了万物共生共荣的优美自然环境，使天空能够及时地降雨，汇聚于河流、湖泊之中，及时地弥补了因空气蒸发和土地渗透而流失的水分，使得江河不会变成沙漠和戈壁上的“内陆河”，甚至干涸、枯竭。由此可见，利他即是利己，奉献即是索取，施舍即是获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八十一章）的哲学道理。

战国时期，中山国君有一次以羊肉汤宴请都城里的军士，在座的唯独大夫司马子期没有分到一杯羊肉汤。司马子期一怒之下，就跑到了楚国，劝楚王攻打中山国。中山国被楚国攻破后，中山国君只好狼狈逃走。在逃走的路，他看见有两个手拿武器的人，总是跟在后边保护自己。中山国君问：“这是为什么？”两人答曰：“我们的父亲有一次快要饿死了，是你把一壶水泡饭给他们吃，才救活了他们。所以，父亲临终时，一再嘱咐我们：‘中山国君若遭事变，你们一定要尽死力报效他。’”中山国君听后，仰天而感慨地说：“给予，不在多少，而在于正当别人困厄急需之际；怨怒，不在深浅，而在于恰好损伤了别人的心灵。我因为一杯羊肉汤而逃亡国外，也因为一碗剩饭而得到两个救我的人。”

商道如水。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有所失必有所得，有所得也必有所失。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道德经》三十六章）的哲学智慧。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回报社会就像水恩惠于万物，消费群体和个人就像森林和草地。企业家为消费者创造利益和价值，消费者自然也会通过认同而购买，汇聚钱财反哺于商家，如同草木使点滴雨水反哺于河流一样，企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商家只从消费者那里赚钱而不向社会奉献，势必会使

自己变成“内陆河”，迟早会在市场上消失。这就是市场中“舍”与“得”的辩证法。

按照“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价值观，中国古代商人皆能在“舍”与“得”之间进退自如，要求经商严格恪守“鄙利己，奉博爱”、“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原则。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曰：“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赴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清末晋商乔致庸也认为商人最重要的东西是“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明确“义”与“利”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价值观。

在现代市场中，香港首富李嘉诚在数十年的商海生涯中，始终认为内心的财富比外在的财富更为重要。在他看来，外在的财富可聚亦可散，只有“鄙利己，奉博爱”的内心财富才是真财富。李嘉诚的事业，说到底是一件事：一是“利从义出”的“赚钱”生意，二是回馈社会的“不断花钱”。所以，他把1980年创办的“李嘉诚基金会”戏称为“第三个儿子”。他说：“我就算是把财产留给两个儿子，他们也只是多了一点儿。我着力培育‘第三个儿子’，是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多一点。”李嘉诚告诉世人：李氏家族成员或基金会的任何其他成员，都不能在基金会获取任何利益。自基金会成立以来，李嘉诚已捐出及承诺捐出的款项已超过数十亿港元，专门用以扶贫、医疗和教育。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认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他在生前，几乎捐出了所有的财富，共计3.5亿美元，创办了3500家图书馆、各种学校和教育机构。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和金融巨头巴菲特不但是著名的慈善家，而且表示在生前也要捐出自己所有的财富。

“企业公民”是目前西方社会流行的一个社会概念。什么是“企业公民”呢？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企业，不但要提供公司本身的经济绩效，还必须关心和努力提高企业行为对社会和环境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所谓“企业公民”，是指企业应如个人公民一样，成为对社会和环境负有责任和义务的“社会团体公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生存的良好社会环境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使企业和社会、企业和自然处于“善”的良性循环之中。

基尼系数是考量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一个概念，在0~1之间波动。

当社会财富分配绝对平均，系数为 0；所有财富集中在 1% 的人手中，系数则为 1。0 或 1 都是理论数值，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在 0.2~0.3 之间，表明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在 0.3~0.4 之间，财富分配比较合理；在 0.4~0.6 之间，财富分配差距偏大。0.4 是“警戒线”，一旦超过 0.6，社会就处于危机状态，有可能发生动乱，社会基础动摇，社会环境恶化。中国的基尼系数 2003 年达到 0.458，超过了 0.4 的“警戒线”；2004 年超过 0.465，呈上升趋势，比同期印度的 0.375、日本的 0.249 都高。如果不能及时地解决我国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问题，缩小贫富差距，富人和穷人同坐的一条船，就有可能沉没，富人是不可能独逃厄命的。所以，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近年大力在我国提倡“企业公民”的理念，“极点有限，公益无限”，这就是王石的“企业公民”的箴言。他认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不只是政府分内的事，同时也是企业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二）以“居下流”为“善地”

所谓“居下流”，就是“处众人之所恶（厌恶）”的地方，具体来说，就是处于卑、贱、弱、下的地方，这是世俗之人所厌恶的。正如《论语·子张》篇所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但是老子不同于儒家，在他看来，“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这是说，江海所以能成为百谷之王（君主），就是因为它善于自居卑下，处在众流的下游，所以，它能成为众流之王。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世俗之人总是喜欢奉上欺下，攀高附贵，青云直上，争名夺利，称王称霸。而水则是本能地流向低凹之地，总是处在沟壑低谷和洞穴缝隙之中，去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圣人如水，不同于世俗之人，从不与他人争高下，甘居众人所憎恶的贱卑之地，具有崇高的谦卑美德。“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道德经》六十六章）圣人以江海为法，他在上领导人民，“必以言下之”，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

令，指手画脚，而是谦下相待，虚心向人民请教；他欲引导人民前进，“必以身后之”，不是利益面前一马当先，脱离民众，而总是把自己利益放在民众之后。正因为如此，“处上”而民不感到重负，“处前”而民不感到妨害。所以，普天下的民众，都乐于推戴他而从不厌弃他！

选择“处众人之所恶”的地方和岗位，可以在磨炼中造就自己的品德和才能，学会低调做人。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说过：“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处众人之所恶”的恶劣低下环境中，成就了他们的不朽之作。这就是“逆境出人才”的道理。

根据“居下流”的原则，企业家在商战中应按照“谦卑守弱”的原则行事。从企业经营管理上，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给管理者定位。首先，要求管理者按照“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原则，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员工，切不可霸气十足，高高在上，瞧不起自己身边的“小人物”。这也就是老子说的“善用人者为之下”的含义。其次，要求管理者要像水那样，善处下而不居高位，即勇于选择艰难困苦的地方和岗位，以磨炼自己、增长才能和提高品德。最后，要求在实施管理中不要犯越位的错误，随意干涉部下的管理权限，以免造成管理系统的混乱。

二是给商品定位。一般说来，商品定位战略分为两种：首先是跟踪战略。可口可乐虽是世界饮料巨人，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配方和包装几十年不变。于是，百事可乐在向它挑战时，就紧紧抓住它的这一弱点，大胆地改变了自己的包装，在市场上推出了一种 12 盎司的新型瓶装产品，使自己的销售额大增，从而赢得了饮料竞争的胜利。七喜柠檬汽水面对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强大攻势，处境十分困难。于是，七喜汽水在广告中将自己的商品定位为“非可乐型”，以区别于它们，第一年销售量就提高了 10%。美国鸽牌美容皂针对“清洗皮肤香皂”的不足，在做行销广告时，将自己的商品定位为“滋润皮肤的美容香皂”，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其次是甘居

人后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战略，即是关注“买点”，努力寻找市场空隙。日本摩斯汉堡店在同美国麦当劳的竞争中，采取的就是这一营销战略。麦当劳以广大顾客为消费对象，以服务迅速为其卖点，而摩斯汉堡则以固定的顾客群为消费对象，以殷勤的精神照料顾客，以弥补因亲手制作食品而要顾客等一段时间的缺陷。不管是哪一种战略定位，都要根据市场需要和企业自身特点来具体决定。

（三）心境如渊的清静心态

“渊”是老子用来形容“道”的形象概念，称“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所谓“心善渊”，是说深山老林中的深潭之水总是随遇而安，居于不争之地，故能水平如镜。正因为水平如镜，大千世界的景象才能映在水面上，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做人要像水那样深沉宁静，透彻明净，能够抛弃物欲的诱惑，不贪图，不强求，顺应自然，保持心胸宽广，眼光深远。面对现实生活的任何压力和挑战、危机境地和物质诱惑，都能保持心态平静，从容应对。这种心境如渊的清静心态，是管理者应具备的一种高贵品格。

近年来，中国家电市场的“价格战”如火如荼，许多企业家都难做到心平如镜。而海尔张瑞敏则能从波澜起伏的“价格战”中，高瞻远瞩地提出不打“价格战”而打“价值战”、不搞“出口创汇”而搞“出口创牌”的经营理念，这是海尔所追求的核心竞争力，为海尔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清华同方总裁陆致成的办公室里有四幅字：一是“无为”，即要努力做事但不强求，一切顺其自然；二是“振铎”，本意是敲钟，做人做事要始终警钟长鸣，要有“问题管理”意识，要有危机感；三是“高山海川”，要求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心胸宽一点，事做大一点；四是“杏花疏影里，吟留到明天”，要求在压力和挑战面前，既要只争朝夕，又要急事缓办，既要心急如焚，又要从容淡定，就像晚上在杏花村里吟诗一样悠闲。这四幅字，既有心静如水的淡定意境，又有如何达到这一人生意境的修行之道。

现代企业家面对的是一个“钱、权、名、色”所诱惑的世界。愈是为外

物所惑的时候，愈是需要保持心态宁静，努力做到“钱、权、名、色”面前“不动心”。在现代商战和管理中，企业家在遇到险情或身陷逆境时要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在企业经营中，面对风云突变的市场，风险之事在所难免；一旦陷入险境，一个成熟的企业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以理性来化解险情。如果不具有这种大将风度，而为情感所左右，必将铸成大错，危及生存和发展。

被誉为“亚洲影业皇帝”的邵逸夫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电影业竞争十分激烈的关头，被竞争对手抓住邵氏的一个失误，挖走了他手下的一大批明星，致使他每年电影拍摄量降至6部。邵逸夫先生没有被这一挫折所困扰，而是以冷静的态度采取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办法，将投资重点由电影业转向录影带业务，并且开展多元化经营（如地产业等），从而保持了香港影视界“巨头”的地位。

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塑胶公司，每月塑胶产量100吨，而台湾的月需求量只有20吨，大量产品积压，股东纷纷要求退股，台湾塑胶公司一时陷入了困境。王永庆沉着冷静，通过理性的科学分析，认为出路就在台湾岛上。他果断地决定在台湾“再建一个塑胶加工厂”。正是这种“我就是市场”（即把塑胶卖给自己的加工厂，然后出售塑胶成品）的经营决策，使他的台塑企业走向辉煌。

由上可见，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从容处之的以理制情、以静制动的冷静心境，对于化解危机、保证企业成功是何等的重要啊！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局者所以迷，“只缘身在此山中”，存在着利害关系，所以看不清事情真相；而旁观者所以清，是因为没有利害关系，所以能看清事情真相。企业家和管理者在大千世界，一定要冷静与淡定。在大家兴奋之时，你依然保持清醒和沉静；在大家绝望之时，你依然能点起希望的火种。这是成功的商人必备的内在素质。

企业家的思维状态，有动态也有静态。在紧张的工作中，企业家总是不停地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思维处于瞬息万变的动态之中。过度的动态思维，往往导致各种心理障碍，如谨小慎微、畏缩不前的恐惧心理，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玩弄小聪明的“浮明”之智等，这些都是不利于企业管理的。

要克服这些心理障碍，将动态心境转变成静态心境是十分必要的。所谓静态心境，并不是绝对的静止，而是一种特殊的思维状态，即在理智之外和毫无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去感悟现实。西方人把它叫做“沉思”，中国人把它叫做“禅悟”。企业家在紧张的脑力劳动后，不妨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按照佛教的“禅思”或庄子的“坐忘”或宋明理学家的“静坐”，每天修炼一段时间，使浮动之心渐渐静下来，并在宁静中悟道。人在宁静的心态中，往往会油然而生出许多绝妙的想法，在宁静中感知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各种现象，通过无形沉思增长智慧和力量。俗话说，“静能生智”，道理就在于此。西方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每天早晨都要在肃静的教堂里长跪三个小时。当助手劝他少跪一会儿去做事时，他说：“正是由于有那么多的事等着我去做，我就需要再跪一会儿。”马丁·路德的“静跪”是为即将开始的工作积蓄智慧和体力。西方有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天都要进入一间寂静、黑暗的密室中静坐一小时。其间，他什么都不去想，将滚滚红尘抛之九霄云外，进入“无我”的心灵境界，在宁静中回归到无智无欲的自然本性，以修复憔悴的身心，激发无穷的潜力。这就是老子一再强调的“静为躁君”（《道德经》二十六章）的哲学道理。

（四）做“仁商”而不做“狼商”

所谓“与善仁”，是说要水善养万物，无论植物还是动物皆受水的仁爱，而水善养万物只施恩惠从不求回报。植物皆受滋润之恩，动物皆得饮食之惠。圣人亦应如水那样，以仁慈之心待人接物，对待他人如同对待朋友一样，总是相亲相爱。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也就是老子的“三宝”之一：仁慈。所谓“仁慈”，就是慈善、慈悲、慈爱、慈祥。只有以慈善为怀，才能有善良之心，容人待物；只有以苦难为悲，才能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只有爱心普度，才能博爱天下，泽被后世。

一位工商管理学教授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是应该做“狼”还是应该做“羊”呢？多数学生选择做“狼”，少数选择做

“羊”。教授告诉学生：既不要做“狼”，也不要做“羊”，而应该做“人”。

近年来，“狼性文化”甚为盛行，主张在市场经济中张扬“狼性”：无视人性，残酷无情，为了战胜竞争对手，可以不择手段，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然而，在市场竞争中，固然需要顽强拼搏的“狼性”精神，但从企业长远利益来说，“狼性文化”是一剂致命的毒药，它在击倒对手的同时，也会大伤自己的元气，形成“双输”的结局。在企业内部，由于人性缺失，人与人之间容易形成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内耗局面。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虽然成功地塑造了“直销模式”，但是它却错误地推行冷酷无情的“流水线”做法，几乎把每个员工都视为流水线上的“人件”。人只是像螺母一样，被强行拧扣在流水线上，人的价值是以流程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既不尊重员工的人格，也不重视员工的才能。所以，企业员工认为“除了挣钱，这是一个不懂得关心人的企业”，是一个“思想真空地带”。在这样的“狼性文化”的背景下，企业员工纷纷流失。中国一家著名的IT公司，曾一度提倡“狼性文化”，鼓励员工以拼搏精神在市场上争取大客户，这使该公司在各地的代理商人心浮躁，认为它首先吃掉的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代理商。由于代理商心存恐惧，直接地影响到企业的销售额，公司不得不去安抚这些代理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有法家的刚性文化，但它更强调的是以“仁”为本的“人性文化”。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按照人性的要求，以“仁慈”待人，实施“仁爱管理”。他认为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你让利给客户，赢得的是客户对你的忠诚；你与员工分享企业成果，就会有一支忠诚的企业团队；你让利给政府，就会得到政府的支持与帮助。只有你首先为别人着想，让利于他人，他人才会关心你的利益，达到“共赢”的局面。如果在市场中“狼性”大发，乘人之危，到处坑害别人，肯定是要失败的。你死我活的“狼性文化”，不是市场运行的正常法则。

在西方，目前虽然还有人坚持缺乏人情的“流水线”管理方式，但多数公司更加重视的是企业员工的精神层面，而不是一味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如英国维珍公司布兰森先生认为企业的成功“在于你拥有什么样的员工，如果你的员工很快乐，每天面带微笑，以工作为乐，他们就会有出色的表现，顾客自然也会喜欢和你的企业打交道”。为了给企业员工营造一个“以工作

为乐”的人文环境，他把关心一切人的“博爱”精神视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必备品格。除了根据每个员工的喜好和特长，将他们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发挥所长外，还打破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坚持每月给员工写一封信，沟通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感情。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员工的工资福利，在澳洲买下美克匹斯岛，建设生态旅游园，让员工免费度假，与员工分享企业的劳动成果。这同中国的以“仁”为本的“人性文化”是相似、相通的。21 世纪企业文化的主流不是“狼性文化”，而是中国的以“仁”为核心的“人性文化”。

（五）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

所谓“言善信”，是说水是言而有信之物。江河汛期来往有时，海水潮汐应时而至，这叫“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道德经》七十三章）。所以，古人将它称为“信水”。圣人说话也应如水那样，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诚实守信。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多次谈到“信”的问题。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道德经》二十三章）；“轻诺必寡信”（《道德经》六十三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八十一章）；“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道德经》四十九章）；等等。

东西方文化虽在许多方面有差异，但在“诚信”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诚信”这一美德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诚信是最好的政策，也是一种最有效的商业资源。因此，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诚信都是安身立命之本。

2006 年初，在美国一所中学发生了一场争论。27 岁的女教师在生物课作业中，发现 28 名学生有网上抄袭行为，于是她判定学生的行为为剽窃，生物课判为零分，学生面临留级危险。在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下，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得分，女教师愤然辞职。这不但引起校内近半数教师提出抗议，表示如校方满足家长要求，他们也将辞职，而且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支持女教师。甚至有些公司向学校索取剽窃学生的名单，确保公司永远不会录用这些学生。他们认为，把学生教育成一名诚实的人，远比生物课得分和留级要重

要得多。这场争论说明多数美国人非常看重“诚信”二字。

中国本是讲“诚信”的国家。但是，近年某些中国学生，不但考试作弊，而且论文抄袭，更为可怕的是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发现德国售票系统的漏洞，多次逃票，三次被抓，均被德国记录下来。他毕业后，去跨国公司求职时，却屡遭拒绝。这是为什么呢？请看最后面试失败后双方的一次对话：“你们不录取我，是不是种族歧视的原因？”“先生，我们不是种族歧视，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公司一直在开拓亚洲市场，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那为什么不录取我？”“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你共有三次逃票记录。”“我不否认，但谁会相信你们就因为这件小事，而放弃了一个你们急需的人才？”“小事？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那也罪不至死吧？”“你的逃票记录证明了两点：第一，你不遵守规则，却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赖。公司很多工作是要靠信任进行的，如果你负责某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很多职权。为了节省成本，公司无法设置复杂的监察制度，所以我们无法雇用你。我相信在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用你的公司，因为没有人会冒这个险。”

2006年，在中国市场上曝出了“欧典”地板丑闻案。经中央电视台记者调查，所谓“创建于1903年”的“德国百年品牌”原是子虚乌有；所谓在德国的“欧典”总部，也不存在。它只是在国内注册、国内生产的一个地板品牌。真相被揭露后，“欧典”品牌在各地纷纷下架，消费者蜂拥索赔，这一假名牌形象轰然坍塌。

上述事件证明，欧美人士常说的“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这句至理名言，是何等的重要啊！

（六）“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所谓“正善治”，“正”即“政”也，即认为清静无为是治国的正道。圣人治国要选择“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五十七

章)，切不可出于私心，“以奇用兵”、“以智治国”。老子指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六十五章）所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态，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夫使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三章）。所谓“无为而治”，形象地讲，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六十章）。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所以，“清静为天下正（首领）”（《道德经》四十五章）。现代学者肖天石先生释曰：“政善治，则能端拱无为而自治，化育万物而自然，故能安和百姓而无名也。”

无论治理国家还是管理企业，都要按照“无知无欲”的自然人性，坚持“无为而治”的原则，切忌扰民的“以智治国”。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和管理者不能凭借手中的权力“瞎指挥”，违背市场经济和资本运行规律，这一方面的经验教训应认真总结和吸取。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这就是说，企业家和管理者不能以私利和个人意志来决策。只有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出发，深入广大群众，进行社会调查，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七）做事要遵循“因势随形”原则

老子所谓“事善能”，主要含义是圣人做事唯“道”是从，道法自然而不扰民。做事要遵循“因势随形”原则。“水无常形”这一事实说明，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唯一永远不变的是“变”。因此，圣人应如水那样，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己，与时俱进，以适应环境，做到“因势随形”，达到“知变则胜”和“方圆有致”的目的。

美国管理大师韦尔奇是一位善于“因势随形”的高手。他认为市场时刻在变化，企业家必须学会随时调整计划，以适应市场的变化。每一次戏剧性的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中，通用电气公司收购了泰国的很多企业。当“9·11”事件突然发生后，航空业跌落到谷底，GE

又收购了几百架飞机。当有人在悲剧性变化面前恐惧时，企业家应该带领你的企业员工奋勇向前，切不可裹足不前。

中国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深谙“知变则胜”的道理。他认为一要快变，通过快速变化来满足市场需求，实现组织、观念、经营模式和人的变化；二要善变，在变中找到机会。刘积仁是中国 IT 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没有把东软的市场定位在国内，而是主要定位在国际市场，定位在“解决方案提供商”上，形象地说，就是一个负责任的 IT 业的“装修公司”，即你要买一座什么样的房子，应该装修成什么样子，需要花多少钱，东软会给你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在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的同时，东软也赢得了自身价值。

杭州贝因美集团根据市场潜在的发展之“势”，顺应消费者的实际需要，把它的营销模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贝因美集团总裁谢宏依据他的“‘人’是最本质的存在，为‘人’服务，是我事业的全部价值所在”的经营理念，在食品市场上，面对外国的“亨氏”、“雀巢”两大强势公司的压力，发现外国的婴幼儿食品不一定适合中国婴幼儿。中国婴幼儿所需要的是含碘的、蛋白质含量丰富且易吸收的断奶期食品。基于这一发现和潜在需要，他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把“卖点”转换成“买点”，即我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你的产品能满足我的需要吗？在观念转变的基础上，他们将大量资金投放在“育婴工程”上，在最大限度地提高顾客满意度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贝因美集团也是一个“因势随形”的成功案例。

如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能“因势随形”，“必败”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中国东方通信公司曾是中国最大的移动通信上市企业，连续 6 年进入中国 500 家最大工业企业之列，位列 2000 年度中国上市公司 50 强的第 18 位。在成功面前，东方通信公司高层领导没有危机感，满足于既定的经验模式，满足于公司作为“摩托罗拉加工车间”的角色，盲目乐观，在技术上和销售上过分地依赖摩托罗拉和普天集团，不能根据市场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当进入 2001 年，在国内移动通信市场饱和的情况下，摩托罗拉又中止了与它的战略伙伴关系，东方通信不仅失去了订单，还失去了技术升级能力，到 2002 年，公司利润负增长 8%，2003 年上半年巨额亏损达 6.4 亿元。

东方通信的失败，证明在市场上“守常必败”几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企业家要想打造“百年老店”，使之成为永葆青春的企业，就必须在成功面前抱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心态，不断地去适应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灵的变化，成为站在市场潮流前头的领军人物。

（八）做人应做到“动静有时”

所谓“动善时”，汉代河上公释曰：“夏散冬凝，应期而动，不失天时。”圣人行动也应像水那样，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做到动静有时。水在流动中，遇阻则让，逢高绕行，从不强求。圣人遇强则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动静皆随机而行，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管理学大师韦尔奇在企业创新中反复强调“只有改变、改变、再改变。要整装以待，注视它、预测它、超前它、创造它”。在市场竞争中，管理者要学会随环境而变，随时间而变。只有真正“随机而动”的企业家，才能做到以变制变，在变中寻找商机，以变求胜。

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是一位善于在变化中发现商机的优秀企业家。他从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发现此领域不仅有巨大的社会需求，还面临着环保与节能的双重压力，这使传统的建筑方式颇为窘迫。为了适应社会与环境的新的要求，他及时地提出了“住宅工厂化”的新理念，“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大胆革新技术，用预制构件和装配的方法，大规模地生产房子，这种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超前意识和创新理念，一定会给万科带来巨额利润。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将是 21 世纪的新客户，也是企业的未来员工，他们追求一种另类个性消费。王石以超前的发展眼光，认真研究这一新的社会群体，了解他们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做事，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为万科集团若干年后的产品开发、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和销售模式的变化，提供科学决策的客观根据。否则，万科集团就无法适应新客户、新员工、新管理时代的到来，也就无法从这一转变中捕捉到商机。企业家要具有一双慧眼，学会在“趋势”和“动向”上做文章。企业一旦不能适

应社会的变化，它的失败是预料中的事。企业的强与弱、大与小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只有企业适应变化是绝对的。

人生处境分为逆境和顺境，如何激励从失败走向成功，又如何防止从成功滑向失败，是每位企业家和管理者认真研究的人生课题。

身陷逆境之时，牢记“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相信逆境可以磨砺人，可以激励人，可以成就人。要学习水的“万折必东”的精神，即水在流行中，不管河道如何曲折，不论千沟万壑的环境如何恶劣，都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奔赴东海。当有人向施振荣问到“不断地面对失败，有没有绝望的时刻”这一问题时，他坦然回答说：“不会。我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条路走不通，我可以放弃，换条路，总归会走通。”日本八佰伴集团前总裁和田一夫虽经过三次重大失败，但他敢于面对失败，认为“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质，那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穷光蛋’了”。八佰伴倒闭后，他经过整整一年的自我反省，重新创业，仅用一年零九个月就带领新公司上市，实现了自己的誓言：“火凤凰必将重生，在燃烧自己后，会再创新天地，大不了从零开始。我是一只不死鸟。”

身处顺境之时，要牢记老子的“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告诫，做到“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切不可“暴发户”心态，处处炫耀财富。宜家公司老板坎普拉德指出：“成功是成功的最大敌人。”李嘉诚认为“经营企业，‘知止’两个字最重要”，因为“全世界很多企业之所以失败，最少一半都是由于贪婪”。美国大型零售企业凯马特的失败，就是一个不懂“知止”的典型案列。在逆境或顺境中，能否找到商机、抓住商机，最可怕的不是客观环境和竞争对手，而是企业家和管理者能否具有积极的“心态”。只有首先战胜自己，才能在市场上战胜他人。

第四章

“逍遥游”与人生境界

“逍遥游”是《庄子》一书中的名篇，也是庄子所追求的潇洒人生境界。所谓“逍遥游”，西晋郭象释曰：“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涂。”（《庄子注》）清代王先谦亦释曰：“逍遥乎物外，任天而游无穷也。”（《庄子集解》）逍遥游即是适情任性，闲放不拘，超然于物外，无往而不适。大体上相当于现在说的“自由自在”、“怡然自得”，也就是一种描绘人的心境状态的理想境界。庄子把“逍遥游”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待”的相对自由，也就是“游方之内”的有限自由；一种是“无待”的绝对自由，也就是“游方之外”的无限自由。把“游方之内”的有限自由与“游方之外”的无限自由结合起来，即是庄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圣人”。

庄子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境界，不仅长期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人生价值取向，而且对于我们重构现代人的心灵境界和理想人格都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商人只有在有限自由的现实世界中，通过“坐忘”之路，才能逐步达到“逍遥游”的人生境界。

（一）“游方之内”的有限自由

“游方之内”的有限自由，也叫“有待”的相对自由，就是有所依赖、

有所凭借、有所制约的自由，主要是指人的某种愿望和要求的实现一定会受到来自各种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制约。

庄子在《逍遥游》中以赞美的口气指出，北海有一条名叫鲲的鱼化成一种名叫鹏的鸟，其身形美丽巨大，仅鹏之背若太（泰）山，起而腾飞就有几千里，它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每当海动风起之时，它就迁往南海，“水击三千里，抟（拍）扶摇（海中飓风）而上者九万里。去（去南海）以六月息（风）者也”。庄子如此赞美鹏，而蝉与学鸠却嘲笑它，认为何必“上者九万里而南为”，还不如自己“腾跃而上，不过数仞（七尺）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到近郊野林去游，带上三餐就可以往返，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之外去游，只要一整夜时间捣米就准备好干粮；到千里之外去游，就要准备三个月粮食。不管是“抟扶摇羊角（旋风）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的鹏鸟，还是腾跃于蓬蒿之间的学鸠，虽说都有不同适情任性的“逍遥游”，但都是有所凭借的。鹏鸟所适者只限于南海，蝉与学鸠所适者只限于“枪（撞、碰）榆枋而止（栖集），时则（或）不至而控（投）于地而已矣”，非能游于无穷，游于乌有之乡，在空间上是有限的，而且它们都是借助于风力而飞的。所以，这种有限的自由还不是庄子所追求的真正的“逍遥游”。

以鹏鸟、蝉与学鸠为代表的动物界无法真正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就连现实生活中的人也只能获得有限的相对自由。人世间的相对自由又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富贵者，他们虽有钱有势，但也无法真正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庄子指出：“夫知效一官，行比（合）一乡，德合一君，而（能）征一国者。”在庄子看来，有的人才智只能胜任一官之职，有的人品行只能服务于一乡之人，有的人德性只可投合一位君主的心意，取得一国人的信任，只能统领一国之事。但是，他们都是囿于一隅而自鸣得意，尚未跳出世俗社会的局限，如同蝉与学鸠一样，所见甚小。他们只知追名逐利、升官发财，在世俗社会中沉浮挣扎而不能脱身。他们还不能“定乎内外之分”，即认定自我与外物的区别；不能“辨荣辱之境”，即辨明荣誉与耻辱的界限。刘武先生释曰：“定内外之分，未能无己也；辨荣辱之境，未能无功与名也。”

未能无己、无功与名也，心亦何能逍遥乎？”（《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第二个层次是道家稷下学者宋荣子。宋荣子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庄子·天下》）。他能够做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正因为他能够超越世俗社会的是非毁誉之争，不为之所左右而丧失自我，较之前面三种人，无疑高出一筹。但是，在庄子看来，宋荣子还没有真正树立齐荣辱、齐内外的价值观，没有跳出物我的封域，未能达到最高的“逍遥游”境界。宋荣子虽不是世俗之辈，但较之列子要逊色得多。

第三个层次是列子。列子“贵虚”（《吕氏春秋·不二》）。庄子以列子为例指出：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返）。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即列子超凡脱俗，免于行走之苦，驾风而行，飘飘欲仙，那样轻盈美好。但是，列子飘飘欲仙是以“风”为条件的，而且过了十五天后才能返回。他虽对富贵之事并未汲汲以求，但毕竟有所依靠。不但要凭借风力才能飞行，而且行与返之间空间狭小，时间短暂，时空的有限性必定使他的精神受牵制与羁绊。他较之宋荣子虽然超脱了世俗社会，但还没有超脱“自我”，未达到绝对的“逍遥游”境界。

上述三种层次在境界上虽有高低之分，但都是“有待”的相对自由。如果在此基础上，能够“乘天地之正”即顺应天地万物之性，而“御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之辩（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那就不需要什么凭借了。只要能够真正做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即达到忘我境界的“至人”，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臻于人格完美的“圣人”，不去追求权势、名誉和事功，齐毁荣之限，齐物我之分，完全与“道”合而为一体，将宇宙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忘却一切，就可以真正达到“无待”的“逍遥游”的人生境界。

我们从庄子的“游方之内”的有限自由中，也可以吸取某些有益的人生智慧。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人，按照郭象的“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庄子注·逍遥游》）的原则，充分发挥其生而具有的独特潜能，就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获得一定的自由。“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庄子·骈拇》），意思是说，鱼顺其本性而为之，在水中游来游去，就是一种自

由和快乐；相反，“人处水而死”。“鳧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庄子·骈拇》），违背其自然本性而人为之，势必会造成“悲”和“忧”的结局，哪里还有快乐与自由可言呢？每个人如能遵循道家的“各有其性，各尽其宜”多元价值观生活，就能“活出意义来”。正如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所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有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活出意义来：从集中营说到存在主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天性，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活法，大可不必模仿他人和盲目攀比。在理性精神指导下，通过冷静的科学对比，实事求是地找出自己的优点和特点，扬长避短，就可以在实现独特价值中找到无穷乐趣，克服因盲目攀比而造成的浮躁心理和无所适从的感觉。喜剧演员卓别林在开始演电影时，一味地模仿德国一位有名的喜剧演员却未获成功。后来，他按照自己的天性和特点，才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和戏路，成为别具一格的世界喜剧大师，从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虽然都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人和人之间的自由度具有明显的差别性。这种差别性，主要是由其“厚积”不同而造成的。庄子论证说：“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小草）为之舟；置杯焉则胶（粘着），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庄子·逍遥游》）这就是说，“厚积薄发”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如果水积不厚，就不能养大鱼，就不能够游大船，因为积厚乏力，自然大鱼无法生存、大船难以游动。

“厚积薄发”是医治现代人浮躁心理的一剂良药，也是扩大自由空间、走向人生成功的必由之路。《道德经》六十四章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纂）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一再告诫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急功近利者：“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只有坚持始终如一，一点一滴地不断积累，从健康与知识、道德与智慧诸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方可“大器晚成”。从无名到有名，从贫贱到富贵，从无权到有权，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是成功人生的必由之路。正如中国工程院教授俞汝勤所说：“几乎每一项诺贝尔奖都是科学家积厚薄发才获得的成果。”老子深谙“欲速则不达”的人生哲理，指出：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道德经》二十四章）意思是说，企而立者不可以久立，跨而行者不可以长行，说明急功近利者和心理浮躁者是难以走向成功之路的。只有在“积厚薄发”上下工夫，才能在人世间获取更大的自由空间，“积厚薄发”与自由空间是成正比的。

（二）“游方之外”的绝对自由

所谓“游方之外”的人，是指庄子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圣人”。他们不是以追求人世间的权势、钱财和名誉作为价值取向，而是要把自己塑造成“游乎尘垢之外”（《庄子·齐物论》）的齐物我、齐荣辱、齐生死、齐是非的绝对自由的人。换言之，就是要追求一种“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天下》）的人生理想境界。

“圣人无名”，是指圣人以追求仁义、道德和权势之名作为人生的旨趣。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儒家所鼓吹的仁义礼乐，不过是束缚人性的枷锁。“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庄子·天运》）“屈折礼乐，响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庄子·骈拇》）这就是说，儒家所追求的仁义道德，虽说满足了人们的求名之心，但是却违背、破坏了人的本然真性。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以来，天下之人莫不“奔命于仁义”，“以仁义易其性”，其结果“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骈拇》）。所以，以仁义道德求名，是不值得提倡的。在庄子眼里，仁义和权势不过是一只“腐鼠”，这表示了他对功名利禄的极大轻蔑。庄子《秋水》篇有一则故事曰：“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凤凰一类的鸟），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猫头鹰）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耶？’”只有“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才能从“功名”与“权势”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与“道”合一的圣人

境界。

“神人无功”，是说神人不以追求事功之名和富贵显达为人生的价值取向。在庄子看来，为了进入“逍遥游”的境界，必须摆脱追求富贵显达的欲望。在《庄子·盗跖》篇中，庄子借知和之口，抨击了世俗的富贵显达观念，指出这种世俗观念，有六大害处：一曰“耳营（听）于钟鼓管籥（箫笛类）之声，口噍（快意）于刍豢醪醴（牛羊美酒）之味，以感其意（意志），遗忘其业（事业），可谓乱（迷乱）矣”；二曰“倏（音该，噎）溺于冯（音愤）气（盛气），若负重行而上坂（斜地）也，可谓苦矣”；三曰“贪财而取慰（病或怨），贪权而取竭（消耗精力），静居则溺（身体沉溺），体泽则冯（身体充盈则意态骄满），可谓疾矣”；四曰“为欲富就利，故满若堵耳。而不知避（积财高于墙而不知足），且冯而不舍（贪求不舍），可谓辱矣”；五曰“财积而无用，服膺而不舍（固守不舍），满心戚醮（烦恼），求益而不止，可谓忧矣”；六曰“内则疑劫请之贼（在家里担心小偷、窃贼），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建楼墙以防窃贼），外不敢独行，可谓畏矣”。这六者是“天下之至害也”。如果不能抛弃富贵功利世俗观念，一旦患至，“求尽性竭财，单（但）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所以，古代隐者许由、善卷，虽尧舜让帝位给他们，他们“计其患，虑其反，以为害于性，故辞而不受也”（《庄子·盗跖》）。《庄子·让王》篇所阐述的15个寓言故事，也是旨在宣扬以生命为贵、以名利为轻的“重生”思想的。

“至人无己”，是说至人“忘己”，亦即“丧我”（《庄子·齐物论》）。老子指出：“吾所以有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十三章）意思是，我之所以有层出不穷的忧患，就是由于过度地关注“自我”，如果忘却“自我”，哪里还有忧患呢？所以，道家要求至人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彻底忘记自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天地》）只有“无己”，才能做到“无功”、“无名”。庄子赞美“忘己而自适”的理想追求。他说：“忘足，屦之适也；忘要（腰），带之适也；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达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至人无己”，也就是圣人“无情”。所谓“无情”，是说圣人“喜、怒、哀、乐不入胸次”，即不以取、与、知、能等意向骚扰

守静之心。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圣人“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庄子·知北游》）。“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欲无情，首先要求圣人对是非不动感情。“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在庄子看来，一切是非之辩，无异于风声，毫无价值。所以，他主张“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庄子·齐物论》），从世俗所谓是非之辩中解脱出来，不为社会上所谓善恶、美丑、是非所动情。其次，在庄子看来，人的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非人力所能改变，故亦不必为生死动情。“得（生）者，时也；失（死）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庄子·大宗师》）生与死不过是“一气”的不同变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庄子不仅要求人们去掉贵、富、显、严、名、利六种欲望，因为它“勃志也”，而且要求去掉容、动、色、理、气、意、恶、欲、喜、怒、哀、乐等情绪，因为它“谬心也”、“累德也”，甚至还要求去掉去、就、取、与、知、能等意向，因为它“塞道也”。只有彻底忘掉这一切，才能做到“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

人如果真能做到“无名”、“无功”、“无己”，便可以达到“逍遥游”的理想境界。只有进入“逍遥游”境界的人，才是庄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真人”、“至人”、“神人”或“圣人”。这些理想人格，从道德境界上看，是超脱物我、是非、善恶、生死之外，“小我”与“大我”是融为一体的。他说：“彼方且与造物者（道）为人（偶），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痂，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之先后之所在！……芒（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庄子·大宗师》）这些理想人格，不受世俗礼教的任何约束而遨游于无穷的宇宙之中。他们“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圜垠之野”（《庄子·应帝王》）。

由上可见，“无待”的绝对自由，就是无任何负累的自由，也就是一种“游乎尘垢之外”的绝对自由。这是庄子一生所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

（三）通往“逍遥游”的“坐忘”之路

在庄子看来，“无待”的绝对自由，在世俗社会中所以无法实现，主要的障碍或原因是“外内之刑”的制约。他说：“为外刑者，金与木也；为内刑者，动与过也。宵人（犹小人）之离（罹）外刑者，金木讯（问罪）之；离内刑者，阴阳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庄子·列御寇》）意思是说，来自身体之外的刑罚，主要是刀锯釜钺和捶楚桎梏；来自内心的刑罚，主要是指内心情欲过度而懊恼。小人遭受外刑，主要是指刀斧和桎梏来问罪；遭受内刑，主要是指阴阳两气交错而剥蚀。能够避免“外内之刑”，只有“真人”才可以做到。换言之，所谓“外刑”，主要是指身之外的法律制裁和道德约束；所谓“内刑”，主要是指伤害、扰乱人的恬淡、静虚、无为心态的五种人生困境：一是生死之忧，二是礼乐仁义之困，三是善恶是非之扰，四是情欲之累，五是权势钱财之惑。庄子认为，要克服这五种人生困境，就必须从生死、礼乐、仁义、善恶、是非、情欲、权势和钱财中超脱出来，将心灵升华为“游乎尘垢之外”的精神境界，从而获得人生的真正自由。

要想克服世俗社会中人们由生死而产生的恐惧感，庄子认为就必须提倡一种“达生”的超然态度。他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庄子·达生》），即不能违背生命的自然本性，强迫生命为其所不能为的事。只有置生死于度外，按照死生“无变乎己”的原则，才能真正做到“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诤（欣），其入不距（拒）；脩（无拘束）然而往，脩然而来”（《庄子·知北游》），从根本上排除死亡恐惧对人心的困扰，形成一种“自然无为”的人生心境。

要想超越世俗的礼乐、仁义之困，就必须持一种“退仁义，宾（摈）礼乐”的无为态度。庄子指出：圣人“芒（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庄子·大宗师》）又指出：至人不为“形德仁义”所累，“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

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摈）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庄子·天道》）。只有“至人之心有所定”，才能“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

要想超越世俗社会的善恶、是非观念，庄子根据道家的“齐是非”、“超善恶”的理念，提出“不藏是非美恶”的命题。在庄子看来，人如果为世俗的美恶、是非之争所困扰，势必会造成“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庄子·养生主》）的结果。成玄英疏曰：“为善也无不近乎名誉，为恶也无不邻乎刑戮。”（《庄子疏》）这样，不但“疲役心灵”，而且“更增危殆”。所以，《庄子·天地》篇主张：“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只有在心灵中“不藏是非美恶”，才能跳出世俗社会的善恶与是非，达到“大善”、“至善”的圣人境界。

要想超越世俗社会的情欲之累，道家大力提倡“无情”论。庄子指出：“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故不足以滑和（扰乱本性的平和），不可入于灵府（心灵）”（《庄子·德充符》）。又指出：“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庄子·田子方》），“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所以，圣人“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庄子·田子方》）。

要想超越世俗社会的权势钱财之惑，道家提出了“不以养伤身”、“不以利累形”的观念。庄子对世俗的名利权势钱财之惑批评说：“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善名）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声音也；所下者，贫贱夭（夭折）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庄子·至乐》）又说：“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庄子·徐无鬼》）“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庄子·骈拇》）不论是“殉仁义”之君子还是“殉货财”之小人，“危身弃生以殉物”

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必须摒弃名利之心，不以名利易其性，才可以消解世人的绳约之缚、悲忧之苦。

那么，如何才能超越生死、礼乐、善恶、是非、情欲、权势和钱财，恢复人的“虚静恬淡无为自然”的本性，从而回归到圣人追求的“游乎尘垢之外”的绝时自由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庄子提出了“心斋”和“坐忘”之说。

何谓“心斋”呢？庄子指出：“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庄子根据老子的“为道日损”的修养之道，主张排除一切私心杂念，专志一于“道”，既禁止用耳去听外界美妙的声音，也禁止用心去体验内在的心灵，只用“气”去真观其心。这里所谓“气”，不是纯生理之气，而是通过“离形去知”的减法，使心灵活动达到极纯极精的境界，实际上就是空灵明觉之心态。所以，“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只要能够守住人的空灵虚明之心，保持无知、无欲、无情的人性，即可与“道”合而为一。所谓“心斋”，就是一种修养达到的空灵明觉的心境。只要进入这种空灵明觉的境地，就是圣人追求的绝对自由的境界。

要想守住这种空灵虚明之心，使人心始终保持“虚静恬淡无为自然”的状态，就必须通过“坐忘”之路才能逐步达到。何谓“坐忘”呢？他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所谓“堕肢体”或“离形”，就是超越由生理而来的情欲；所谓“黜聪明”或“去知”，就是超越由心灵而来的知识。这样，就可以与“道”通而为一体，成为“悟道”的圣人。《庄子·庚桑楚》篇指出：“彻（同撤）志（意志）之勃（同悖，乱），解心之谬（系缚），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高显）严（威势）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姿容）动（举动）色（颜色）理（辞理）气（气息）意（情意）六者，谬心也；恶（憎恶）欲（爱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去舍）就（就从）取（贪取）与（付与）知（知识）能（技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荡乱），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坐忘”是一个由“忘形”、“忘利”到“忘心”的过程。《庄子·让王》

篇指出：“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庄子·大宗师》篇中有一段南伯子葵与得道者女偶的生动对话，形象地阐述了世俗之人的“悟道”过程。南伯子葵问女偶说：“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对曰：“吾闻道矣。”又问：“道可得学邪？”女偶答曰：我曾告诉过一个人如何“学道”。他听后而坚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遗忘世故）；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不为外物所役）；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将生死置之度外）；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心境就能清明洞彻）；朝彻，而后能见独（体悟绝对的‘道’）；见独，而后能无古今（不受时间限制）；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进入不受死生观念拘执的‘道’的精神境界）”。悟道是从“外天下”、“外物”、“外生”到“朝彻”、“见独”、“无古今”，而“入于不死不生”的过程。这是一个心灵自我减法的否定过程。人只有从世俗感性世界中，将其内外束缚一层一层地剥离出来，真正形成“无己”、“无功”、“无名”的空虚无为的心灵，才可以进入与“道”合而为一体的“逍遥游”境界。正如刘武先生所云：“人之不能逍遥者，有为也。其所为者，名也，功也，己也。此外则有有用之材也。……夫至于无名、无功、无己、无用，斯无为矣，斯逍遥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唐代道教哲学家司马承祯将儒家与佛教的修养之道加以改造和吸收，撰写了一篇《坐忘论》，进一步发展了庄子的“坐忘”之说。他认为要想得道成仙，必须通过“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七个阶段，才可以逐步地达到“与道冥一，万念俱遣”的“逍遥游”人生境界。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个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不可能存在于“无何有之乡”（《庄子·应帝王》）或“无人之野”（《庄子·山木》）。正如《庄子·人间世》所云：“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既然人伦世情是无法逃避的，那么，当庄子从理想王国走进现实社会的时候，他不能不对世俗社会采取“顺世”和“遁世”的态度。

什么是“顺世”的态度呢？所谓“顺世”，主要是由三个命题组成的：

（1）“安之若命”。《庄子·德充符》篇指出：“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唯有德者能之。”《庄子·人间世》篇亦指出：“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认为，“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必然性，人对它无可奈何，只能“安之若命”。“安之若命”要求有德者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做到“安时而处顺”，这是一种极高的道德修养。

(2) “安时而处顺”。《庄子·大宗师》篇指出：“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这里所谓“安时”，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求有德者在自然界和世俗社会中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要安于自然，泰然处之，保持心灵愉悦；所谓“处顺”，重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要求与世偕行而不相抵触。《庄子·山木》云：“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庄子·人间世》云：“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这里讲的“为婴儿”、“为无町畦”、“为无崖”，就是大智若愚，勿露锋芒，尽量顺人，切不可触犯他人。如此，就可以“入于无疵”，达到“哀乐不能入”和免害保身的目的。

(3) “顺人而不失己”。《庄子·外物》篇云：“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如果片面地只强调“安命”、“顺人”，那就有可能出现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中国哲学史》上卷）也许庄子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庄子不只讲“安命”、“顺人”，他还特别强调“不失己”，把“安命”、“顺人”与“不失己”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安命”、“顺人”是以“不失己”为前提的。在人际交往中，庄子主张“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庄子·知北游》），要求圣人待人处世“不伤物”，即不以言行伤害他人，他人也就不会伤害你，才能保证“不失己”。“顺人而不失己”既有灵活性的“顺人”，又有原则性的“不失己”，是一种辩证的、高超的方圆之道。

什么是“遁世”的态度呢？所谓“遁世”，就是“削迹捐势，不为功名”

而隐身山林的“不合作”态度。《庄子·庚桑楚》篇描绘道：至人“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庄子·则阳》篇亦描绘道：圣人“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在“仅免于刑”的恶劣社会里，如何免祸保身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在庄子看来，“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庄子·山木》），是最为安全的办法。这种遁世态度是以“无用之用”理论为根据的。在《庄子·人间世》中指出：“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以畸形之人为例论证说：有一个畸形人，当国家有战争的时候，因为他“有常疾不受功”；当国家给病者发粟米时，他却领到三钟米和十束薪。所以，潜隐于众人之中或林泉之畔而不显露其才华和功名，既是对世俗社会和恶劣环境的哲学反思，也是自我保护意识的理性升华。

由上可见，庄子所追求的“游乎尘垢之外”的绝时自由，是一种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游”。这种“逍遥游”的人生境界，虽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却是一种哲学理性的升华，是人的一种自觉意识的醒悟。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种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庄子对战国时期人类文明所滋生的异化现象的哲学反思，对于物欲横流、价值迷惘、道德滑坡、心灵浮躁的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庄子所追求的“逍遥游”人生境界，虽然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性质，但是，在某种特定的人生境遇中，实际上也会出现短暂的“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当人在旅游时，亲近自然，热爱自然，回归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就可以净化心灵，陶冶性情。山川的美景，江海的宽阔，山岳的崇高，飘逸的蓝天白云，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静谧的潭水，天色一体的湖泊，都能短暂地缓解人的紧张心理，使人淡化名利意识，忘却烦恼和忧虑。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描绘的岳阳楼、洞庭湖的美景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

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岳阳楼和洞庭湖的美景而激发出的他的“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内心愉悦，既不是世人沉溺于声色肉欲的放纵，也不是释老出世的禁欲之乐，而是一种超越功名利禄得失而回归自然的自得之乐。正如他在《定风波》中所云：“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桃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这正是一种超乎世俗社会一切羁绊的“逍遥游”境界。

人生读书，实际上是一个求知求道、修身养性的过程，也是人生境界不断升华的过程。明代民族英雄和著名诗人于谦在《观书》一诗中，盛赞读书之乐，极写读书之趣，诗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两眼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现代也有一位名人在他的书房内，挂有一副对联云：“抛他难抛身外物，读我平生未读书。”当人在静静的书房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去解读书中所阐述的哲学智慧和人生理念而有所悟的时候，就会顿时将自己一生所追求的钱、权、名、色等“身外物”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完全摆脱令人痛苦的世俗的“功利境界”而升华为君子的“道德境界”。这里所说的“胸次全无一点尘”的“道德境界”，是一种快乐和谐的人生境界。这正是“世事浮躁，唯拥书城而心静；人间烦嚣，但闻墨香而气平”。法国哲学家梅里特在《人是机器》一书中，正确地指出：“征服全世界也抵不上一个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所尝到的那种快乐。”这也是一种难得的“逍遥游”境界的快乐。

庄子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具有两重性。作为一种理想，他所追求的是绝对自由的“逍遥游”，幻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傲）倪万物”，但在行动上，则“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他的“方外之游”与“方内之游”正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现。“至人”、“神人”、“真人”或“圣人”，是“方内之游”与“方外之游”的统一典范。

庄子的人格论和境界论，虽然缺乏儒家和法家的“经世济民”的胸怀和

奉献精神，但是庄子睥睨人生，超然尘外，以完成自我的精神超脱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反映了人生过程中逆境下的一种文化心态。正如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说：“得志于时而谋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诗广传》卷四《大雅四十八论》）这一论断，描绘出了人在不同境遇下的不同文化心态。当人“得志于时”，则推崇儒、法的理想人格，他们以“经世济民”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的这句话，充分地反映了儒家的参政意识和“谋天下”的胸怀。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句，都是儒家的积极入世和奉献精神的体现。而一旦人们“失志于时”，则往往倾心于老、庄的人生追求。他们淡化当官心理，“越名教而任自然”，欲图“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圉垠之野”（《庄子·应帝王》）。陶渊明失意后所追求的理想，即“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即是失意者的普遍心态的形象描绘。在任何社会里，都有得志者与失志者之分，任何人的一生也都有“得志于时”与“失志于时”之别。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设计的各种理想人格，都能起到保持人的心理平衡的调节作用，都有其存在的社会价值。这也正是儒、法与老、庄两种不同的理想人格所以能够长期互补、并存的原因所在。

庄子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虽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却深深地埋藏在现代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既有消极作用，也有积极作用。庄子的理想人格，虽然具有遁世与利己的性质，但是其至少有三点是应该肯定的：一是鄙视权贵，淡化做官心理。这种“粪土万户侯”的精神，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具有某种进步意义；二是肯定人的个体生命价值，从而填补了儒、法两家在价值观上忽视生命价值的缺陷；三是立足于整个宇宙，使人心胸豁达，提供了在逆境中得到解脱的方法，求得心理平衡，从而填补了儒、法思想留下来的精神空间，起到了抑制外来宗教在中国

文化中滋长的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今天，在重构现代化的理想人格过程中，我们应该细心地对它加以鉴别，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把它作为传统理想人格向现代化理想人格转换的重要基因，这对于塑造现代化的理想人格，培养适应当代需要的普遍人格具有借鉴意义。如果有人认为构建现代的理想人格就必须全盘否定庄子的理想人格之说，简单地将它斥之为“阿 Q 精神”或“混世哲学”，则是一种不可取的粗暴态度。

第五章

“上德若谷”与和谐人生

“上德若谷”这一命题源自于《道德经》四十一章。这里，“谷”是指“两山间流水之道”，“上德若谷”是说上德之圣人，虚心若谷，涵盖天下，无所不容，无所不应，气度恢宏，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圆通性。“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六十六章）宋常星释曰：“江海能为百谷之王者，因江海之地形，善以卑下自安。众谷之川流，无不归之者，以其有容纳之量，故聚众流而成江海，为百谷之王也。”

所以，每个人要想在和谐的人生旅途中“潇洒走一回”，具有宽厚美德是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石。在待人接物上，要求具有宽宏、宽容、忠厚、大度的品格，切忌待人尖酸、刻薄，切忌嫉妒和心胸狭隘。宽厚之德，是构建和谐人生的重要保证。宽则得人，宽则得福，宽则得乐。正如佛寺里的弥勒佛一样，“大肚能容，容世间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这副楹联说明，弥勒佛所以“开口常笑”，是因为他大肚能容世间难容之人、难容之事、难容之物。天下人之所以被视为“可笑之人”，是因为他们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容事、容物。他们整日愁眉苦脸，就是因为跳不出“小我”的名利所致。

（一）“无弃人，无弃物”

在老子看来，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或本源的“道”，本是空虚不盈的。

他说：“道冲（空虚）而用之，或不盈”（《道德经》四章），即“道”是一个空虚之体，永远不会盈满。“大盈若冲，其用不穷。”（《道德经》四十五章）“道”以“无”为体，空虚不实，其作用也是无穷无尽的，如煽火的风箱一样，在天地之间，“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道德经》五章）。正因“道”唯空虚，故能容纳万物；“道”唯空虚，故万物能自由运行于其中而不尽也。

既然“道”是空虚不实的，那么体“道”的圣人也就应当“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十六章）。在老子看来，人的心灵本来是虚明宁静、无私无欲的。唯其虚静，不计利害得失，故能无所不容，宽宏大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为私欲利害所蔽，人心紊乱，多有差错。只有尽力地去掉自己的私欲，真正做到“旷兮其若谷”（《道德经》十五章），才能使人心恢复到如“渊”一样的虚静状态，从而达到“虚极”、“静笃”的境界。为人处世胸襟宽广，无欲无私，就能够包容人世间的一切，这就好像江海不逆小流，众流皆归一样。

正因为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品德，所以在待人接物上，老子采取了“无弃”的态度。他指出：“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道德经》二十七章）圣人能够豁达大度，随时教化民众，拯救民众，使人尽其才，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圣人能够处处珍惜万物，使物尽其用，所以，没有被遗弃的物。

从这种“无弃”的态度出发，老子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结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道德经》四十九章）在人世间，“善者吾善之”，比较容易做到，“不善者吾亦善之”则不容易做到。老子以他宽宏的胸襟，主张无论是善者还是不善者，我们都应当以善相待。这样，就可以达到化不善为善，使不善者也变成善者的目的。在人世间，“信者吾信之”，一般人可以做到，“不信者吾亦信之”则难以办到。老子认为无论是诚实的人还是不讲诚信的人，我们都应当信任他。这样，就可以化虚伪为诚信，使虚伪的人变成诚实的人。

这种既能容人之长也能容人之过的“无弃”观念，多为后人所赞同。明代杨继盛发挥老子的“无弃”思想，指出：“见人之善，则对人称扬不已；闻人之过，则绝口不对人言。”“人之胜似你，则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

人不如你，则谦待之，不可有轻贱之意。”（《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清代金缨在《格言联璧》中，也称赞这种“上德若谷”的宽容精神，指出：“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非大丈夫不能如此度量。”在人民内部，我们都应当如老子说的那样，以善待人，以信待人，不对有缺点有错误的人采取不理睬或不信任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人，教育更多的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他人的长处和优点，是构建和谐人生的重要问题。是以“见人之善，则对人称扬不已”的敬重态度还是以“傲忌之心”对待他人呢？前者是我们所提倡的，而后者则是我们所反对的。

嫉妒之心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嫉妒之心的实质是从自私自利出发去嫉贤妒能，而嫉贤妒能的实质则是嫉名妒利。实际上，嫉妒之心是一种自私的功利心理。嫉妒心强，往往是自高自大的表现。因为自高自大，总是想高人一等，所以，就容不下比他强的人。周围的人一旦超过自己，就要设法贬低他人，甚至设陷阱去坑害他人。法国有一位作家说过：“嫉妒者，爱己胜于爱人。”因为自私自利，他嫉妒别人比自己优越；因为自私自利，嫉妒者从来不为别人说好话。所以，他就通过说别人的坏话来寻求一种自己心理上的满足。正因为这样，嫉妒的人没有朋友，因为他把所有比自己强的人都视作自己的敌人，总是以冷漠的目光注视着别人。

嫉妒源于比较。别人比自己挣得多，要嫉妒；别人比自己过得好，要嫉妒；别人的妻子比自己的漂亮，也要嫉妒。嫉妒的人每天都要审视着别人之长来衡量自己之短。于是，他永远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心理不平衡中，所以他活得很累。嫉妒还植根于一种自卑心理，造成伤害最大的可能还是嫉妒者自己。嫉妒者对自己的潜能丧失信心，只好转向去搞一些小动作来制胜对手。

在中国历史上，庞涓是一个典型的嫉妒心很强的人。庞涓和孙臧都是鬼谷子的学生。鬼谷子根据两人的特长和考核，叫孙臧侧重学谋略而兼战法，让庞涓主学战法而兼谋略。学期将满，鬼谷子对孙臧和庞涓说：“你两个同门学习三年，一个善谋，一个善战，若能一心，同保一主，一定能治乱世，定太平，双双成名。”当着老师的面，孙臧、庞涓二人都表示一定遵从师教。但是，鬼谷子已看出孙臧是真心实意，而庞涓则是口是心非，因而叹道：

“山人三年心血，却教出一福一祸，真乃教子在师，成名在己也！”后来，庞涓果真背着师傅私奔魏国被招为驸马，又当了大将军。但是，他始终害怕孙臧下山施展智谋，压住自己的威风，遂起杀害孙臧之心。于是，他编造谎言骗孙臧到魏国，挖掉了孙臧的膝盖骨。他以为孙臧成了残废之人，再也没有用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孙臧被救回齐国，施展智谋，庞涓最终兵败马陵道，落了个万箭穿心的可耻下场。真可谓是嫉妒如火，害人亦害己。

唐朝有个名叫卢杞的人，在他尚未成名的时候，有一天，他去拜访郭子仪。郭子仪马上令女眷避开。卢杞走后，家眷问他：对一个书生为什么这样慎重？郭子仪说：卢杞虽有才干，但他心胸狭窄，嫉妒心很强，睚眦必报。他长相不好看，半边脸是青的，好像庙里的鬼怪。如果看到他的半边青脸，你们一定会笑，他就会牢牢记恨在心，必会报复。果然，不久，卢杞做了宰相，凡是过去因脸青看不起他、得罪过他的人，一律杀身、抄家。只有郭子仪家免遭灾祸。因为在卢杞看来，郭子仪不歧视他，还尊重他，有知遇之恩。

嫉妒是心灵的地狱。《圣经》中把嫉妒叫做“凶眼”，而占星术士称之为“灾星”，就是说，嫉妒能把凶险和灾难投射到它目光所注目的地方。培根说：“人性各种情欲中，有两种最具有迷人的魔力，一种叫做爱情，另一种叫做嫉妒。两种感情都能激发出人的强烈欲望，创造出虚幻的意象和观念，蛊惑人的心灵。”

那么，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嫉妒之心呢？俗话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看到别人有长处有成绩，如果只是口头羡慕，还不如自己发愤图强、虚心向他人学习，完善自我，这才是上策。中国古代还有一副对联：“欲无后悔须律己，各有前程莫妒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在锦标赛场上，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搏击高手踌躇满志地去参加锦标赛，结果却是失败而归。他去请教自己的师傅，师傅笑而不语，只在地上画了一条线，要他在不擦掉这条线的情况下，设法把这条线变短。搏击高手百思而不得其解。于是，师傅就在那道线的旁边又画了一道更长的线。两者相比，原来那道线不就变短了？师父道：“要战胜你的对手，不能指望别人变‘短’，而是要使自己变‘长’。只有你强于对方，你才能够成为胜利者。”这

个故事告诉人们：如把强者比喻为一道长线，面对强者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嫉妒者千方百计想把这道线擦掉或者擦短；有志于攀登高峰的人则努力用自己的生命去划一道更长的线，相比之下，原来那道长线不就变短了吗？后者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圣经》曾说：魔鬼所以要趁着黑夜到麦地里去种稗子，就是因为他嫉妒别人的丰收。嫉妒是一把火，烧毁别人的同时也伤害自己。所以，我们应该像铲除毒草一样去铲除嫉妒，才能营造出和谐社会，让人生变得更美好。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在待人上，应根据“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原则，不要老是盯着他人的缺点和不足。任何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功劳也有过错。管理者应当不拘于小节，不以小恶妨大美。《文子》作者指出：“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上义》）如果一个管理者总是盯着下属的缺点、毛病不放，只能招来下属的怨恨和不满。为人处世，切忌对他人吹毛求疵，应持宽容态度，容纳其缺点。

明朝思想家刘基在《郁离子·捕鼠》一文中，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赵国有户人家老鼠成患，就从中山国讨了一只猫。这只猫善捕鼠，也爱吃鸡。过了一个月，老鼠捕尽了，鸡也被它吃光了。赵人的儿子问其父：“为什么不把这只猫赶走呢？”赵人回答：“目前我们家最大的祸患是老鼠而不是鸡，老鼠偷吃粮食、咬坏衣服、穿墙壁、破坏家具，我们就得受冻挨饿，没有鸡顶多没有肉吃，为什么要把猫赶走呢？”这则故事使我们懂得“论人当取节其长，曲谅其短”的道理，用人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和发挥下属的积极性。

IBM 公司在用人上奉行的原则是：“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受欢迎的。”他们认为世上“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坦诚承认自己有缺点的人，才是能保证事业成功的人。一个竭力为自己的缺点辩解、掩饰的人，实际上是一个伪君子，切不可重用这种人。有这样一个例子，两个女孩到某公司应聘会计，其中张小姐学历高，会弹钢琴，人又漂亮；王小姐学历不高，

性格内向。显然，张小姐优于王小姐。但是，主考官最后录用了王小姐，原因是面试时，张小姐只讲自己的优点而不讲缺点，当主考官询问她的缺点时，她为自己辩护说：“我太追求完美”，“有时候太坦白，不够圆滑”。而王小姐在主考官面前既讲自己的优点，又坦诚地讲了自己“有时候比较内向”的缺点。在主考官看来，只有敢于正视自己缺点的人，才能改正缺点，超越自我，走向完美。这也正是《老子》所说的“夫唯病病，是以不病”（《道德经》七十一章）命题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

在待人接物上，对于朋友和下属的缺点和错误应当适当批评，但是切忌尖酸刻薄，更不能恶语伤人，应温言暖语地劝说，使他“闻温语如佩玉，闻益语如赠金，口耳之际，倍为亲切”（吴从先《小窗自纪》）。同时，“君子攻（责）人，不尽其过，须含蓄以养人之愧惧，令其自新”（《呻吟语·伦理》）。宽容待人还表现在背地里“常言人长，希言人短”（《论衡·自纪》），更不能在众人面前“发人隐私”。当与他人发生矛盾时，既不能勃然而怒，更不能借他人之过以市名。这样，才能收到“以石击絮，两无伤焉”的良好效果。如何对待怀才不遇的落魄者（落难者），也是老子的“上德若谷”思想中的应有之义。它不仅是对一个人道德品质的考验，而且也是寻找人间真诚友谊的契机。

会烧冷灶，善插冷香，寻找“贵人”，是对待落魄者应有的正确态度。在人间，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任何社会里都有既富且贵的得势者，也有怀才不遇的落魄者。人之知遇与不知遇，要靠时机。因时机不到而怀才不遇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就是冷庙、冷灶。我们应当以真诚的态度关爱那些落魄者，不要抛弃他们。从人生长河来看，每个人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受挫折、遇背时的時候。在此时，采取置之不理、远离而去的冷漠态度，甚至落井下石，是不可取的。应当发掘人的善性，同情、关心、帮助其渡过难关，他会一辈子牢记这份恩情、没齿难忘，一旦他否极泰来，总是要回报的。所谓莫逆之交，往往都是在落魄时形成的，这种友谊是最有价值、最令人珍视的。在成功之路上，仅靠个人努力奋斗以求发展，空间总是有限的，多与各方朋友结缘，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要想赢得好人缘，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在别人落难时，给予关怀与帮助；在别人有事时，不计

回报，鼎力相助。如此，才能获得好人缘。平时不烧香，临时求菩萨，菩萨虽灵，也不会显灵的。所以，从长远战略眼光看，冷庙烧香，是稳健的人情投资。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位领导被当作“走资派”，批斗、游街、挂破鞋、关牛棚，各种子虚乌有的罪名纷至沓来，连妻子儿女也都跟他划清了界限，更没有人接近他。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他的心情苦闷到了极点，一度丧失了生活信心，动了自杀的念头。然而，就在此时，他的一个老部下不顾种种罪名的重压，主动来见他，给他送来各种生活必需品，并开导他、鼓励他，指出他的前途是光明的。“文革”结束后，这位领导得到平反，再次出山，把老部下当成知己。当这个部下患了重病时，他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为他看病，还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亲自派人照顾。可见，莫逆之交的感情是何等之深，是何等之真！

外国也有这种事例，有一天下雨，一位老妇人走进费城的一家百货公司。柜台人员见她衣着简陋，都不理她。只有一位年轻人走过来问她：是否能为我做些什么？她回答说：只是在避雨。这位年轻人没有向她推销任何东西，而是转身拿给她一把椅子，请她坐下。雨停之后，这位老妇人向这位年轻人道谢，并向他要了一张名片。几个月之后，这家店东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要求派这位年轻人前往苏格兰收取装潢一整座城堡的订单。这封信就是这位老妇人写的，而她正是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母亲。当这位年轻人收拾行李准备去苏格兰时，他已升格为这家百货公司的合伙人了。

由此可见，在冷庙、冷灶中烧香，用心寻找生活中的“贵人”，多交结有志之士，扩大自己的人际关系网，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华尔街日报》针对人力资源主管与求职者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5%的人力资源主管或求职者能够通过人脉关系找到适合的人才或工作。

最后，依据老子的“无弃”原则，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小人或伪君子的态度问题。小人相对于君子而言，是指道德败坏的人。古往今来，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根本原因在于君子坦荡无私，小人唯利是图。坦荡无私的君子为人处世总是遵德守法，有情有义，而唯利是图的小人则无羞耻感，只要对己有利什么坏事都干。为此，他们权迷心窍，攀援权势，圆滑世故，阿谀

奉承，工于心计，玩弄权术，拉帮结派，小人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这些小人一旦得志，其本来面目就会显露出来。正如有人形象描写的那样：职务升一级，不会走道了；又升一级，逢人不会说话了；再升一级，不认识人了。于是，有些人摆出一副“虎狼”的架势，或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行贿受贿，贪得无厌；或拉帮结派，排挤忠良等等。所以，在通常情况下，那些重情讲义、重礼守法的君子，往往不是小人的对手。在人生道路中，小人随时随地都存在，令人讨厌、痛苦、憎恨，是完全可能出现的情况。

善良的人总是希望现实生活中没有小人，但这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其实，小人给我们制造了种种麻烦、痛苦与困境，同时也是磨炼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古人云：以镜为鉴，可整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古今；以人为鉴，可明是非。小人是人生路上的一面镜子，也是人生路上的一块磨刀石。我们通过反躬自省，能够从他们身上吸取教训，把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顽强与坚韧。同时，还要确信“世上没有绝对的小人”，经过批评和教育，小人是可以被感化的。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善和恶相统一的生命体，人性具有两重性。有些人善性占据矛盾的主导方面，在行动中多有善心善举，占据矛盾的次要方面的恶性被隐藏起来，或是偶尔也做些坏事。有些人恶性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在行动中多有恶心恶举，虽偶有小善，给人的印象总体是恶人。在一定条件下，善和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善良的人可以变为恶人，恶人也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变成善人。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于小人要有“上德若谷”的宽容之心，通过以诚相待、“以心化心”的方式，小人是可以逐步转变成君子的。

唐代宗时，皇帝宠信的太监鱼朝恩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他一向敌视郭子仪，曾派人暗地挖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郭子仪知道后，对唐代宗说：我在外面带兵打仗，士兵们破坏了别人的坟墓，也无法完全照顾得到。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了，这是报应，不必怪罪他人。鱼朝恩听说后，便邀请郭子仪游章敬寺，表示尊敬和友好。宰相元载担心鱼朝恩谋害郭子仪，极力主张他带着卫队去赴约，而郭子仪却只带了八个家童前去赴会。鱼朝恩看到家童一副戒备的神情，奇怪地问郭子仪。郭子仪如实说：外面谣传你要害我，所

以，我只带了八个老实的家人来。鱼朝恩见他如此襟怀坦白，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对他说：“如果不是郭令公这样宽厚待人的大好人，这种谣言叫人不能不起疑心啊！”

企业家和管理者应如江海一样，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更应做到容物、容事、容人，切不可眼光如豆，心胸狭窄，排斥他人，孤芳自赏。地位越高，心胸越要大度，真正做到“宰相肚里能撑船”。美国王安电脑公司和日本八佰伴公司，都曾是成功的家族式企业。但在接班人问题上，总是走不出“传子不传贤”的怪圈。正是这种“不兼容”的狭隘心理，王安将公司总裁的高位钦定为只有 36 岁而又缺乏管理经验的儿子王列，八佰伴前总裁和田一夫让位于他的弟弟，导致公司破产。相反，台湾著名企业家施振荣突破了家族企业的“传子不传贤”的瓶颈，以“传贤不传子”的气度，把“接力棒”交给了几个“外姓人”，从而为企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两者形成的鲜明对比，更凸显了“有容乃大”是一条成功之道。

（二）败莫败于不自知

“自知者明”，也是老子从“上德若谷”思想中引申出的一条至理。在古希腊一座智慧神庙的大门上，也写着这样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古希腊人还把它奉为“神谕”，是最高智慧的象征。可见，“自知者明”对于全世界的人都是何等的重要！

老子《道德经》三十三章中指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者智”是说，善于鉴别人才、使用贤人的人，是最智慧的人；“自知者明”是说善于对自己的潜能、特长、缺陷、经验等各种基本素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在社会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一个明确的定位的人，才是世上最聪明的人。

中国人历来对有“自知之明”者持赞赏态度，认为这是每个人前进的动力和阶梯。《吕氏春秋·自知》篇指出：“败莫败于不自知。”意思是，人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自知之明。《唐太宗纪》指出：“人苦不自知其过”，即人

的最大苦恼是不知其过而造成的。所以，南宋陆九渊说：“人莫先于自知。”（《陆象山先生语录》卷三十五）人没有比自知之明更重要的品德，应大力提倡“人贵有自知之明”。现在流行于民间的谚语如“老鸦笑猪黑，自丑不觉得”、“牛不知角弯，马不知脸长”、“见人之过易，见己之过难”，都是“人贵自知之明”思想的形象表述。中国还有几句谚语：“谦虚的人常思己过，骄傲的人只论人非”、“自私者，常道别人短；骄傲者，只见自己长”，世俗之人，由于缺乏“上德若谷”的气度，局限于狭隘的自私心理和盲目的骄傲心态，往往缺乏自知之明，总是不能正确地估计自己，自作聪明，自命不凡，盛气凌人。

“人贵有自知之明”，说话容易，做到甚难，正如“目不见睫”——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百步以外的东西，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一样。

在年轻气盛时，一些男人以为自己是未来的毕加索、成名以前的比尔·盖茨；而一些女人以为自己是貂蝉转世，或是倾国倾城的罗敷妹妹。在这种不切自己实际的幻想中，对待领导的态度就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对待工作的态度就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针对人性的这种弱点，老子早在春秋末年就提出了“洼则盈”（《道德经》二十二章）的辩证法命题。由于洼地空旷，故能注满积水。他告诫人们一定要“戒盈”，正确认识自己，不要以为自己完美无缺，也不要一味地追求十全十美。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才能不断进步。日本松下公司依据“洼则盈”的道理，提倡“70分的人才已足够”的用人之道。松下幸之助认为，超过公司使用标准的高水准人才，多半骄傲自满，目空一切，不安心为本公司作出真正贡献。只有那些“70分的人”则以在该公司工作为荣，竭尽全力为公司工作，并在工作中把自己变成“100分的人”。适当的公司，适当的商店，适当的工厂，招聘适当的人才，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多数人都喜爱听好话、奉承话，而不自知的人在听到好话、奉承话后，便会把“假我”信以为“真我”，飘飘然起来，他没有深入考虑这些话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也有少数智者如孔子的学生子贡、齐国的相国邹忌等，是有自知之明的人。

在孔子的学生中，子贡不但会经商，而且也擅长外交。但孔子最喜欢的

还是颜回。有一次，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哪一个强？”子贡答道：“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颜回能够以一知十；而我只能闻一知二。”颜回聪明过人，善于类推。子贡胸怀博大，头脑清醒，能够正确认识自己，评价自己，可算得上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人。正如哲人所说：“诚实地向自己展开自己，这是人生一道优美的风景线。”

据《战国策·齐策》载：齐威王的相国邹忌长得相貌堂堂，体格魁梧，身高八尺，十分威武。与邹忌同住一城的徐公长得也是一表人才，他们都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一天早晨，邹忌起床后，穿好衣服，戴好帽子，信步走到镜子面前仔细端详全身的装束和自己的模样。随口问妻子说：“你看，我跟城北的徐公比起来，谁更漂亮？”妻子走上前去，一边帮他整理衣襟，一边回答说：“您长得多漂亮啊，那徐公怎么能跟您比呢？”邹忌心里不大相信，又问他的小妾：“我和城北徐公相比，谁漂亮些呢？”他的小妾连忙说：“大人您比徐公漂亮多了，他哪能和大人相比呢？”第二天，有位客人来访，邹忌顺便又问客人说：“您看我和城北徐公相比，谁漂亮？”客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徐先生比不上您，您比他漂亮多了。”邹忌虽然三次询问他人，妻妾和客人都认为他比徐公漂亮，可是邹忌毕竟是个有头脑的人，并没有被旁人的吹捧搞昏了头脑，就此沾沾自喜。过了一天，城北徐公到邹忌家登门拜访。邹忌偷偷从镜子里看看自己，再调过头来瞧瞧徐公，他自觉自己长得不如徐公。当天晚上，邹忌躺在床上，反复地思考着这件事。想到最后，他总算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原来这些人都是在恭维我啊！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偏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害怕我；客人说我美，是因为有求于我。看起来，我是受了身边人的恭维赞扬而认不清真正的自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在一片赞扬声前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自知之明，才能不迷失方向，招来灾祸。请记住《吕氏春秋·谨听》篇中的一句名言：“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意思是说，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这是多种祸患的根源。

《太平广记》一书中也有一则故事：一位监察御史文笔本来不行，而他却爱写文章。人家奉承他几句，他就拿出钱来请客。于是，监察御史夫人劝他说：你并不擅长写文章，一定是那些同事拿你寻开心。监察御史听后，觉

得有理，以后不管别人怎么奉承自己，再也不肯出钱请客了。当听到别人奉承自己时，请牢记明代吕坤《呻吟语·补遗》中的一句话：“毋以人誉而遂谓无过。”意思是说，不要因为人家称赞你，就认为自己没有缺点了。

要想真正从“假我”中找回“真我”，就必须从外在的“怨天尤人”思维方式转换成“自我内省”的思维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自己的认识，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痛苦的。“内省”是对自我动机和行为的审视和反思。“内省”如同照镜子一样，不但从正面看到自身的亮点，也要从反面看到自身的瑕疵，还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对于自己的缺点、弱点和不足的解剖，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往往令人十分痛苦。只有通过“内省”的自我解剖，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升华和超越，重新找回“真我”，重新对自己的人生坐标进行准确的定位。

（三）宽容他人也是善待自己

由于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胸怀，所以，在恩怨问题上，主张“报怨以德”（《道德经》六十三章）。人世间，每个人在与人交往中，由于利害冲突，难免产生恩恩怨怨。那么，如何对待恩怨呢？一般说来，有三种态度：一是“以怨报德”，这是小人的卑鄙伎俩。二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这是常人的做法。以怨报怨，你不仁，我不义，“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德报德”虽比“以怨报德”高尚，但毕竟还谈不到胸怀宽宏大量。三是“以德报怨”，这是君子的做法。君子襟怀坦荡，而主张宽容他人，宽容他人也是善待自己，因为心胸狭窄只能折磨自己，加深彼此的仇怨。所以，真正的大丈夫能够以宽厚的胸襟去容纳伤害过自己的人。老子既反对“以怨报德”，也不赞成“以怨报怨”，而主张“以德报怨”，即主张以恩德包容仇怨，乃至回报仇怨，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怨仇。

“以德报德”多为中国历代士人所肯定所采纳。《襄阳耆旧传·李衡》云：“琅琊王素好善慕义，博学深广，多见以德报怨之义。”明代洪应明在《菜根谭》一书中，认为对待恩怨的正确态度是记恩忘怨：“人有恩于我不可

忘，而怨则不可不忘。”杨继盛也称赞这种“以德报怨”的品格，告诫他的儿子说：“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过。……有人向你说，某人感你之恩，则云他有恩于吾，吾无恩于他，则感恩者闻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说，某人恼你谤你，则云彼与吾平日最相好，岂有恼我谤我之理，则恼吾者闻之，其怨即解。”（《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金缨在《格言联璧》中肯定：“能容小人，是大人。”指出“一念容忍，不但是无量德器，亦是无量福田，试看哪有不容忍的君子？”“仁人心地宽舒，事事有宽舒气象，故福集而庆长；鄙夫胸怀苛刻，事事以苛刻为能，故禄薄而泽短。”可见，宽容与苛刻是君子与小人在气象上的不同表现。

“以德报怨”在特定情况下是一种化解仇怨的办法。战国时期，魏国靠近楚国边境的一个县令职位，由魏国大夫宋就担任。两国边境的村民各自都种了一块瓜田。魏国一方百姓勤劳，由于天气干旱缺水，就组织一些人每天晚上到地里挑水给瓜田浇水灌溉，所以，他们种的瓜长势很好。而楚国百姓比较懒惰，瓜田浇水灌溉次数少，所以，他们种的瓜田长势不好。出于妒忌，有些楚国人一到天黑后就去糟蹋魏人的瓜秧。不久，魏国百姓发觉了这件事，就向宋就请求：允许他们也去糟蹋楚人的瓜秧。宋就知道后，请村民们消消气，让他们都坐下，然后对他们说：“我看，你们最好不要去踩他们的瓜地。”村民们气愤已极，哪里听得进去，纷纷嚷道：“难道我们怕他们不成，为什么让他们如此欺负？”宋县令对他们耐心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去报复，最多只能解解心头之恨，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如此下去，双方互相破坏，谁都不会得到一个瓜的收获。”村民们皱紧眉头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宋就说：“你们每天晚上都去帮他们浇地。”村民们按宋县令的意思去做，楚国村民发现魏国村民不但不记恨，反而天天帮他们浇瓜，惭愧得无地自容。这件事上报楚王后，楚王原本对魏国虎视眈眈，听了此事，深受感动，甚觉不安，于是，他主动与魏国和好，并送去很多礼物，对魏国有如此好的官员和国民表示赞赏。魏王见宋就为两国的友好往来立了大功，也下令重重地赏赐宋就和他的一方百姓。

晋文公出逃时，他的财物保管者头须趁机将其财物全部卷走。而在他回国即位、大权在握时，那个不知羞耻的头须又回来求见晋文公。晋文公知道

在他出走时，举国上下不少人都依附于反对者一方。为了安定全国人心，特别是在自己得势之时，更不应利用手中权公报私仇。于是，他容忍了这个无耻的小人，接见了。这是明智之举。

在蒙古各部落之间争夺草原时，成吉思汗虽与泰赤乌部有仇，但当他得知他们粮食、帐篷不足时，非但没有加害于他们，反而主动地提出一块住宿，平分猎物。这一“以德报怨”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仇人，仇人纷纷向他投降。这就证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宽恕别人，不计私仇，是一种避免仇恨循环相报的正确办法。

在中国古代民间，还有许多“以德报怨”的动人故事。汉朝浙江绍兴有个名叫陈器的人，为人忠厚忍让。小时候有一次在城外捕鱼，有人偷了他的鱼，陈器发现后，偷鱼人急忙躲进草丛中。陈器追上他，把自己捕的鱼送给了他。那人内心非常惭愧，不肯接受，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去偷鱼了。陈器的邻居纪伯，有一天晚上，偷偷地把篱笆向陈器家的那一边挪动了一些，以扩大自己的庭院面积。陈器发现后，又偷偷地把篱笆拔起，向自家那边再移了一丈。纪伯知道后，很是惭愧，除了把侵占的地全部归还给了陈器家，又将篱笆向自己这边挪了一丈二尺。“以德报怨”是一种崇高智慧，能使人迷途知返，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和谐。

“以德报怨”虽有其合理的社会价值，但是不能将其绝对化，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基督教《圣经》上说：你在我左脸上打了一记耳光，我不但不还手、不躲避，反而再送上右脸让你打。中国也有“唾面自干”的说法。《新唐书·娄师德传》记载，当娄师德的弟弟要到代州做官时，他教导弟弟要学会忍耐。弟弟说：“这没问题，比如说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我把它擦掉就是。”而娄师德却进一步说：“擦掉也不对，因为这样还会显露出你对他的做法不满，所以，应该让它自己在脸上干掉。”这种做法，不讲是非原则，一味“以德报怨”，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也是不合情理的。

“以德报怨”虽然是一种化解仇怨的办法，但是终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仇怨。“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道德经》七十九章）在对待“大怨”问题上，简单地用调和的办法去化解怨恨，不分清对与错，不能真正的消除怨恨。要想从根本上消除人间仇怨，就必须采取“天道无亲，常与

善人”（《道德经》七十九章）的态度，即应当像“天道”那样无私，“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只给予人而不向人索取，仇怨自然就不会产生；如果像税官那样，只向人索取而不给予人，仇怨势必产生。这种办法，看起来好像吃亏，其实是不会吃亏的。这就是所谓“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八十一章）的道理。俗话说：“施者比受者有福”，也是这个意思。清代钱泳深知这种道理，他在《履园丛话·臆论·恩怨分明》中指出：“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

“以德报怨”精神，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某报纸上，刊登过一则动人的故事：济南有位出租车师傅驾夜班车时遇劫，他奋起反抗，遭劫匪捅了两刀，而劫匪在搏斗中也受了伤，都送进了医院抢救。出租车师傅妻子获讯后赶往医院探望丈夫，看见受伤劫匪无人代缴 1 000 元住院押金，怕他因此延误治疗。夫妇俩不计前嫌，慷慨解囊相助。当记者采访这位妻子时，她淡淡地说：不管他是好人坏人，总是一条生命，咱不能见死不救。这种“以德报怨”的精神，使济南整座城市都被感动了，人们纷纷为出租车司机捐助医药费达万余元，并在他的出租车上扎上了红蝴蝶结，向这对善良的夫妇致敬。

老子提倡的“以德报怨”虽有化解矛盾、感化对方、化仇为友的好处，但是人间的恩怨不能单靠道德，还必须依靠正义和法律化解，这就是孔子说的“以直报怨”（《论语·宪问》），即以正直公正的法律来化解怨恨。如商家坑害消费者，消费者虽不必找商家打架，但是可依法索赔。

（四）“宠辱不惊”

正因为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胸怀，所以，在荣辱观上，老子提倡“宠辱不惊”。在老子看来，世俗之人由于名利、得失之心太重，缺乏“无私”、“无我”的人生意境，在他们的心目中，“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道德经》十三章），以受到他人宠爱为荣、受到他人羞辱为耻，

所以一旦受到宠爱或羞辱都会感到意外的狂喜或恐惧。喜与惧都是以“小我”的得失利害为转移，整天为宠爱与羞辱所惊扰，失去了心灵的宁静和平衡，这叫做“宠辱若惊”。民间流传着一则笑话：清朝有一个多次考试落榜的老童生，有一次正好与儿子同科应考。放榜那天，儿子知道自己已被录取，赶快回家报喜。他的父亲正好在房里洗澡，儿子敲门大叫说：“爸爸，我考取了！”老童生在房里一听，大声呵斥说：“考取一个秀才，算得了什么，大声小叫！”儿子又轻轻地说：“爸爸，你也考取了！”老童生一听，竟忘了自己光着身子，连衣裤都没穿，冲出房门，大声呵斥说：“你为什么不说？”这便是“宠辱若惊”的最好写照。这是老子所反对的。老子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虚怀若谷，做到“无私”、“忘我”，置荣辱、祸福、得失、生死于“我”之度外，视之为身外之物，哪里还有什么喜与惧可言？这叫做“宠辱不惊”。“宠”是得意的总表相，“辱”是失意的总代号。为君子者，宠亦坦然，辱亦坦然，豁达大度，一笑置之。这是老子所提倡的。在老子看来，只有“知其荣，守其辱”，做到弃尊荣守辱卑，成为“上德若谷”的人，方可达到“常德乃足，复归于朴”（《道德经》二十八章）的圆满境界。

老子所说的荣辱观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道德层面上，认为行仁义为荣，违仁义为辱，不以贫富、贵贱、声名为标准。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陆九渊亦曰：“由义为荣，背义为辱。”（《陆九渊集》卷十三《与郭邦逸》）荣与辱“由中而出”，完全取决于自己。二是从社会层面上，认为除了道德意义上的荣辱观外，还有由外在的权势、财富和声名决定的荣辱观。荀子指出：“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势辱者。”（《荀子·正论》）在现实社会中，由自己的高尚道德而得到的荣誉为“义荣”，由于自己的道德缺失而导致的耻辱为“义辱”；由于权势、财富和声名而带来的荣誉为“势荣”，由于自己无势而外界强加于自己的耻辱为“势辱”。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指出：“毁谤自外来者，虽圣人如何免得？”（《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富贵者还是贫贱者，甚至连圣人都避免不了外来的毁誉。那么，如何正确对待外界的毁誉呢？如果完全以外界的毁誉特别是社会邪恶势力的诬害或被人误解的毁誉为转移，闻誉而喜，闻辱则惧，惶惶于外，从而丧失了宁静的自我，是不

可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求诸于己”，加强自修、自律，做到“不诱于誉，不恐于诽”（《荀子·非十二子》），真正做到淡泊名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可以达到“宠辱不惊”的人生境界。

楚国宰相孙叔敖三次做宰相而不知荣耀，三次离职也没有忧色。隐士肩吾称赞孙叔敖确有过人之处，孙叔敖回答说：“我哪里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我认为爵位之来不能推却，它的失去也不能阻止。爵位之得失不在于我，故无忧色。况且，不知道可贵的是在宰相还是在我？如在于宰相，就和我无关；如在于我，就和宰相无关。我整天踌躇满志，逍遥四方，哪里顾得上人间的贵贱呢？”（《庄子·田子方》）由此可见，只有真正做到“爵禄不入于心”，方可达到“空字解忧”。

《警世通言》有这样一则故事：楚人钟子期本是道家信徒，隐居于山林，以打柴为生。初见晋国大臣俞伯牙，俞伯牙全无客礼，子期受辱而不惊；后来待之如贵客，子期亦不欢悦。俞伯牙见钟子期宠辱不惊，伯牙愈加敬重，终结为知音。

据《新唐书·卢承庆传》载：唐太宗时，有个名叫卢承庆的人，为官清廉，做事认真，讲求实际，是一个“宠辱不惊”的人。他做官主要是为国尽忠，官职升降他不在乎。最初，他当过考功员外郎，后来当过尚书左丞，最后还当过兵部侍郎。由于说老实话，得罪了皇帝，被贬外出做简州司马，他一点也不生气。后来，把他调回朝中升为刑部尚书，他也没有因此特别高兴。卢承庆不仅清廉，而且对虚荣和美名也看得很淡，从不因个人得失而动心。他担任考功员外郎时，专门给下级官员评定等级，事关每位官员的仕途升迁。有一次他负责考核某官员负责的粮船沉没事件，由于失职，给那位运粮官只评了个“中下级”，那位运粮官一点也不生气，依旧谈笑自若。后来，卢承庆经过综合考虑，认为他有认错表现，还有一定的责任心，又将他的级别改成了“中中级”，他也没因此而高兴。再后来，卢承庆又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那次船翻不是因他管理不善造成，而是因为突然遇到刮大风才把粮船吹翻了。卢承庆一想，觉得给他评个“中中级”不妥，又主动改成了“中上级”，这个运粮官依然没有因此而特别高兴。卢承庆赞扬他“宠辱不惊，实在难得”。从此，卢承庆对他的印象很好，在吏部考核时，就提拔

了他。

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宰相肚内能行船”这句名言，是对老子的“宠辱不惊”思想的形象说明。这一思想已经积淀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国优秀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略举几例：《兴唐传·闹花灯》第十二回曾言：“常言道：‘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内能行船’。一为他们无知，二看卑职我的面上，您就恕过他们吧！”《警世通言》有一则《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的故事：宋代名相王安石挂冠而归南京时，不用官船，微服归行。他的一名亲吏江居稟道：“相公白龙鱼服（比喻权贵人物化装微行），隐姓潜名。倘或途中小辈不识高低，有毁谤相公者，何以处之？”荆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撑得船过’，从来人言不足恤：言我善者，不足为喜；道吾恶者，不足为怒。只当耳边风过去便了。”《官场现形记》第二十七回：“华中堂说：‘天底下哪里有好人！老前辈你我也不过担待他们些就是了。’徐大军机道：‘我见了不好的人，我心上就要生气。我不如你有担待。你做中堂的是宰相肚里好撑船，我生来就是这个脾气不好。’”《李自成》第一卷载：“常言道：‘将军额上跑下马，宰相肚里能行船。’你这样气量窄，将来如何能独当一面，肩挑五岳，胸罗百川，统帅百万大军！”这些故事，说明老子的“宠辱不惊”的思想已经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成为一种传统美德，为后人所传颂，所奉行。

现代大画家齐白石的座右铭是：“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人誉之一笑”，是因为在他看来学无止境，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别人尊自己为大师，而自己却不能以大师自居。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如果自己骄傲了，就要落后了。所以，虽长期在荣誉和花环中生活，齐白石既不得意忘形，也不故步自封，终成为人民艺术家和国际和平奖获得者，洒脱地“人誉之一笑”。饱经风霜的齐白石，深知世态炎凉，人多嘴杂，欣赏眼光也不同。对同一幅艺术作品，喜欢者可能将它捧到天上，厌恶者可能将它踩在地下，心存偏见或嫉贤妒能者也大有人在。所以，外界的骂声、嘘声、喝倒彩声，虽然难以入耳，也只好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人骂之一笑”。心底无私天地宽，得之不喜，失之不忧，何必为私欲所惑而患得患失呢？齐白石先生的“两笑”，就是“宠辱不惊”的最好说明。

社会活动家、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先生在遗文中写道：“生亦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今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牵挂。”这一洒脱飘逸的遗文，充分地体现了一种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达观人生境界。

《幽窗小记》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意思是说，为人做事能视宠辱如庭前花开花落一样自然、平常，才能不惊；视职位去留、名利得失如天空云卷云舒一样变幻无常，才能无意。不管是齐白石还是赵朴初，真可称之为现代的陶渊明，他们真正达到了“英雄自洒脱，名士自风流”的崇高境界。这是一种大智大慧、大觉大悟的人生境界。

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人言可畏”的问题，也是“宠辱不惊”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人言可畏”，主要是指两种情形：一种是恶言伤人，即是“舌头底下压死人”的一些话，如流言蜚语、秽语谩骂之类。在流言蜚语面前，弱者惶然、悚然，甚至个别精神脆弱者走上了绝路；而意志坚强者则辩诽谤、争清名，也是人之常情。道家根据“以德报怨”思想则主张“无辩”、“不争”的宽容态度。“何以息谤？曰无辩。”“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宋朝有个名叫富弼的大臣，当有人告诉他“有人在骂你”时，答曰：“恐怕是骂他人吧。”又告之：“是指名道姓在骂你。”答曰：“天下难道就没有同姓同名的人吗？”富弼并非不知道那人在诽谤他、咒骂他，只是想通过“无辩”、“能容”的态度，化解矛盾而已。

另一种“人言可畏”的情形是美言诱人。指在学业和事业上刚刚起步、取得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时，名不副实的溢美谀辞纷沓而至，再冠以“天才”、“新秀”、“新星”之类的浮名，使得部分涉世未深的青年人飘飘然、昏昏然，进而故步自封、不思进取，活生生地被“美言”捧杀者，大有人在。“宠辱不惊”是一种克服浮躁心态的心理素质。有一位苦练书法十余载的书法家，每日面壁临帖，自得其乐。当他在一些全国性书法大赛中连连获奖时，被人们堂而皇之地冠以“著名书法家”、“大家”之类的头衔。亲朋好友纷纷向他道贺，他只是摇摇头说：“我还是我，离那些吓人的头衔相去甚远。如果我能做成一点事情的话，秘诀就一条：不受舆论干扰！”他提笔写下了

“宠辱不惊”四个大字。

面对形形色色的“人言”，不管是恶言还是美言，“宠辱不惊”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护身之宝。在现实生活中，当各种“人言”向你袭来、令你生畏，甚至要置你于死地时，如果终日被“恶言”所困、被“美言”所诱，其结果必将一事无成。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既要对流言蜚语“无辩”、“不争”，淡然处之，又要对溢美之词保持高度的警惕，坦然前行，走自己的路，才能真正达到“宠辱不惊”的人生境界。

“宠辱不惊”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而且对世界各国也有深远的历史影响。17世纪，日本有个名叫百忍的僧人，品德高尚，名声极好。寺院附近有个漂亮女孩未婚生子，女孩的父亲追问她新生儿的父亲是谁，女孩无奈，说是百忍。人们震惊了，狠狠地斥责百忍，并把孩子送到了寺院，百忍轻轻一笑，收下了孩子。许多年后，女孩良心发现，告诉家人那个小孩的父亲是另一位青年。大家这才知道错怪了百忍，去寺院向百忍道歉，并接回孩子，百忍还是淡然一笑。大师虽承受奇耻大辱，却视若纤尘。

19世纪中叶，美国企业家菲尔德带领他的船员和工程师用海底电缆把“欧美两个大陆联结起来”，被誉为“两个世界的统一者”，一时而成为美国最光荣、最受尊敬的英雄。但是，因技术故障，刚接通的电缆信号中断，顷刻之间，人们的赞辞颂语骤然变成愤怒的谩骂，纷纷骂菲尔德是“骗子”。面对如此悬殊的宠辱落差，菲尔德泰然自若，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事业。经过六年努力，海底的电缆最终成功地架起了欧美的信息桥梁。宠也自然，辱也自在，一往无前，否极泰来，这就是菲尔德成功的精神力量。

“宠辱不惊”是一门生活艺术，更是一种处世智慧。古往今来，许多事实证明：凡事有所成就者，无不具有“宠辱不惊”的品格。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恪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宗旨，他谪居邓州时仍能从容处之，在洞庭湖边，“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从范仲淹的言行中，我们窥见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和淡泊名利的洒脱。

“宠辱不惊”是构建和谐人生的精神动力，而且也是健康长寿的道德基础。北京大学原校长马寅初先生，因其“新人口论”蒙冤获罪，遭到无理批

判，终被革职。当他的儿子告诉他革职一事时，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噢”了一声；数十年后拨乱反正，还是他儿子告诉他被平反的喜讯，马先生也还是轻轻地“噢”了一声。从外表上看，他静若止水；从内心里看，却充满着“宠辱不惊”的大智慧，这是何等难能可贵啊！马先生就凭着这种自尊自强的人格魅力和淡泊名利的坦荡胸怀，终成“人瑞”，赢得了 101 岁的高寿。湖北大冶陈贵镇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老寿星张瑞云，103 岁高龄。其长寿的奥秘主要归功于“宠辱不惊”的豁达心态。当记者向他问到长寿的秘诀时，张瑞云老人回答说：“心态平和，得之不喜，失之不悲。”

“宠辱不惊”说则易，做则难。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淡泊名利、宠辱不惊呢？一要“看得透”，二要“忍得住”。所谓“看得透”，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都会看到，金钱的诱惑、权力的纷争、宦海的沉浮，让人殚精竭虑。是非、成败、得失，让人或喜、或悲、或惊、或诧、或忧、或惧，一旦希望成了幻影，就会失落。由于私欲过度膨胀，有的人将得失荣辱深藏于心，有的人则因受宠而得意忘形，因受辱而愁眉不展。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才能以平常的心态对待名利。所谓“忍得住”，就是要耐得住贫贱，耐得住寂寞。名和利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常使人丧失理智，神魂颠倒。如果满脑子都是名利地位，利欲熏心，贪财成性，就会使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畸变，最终被权力、金钱、美色等所诱惑，道德沦丧，违法乱纪，行为越轨，自毁前程。说到底，“宠辱不惊”是一个价值观问题。所以，由“宠辱若惊”转变成“宠辱不惊”，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升华和超越。

第六章

“光而不耀”与低调做人

“光而不耀”是道家“中和之道”的一个重要辩证法命题。它出自于《道德经》第五十八章。这一命题是老子根据“道法自然”原则，从太阳光的强弱对于人的感受中领悟出的人生智慧。在老子看来，无光或过度的弱光不利于人类，过度的强光也不利于人类，只有“中和之光”才能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他以暗淡无光比喻人之逆境，以光彩照人比喻人之顺境。这里，所谓“光而不耀”，是指人在顺境即在光彩、得意之时，也就是“有权”、“有钱”、“有名”之时，要牢记老子“光而不耀”的告诫，既不要过度地炫耀自己，也不要以自己的荣光去照耀他人，只能以“和其光”的平常心态，努力做到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方可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这是一种不露锋芒的高超的处世哲学。

（一）“光而不耀”

在人生道路上，为什么要求“光而不耀”呢？我们将从理论层面和历史层面进行深入的阐述。

智者老子以他对春秋末年社会政治生态的观察，深刻地认识到：人在得意之时，如果“光而耀人”、高调做人，其后果必然是“金玉满堂，莫之能

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道德经》九章）。所以，人要想保住自己的富贵地位，就必须根据“光而不耀”原则，以谦卑的“戒盈”心态，学会低调做人，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合乎“天之道”的。

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文子，在诠释老子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时，指出：“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同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人怨之。”那么，如何才能使人不妒、不恶和不怨呢？文子从辩证法的高度，认为贵与贱、高与下是相互转化的。只有清醒地保持“光而不耀”的谦卑态度，方可无怨无恨。他告诫富贵者说：“夫爵益（愈加）高者意益下（心愈谦下），官益大者心益小（小心谨慎），禄益厚者施益博（广济博施），修此三者怨不作。”（《文子·符言》）即只有做到爵位愈高者心就愈谦下，官位越大者心就越谨慎，俸禄益厚者就更广济博施，才能免除祸患。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人生大智慧。

为了形象地阐述道家的“光而不耀”思想，在这里先讲一段哲学家老子与孔子之间的对话。老子在东周做官，官职虽小，但是他的学问却博大精深，因为他是周王朝的守藏史，掌握着大量文献资料。因此，老子在全国很有名气，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也要从山东到洛阳问礼于老子，拜老子为师。有一次，老子在送别孔子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一言乎？凡当今之世，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处境危险的人），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闷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见于《孔子家语·观周》、《史记·孔子世家》）意思是说，我官虽小，也没有什么钱，不能送你以钱财，那就送你两句话吧。这两句话是说，那些聪明透顶的人总是喜爱揭露他人的缺点和错误，讥讽挖苦别人，使他处于“近于死”的危险境地；那些学识渊博、能言善辩的人，总是喜好在公开场所揭发别人的隐私和伤疤，这样的人也是非常危险的。上述两种人所以处境危险，因为他们为小智所惑，结果总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道家主张待人处世要“宽而勿察”，千万不能对他人的缺点过于尖刻，“察之又察”，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使自己时刻处于被他人怨恨和报复的危险境地。“光而不耀”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法宝。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是一位“弯腰示弱，赢得一世”的历史人物。刘邦与项羽商定“先入关者为王”的诺言，刘邦先行入关后，项羽却公开毁约，在谋士范增的挑动下，设下“鸿门宴”欲加害于刘邦。当时驻扎在坝上的刘邦的兵马只有十万，而驻扎在鸿门的项羽拥兵四十万，面对双方兵力如此悬殊的局面，以武力相争，刘邦肯定不是项羽的对手。于是，谋士张良献计说：项羽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你只要弯腰示弱做‘孙子’，向他道歉，就能平息他的怒火，他就不会杀你。刘邦按计只带了一百多个随从，在“鸿门宴”上，他献媚地说：我跟将军同心协力攻打秦国，将军在河北，我在河南，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先入关。今天，在这里和将军相见，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哪里知道有人在您面前挑拨，令您生气，这实在太不幸了。听了这些示弱、谄媚的话，项羽果然中计，刘邦巧妙地逃离了这个生死之地。秦亡后，项羽分封天下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刘邦被封在穷山恶水的汉中。刘邦继续弯腰示弱，按照韩信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建议，励精图治，积蓄力量，等到楚、汉势力平衡发生变化后，才突然杀出汉中，打败项羽，逼使项羽乌江自刎，留下了“霸王别姬”的历史遗憾。

刘备所以能够成就他的蜀汉王国，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一生三次成功地实施了“低调战术”：一是“桃园三结义”。刘备本出身于皇亲国戚，但他敢于冲破传统等级观念，与酒贩屠户张飞、在逃杀人犯关羽结为异姓兄弟。这一“低”，使他得到了两员虎将，给他的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二是“三顾茅庐”。刘备为了得到未出茅庐的谋士诸葛亮，竟不顾皇室身份和地位，前后三次登门拜访，却一点都不觉得丢脸面。这一“低”，使他得到了一位千古名相。诸葛亮的《隆中对》也为他的事业奠定了战略基石。三是“礼遇张松”。张松本想把西川地图献给曹操，但是曹操破了马超之后，志得意满，竟数日不见张松，还扬言要问罪于他。相反，刘备却派关羽、赵云迎他于境外，自己亲迎于境内，宴饮三日，泪别长亭，牵马相送。这一“低”，使张松深受感动，最终决定将西川地图献给刘备，从而为蜀汉王国的最后确立打下了战术基础。

三国名士祢衡，年少轻狂，自认为胸怀治国安邦之策，经天纬地之才，公开鄙视他人，孤高自傲。他不但敢于大骂曹操，对视他为上宾，待之以礼

的黄祖，他也出言不逊，恶语伤人。所以，正当群雄逐鹿、急于用人之际，以祢衡之才竟不被重用于曹操、刘表，反而身死名丧。这是因为他不懂得收敛锋芒、低调做人的道理。

明朝开国元勋徐达，有勇有谋，用兵如神，为明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将帅之才，深得朱元璋器重。朱元璋为了奖励徐达，曾将自己登基前当吴王时居住的府邸赐给他，而徐达死活不肯接受。无奈之际，朱元璋请徐达到旧邸饮酒，将其灌醉，然后亲自将他抬到床上，蒙上被子睡觉。徐达半夜酒醒，知道自己睡的是什么地方后，连忙跳下床，俯在地上，自呼死罪。朱元璋见他如此谦恭，心中十分高兴，命人在此旧邸前修建一所宅第，门前立一牌坊，并亲书“大功”二字。徐达平生无声色酒赌之好，“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所疵，昭昭乎日月”。朱元璋曾赐予他一块沙洲，由于正处于船只水路必经之地，家臣以此擅谋其利。徐达知道后，马上将此地上缴官府。徐达深谙为人处世之道，不论作了多大贡献，也从不邀功请赏，视自己如平常人一样。因为他懂得“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所以，他才得以善终，名垂青史。

由此可见，待人处世，切不可逞一时之快，尽露锋芒，树敌过多，必定葬送自己的前程。收敛锋芒，独守寂寞，深藏若虚，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策略。一个具有才华的人，最好是能保持深藏不露的态度。只有能够耐得住寂寞的人，才不会招致周围人的忌恨。正如《菜根谭》所说：“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世，固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锋芒。”意思是说，志向淡泊的人，必定会受到热衷于名利的人所怀疑；生活俭朴谨慎的人，大多会被行为放荡的人所妒忌。一个坚守正道的君子，固然不应该因此而稍稍改变自己的节操，但是也不能够过于锋芒毕露。不管是暂时怀才不遇的人还是身处高位的当权者，都要懂得低调做人的道理，才能够最终成就一番伟业。

“光而不耀”的道理，不只是中国人的护身符，也是世界各国智者的人生哲理。“美国之父”富兰克林在年轻时，昂首挺胸，气盛傲慢，迈着大步去拜访一位令他敬仰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不料，就在他一只脚踏入大门的一瞬间，由于他大步前进，目中无人，一头就狠狠地撞到了比自己矮的门框

上，痛得他不停地用手揉搓额头。此时，老前辈正好前来迎接他，笑着对他说：“很痛吧。可是，这将是你今天来访我的最大收获。”富兰克林不解地望着他，老前辈平静地对他说：“一个人要想平安无事地生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该弯腰时就弯腰。这也是我想要教你的道理。”富兰克林牢记老人的教诲，终成为美国历史上功勋卓著的一代伟人。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塑家达·芬奇形象地对“低调做人”阐释道：“微少的知识使人骄傲，丰富的知识使人谦逊。所以，空心的禾秆高傲地举头向天，而充实的禾穗却低头向着大地，向着它们的母亲。”芦苇就是因为能弯下身，所以才能在狂风肆虐下生存，而榆树就是想一直挺着腰杆，结果为狂风吹断枝干。做人如进门，要想进入一扇门，你就必须使自己的头比门框更矮；做人如禾穗，越是强于他人，越应该低下高傲的头。要想登上成功人生的顶峰，就必须学会低调做人。

（二）低调做人

低调做人是成就辉煌人生的助推器。因为它是一种气度，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当人处于逆境时，要善于避开锋芒，暂受屈辱，退让一步，学会保护自己；当人处于顺境时，也要学会内敛锋芒，低调做人，以免树敌太多，陷于危险境地。这是一种学会弯腰、穿过人生荆棘的大谋略、大智慧。

低调做人是营造和谐人际关系的法宝。因为它能够使人准确地定位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努力发掘自己内在的潜能，善于以自己的乐观精神感染他人，从而获得大家的认同。“低调”的人能够尊重他人的言行，肯定他人存在的价值，赞美他人的优点，故能为群体所接纳。低调做人能够赢得更多的朋友，为自己走向成功团聚更多的杰出人才。

低调做人能够赢得社会的尊敬。不管你的权力有多大，财富有多丰，地位有多高，在处世待人上，越是谦卑，内敛锋芒，就越能赢得他人的尊敬。如果过度地锋芒毕露，在刺伤别人的同时，也往往会刺伤自己，遭遇他人的

明枪暗箭射伤。在通往成功的路上，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啊！

在人生道路上，如何才能做到“低调做人”呢？

(1) 根据道家的“光而不耀”的原则，人应具有“四不”的高贵品格。从正面说，即主张“自见（自我表现）者不明（聪明），自是（自以为是）者不彰（彰显），自伐（自我炫耀）者无功（功劳），自矜（自高自大）者不长（长久）”（《道德经》二十四章）。在老子眼中，这些“自见”、“自是”、“自伐”、“自矜”，都是违背“道”的“无为”本性的表现。从“道”的高度看，这些都是“余食（剩饭）赘形（如形体上的骈拇、枝指、肉瘤之类）”，所以，“有道者不处”。在老子看来，争强好胜违反自然，令人厌恶，“适得其反”。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辩证法。从反面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道德经》二十二章）。历史一再证明：自是者必败，自矜者必亡，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项羽百战百胜，自以为是，以乌江自刎告终；苻坚投鞭断流，骄态十足，终于淝水败亡；李自成进驻北京，傲气毕露，导致起义失败。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文中，告诫全党同志：“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

在《庄子·山木》篇中，庄周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阳子到宋国，投宿于一家旅舍。旅舍主人有两个妻妾，一个长得美丽，一个长得丑陋。但是，在店里，丑陋者受到尊宠，而美丽者反被冷落。阳子问其故，旅舍童子回答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于是，阳子告诫弟子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安往而不爱哉！”这则故事说明，具有“四不”高贵品格的人，因为自己不自我表现、不自以为是、不自我夸耀、不自高自大，所以，他才能受到大家的称赞和爱护。

(2) 在功成名就之时，人应具有“功成而不居”的“四勿”精神。在社会上，我们常常会看到，人一旦功成名就，就会“以功臣自居”，争名誉、争私利、争地位。这是老子所不赞同的。老子一再告诫人们：“果（成功）而勿矜（自大），果而勿伐（炫耀），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逞强）。”（《道德经》三十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二章）“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道

德经》三十四章)这是“天道”的“无为”品格。人以“天道”为法,亦理应“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道德经》七十七章)。正因为圣人能够遵循“天道”做到“功成而不居”(或“功成而不处”),所以,他才能够名垂青史。这是一种高超的人生艺术。

春秋时,晋国发生内乱,太子申生被晋献公的宠妃骊姬陷害致死,公子夷吾和重耳因畏惧而逃亡。介子推随重耳在外逃亡十九年,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备尝“险阻艰难”,甚至在重耳无粮时,为了让重耳活命,介子推竟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了一块,将肉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吃,重耳大受感动,声称有朝一日做了君王,要好好报答介子推。当重耳返回晋国称晋文公后,时值周室内乱,“未尽行赏”,便出兵勤王。后来,晋文公封赏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而不及封赏介子推。对此,介子推没有像壶叔那样,主动去请赏。他认为晋文公返国,实为天意,壶叔、狐偃等人“以为己力”,无异于“窃人之财”,这种封赏是“贪天之功为己功”。所以,他既不居功自傲,又不要求官禄,反而隐居山林,“至死不复见”,结果名垂千秋,为世人称颂。(详见《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宋代黄庭坚赞叹道:“士甘焚死不公侯,满眼蓬蒿共一丘。”东汉开国元勋冯异,跟随刘秀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创建东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为人谦退不伐,“功成而不居”。每当刘秀为诸将论功封赏之时,他总是独自一人站在大树之下,一言不发,被人尊为“大树将军”,被后世传为美谈。

在现代社会中,当你功成名就之时,一定要牢记老子的“光而不耀”的告诫,切不可“暴发户”的心态,处处炫耀自己,张扬功劳和声誉。深圳某家证券公司老总曾一度事业如日中天,在证券市场呼风唤雨,堪称一位明星人物。在成功面前,他对人傲慢十足。当有人向他请教时,他既不让座,也不站起接待,而是坐在他的大班台后面翘着二郎腿,俨然一副居高临下的领导者的模样。一位资深证券商评曰:“败象已露。”果然,他的公司不久就因巨额亏损而破产,最终从证券市场上消失了。他的失败就在于成功后的骄傲,没有做到“光而不耀”。相反,用友软件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在他36岁时,由一个穷书生变成身价40多亿元的企业明星。他的身价虽然变了,但他的为人一点也没有变,依然如往常一样谦虚、热情,能够虚心地听取企业

员工的建议，接受客户和顾客的批评，听取专家的提醒和劝告。在成功面前没有停滞不前，他正在按照“赢利增长，客户满意，员工发展”的方针，向“世界级软件企业”的发展目标前进。

上述事例证明，“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或者“成功是成功的最大敌人”，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在这里，关键在于能不能以“平常心”对待成功，保持“四不”美德，在行动上真正做到“光而不耀”。成功者的这种“心态”是极为重要的。

(3) 根据老子“光而不耀”的原则，要求人应具备“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六十七章）的品德，从不高傲和霸气，学会以谦卑的态度对待他人。“不敢为天下先”这一立身处世之道，为中国历代名人学士所推崇。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在《放翁家训》中指出：“虽高官，亦当力请居其下。”明代杨继盛将它具体化，告诫儿子说：“与人相处之道，第一要谦下诚实。同干事则无避劳苦，同饮食则勿贪甘美，同行走则无择好路，同睡寝则勿占床席。宁让人，勿使人让。”（《父叔山谕应尾应箕两儿》）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也把老子的谦卑思想奉为自己的处世准则，他说：“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今天，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是也在大力提倡“谦下”、“让人”和“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传统美德吗？

“不敢为天下先”的做人之道，表现在使用人才上，主张“礼贤下士”。《史记·鲁世家》载：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贤人”。周公为了辅佐周成王，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当他的儿子前往封地鲁国就位时，他意味深长地告诉儿子说：“论身世、权力和地位，有谁能比得上我呢？但是，为了接纳天下之士，我在洗澡时，曾多次顾不上擦干头发，手里握着湿头发就去迎接贤士；在吃饭时，曾多次放下手中的筷子，吐出嘴里的饭，恭恭敬敬地与他们说话。就这样，我还怕对待贤士不够虔诚和尊敬。你到封地鲁国后，千万不要以官高势大瞧不起人，而是要从心底里重贤纳士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故事。曹操在《短歌行》诗中称赞周公曰：“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商山四皓是秦末汉初隐居深山的四位高人，汉高祖几次派人请他们出

山，四皓总是不肯出山相助。原因就在于刘邦这个人一向倨傲无礼，四皓很是不满。后来，太子刘盈卑辞厚礼，亲自去请，四皓终于出山辅汉。

这些生动的历史事例，都充分地证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一条成功用人的大智慧。

(4) 根据“光而不耀”的处世之道，在领导和管理艺术上，领导和管理者应甘于“处众人之所恶”的卑下之地。

在老子看来，“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六十六章）。大江大海所以能成为百谷之王（君王），是因为它善于自居卑下，处在众流的下游。老子从江海“善下之”中，悟出了圣人处世亦应“居下流”的道理。圣人不同于世俗之人，他应如水一样，从不与他人争高下，甘居众人所憎恶的卑下之地，具有崇高的谦卑美德。“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道德经》六十六章）圣人以江海为法，他要想在上领导人民，“必以言下之”，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指手画脚，而是谦下相待，虚心向人民请教；他要想引导人民前进，“必以身后之”，不是利益面前一马当先，脱离民众，而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民众之后。这也正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 and 谦卑品格。正因为如此，“处上”而民不感到重负，“处前”而民不感到妨害。所以，普天之下民众，乐于推戴他而从不厌弃他啊！

(5) 根据道家“光而不耀”品格的要求，在企业发展模式上，必须注重内涵式发展。山东烟台张裕集团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厂家，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葡萄酒生产经营企业，是中国葡萄酒工业的“龙头老大”，市场份额在30%以上，“张裕”商标是中国葡萄酒行业唯一的驰名商标，这一品牌价值是无价的。在巨大的成功面前，他们不自我张扬，不搞轰动效应，不搞花架子，不追求短期效益，不盲目追求增长速度，而是坚持苦练内功，走注重内涵的发展之路，以提高自己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以葆百年老店的生机。改革开放以来，张裕人始终遵循“质量是根，创新是魂，市场是镜”的十二字方针，认为把好产品质量关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只有在观念、技术和管理上的不断创新，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质量与创新如

何，是由市场来检验的。这就是百年张裕成功的秘诀。相反，“秦池”酒业 1996 年勇夺 CCTV 之王之后，销售量增长了 500%，利税增长了 600%。此时，“秦池”本应在产品质量、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和品牌维护上下工夫，走“内涵式”的发展之路。但是，“秦池”1997 年再次夺取标王后，却一味迷信广告效应，依靠外在包装的华丽，继续走“张扬式”发展之路，而最终导致“秦池”的失败。20 世纪末，秦池酒业的失败，与它只重标王而轻质量的“张扬式”发展模式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证明道家“光而不耀”的人生智慧，在现代企业发展中是何等的重要！

成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中往往孕育着向坏事转化的基因。此时，如果成功者采取“光而耀人”的错误态度，违背了“和其光”的适度原则，必然会把好事变成坏事；如果成功者采取“光而不耀”的正确态度，就会忘掉成功者的花环，放下权力、财富和荣誉的包袱，就会继续前进。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也是失败之母，这就是成功与失败之间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三）高调做事

IBM 总裁送给他儿子的座右铭是：“心灵像上帝，行动如乞丐。”这就是说，在人生道路上，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所谓“高调做事”，就是做事要像上帝一样，要求人的心灵要永远充满崇高的人生理想，在事业上一次比一次优秀，做事要辉煌耀眼，敢为人先，逐步地登上成功人生的顶峰。所谓“低调做人”，就是做人要像乞丐一样，要善于忍辱，要处处低调，把握一切机遇，走向成功之路。

首先，高调做事要求“立志”，即要求树立实现自我价值的伟大理想，使人生永远充满着梦想和希望。所谓“立志”，即是根据主观实际与客观需求来设计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即人是一种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的高级动物。孟子指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嵇康亦指出：“人无志，非人也。”这就是说，人无“大志”、没

有理想的人生是枯萎的人生。所以，自古以来，凡是成功者都必须先立志，因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阳明语）。胸怀大志，正如某人立志刷新某项体育世界纪录一样，它会给人以方向，给人以动力。立志既是人生的方向盘，又是人生的原动力。明代李时珍在科举失意后，由于世代医家的影响，他最终选择了“立志从医”的人生方向。在从医的道路上，他不但阅读了大量的医学典籍，还足迹遍及中国，吃尽人间之苦，才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成为伟大的药物学家。徐霞客虽出身于仕宦之家，但他无意于科举仕途，而立志于考察祖国名山大川。他不畏辛苦，经过三十多年的艰难跋涉，终于写成了《徐霞客游记》这部被后人誉为“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的地理学名著。

其次，高调做事要有自信心，这是高调做事的人生秘诀。充满自信的成功欲望，是科学创新和拥有财富的源泉。人一旦拥有了这种激情和自信，它就会转化成一种“积极的感情”，释放出无穷的热情、智慧和精力，从而获得巨大财富与事业成功。在追求成功的人生道路上，不论你遇到多少挫折和失败，都应当以坚持不懈的信心和“万折必东”的毅力，在磨炼中自觉地把自已锤炼成一个做大事的人。任何时候，无论条件多么困难，都不要轻言“放弃”二字，即使在一片懊悔或叹息、悲观或指责的氛围中，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就要坚持到底。只要坚持到底，成功就一定会属于你。在逆境中，要学会自己鼓励自己，要学会激发自己的潜能，相信丑小鸭也能变成白天鹅。只要有一颗点燃希望之火的心灵，再加上坚韧不拔的决心，就会产生巨大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就会激发人的内在潜能，助你从逆境中突围，实现人生理想。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天将要把重任交给你，必先贫穷和困苦中磨炼你，考验你，这是实现人生“大志”的根本保证。

再次，高调做事，还必须具有向上的火一般的激情。在人生道路上，一旦有了懒惰情绪和灰冷的心态，做事就不可能兢兢业业，开拓创新，甚至不能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在平凡的工作中，我们也需要火一般的激情，因为激情是高调做事不可或缺的内在精神动力。只有对工作和生活充满激情的人，才能把繁重工作视作人生机遇，把陌生人变成好朋友，真诚地宽容别

人。有了不断向上的激情，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来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事充满激情的人，就会抛弃人间怨恨，会战胜各种困难，铸造成功人生。

最后，要想实现人生的伟大理想，还必须善于从小事做起。因为任何大事的成功，都是从小事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成功人生是无数小事积累的结果。正如老子所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六十四章）对小事敷衍了事，或者不把细节当回事的人，是不会走向成功的。只有注重细节，将小事做细，滴水成河，善于在做小事的过程中找到机会的人，才能使自己走上成功之路。

敬业精神加上脚踏实地，是成功人生的秘诀。敬业精神，不仅是事业成功的保障，更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成功人生，无一不是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结果。如果一味地追求过于高远的目标，丧失了眼前可以成功的机会，就会成为高远目标的牺牲品。许多年轻人羡慕那些大款或高级白领人员，不安心本职工作，总是想跳槽，这是一种浮躁心态。我们还是多向成功者学习，力戒浮躁之气，脚踏实地，做好基础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成功之路。

“低调做人”与“高调做事”是从道家“光而不耀”辩证法命题中引申出的两个人生大智慧。“低调做人”是指人在有钱、有权和有名之时，一定要牢记道家的“光而不耀”的告诫，切不要以“暴发户”的心态，处处炫耀自己，张扬自己的财富、权势和浮名，要学会以谦卑的心态“低调做人”，以防自己重蹈“成功也是失败之母”的覆辙。“高调做事”是指在做事上要敢为人先，必须树立实现自我价值的高远理想。在实现“大志”的人生道路上，一定要充满不断向上的激情，要有“万折必东”的毅力，要有必胜的信心，决不轻言“放弃”二字，努力登上成功人生的顶峰。低调做人是实现高调做事的道德基石，而高调做事则是低调做人的人生目标，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第七章

“人生三关”与 潇洒人生

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矛盾多的中国人，要想构建潇洒人生，就必须通过三关：“名利关”、“情欲关”和“生死关”，从价值观上来一个根本转变，回归于道家的“身重于物”的生命观、“少私寡欲”的情欲观和“以死为乐”的生死观，方可在人间“潇洒走一回”。

（一）“身重于物”的生命观

第一道关是“名利关”。

要想“潇洒走一回”，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道家的“身重于物”的生命观，摆正“名”（功名、权位）、“利”（金钱、货财、利禄）与“身”（生命）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摆正这三者的关系，清醒地认识到“名缰利锁”对人的生命的危害性，牢固地树立“身重于物”的生命理念，才能不为“外物”所累。

那么，如何摆正“名”、“利”与“身”的关系呢？这是每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对此，历来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是“物重于身”。认为三者之中，功名、利禄重于生命。持这种人生观的人，往往为了获取名利、权势而不顾

自己的生命，把名利、权势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二是“身重于物”。道家在批判“物重于身”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珍惜生命、爱护生命的“身重于物”的理念。老子从“全生”的基本立场出发，认为“名”、“利”与“身”三者相比，生命（身）比功名、利禄更为重要。老子在名利与权势的迷宫中，破天荒地发现了人的“生命”价值。他认为生命贵于功名、利禄，追求功名、利禄是为了人的生命，如果功名、利禄有害于人的生命，那么宁肯抛弃它们，也要保存自己的生命。老子指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道德经》四十四章）。肯定功名、利禄和生命相比，生命更为重要。

庄子从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出发，明确地提出了“身贵于隶”的命题。他说：“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庄子·田子方》）把外在的得失、祸福、功名、货财、权势、生死，统统视为“身”（生命）的奴仆，舍弃身外之物就同舍弃泥土一样。庄子还进一步提出了“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庄子·田子方》）的命题，认为人的生命最为可贵，切不可为外在的货财、名位的诱惑而丧失了自我。《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有一则故事：当“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时，庄周笑着对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庄子还借盗跖之口指出，在孔子道德说教的影响下，世上所谓贤者、义士、忠臣重名轻死，皆“不足贵也”。《庄子·让王》篇是庄子后学阐述“身重于物”思想的代表作，它借用 15 个寓言，反复论证以生命为贵、以名位利禄为轻的人生哲学，指出：“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主张“能尊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

在春秋战国的动乱时代，血与火的残酷现实严重践踏了人的生命价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道家学派力倡“身重于物”，在名利、权势背后，发现了人类自身的生命价值，唤起了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一种惊世骇俗之论，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转换。在这里，道家对人类初期文明弊病的揭露与剖析，是对人类初期文明负面作用的深刻反省。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巨大

的理论贡献。

从道家“身重于物”的哲学智慧中，现代人可以悟出许多人生真谛。

(1) 树立“身外之物”的生命理念。所谓“身外之物”，是说名位、权势、钱财、女色、美言是身体以外的东西。这些东西，既不能随人生而带来，也不能随人死而带去，所以人们把它们称为“身外之物”，以表示轻视之意。清代学者金缨主张“毋嗜欲杀身”，形象地论证说：“鱼吞饵，蛾扑火，未得而先丧其身；猩醉醴，蚊饱血，已得而随亡其身；鸱食鱼，蜂酿蜜，虽得而不享其利。”世上贪利者，大率类此。有钱财者有乐亦有苦：“夫人厚积，则必经营布置，生息防守，其劳不可胜言；则必有亲戚之请求，贫穷之怨望，僮仆之奸骗，大而盗贼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窃，经商之亏折，行路之失脱，田禾之灾伤，攘夺之争讼，子弟之浪费。”（《格言联璧》）身处如此境地，你能潇洒得起来吗？这叫做“为利所累”。

(2) 淡化做官心理。在古代，“贪夫殉利”、“烈士殉名”，比比皆是。在今天，也大有人在。身居官位是福也是祸，是乐也是忧，是天堂也是地狱，具有二重性。对名利善处之，则为福，为乐，为天堂；不善处之，为物所累，则为祸，为忧，为地狱。所谓“位尊身危，财多命殆”是也。身处高位者，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政治火炉上烤，使自己成为“责备之地，嫉妒之门，怨尤之府，利害之关，忧患之窟，劳苦之藪，谤讪之的，攻击之场”。身处如此境地，你能潇洒得起来吗？这叫做“为官所累”。所以，人们常常依据道家的人生哲学，主张淡化功名，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不管是“为利所累”还是“为官所累”，都是“为外物所累”。因为居高位者，不知进退，将有生命危险；聚财富者，“不以义取”、不“乐善好施”，也将有性命危险。这就是老子所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遣其咎”（《道德经》九章）的道理。

（二）“少私寡欲”的情欲观

第二道关是“情欲关”。

为了维持人的生命，满足人生而具有的各种情欲是需要的。但是，如何对待人的情欲，历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自古至今，总有人提倡“纵欲主义”，认为人生“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主张“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香，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老子则主张“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道德经》六十四章）。这里，所谓“不欲”，并不是完全放弃人的情欲，而是“少私寡欲”（《道德经》十九章）的意思。老子说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八十章），庄子说的“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即是道家“少私寡欲”思想的形象写照。在道家看来，人生欲望难填，如果无止境地追逐财货，放纵情欲，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1）就个人养生来说，“益生曰祥（祸害）”（《道德经》五十五章）。老子认为，声色犬马，饮食男女，本是人的生理需要，但是如果过分地追求它，就会造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道德经》十二章）。自古至今，有些人之所以短命，主要是“以其生生之厚”（《道德经》五十章），即放纵嗜欲、为非作歹的结果。

（2）从个人道德来说，过分地追求名利财货，非但无益于贵生，反而会行伤德坏，身败名裂。这就是老子说的“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十二章）的意思。

清代学者金缨告诫人们：“浓于声色，生虚怯病；浓于货利，生贪饕病；浓于功业，生造作病；浓于名誉，生矫激病。”（《格言联璧》）这就是现代人所谓的“荣誉病”和“富贵病”。

在老子看来，社会上的一切罪恶和灾祸，人间的一切矛盾和纷争，皆源于“不知足”。老子指出：“罪莫大于可欲（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痛苦）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四十六章）又指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四十四章）这就是说，只有“知足”才能“不辱”，只有“知止”才能“不殆”，只有“不辱”、“不殆”，才有人生的长久欢乐。

金缨在《格言联璧》一书中发挥说：“饱肥甘，衣轻暖，不知节者损福；广积聚，骄富贵，不知止者杀身。”他还进一步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说：人

间“贫贱是苦境，能善处之自乐；富贵是乐境，不善处之更苦”。“困辱非忧，取（自取）困辱为忧；荣利非乐，忘荣利为乐。”在这里，苦与乐的转化条件是“知足”。

对于人来说，适度的欲望，应当满足。因为不能满足人的适度欲望，使人处于“迫生”境地，是痛苦的。但是，过度的情欲追求，也会给人带来痛苦和灾祸，使之成为人的心灵自由的沉重负担。所以，按照“适度”原则，做到“知足常乐”，就能使自己从过度膨胀的情欲困惑中解脱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既需要“知足”，又需要“不知足”，“知足”与“不知足”是相辅相成的。在人生历程中，由“多欲”而萌生的奋发进取的“不知足”，既是事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源泉。但有时又需要清静无为的“知足”，以防止由贪心而产生的祸殃，保证身心放松，精神自由，恢复精力，以利再搏。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满足人生的一切欲望。如在现实生活中，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往往不能同时满足，事业与爱情无法兼顾，工作与娱乐发生冲突，名与利也难以双收。在这种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根据具体情况，有的人取“不知足”态度，有的则取“知足”态度，只有把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才能调节人的生活节奏，维持人的心理平衡，获取人的精神愉悦。这是一种高超的生活艺术。

（三）“以死为乐”的生死观

第三道关是“生死关”。

古今中外，死亡都是人们探索的一大课题。一般说来，人总是本能地“悦生恶死”，把死亡看成人生的最大悲剧，沉浸于对死亡的恐惧而不能自拔。道家为了解脱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改变人的“悦生恶死”的忧伤心态，以博大的宇宙情怀，展开了对生死之道的冷静思考。在生死问题上，道家不赞成“悦生恶死”，要求生则乐生，死则安死，以扫除悦恶之情对人心灵的外在干扰。主张“不乐寿，不哀夭”（《庄子·天地》），“不知说生，不知恶

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来”（《庄子·大宗师》），以洒脱、宁静的心境和“顺其自然”的态度，直面人的寿与夭、生与死。

古今中外，能看透人的生死之奥秘者，莫过于道家。道家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人的生死放在宇宙大化流行中去考察，将人对生死的恐惧与忧伤理性地转化为对宇宙大化流行的观照。老子依据“万物得一（即道）以生”（《道德经》三十九章）的宇宙论思想，认为人的生命产生于“道”，经过生长发育到衰退死亡，最后又复归于“道”（即回归于生命的根源处），老子名曰“归根”。“归根”既标志着旧生命的终结，又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老子谓之“复命”（复原生命）。这就是老子所谓“出生入死”（《道德经》五十章）、“归根复命”（《道德经》十六章）命题的真实含义。这样，老子就把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转化为对“归根复命”、“出生入死”的理性认识，从而把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对生死规律的冷静思考，将人的有限生命融入无限的宇宙之中，既消除了因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而带来的人生忧伤，又赋予人之生死以一种达观的超然的态度。

老子还从境界论角度提出了“死而不亡者寿”（《道德经》三十三章）的命题。古代有人以“三不朽”学说解读它。《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里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朽。”这一解读非老子本意。老子所谓“死而不亡”，既不是人死肉体不灭，也不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而是说人通过自身的摄生修养，即可达到与“道”浑然一体，在精神上有一种不生不死的主观体验，上升到一种超越生死有限而入于生死无限的境界。“死而不亡”只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境界，在客观世界里是根本不存在的。

庄子继承与发挥老子的“出生入死”的生命观，从“气”学的观点，认为人的“出生”是“气”之聚，“入死”是“气”之散，人之生死不过是“气”的不同存在形式。“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一体化）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人与天地同生于“道”，又回归于“道”，人之生死不过是“道”的循环、“气”的转化，人又何必为生死、寿夭而恐惧忧伤呢？

根据道家“死生存亡之一体”的生死观，庄子从自然论出发，认为人的生死寿夭如昼夜交替一样，完全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他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又说：“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驎之驰过隙也。”（《庄子·盗跖》）“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阳光掠过空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庄子·知北游》）既然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那又何必“生物哀亡，人类悲之”呢？

庄子根据道家“死生存亡之一体”的生死观，进一步提出了“以死为息”、“以死为归”的思想。《庄子·刻意》云：“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这就是说，人活着的时候，为外物所累，好像漂浮不定的游物，既劳形又劳神，只有死去，才是人生的彻底休息。《庄子·庚桑楚》又云：“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也。”庄子站在宇宙大化流行的角度，把生视为自幼流落于外、漂泊不定的孩子，把死看成流浪孩子的回家。这就是俗语所说的“落叶归根”。那种悦生恶死之人，就好像一个流浪漂泊、痴迷于外物而不知回家的可怜孩子。

根据道家“死生存亡之一体”的生死观，在“以死为归”思想的基础上，庄子又提出了“以死为乐”的思想。他在《庄子·齐物论》中论证说：“一受其成形，不化（或曰亡，犹云弗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劳碌）而不见其成功，怵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一旦禀受“气”而成形体，不变化而等待形体耗尽，为外物所役，相刃相磨，如马驰骋追逐于其中，而不能止步，这不是很可悲的吗！终身劳碌而不见其成功，疲惫病困而不知一生究竟为的是什么，这不是很可悲的吗！这样的人虽然不死，又有什么价值呢！人的形体一天天枯竭衰老，人的精神也随之而痴呆消泯，这不是莫大的悲哀吗！

道家在揭示人生悲哀困境的同时，又通过各种寓言形象地论证了“以死为乐”的观点：

（1）庄子妻死。惠子去吊丧，看到庄子正蹲坐着“鼓盆而歌”。他批评

庄子说：“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至乐》）庄子解释说：“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哀伤呢？但观察她的开始，好像不曾降生；不仅未降生，而且本来就没有形体；不但无形体，而且本来就没有气。只是在若有若无的恍惚之中，忽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为死，这就好像春夏秋冬四时的交替运行一样。现在，她安静地睡在天地之间的巨室中，而我却在一边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样做，不通达生死由天的道理，故而不哭。”

（2）庄子见髑髅。《庄子·至乐》篇中讲到，庄子到楚国，看见一个干枯的髑髅，他用马鞭敲敲后，就把它拿来当作枕头睡觉。半夜里，髑髅在梦中对庄子说：在人间，不管是“贪生失理”、“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还是“不善之行”、“冻馁之患”，皆人生之累也，死则无此矣。髑髅进一步为庄子描述“死之说”，指出“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反问道：“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听后，忧愁地回答：“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3）庄子主张“天葬”。庄子将要死的时候，弟子们想为他厚葬，他以惊人的气魄，对弟子们说：“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赇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当弟子们告诉他担心乌鸦、老鹰会啄食遗体时，庄子回答道：“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列御寇》）这是何等豁达的胸怀！超然生死，追求精神解脱，他对于人的生死有着比世人更为清醒的认识。儒家主“厚葬”，墨家倡“薄葬”，而庄子则主张“天葬”。这不仅表现了他对人生终极的思考与超越，也是对世俗社会“厚葬”之风的严厉批判。

在《庄子·大宗师》篇中，庄子指出：“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自然给我以生命，使我劳作一生，只有到年老多病体衰时才使我安逸，最后又以死亡使我安息。从生到死，完全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因此，生与死既然是自然的造化，就不应重生轻死。只有懂得“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人，真正体悟出生命的真谛，才能从死亡恐惧中解脱出来，成为“潇洒走一回”的人。

上述三则寓言表明，庄子对于生死的理性认识有助于现代人认识生命的本质，充分珍惜自己的宝贵生命。同时，有助于现代人深化对死亡价值的认识，从而消除对死亡的恐惧。道家确实看透了人的生死之谜。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平静地走向死亡。这是一种经过道家理性净化了的人生境界。

第八章

道家智慧与成功人生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意思是说，人对着镜子可以整理服饰与穿戴；参照历史经验教训可从中总结国家兴衰之道；以人为镜，可以对比自己和别人的优点与缺点，并从中找出自己的成功和不足之处。我们通过对张良成功秘诀和道家“不言之教”的解读，有助于现代人走上成功之路。

（一）解读张良“忍之术”的秘诀

西汉名臣张良逝后两千多年间，中国历代文人墨客和社会政治家，或赋诗咏歌，或拜谒陵庙，称颂不绝；又重修张良墓，重建张良祠，这究竟是什么呢？从他的成功人生中解读其精神世界。为寻求这一答案，笔者重读《史记》、《汉书》和其他有关史料，仿佛看到了他所以成功的两个最耀眼的亮点：一是人格魅力，二是智慧超群。这或许是其成功的秘诀，也是其为后人称颂不绝的原因。

1. 人生成功取决于人格魅力

老子曰：“自胜者强。”历史证明，人生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他的人格魅

力。只有善于战胜自己的人，才能战胜他人。不论是古代的英雄豪杰，还是现代的模范人物，在他们的人格中，总含有两个永恒的人生理念，即把“个人名利淡如水，国民事业重如山”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当秦灭韩后，张良满怀为韩报仇的爱国激情，竟置“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演出了一幕可歌可泣的博浪沙刺秦王的悲壮史剧。（详见班固《汉书》）刺秦王失败后，他逃匿下邳，路遇黄石公。黄石公“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圯桥纳履”，以折其匹夫之勇；“三会立信”，以折其倨傲无礼，使其能以“忍”做事、以“信”做人，从而完成了从“壮士”即从“狙秦怀猛气”到“师汉挺柔容”（卢思道《春夕经行留侯墓》）的人生转变。这就为他日后实现其人生价值奠定了人格基础。

2. 道德与智慧成就人生价值

汉代元年，刘邦听从张良计，召诸县父老豪杰，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司马迁《史记》），余悉除去秦法，以解民倒悬之苦，充分体现了张良的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刘邦拒关（指函谷关）勿纳诸侯军，项羽因之欲击刘邦，兵至鸿门。项伯与张良故情甚厚，私见张良，劝他逃走，以保全其生命。而张良以为“不义”，非但不私逃，反而以大局为重，多方设法保护刘邦，使刘邦平安归汉。他的“忠君”、“守信”形象，跃然纸上，令人敬佩。汉三年，刘邦依张良之计，令民得田故秦关中废苑园池，又令汉地引水灌废丘，以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汉五年，张良建议刘邦指令“罢兵归田，免奴婢为庶人”，以增加农业劳动力。汉六年，刘邦称帝，大封功臣。群臣因分封不公，“日夜争功不休”。张良虽在推翻暴秦和楚汉之争中无赫赫战功，但刘邦认为“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其功甚大，请他“自择齐三万户”受封。而张良却谦让地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承受）三万户。”（班固《汉书》）于是，刘邦封张良为留侯。这种淡泊名利的谦让美德，令人可亲可敬。汉十二年，刘邦晚年“不理朝政”，张良因吕后跋扈专权，杀韩信，囚萧何，多次谏言又不听。于是，深谙“功遂身退”哲理的

他，只好急流勇退，以保全自己。他对汉高帝说：“今以三寸舌为帝王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班固《汉书》）从而完成了从“谋士”到“隐士”的又一次人生转变。这较之韩信不听蒯通告诫而迷恋富贵、被杀长乐宫来说，其人生智慧与道德境界不知高明多少倍！

3. “忍”是人生智慧和美德的真髓

张良“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他一生为刘邦出谋划策，被司马迁赞为“其人计魁梧（悟）奇伟”。他的超群智慧，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个“忍”字。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其《留侯论》中指出：张良辅佐刘邦灭秦楚、兴汉室，只“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此论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秦二世三年，张良引兵辅佐刘邦攻略韩地十余城。此时，刘邦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懂得“养气之学，戒乎躁急”的忍术，在秦强汉弱的情况下，急于攻打峽关。张良依“戒乎躁急”的忍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当众拒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司马迁《史记》）

根据张良之计攻下宛城后，刘邦急躁之病又犯，“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峽下军”。面对“秦兵尚强，未可轻”的现实，张良不得不再次深折刘邦“躁进之气”，主张布疑兵，收买守关秦将，再以武力击之，遂取武关，再战兰田，直逼咸阳，秦王子婴降。

刘邦进入咸阳后，面对秦宫数以千计的宫室、狗马、重宝、嫔妃、宫娥、帐帷等，禁不住声色物欲的诱惑，“意欲留住之”。张良深知“玩物丧志”的道理，依据“声色之忍”、“酒食之忍”的忍术，谏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于是，刘邦封秦官府库，还军霸上。（班固《汉书》）

自秦亡后，天下之势已由秦汉之争转为楚汉之争，如何以弱汉战胜强楚呢？张良辅汉胜楚，采用的依然是“忍”之术。此时，刘邦称帝心切，听信他人之言，“距（拒）关（函谷关）勿内（纳）诸侯”，引起项羽极大不满，欲击刘邦杀之。在鸿门宴上，面对险象丛生，张良信守“能忍辱者，必能立

天下之事”的人生哲学，使沛公以兄事项伯，“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再“令项伯言沛公不敢倍（背叛）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才取得项羽的和解。当项庄舞剑欲杀沛公时，张良即令樊哙入内护之。随后，“沛公起如厕”，独身逃回汉营，免遭一劫。（详见司马迁《史记》）

尔后，依张良之计，沛公率军南去巴蜀，“烧绝栈道”，以此向项羽表明：“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同时，又书告齐王田荣反。项羽随之将楚兵由西击汉转向北击齐，这就为刘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司马迁《史记》）。汉四年，韩信灭齐后，“欲自立为齐王”，认为“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若不以假王镇之，“其势难定”。此时，刘邦正被楚军围困于荥阳，急待韩信前来解围。所以，当刘邦看完使者来信后，竟忘了孔子的“忿思难”的告诫，顿时大怒，破口大骂：“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牢记“圣人有忿思难之诫”，故一边踩着刘邦的脚暗示，一边又附在他的耳边说：“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刘邦忽然大悟，假意地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于是，派张良之齐立韩信为王，并将韩信兵调来击楚。这是一次成功运用“怒之忍”的典型。（司马迁《史记》）所以，苏轼赞曰：“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辞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谁能全之？”

汉六年，刘邦分封功臣时，由于他心胸狭窄，不懂得“忍侮于大者无忧，忍侮于小者不败”的道理，不能做到“恩仇两忘，人己一致”，故他所封者皆“萧（何）曹（参）故人”，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者”，从而引起未封者极大不满，即相聚谋反，刘邦甚忧。张良问道：“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答曰：“沛人雍齿与我故（旧怨仇），数（多次）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张良依据“仇之忍”、“侮之忍”的人生智慧，告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刘邦设置宴宴，宴请群臣，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皆曰：“雍齿尚为侯，我属（辈、等）无患矣。”张良在这里成功地以“忍之术”化解了一场政治危机。（班固《汉书》）

张良成功的一生，证明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

理。凡胸怀大谋者，必具“小忍”之美德，“小忍”是“大谋”实现的道德保证。“忍”是一种高尚美德，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并非是“无能”的代名词。

（二）道家的“不言之教”

“不言之教”出自于老子《道德经》的四十三章。它是道家“自然无为”价值理念在语言上的表现和要求。这一命题，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在教育方法上，“贵行而不贵言”，“身教重于言教”。圣人提倡“不言之教”，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用语言进行教化，而是强调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实践比空谈更为宝贵。如果只是实施“言教”而不注意实行“身教”，只是实行书本教育而忽视社会实践，就不会取得成功。因为它违背了“不言而善应”（《道德经》七十三章）的“天之道”。北宋政治家吕惠卿释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尝差也。故曰‘不言而善应’”。天不言，四季和谐运行；地不语，万物生生不息。天地之道，不言而行。所以，按照天地与四时万物“不言而善应”的法则，圣人在人间对民众进行教化，亦应重身教、重实践。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于是举国上下就跟着穿紫色的衣服，一时间把紫色衣服炒得价格很高。齐桓公发现之后，听从管仲的建议，装出厌恶紫色的样子，三天之后，境内再也没有人穿紫色的衣服了。邹国国君喜欢佩带长帽缨，他的左右也都跟着学，长帽缨一时抢手。后来，邹君“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缨”。从齐桓公和邹国国君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君王以身教影响和感化人民是多么重要啊！

“言教”是一种教育手段和方法，而“不言之教”则是一种教育人的大智慧、大境界。孔子是一位善于“不言之教”的教育家。在《论语·阳货》篇中，有一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曰：‘予（我）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传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和老子一样，根据他对“天之道”的深刻体悟，在人

间大力推行“不言之教”。教育学生不仅靠老师的说教传授知识，还要靠学生的躬行体悟获得真知。学生的知识，既来自于教师的“言教”，也来自于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的体悟。

“不言之教”是一种教育手段，也是明君贤臣孜孜以求的一种道德境界。《国语·鲁语》中有一则故事：季文子虽然官居鲁国宰相，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女却没有一个人身穿绸缎衣裳；他家里的马匹，也只喂青草而不喂粟米。孟献子的儿子仲孙责问道：“你身为鲁国宰相，可是你的妻子不穿丝绸衣服，你的马匹也不用粟米来喂，难道你就不怕朝廷上百官耻笑你吝啬吗？难道你不顾及与诸侯交往时影响鲁国的声誉吗？”季文子回答说：“我当然也愿意穿绸衣、骑良马，可是看到国内很多老百姓吃粗粮穿破衣，我不敢让全国父老姐妹粗饭破衣，而我家里的妻子儿女却过分讲究衣着饮食。我认为具有高尚品德才是国家最大的荣誉，从未听说过用炫耀自己的美妾、良马会给国家争光。”孟献子闻知儿子对季文子的责问后大怒，将仲孙幽禁了七天。受到管教的仲孙也开始仿效季文子的俭朴行为。

中国有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它出自于《史记·李将军列传》。意思是指桃树、李树虽不会说话，但因其花朵美艳，果实可口，人们纷纷去采摘，于是便在树下踩出一条小路来。它比喻为人做事只要真诚笃实，德才兼备，虽不言也能自然感动他人。西汉名将李广智勇双全，他在同匈奴作战中，为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对待兵士上，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有一次，在行军途中，天气寒冷，李广发现身边有一个腿部负伤的士卒，冻得全身直打颤，行走十分艰难。他立即跳下马背，毫不犹豫地牵着缰绳来到这个士卒跟前，亲切地对他说：“你行动如此不便，就暂时骑我的马吧！”说完，李广便小心翼翼地把他扶上马背，并且亲自为他牵马，轻声地和他交谈。负伤的士卒受到将军如此的呵护，不由得感激涕零。当军队到达宿营地点时，李广又发现军中粮食缺乏，为了让负伤的士卒吃得好些，李广就将自己那份饭菜给他们送去，自己却是空着肚子挨饿了一夜。

二是在“言教”上，强调“希言”重于“多言”。老子指出：“希言自然。”（《道德经》二十三章）又指出：“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

自然。”（《道德经》十七章）所谓“希言”，即少言、罕言、寡言；所谓“贵言”，即是不轻易说话，发号施令。为什么要求“希言”、“贵言”呢？因为在老子看来，“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道德经》五章），即人违背“自然”本性，多说话，多烦琐政令，只能言多必失，加速穷困与败亡。所以，不如坚守心中的清静之道，实施无为的“不言之教”。

老子进一步从“希言”与“多言”的比较中，论证了“不言之教”的重要性。

（1）“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德经》五十六章）这里的“知”是通假字，与“智”字通，“知”作“智”解，知即智慧之智。“知者不言”是指聪明的人不乱说话，不多说话，从不向民众发布烦多政令，以炫耀自己。喜欢喋喋不休、以“多言”炫耀自己的人，是缺乏真知灼见的愚蠢者。“少言”与“多言”是区别智者与愚者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现实生活中，讲话要注意特定的对象、场合和背景。该说的一定要说，不该说的一定不能说，说了反而不如不说的好，这叫“知者不言”；如果不看对象，不看场合，想说就说，往往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甚至会带来祸害，后悔一生，这叫“言者不知”。春秋时候，齐景公喜欢射鸟，他让一个名叫烛邹的人去看管那些捕捉到的鸟。可是烛邹一不小心，让那些鸟都飞走了。齐景公很生气，命令官吏杀掉烛邹。当时，晏子是齐国的相国，知道后就对齐景公说：“烛邹有三条罪状，请让我当面向他一一指出，然后再杀他。”齐景公说：“可以。”于是就把烛邹叫来，当着齐景公的面列数烛邹的三条罪状。晏子说：“烛邹，你为我们齐王看管鸟却让鸟飞了，这是罪状之一；因为这事，使我们齐王为了鸟而杀了人，这是罪状之二；因为这事，使各国诸侯听到这件事，认为我们齐王看重鸟而轻视了人，这是罪状之三。”晏子列数烛邹罪状之后，请求杀掉烛邹。齐景公说：“不要杀了，我听从你的指教。”这里，充分表现出了晏子的说话艺术和智慧。智者晏子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该说什么和该说什么，先说什么和后说什么，表面上说什么和心里想说什么。

（2）“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八十一章）意谓诚信之言，出于真心，质朴无华，无媚世之病，故“不美”；华美之言，多尚伪饰以媚世，

故不可相信。信言因质朴而少，美言因伪饰而多。漂亮话说得越多，又无法一一兑现，使自己成为口惠而不行的伪君子，往往陷入“美言不信”的人生怪圈。信言是一碗苦丁茶，味苦却沁人心脾；美言是一坛鸩酒，醇香却夺人性命。真诚质朴的信言，逆耳却醍醐灌顶；阿谀奉承的美言，顺耳却贻害无穷。

出自《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句格言，已被民间通俗化为喜闻乐见的谚语。如“好话不好听”，“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说金玉良言往往不中听。“虎在软地上易失足，人在甜言里会摔跤”，“说嘴郎中无好药”，等等。

(3)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道德经》八十一章)这里所谓“善者不辩”，也就是庄子说的“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老子说的“大辩若讷”(《道德经》四十五章)，即善辩者不逞口舌之辩，宛如木讷之人语言迟钝；徒逞口舌之辩者，则不是善辩者。因为辩论之优劣，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即要求字字珠玑，句句掷地有声。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总统林肯虽有说话结巴的语言障碍，但他具有“大辩若讷”的优秀品格，发表演讲既简朴又明快。在南北战争胜利后，他在葛底斯堡“悼念阵亡者”的大会上演讲，虽然只有15分钟，却被人们视为无可挑剔的精彩演讲。毛泽东同志在选派驻外大使时，“大辩若讷”也是候选人的重要标准之一。有一次，他选派一位同志担任外交使节，而这位同志向毛泽东报告自己不善言谈，不适于作外交官，毛泽东对他说：“这正是你的优点，作为驻外使节就应谨言慎行。”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真理，不只限于治国，而且也完全适用于企业管理。道家提倡的“不言之教”，在塑造现代企业家的人格魅力和使用人才上，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企业家来说，要想走向成功之路，应力戒空谈，切忌浮夸，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创业。成功的企业领导人应当像球类运动员那样，紧紧盯住一个球，盯着你的奋斗目标和伟大理想。“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企业家只有少说多干，才能保证企业走向成功。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帕金森指出：“成就最大的企业通常是那种不事声张，干着相对来说令人厌烦的工作的企业。”(《帕金森管理经典》)

在企业管理中，员工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有“光说不动型”，也有

“沉默实干型”。“光说不动型”的员工，往往把他们的智慧和才能用于“嘴上功夫”，通过“嘴”为自己牟私利，甚至制造麻烦、搬弄是非；而“沉默实干型”员工，整天不声不响地在自己的工作岗苦干实干，成绩卓著。企业领导人应善于发现沉默的实干型员工，脚踏实地创业。企业的成功，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不言之教”是企业家走向成功之路的重要保证之一。

第九章

道学智慧与快乐人生

——葛洪的心灵养生论

葛洪（283—343），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汉族，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他是东晋著名的道学家、炼丹术家、医药化学家、养生学家。著有《抱朴子》、《抱朴子养生论》、《肘后备急方》、《神仙传》和《西京杂记》等，其中《抱朴子》是他的代表作。

葛洪的养生文化是建立在他的形神论基础之上的。他在《抱朴子内篇·至理》篇中，指出：“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形）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葛洪从人是“形神合一”的高级动物这一认识出发，在养生上，既讲生理（身）养生，更讲心灵（心）养生。

（一）养生是一种人生价值选择

葛洪一生所追求的是快乐神仙的人间仙境。而要达到这一理想境界，首先就必须选择与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人最初是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动物的本性。但是，人又是一种“身（肉体）”与“心（心灵）”、“形”（形体）与“神（精神）”相结合的高级动物。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主要不是形体、美色等，而是充满人文精神的纯洁心灵（或阳光心态）。

每个人生而具有“七情”、“六欲”。所谓“七情”，一般是指喜、怒、

哀、乐、爱、恶、欲；所谓“六欲”，是指生、死、耳、目、口、鼻之欲。“七情”和“六欲”是每个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本性。

为了维持人的生命和繁衍后代，人需要构建以“食”为基础，以衣、食、住、行、性、健康与安全等为内容的物质家园。同时，为了满足人的心灵需求，必须塑造完美人格、提升人生境界，构建以“道”为指导，以道德、艺术、音乐、哲学和宗教信仰等为内容的精神家园，以满足人的精神生活。构建物质家园与构建精神家园是人类赖以生活的两大基本生存形式，就像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那么，如何正确地认识与摆正“道”与“食”的关系，是一个人生价值观的选择。从古至今，有两种选择：一是君子（有道者）的“谋道不谋食”，二是世俗者的“谋食不谋道”。

如果按照世俗者的“谋食不谋道”的价值观，就会把人生的幸福快乐看成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生活，认为“有钱有权就是快乐”、“吃喝玩乐就是快乐”、“物质刺激就是幸福”等，势必会陷入为物所役、价值迷惘的泥坑。葛洪指出：“夫圆首含气，孰不乐生而畏死哉？然荣华势利诱其意，素颜玉肤惑其目，清商流征乱其耳，爱恶利害搅其神，功名声誉束其体，此皆不召而自来，不学而已成。”（《抱朴子内篇·至理》）又指出：“知好生而不知有养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饮食过度之畜疾病，而不能节肥甘于其口也。知极情恣欲之致枯损，而不知割怀于所欲也。余虽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抱朴子内篇·微旨》）这就是说，贪得无厌者的“情欲”是人类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世俗者在金钱、权势、虚（浮）名、女色和美言的诱惑下，完全迷失了人生方向，将“真我”异化为“假我”，将自己变成了没有理想、没有道德、没有信仰、没有敬畏之心的“游魂野鬼”，根本不可能成为快乐的神仙。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大写的“权”字与“钱”字，只知道“饮食过度”，只知道“极情恣欲”，而完全忘记和忽视了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结果把自己变成了“物质富有，精神贫乏”的畸形人格。他们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德”（道德）字；什么都不少，就少一个“魂”（灵魂）字。这种满身铜臭味的人，什么都不怕，什么坏事都敢干。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丑恶现象和犯罪行为，都是这些为物所役的“假人”所造成

的。过度地追求物质生活和感官刺激，他们就有可能走犯罪的道路，沦为阶下囚，或者疾病缠身而早逝，哪里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正如美国人本主义哲学家爱利希·弗（1900—1980）指出的那样：“贪婪是一种会给人带来无限痛苦的地狱，它耗尽了人力，满足其需求，可并没有给人带来满足。”为贪婪情欲所累的人，永远都不会获得幸福与快乐，更不可能成为葛洪所追求的长生神仙。

我曾在南岳考察道教，发现一处道观的祖师殿有一副楹联：财富当求应能知足，神明可鉴切莫贪心。如果人能照此生活，就不会为“贪婪情欲”所累，而从“欲而不贪”中获得幸福与快乐。人应从哪里寻求幸福和快乐呢？要想获得幸福和快乐，就必须在人生道路上始终坚持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核心价值观。葛洪正确地指出：“立德践言，行全操清，斯则富矣，何必金玉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则贵矣，何必青紫之秉乎？”（《抱朴子外篇·广譬》）在富贵上，他鄙视世俗的荣华富贵，认为“金玉之崇”的财富和“青紫之秉”的权势，并不是人所追求的真正富贵。只有“立德践言，行全操清”的美德和“高尚其志，不降不辱”的行为，才是君子所追求的真正的人生富贵。因为在葛洪看来，“荣位势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抱朴子外篇·自叙》）他认为富贵权势不过是过眼烟云，何必因它得之而喜、失之而悲呢？他认为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主要地不是追求以荣华富贵为内容的“物质家园”而是“以太和为至乐”、“以恬淡为至味”的“精神家园”。清代权倾朝野的和珅，在他被处死后，其子丰绅殷德才从中懂得了人生的真正价值，诗曰：“朝亦随群动，暮亦随群动。荣华瞬息间，求得将何用？形骸与冠盖，假合相戏弄。何异睡着人，不知梦是梦。”丰绅殷德从全家被抄和和珅被处死中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面对当代社会因“精神家园”与“物质家园”的错位而产生的“畸形”人格和价值迷惘的精神危机，我们应当根据葛洪的价值观，抛弃世俗者的“谋食不谋道”的错误价值观，继承和弘扬葛洪坚持的“谋道不谋食”的正确价值观念，使人真正认识到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权势、美色、浮名、美言更为可贵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利他主义和乐善好施更为崇高、更有价值，努

力把自己变成精神家园的亿万富翁，做金钱、权势、浮名、美色的主人而不是它们的奴仆。只有在“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下，努力追求比“物质家园”更为重要的“精神家园”，从过度情欲中解脱出来，找回“真我”，才能成为长生快乐的人间神仙。

（二）“养身”是一种“减法哲学”

葛洪认为，寻求物质快乐，从本质上是一种不断“涤除嗜欲”的“减法哲学”。他在《抱朴子内篇·论仙》篇中指出：“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于富贵也。苟非其人，则高位厚货，乃所以为重累耳。”欲求长生快乐，其要诀在于“修至道”，“不在于富贵也”。因为在葛洪看来，俗人不断地追求“高位厚货”，“贪荣好利”，“汲汲名利”，享受“极情恣欲”的奢靡生活，乃是人生的“重累”，是不会长生成仙的。所以，“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涤除嗜欲”。换言之，“仙法欲静寂无为”。他还具体地描绘说：“仙法欲止绝臭腥，休粮清肠，而人君烹肥宰脔，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于前，煎熬勺药，旨嘉饕餮。仙法欲溥爱八荒，视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乱推亡，辟地拓疆，泯人社稷，驱合生人（民），投之死地，孤魂绝域，暴骸腐野，五岭有血刃之师，北阙悬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动数十万，京观封尸，仰干云霄，暴骸如莽，弥山填谷。”这些贪得无厌的君主，只“有好仙之名，而无修道之实”，“为合成仙药以与之，不得长生，无所怪也”。

要想长生成仙，只有按照“恬愉淡泊，涤除嗜欲”的“减法哲学”，鄙视富贵者的糜烂淫逸生活，尊崇“简单生活”。在有道者看来，“视爵位如汤镬，见印绶如缢经，视金玉如土粪，观华堂如牢狱。岂当扼腕空言，以侥倖荣华，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赐，带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贵，耽沦势利，不知止足，实不得道，断可知矣”。提倡一种“入无绮纨之娱，出无游观之欢，甘旨不经乎口，玄黄不过乎目，芬芳不历乎鼻，八音不关乎耳”、“内弃婉变之宠，外捐赫奕之尊，口断甘肴，心绝所欲，背荣华而独往，求神仙之幽

漠”的“静寂无为”的生活方式。

葛洪发挥庄子、王充等人的养生观点，具体地提出了“除六害”之说。指出：“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以延（年）驻（颜）于百年。何者是耶？一曰薄（轻视）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诽谤妒忌）。六者不除，修养之道徒设尔，盖缘未见其益。虽心希妙道，口念真经，咀嚼英华（健身治病的药草），呼吸景象，不能补其短促，诚缘舍其本而忘其末。深可诫哉！”

那么，如何“除六害”？葛洪的具体做法是：

主张“十二少”。他说：“所以保和（保持心志和顺）全养（保全天性）者，乃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机（机巧、机心）。夫多思则神散，多念则心劳，多笑则藏腑上翻，多言则气海（指下丹田）虚脱，多喜则膀胱纳客气（指由外入体的客气风邪），多怒则腠理奔血，多乐则心神邪荡，多愁则头鬓憔悴，多好则志气倾溢，多恶则精爽奔腾，多事则筋脉于急（谓血液流通不畅，脉搏跳动急促），多机则智虑沉迷。斯乃伐人之生甚于斤斧，损人之命猛于豺狼。”

主张“四无”。在养生上，主张“无久坐，无久行，无久视，无久听”。

主张“两不”。在饮食上，主张“不饥不强食，不渴不强饮。不饥强食则脾劳，不渴强渴则胃胀”。

除“两过”。在饮食上，主张“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无过极，食勿过饥。冬朝勿空心，夏夜勿饱食。早起不在鸡鸣前，晚起不在日出后，心内澄则真神守其位，气内定则邪物去其身”。

除“两行”。指出“行欺诈则神悲，行争竞则神沮。轻侮于人当减算，杀害于物必伤年底”。

只有按照上述观点，才能做到“行一善则魄神乐，构一恶则魄神欢，魄神乐死，魄神好生。常认宽泰自居，恬淡自守，则身形安静，灾害不干。生录必书其名，死籍必削其咎。养生之理，尽于此矣”。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面临着沉重的压力、快节奏的生活、多选择的机会和心灵的浮躁，葛洪提倡的“恬愉淡泊，涤除嗜欲”的“减法哲学”，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想从物欲所累中解脱出来，只有通过“减

法哲学”，减去一些奢侈的欲望，减去没有价值的身外之物，减去疲惫，减轻烦恼，减去浮躁，减去心灵上的一切沉重负担，才能获得轻松和洒脱。减少一次奢靡淫逸，就会增加一份心灵的纯净与人生的宁静；减少一次诽谤与嫉妒，就会增加一份和谐的空间与道德的高度；减少一次谄媚邀宠，就会增加一份人格的尊严与心灵的净化；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周旋，就会增加一份家人的亲情与生活的从容；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就会增加一份宁静的读书。在人生道路上，宁愿不要车子、票子、房子，也要一份平平安安；宁愿不要灯红酒绿、轻歌曼舞，也要一份恩恩爱爱；放弃变了质的友谊，放弃破碎了的婚姻，放弃爱错了的人，就会获得一份人生的快乐。减去过度的物欲追求，减去力所不及的执着和浮躁，追求一种自然虚静、简朴无为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获得幸福和快乐。总而言之，就是要从人生的沉重物欲的负担中减出轻松，减出自在，减出自由，减出快乐！只有勇敢地放弃人生不必要的“身外之物”，才能从“戒贪”的“减法哲学”中成为真正快乐的人。

（三）“养心”是一种“加法哲学”

如果人在“养身”上实施“减法哲学”的话，那么在“养心”上则要实施“加法哲学”。所谓“加法哲学”，就是加强人文道德修养，不断地塑造理想人格，不断地提升人生境界，以获得心灵的愉悦和满足，从而达到长寿的目的。

要想获得心灵的愉悦和满足，必须进行人生境界的超越和转换。所谓“境界”，是指人的心灵存在的状态。按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观点，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当人的物质生活达到衣食无忧时，就要及时地从功利境界中超越出来，升华为道德境界，方可获取“人乐”。所谓“人乐”，是指“仁者不忧”即“仁者乐”、“仁者寿”的人生境界。在道德人生境界中的人，由于无私欲障蔽仁爱之心，故无得失利害之计较，自然无忧，亦无烦恼。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篇中提出了“为道者当先立功德”的命

题，指出：“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人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一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他在《抱朴子内篇·微旨》篇中又指出：“其有曾行诸恶事，后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则当思救济应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财物，则当思施与贫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则当思荐达贤人以解之。皆一倍于所为，则可使受吉利，转祸为福之道也。能尽不犯之，则必延年益寿，学道速成也。”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不断地心性修养，从功利境界进入道德境界，方可成仙。他论证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又说：“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在葛洪看来，欲长生求仙，既要“服仙药”，又要“行好事”，二者相比，“为道者当先立功德”。他在《抱朴子内篇·微旨》篇中，进一步从纲目结合的角度，详细地论证说：

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赈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杀，口是心非，背向异辞，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赂，纵曲枉直，废公为私，刑加无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宝，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贤者，诛戮降伏，谤讪仙圣，伤残道士，弹射飞鸟，剖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迫胁羸弱，以恶易好，强取强求，掳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倾邪，凌孤暴寡，拾遗取施，欺给诳诈，好说人私，持人长短，牵天援地，说诅求直，假借不还，换贷不偿，求欲无已，憎拒忠信，不顺上命，不敬所师，笑人作善，败人苗稼，损人器物，以穷人用，以不清洁饮饲他人，轻秤小斗，狭幅短度，以伪杂真，采取奸利，诱人取物，越井跨灶，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

在这段长引文中,“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是其总纲,他从人际道德与自然伦理两方面详细地阐述了他的“为道者当先立功德”的命题。根据这一命题,葛洪认为只有从功利境界升华为道德境界的人,才能达到“仁者不忧”的“人乐”境界。这是一种由超越名、利、富、贵的功利境界而升华为道德的人生境界。在这种道德人生境界中,“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权力)、尘视金玉(财富),其重无加焉尔”(《通书·富贵》)。人只要能做到“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自然就会超越人世间的功名利禄,“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从而获得一种“常泰无不足”的精神快乐。道德高尚的人总是快乐的人,而缺德的人总是痛苦缠身,根本无快乐可言。这是一种君子人格之乐。这种人格之乐,既不是向贫贱处求,也不是向富贵处求,而是向自家人格中求。

人不仅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员,而且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员。在获得“人乐”的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由道德境界升华到“天地境界”,方可获得“天乐”。所谓“天乐”,即是尘视名利、雅好山林之乐。人在“天地境界”中,已不再是自私的“小我”,而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的无私之“大我”。人作为“天地境界”中的“大我”,不仅要“事天”,而且还要“乐天”。所谓“事天”,即人类不再为了满足自己膨胀了的私欲,过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而是以平等的朋友关系,要求人类对于大自然应尽“以仁爱物”和“民胞物与”的天伦、天职,真正做到王阳明所云:“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大学问》)葛洪发挥生态文明思想,在《抱朴子内篇·对俗》篇中,大力主张“仁逮昆虫”、“手不伤生”,极力反对“弹射飞鸟,剖胎破卵,春夏燎猎”,从而达到“以仁爱物”的天人和谐境界。这是一种贵贱穷通无滞于心的超然态度,由“天人对立”转化为“天人合一”的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由品尝自然之美而感悟到一种超越功名、利禄、得失而回归自然的“天乐”。

第十章

“为而不争”与“舍得之道”

“舍得”一词源于梵语，最早出自《了凡四训》一书。在《道德经》中，老子也以不同的表达方式阐释了这一人生哲学智慧。

老子认为，在人生道路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三个人生价值观问题：“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道德经》四十四章）即浮名、美誉与生命哪一个更亲近？生命与钱财哪一个更重要？获得与舍弃哪一个更有害？这三个问题，如果不能从价值观高度加以正确解决，就势必会造成“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即过度痴迷于名利，代价必然惨重；财富积藏太多，亡失必然更严重。在人生道路上，如何正确地选择和对待这一问题，就是一种舍得之道。是争还是不争？是舍还是不舍？这是一个价值观问题。

（一）“为而不争”

如何对待名利、如何对待生命，是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核心价值观。

在老子看来，“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十三章）我之所以患得患失，就是因为我有自身的利害；如果我无自身的利害，哪里有忧患可言呢？正如《老子指归·名身孰亲篇》所云：

“失之而忧，得之而喜。一喜一忧，魂魄浮游；一忧一喜，神明去矣。身死名灭，祸及子孙。”正因为此，人只有“以身为天下”，去掉私心，才能把自身托给天下，为天下人办事。这就是老子说的“圣人无身”、庄子说的“圣人无己”的无私精神，就是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同时，道家根据“为而不争”的原则，强调利他与利己的辩证统一。“为人”、“予人”不是单纯的付出，而是一种有利于己的行为，是一种在“为人”、“予人”活动中寻求自己利益，达到为人与为己互利的双赢目的的行为。个人利益即存在于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之中，在利他行为中不但可以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且也可以换取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相比的精神享受和愉悦。这就是庄子说的内刚外柔的“顺人而不失己”（《庄子·外物》）的价值内涵。

老子指出：“将欲夺之，必固（暂且）与之。”（《道德经》三十六章）在他看来，“得”与“舍”这对概念，既矛盾而又相生。所谓“舍”，即是舍弃、损失；所谓“得”，即是获得、便宜。认为“舍即是得，得即是舍”，只有先“舍”方可后“得”，“得”是以“舍”为前提的，二者密不可分。作为“舍”的一方，有时在其“舍”之初可能得不到回报，而“得”则是在其施舍之后的一种自然合理的反馈。正如史学家范晔所云：“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不知与之为取。”这就是“舍得舍得，不舍即不得”的道理。老子进一步指出：“圣人不积（或无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八十一章）有道圣人藏财富于天下，从不据以为私有。正因为圣人竭尽全力帮助人，所以百姓归附之心如水之流湿，如火之就燥，己之所得也就愈多。这就是“小舍小得，多舍多得”的人生哲理。

在如何正确对待“舍与得”的问题上，老子主张圣人“为而不争”或“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指出：“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八十一章）“天道”对于宇宙万物，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就生、为、长而言，是“为”；就不有、不恃、不宰而言，是“不争”。这就是“体道”圣人的“为而不争”的价值观。老子还以债权人和负债人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了这一人生价值观。他说：“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有道德的人就像管契券的那样宽容不责于人），无德司彻（无道德的人就像管租税的人那样斤斤计较）。”“天道无亲，常与

善人（天道对人无所偏爱，经常将利给与善人）。”（《道德经》七十九章）老子根据“为而不争”的价值观，要求君主在治国上应“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即负责契券之事的有德君臣，他们手中虽然握有他人的契券，但是从不强迫他人偿还债务，以利济百姓。而无德君臣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侈的享乐生活，就像管理租税的人那样，对百姓总是斤斤计较，百般盘剥，无度索取。这是老子所反对的。

（二）“舍得”是一种人生价值选择

人生就是选择的过程。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鱼与熊掌、生与义，必须择一，就是人生的选择。在人生道路上，人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舍”与“得”的两难抉择。有些人不愿舍去、总想占取所有好处，其结果往往是什么都得不到，犹如手中的沙子，越是想把它攥紧，从指缝间流失的沙子也就越多。所以，我们在鱼和熊掌不可能兼得的情况下，就必须在“两难”中择其一。如果能够抛开功利私心，积极主动地舍去不必要的身外之物，不仅自己开心，而且还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隐，舍去的是官职，得到的是自由、恬淡。当自由与生命、爱情不能兼得时，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当生命与正义发生矛盾时，应当坚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人生理念。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汉代司马迁云：“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宋代文天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优秀共产党员夏明翰在敌人刺刀下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大凡成功人士，一开始，并非刻意地追求名利，只是一味地默默付出，随着他们为社会、为他人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权力、荣誉、名望、金钱才会自然而然。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他们开始只是埋头本职工作，并非为了获

奖。诺贝尔奖只是他们百般努力之后不期而至的收获。只有先付出，才有美丽的收获。

在人生选择上，有大利与小利之分，舍小利才能取大利。有一则寓言故事说：某人旅行经过沙漠，焦渴濒死。忽见茅屋，内置木盆，存水一半。欲饮之，忽见留言曰：以盆中余沥作为引水，可从屋内压井汲水。旅行者犹豫久之，终不饮，依留言操作，果得井水。为了未来可能得到的清泉，他舍弃了眼下救命的“半盆水”。这样，他不仅获取了一井清泉，而且也获得了愉悦的心情。据《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国有个名叫孟尝君的相国，一生喜欢养士。其中有个落魄的人名叫冯谖，有一次，孟尝君派他去封地薛邑讨债。冯谖问他讨回来的钱应该买什么，孟尝君说：就买点我们家没有的东西吧。冯谖到薛邑后，目睹百姓生活十分贫苦，对讨债甚为不满。他就擅自向百姓承诺说：孟尝君知道大家生活困难，特地派我前来告诉大家，以前的欠债和利息一笔勾销。我带来的欠条当着大家的面烧掉，以后不再讨要。百姓听后，感激涕零，欢呼雀跃，称赞孟尝君仁义慈悲。数年后，孟尝君遭人陷害，罢相回到封地薛邑。薛邑百姓知道后，倾城而出，夹道欢迎。孟尝君才领悟到冯谖“焚券市义”的苦心。冯谖是一位真正的“执左契而不责于人”的有德之人。这就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得”与“失”的转化。

舍得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境界。舍得之道，不仅适用于企业与客户之间，也适用于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同事之间。它可以体现在金钱、名利上，也可以体现在情感、友谊以及待人接物等方面，莫不透射出智者的豁达气度。

在构建企业家与员工的和谐关系上，也需要舍得之道。有一位服务企业六年的员工，由于健康原因，向企业请辞，他黯然地说：“我舍不得离开公司。”原因是这家企业非常重视人本管理，非常关心员工。该员工任职时，一日神色恍惚，老板询问后，得知其远在西安居住的爱人生病住院，乃密嘱手下安排驻地人员，为他的爱人送去了鲜花和慰问品。在员工离职时，公司也会专门安排欢送会，令员工心怀感激之情。所以，该企业历年的员工主动流失率极低。因为企业家在感情投资上肯“舍得”，才换来了员工心灵的“不舍得”。在企业管理上，舍得时时向员工展现真诚的笑脸，舍得为达成一

致目标而不厌其烦地上下沟通，舍得无所保留地带出一支素质精良的队伍，舍得为顾全大局而牺牲小我，舍得付出更多的刻苦努力，舍得经受住各种物质诱惑，换来的将是企业面貌的焕然一新。

在构建夫妻、朋友关系上，更需要一种忍耐的舍得智慧。任何人都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是朋友还是同事，在接受对方优点的同时，也必须包容对方的缺点，方可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多年的家庭磨合中，丈夫在接受妻子对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几十年如一日的精心照顾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妻子可能是一位不给丈夫留情面的“怨妇”；你选择了她的美貌和温柔，你就可能要忍受她的啰嗦和任性；在接受妻子非常能干，帮助自己做生意、有着较高收入的同时，也可能要接受妻子喋喋不休的抱怨。反之，妻子对待丈夫亦应如此。如果只接纳对方的优点而不容忍对方的缺点，轻者吵架，重者离婚，家庭是无快乐可言的。如果只接纳朋友的优点而不容忍朋友的缺点，也是难有真正友谊可言的。“舍得”是一种忍耐，无非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同时也失去了为此所必须付出的东西。这就是“舍”与“得”的辩证关系。

舍得是一种灵性的觉醒。只有从心灵中舍弃物质的诱惑和凡俗的喧嚣，才能获得一片宁静和快乐。在《韩非子·喻老》篇中，有一段子夏与曾子的对话：“子夏见曾子。曾子曰：‘何肥（胖）也？’对曰：‘战胜，故肥也。’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向往）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羡慕）之。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羸（瘦）。今先王之义胜，故肥。’”这里说的“先王之义则荣之”与“富贵之乐又荣之”，实际上是两种人生价值取向的选择。向往“先王之义”，就是重在追求道德价值；羡慕“富贵之乐”，就是一味地追求物质价值。在价值取向上，世俗之人一生所追求的是功名利禄、富贵之乐。未得时，发愤以图；既得之后，意遂而乐。这是一种世俗之人“谋食不谋道”的价值观。而孔子则坚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的人生理想，一生所追求的是“志于道”、“志于仁”，不断地升华自己的道德情操和道德境界，把追求道德情操和道德境界视为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当这两种价值观长期在思想上激烈斗争时，胜负未定，心灵无主，十分痛苦，故子夏很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后

选择了“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先王之义”，战胜了“富贵之乐”的价值取向，在心灵深处找回了自我，心情十分愉快。所以，子夏心宽体胖。

快乐人生，实际上是一种“减法哲学”。欲望是人生而具有的本性，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原动力。同时，欲望又是一头难以驾驭的猛兽，它常常使我们对人生的舍与得难以抉择，不是“不及”，便是“过之”，滋生出许多的人生悲剧。因此，只要真正把握了舍与得的尺度，就等于把握了人生成功的钥匙。所谓“减法哲学”，就是减去疲惫，减轻烦恼，减去心灵上的沉重负担，减去一些奢侈的欲望，减去没有价值的身外之物。从根本上，就是从人生的沉重的负担中减出轻松，减出自在，减出自由，减出快乐！

（三）“舍得”是一种成功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是成功者，都是具有“舍得”智慧的人，深谙“舍得”的哲学意义。越王勾践亡国被俘，能够自觉地舍弃帝王之尊，受尽凌辱，忍辱负重，以谋取复国之大业。上天不负苦心之人，终于“三千越甲可吞吴”，“卧薪尝胆”成为历史美谈。秦始皇帝嬴政，在统一文字、货币及度量衡方面，舍弃的是守旧朝臣的极力反对，得到的却是千秋伟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舍弃的是传统服饰，奋发图强，锐意改革，成就的则是强国大业。西楚霸王项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绝处逢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典战役。韩信以“舍得”智慧忍受无赖之徒的胯下之辱，舍去的是“面子”，最后则在辅佐刘邦成就霸业中，成为“汉初三杰”，被封为“淮阴侯”。三国后期的司马懿精通“舍得”哲学，他本是一位有智慧有才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最初在曹操手下只当一名文学掾，即抄抄写写的一名小官。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对曹操不满意，相反，他更加兢兢业业地苦干，这是因为当时曹操的势力强大，若他与曹操对抗，就一定会落败，甚至被杀。所以，他自觉地“放下”自尊而保身，学会低调做人。直到魏少帝曹芳时期，他才集中力量一举在魏国夺权，为后来建立晋朝拉开了序幕，可以说他是笑到最后的赢家。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元军的威逼利

诱面前，坚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生理念，他舍弃的是生命，而得到的却是忠义美名。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为我们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就是“吃亏是福”。“吃亏”即是“舍”，“福”即是“得”。先“吃亏”而后“得福”。吃亏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气量。这是一种成功人生之道。东汉有一名称做甄宇的博士官，某年腊月节，皇帝刘秀赐了十四只羊分给十四名博士，但羊有大有小，有肥有瘦。如何分配公平，祭酒十分为难。有人主张“抓阄”，有人主张杀羊后按斤平分，甄宇认为都有损博士声誉。于是，甄宇站出来说：“还是一人领一只吧。让我先牵第一只。”他走进羊群中，选择了一只又瘦又小的羊。在他的感召下，大家互相谦让，争着挑选又瘦又小的羊。由此，他得到了“瘦羊博士”的美名。刘秀不仅下诏给以褒奖，而且还破格提拔，委以重任。

现代有一位砂石老板，既无文化、技术也无政治背景，但是他生意却很成功。其成功的秘诀就是“吃亏是福”。他与每个合作者分利的时候，都只拿小头儿，把大头儿让给对方。所以，凡是与他合作过一次的人，都愿意与他继续合作，而且还会介绍一些朋友给他，最后都成了他的客户。从“舍小利而取大利”的战略眼光看，虽说他只拿小头儿，但把从所有人那里拿来的小头儿加起来，就成了大头儿，他才是真正的赢家。

香港首富李嘉诚亦深谙“吃亏是福”的真谛。他对其子李泽楷说：同他人合作，你可以拿七分或八分，拿六分就可以了，这样，才可以使你的合作者有利可图，有奔头，才会与你真心合作。拿七八分，只有五个合作者，而只拿六分，就可以得到一百个合作者，是亏还是福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李嘉诚赚钱的秘诀之一。

美国有一家叫“汉堡包大王”的连锁店，推出一种九毛九分的汉堡包，按照美国物价，只够成本。但是，因为便宜，这种汉堡包不仅深受大量学生、职工欢迎，而且有钱的人也乘豪车前来购买。他们在吃汉堡包的同时，也要购买一些薯条，喝点饮料，这就有钱可赚了。

深圳有个农村来的老太太，起初当保姆，后来摆小摊，卖一个胶卷只赚一毛钱。后来她生意做大了，开设了一家摄影器材店，还是一个胶卷只赚一

毛钱。不仅深圳人都去买她的摄影器材，外地人也慕名到她店里买东西。批发量大得惊人，成了深圳最“牛”的摄影器材商。

北京和德集团，从 1994 年开始，短短三四年间，资产从 3 个亿发展到 30 个亿，主要就是靠鱼粉进出口生意，是世界上进出口鱼粉贸易公司中最大的企业，在国内的市场份额达到了 85% 的垄断地位。它的成功秘诀就是低价格。在同行业中，和德的报价永远是最底的，它出售的鱼粉每吨销售价比买进价要低将近 100 元。这样的生意，岂不是越做越赔本？其实不然。一方面，和德集团要求所有的买家在签订购买合同时，预先支付 40%~50% 的订金，合同一般都是三个月以上的远期合同。这样，就有 50% 的货款至少提前 90 天进入和德的账户，然后在国外出口商发出装船通知单之后支付另外 50% 的货款。在将近 30 天的行船时间内，和德就可以白白占用大量资金。另一方面，由于和德在业内的绝对垄断地位，使得它的信用度很高，这就可以在不具备任何抵押的情况下获得 180 天的信用证额度。两者相加，和德在一年至少有半年的时间可以有大量的资金在账。有了钱就好办事，仅仅是用这部分资金进行一级市场上的新股认购，20% 甚至更高的投资收益率就完全可以弥补在鱼粉贸易中的损失。至于账面上的亏损而省掉的税金，还有大量的货物贸易使它在与保险公司、银行、码头等方面谈判时占据的优势，则更是外人所不知的。

“2004 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江苏首富、现任江苏雨润食品产业集团董事长祝义才，从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一跃而成为亿万富翁，其成功之道在哪里呢？归根到底是“舍得”二字。在他的成功之路上，有两次“舍得”。第一次“舍得”之举，是舍去“皇粮”而“下海”。祝义才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了安徽省交通厅属下的海运公司。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跳出“农门”，吃起“皇粮”，这在绝大多数人都会心满意足。然而，祝义才认为“这样整天坐在办公室，逐渐老去，我觉得很可怕”。于是，在 1990 年，全部家当只有 200 元的他，就“跳下了海”。他以一双慧眼瞄中了当时利润很大的水产生意——贩卖虾蟹，做出口贸易。由此开始，他的财富，聚沙成塔，当年销售额就达到 9 000 多万元，净赚了 480 万元。他虽然靠水产起家，但是贩卖虾蟹没能留住他的“野心”。他认为“做贸易，我不踏实，无法做出自己的品

牌。况且，贸易做得再好，也只是个中介，唯有实业才是我的终身大计，我得创新项目，找新市场”。于是，在 1993 年底，祝义才在合肥投资 450 万元建起了肉食品加工厂。这是祝义才的第二次“舍得”之举。为什么舍弃贩卖虾蟹而做低温肉制品行业呢？原因在于他善于从冷门中寻找商机。他发现上世纪 90 年代初，肉食行业是高温肉制品的市场，春都和双汇几乎二分天下。祝义才在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 20 多个大中城市进行了肉食品市场调查，发现低温肉制品几乎无人涉足。所谓“低温肉制品”，主要是当时涉外宾馆、饭店才使用的西式火腿。由于使用量不大，主要是手工化制作，所以成本很高。如果能降低成本，机械化批量生产，无疑将会带来高额利润。他决定将低温肉制品行业作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的落脚点。于是祝义才便投资建起了肉食品加工厂，成为国内首家工厂化、机械化生产低温肉制品的企业。14 年之后，他已成为拥有数十亿元资产的商界大亨。他雄心勃勃地说：“只要突出主业，坚持创新，一步一个脚印，相信十几年、二十几年后，世界 500 强企业，也有可能出现江苏企业！”

（四）“舍得”也是一种老板哲学

无论是经营企业还是管理企业，都需要“舍得”的商道智慧。谁在实践中将它运用得好，企业就会兴旺发达；谁不懂也不会运用它，企业就会由盛转衰，甚至走向失败。

经营管理企业，最重要的是以“舍得”智慧选择好老板（总裁、董事长等）。不管是自己当老板还是选择自己的老板，都必须具有一双敏锐的“舍得”慧眼。现任华西希望集团副总裁傅文阁，就他 2005 年初主动放弃中国农业大学 MBA 中心主任而加盟希望集团而言，是如何选择老板；就他现任华西希望集团副总裁而言，又是如何当好老板。傅文阁喜读《道德经》，还准备写一本名为《上善若水的管理之道》的著作，他深谙《道德经》的精髓。他以“舍得”的眼光，主张舍弃“曹操型老板”，选择“刘备型老板”。根据他对当代中国企业的观察，他认为“找一个好老板”极为重要，老板

“为人怎么样，能不能信任你，能不能给你平台”，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因为“曹操型老板”是以不信任为前提，用人要疑，疑人要用；而“刘备型老板”则是以信任为前提，既信之则任之，宅心仁厚，用人不疑。“曹操型老板”既恋权又爱钱。因为“恋权”，所以不少老板对职业经理授权，或者先予后取，或者越权指挥，或者以权谋制衡；因为“爱钱”，才导致老板的一个错误观念——“我给了你平台，我雇佣你，好好干，我给你钱”，而职业经理人则投之以“给我钱，才好好干”，完全是一种交换式的金钱关系，心情不畅，人格也得不到尊重，不可能把职业经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诸葛亮为什么要选择刘备这样的老板呢？傅文阁分析有四条理由：“第一，刘备是一位有梦想、有愿景的主子，他想光复汉室，如果他没有光复汉室这样一个梦想，诸葛亮也不可能投靠他；第二，刘备爱才如命，真正给人平台，真诚待人；第三，刘备义字当先；第四，刘备是真正的智者，他信任能人，给能人极大的空间。”傅文阁所以加盟华西希望集团，选择陈育新董事长为自己的老板，他解释说：“他为人很好，真诚、谦和，待人让你感觉到舒服。”“我们这些人最看重的就是舒服和尊重。”不管是三国时的诸葛亮还是当代的傅文阁，正因为舍弃了“曹操型老板”，选取了“刘备型老板”，才可能做到“士为知己者死”，心甘情愿地为老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衡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雷双悬在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一部《道德经》，他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有语云：‘舍得是智慧的回归，是人生的顿悟。’《道德经》就有深刻的取舍之道。”雷双悬将《道德经》的“舍得”哲学，娴熟地运用在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上。作为有七千名员工的集团公司董事长，雷双悬的个人生活简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唱歌，不洗脚按摩。中午在公司食堂吃盒饭，晚上回家和爱人一素一荤一汤。夏天穿T恤、凉鞋，冬天穿军装、布鞋。办公室和外走廊都是自己打扫，空调有客人来才开一下，冬天还常常打开窗子吹冷风。锻炼器材有两样：一是五元一根的跳绳，一是不要钱的湘江水，就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他也要去河里游个来回。真可谓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最简朴的也就是天下最美的。他虽然“失去”了当今社会最时髦的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但是他却得到了员工的爱戴、凝聚了人心：

公司 7 000 名员工拥戴他做了 26 年“当家人”，其中国营企业 18 年，民营企业 8 年。在国营企业时，民意测验满意率就高达 99% 点多。在经营方式上，雷双悬也娴熟地将“舍得”哲学用在公司经营上。衡汽集团现有 1 070 台客运车在跨省市县的 403 条班线上运行，多家广告商看中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即作车身广告，最高时曾许诺年付租金 100 多万元。可是，衡汽集团就是“守身如玉”，至今始终保持洁白之身，没有任何商品广告点缀。从表面看，每年损失多达百万元，可是，它却得到了提升衡汽集团形象和强化品牌的社会效益。在车票价格上，车流高峰时通常的做法是加价，而衡汽集团却在高峰时舍弃高价，深得旅客欢迎。这一“失”一“得”，为衡汽集团赢得了广泛的社会美誉和巨大的无形资财。

成功企业家在年老退休之际，如何做到完美的谢幕，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和回答的现实问题。人生如潮水，潮起而来，潮落而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人生宿命。但是，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选择的问题。

一是正确选择时机。从日照中天的“极点”到开始衰落的“拐点”之间退出，适时退出是一种明智选择。最成功的典型是格鲁夫从英特尔公司 CEO 辞职、比尔·盖茨从微软 CEO 辞职。他们辞职之时，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依然是市场之王，但是市场的竞争力已经式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两位先生从顶级企业理性让贤，使企业获得新的发展。他们在企业达到巅峰与开始衰落之间引退，真可谓是明智之举。在中国，适时退职者，恐怕要数前科龙公司的掌门人潘宁先生。1999 年，潘宁在科龙由最鼎盛而开始衰落之时退位，从而避免了科龙最后被并购的命运。他留下的是功业，带走的是怀念。

二是价值取向。退休或辞职后，是留下一片基业，携誉而归，还是留下一堆废墟，留下骂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果。前健力宝董事长李经纬用 18 年智慧与血汗打造出了“健力宝”著名品牌，健力宝鼎盛时期的利税占当地财政收入的 45%。李经纬的丰功伟绩，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先后成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劳动模范、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但是，李经纬并不满足这一点，他不仅要“名”，而且进一步要“利”。在这种“名利兼得”思想驱动下，大搞所谓“产权改革”，进行

违规操作，终因受贿案葬送了自己。这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海尔张瑞敏选择的却是另外一条路。张瑞敏以产业报国为理想，为创造民族品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中央候补委员，这几乎是中国企业家能够达到的最高地位与荣誉。他在年老退职时，选择留“名”而舍“利”，使他能够保持晚节。他虽没有无限地要求物质报酬，但是，他被誉为民族英雄，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自我价值。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人生短促，如何以清醒的舍得智慧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定位，是享受快乐人生的根本保证。现代社会是每个人面临太多选择的时代。因为太多的选择直接侵占了心灵的悠闲空间，剥夺了人生的幸福和自由，每个人几乎成了选择泛滥的奴隶。正因为选择太多，面面俱到，精力分散，既不能思考、交谈，也无时间运动、休闲，往往不能一心一意地做好每件事。据调查，美国有 50% 的人，每天为吃什么、穿什么、买房子、买汽车、炒股票、银行贷款、孩子上学、职业选择、旅行地点、人际关系等，伤透了脑筋。当你发现自己被四面八方的各种麻烦和琐事绑住的时候，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舍弃”二字。舍弃，就是为人处世要有生活底线，即做事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和需求，要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位猎人在山中捕捉到了一只神奇的鸟，它会说 70 种语言。在神奇的鸟的恳求下，猎人从笼中放了它，它落在一棵大树上，大声对猎人喊道：“你真愚蠢。你放了我，但是你不知道我嘴中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大珍珠。”于是，贪婪的猎人想再次捕到它，就不自量力地往树上爬，刚爬一半，就从树上掉了下来，并摔断了两条腿。那只神奇的鸟嘲笑了猎人后，乐呵呵地飞走了。贪婪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只有懂得舍弃贪婪，量力而行，守住人生底线，才能避免因小失大。切记不要为了赚更多的钱而失去天伦之乐；不要因为巧言令色而丧失自己的尊严；不要因为争权夺利而丧失友谊（如庞涓陷害孙臆等）；不要因为自我创业而损害健康。在人生道路上，什么都想要的人，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只有明智地舍弃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在“舍弃”背后才有更多的“获得”。这是企业家走向成功之路的大智慧。

第十一章

“柔弱胜刚强”与人生谋略

一般人都懂得“刚强胜柔弱”的道理，而智者老子则依据“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原则，从逆向思维角度，深刻地揭示了“柔弱胜刚强”的人生谋略。

“柔弱胜刚强”命题源自于《道德经》。老子指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道德经》七十八章）认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役使、穿透）天下之至坚”（《道德经》四十三章）。老子以婴儿为例，论证曰：“专气致柔，能婴儿乎？”（《道德经》十章）精气结聚而至柔的婴儿，虽然无知无欲，无思无虑，骨弱筋柔，毫无自卫能力，但是婴儿却能“握固（拳头握得牢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婴儿生殖器勃起），精之至（精气充沛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沙哑），和之至（阴阳淳和之至）也。”（《道德经》五十五章）充满“厚德”和生命力的婴儿，最终是要战胜中老年人的。孔子叹曰“后生可畏”，道理也在于此。由此，老子在人生谋略上，提出了“守（持守）柔曰（叫做）强”（《道德经》五十二章）的命题。

但是，不能把“柔弱胜刚强”的命题绝对化。鸡蛋碰石头，鸡蛋非碎不可；钢刀裁纸，纸非破不可。在现实生活中，“柔弱胜刚强”只具有相对性。但是，从长远的战略意义上，老子认为柔弱和刚强这一矛盾，不仅是对立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刚强”可以转化为“柔弱”，“柔弱”也可以转化为“刚强”，“柔弱胜刚强”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这

就是老子对柔弱和刚强这对矛盾进行的辩证分析。总之，“柔弱胜刚强”是贯穿于《道德经》的一条主线，也是走上成功之路的人生智慧。

（一）“柔弱胜刚强”是一种人生智慧

老子曾师从于古代礼乐大师常枞（或曰商容）。根据道家的“不言之教”原则，常枞教育学生从不多说话。所以，老子师从常枞多年，却听不到老师教他什么东西。据汉代刘向《说苑·敬慎》篇记载：“常枞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常枞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枞）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枞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就是说，当常枞年老病重时，老子前去看望老师，请求教诲之言。他说：老师，你现在病得很厉害，你还有什么要教诲弟子的吗？常枞说：你找我来了，你不找我，我也来找你。常枞张开口让老子看，然后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舌头还在。你再看看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看后说：牙齿都落光了。老师注视着老子，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老子沉思了一会，说：牙齿之所以掉光了，是因为牙齿刚强；舌头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舌头柔弱，这就是“柔弱胜刚强”的道理。老子又问：还有什么要教诲我的？老师笑着说：懂得“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世界上的许多道理都包在里面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柔弱胜刚强”这一命题，既是老子对其师常枞哲学智慧的发扬，更是他以睿智目光观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做出的哲学概括。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不断出现的新生事物，虽然开始柔弱，但是由于它充满着生命活力、代表着发展的前进方向，经过不断努力，最终是要战胜貌似强大的旧事物的。“柔弱胜刚强”是一条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

为什么“柔弱胜刚强”呢？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道德经》七十六章）老子以智者的目光，发现世界上凡是刚强的东西都是

死亡的象征，柔弱的东西都是生命的象征。老子所谓的柔弱，绝不是软弱无力，而是含有无坚不摧的积极内容。

河南鹿邑是老子的故乡，在古代是一个河流纵横、湿地广阔的水乡。所以，老子对水有着深刻的观察和感悟。他从水的至柔表象背后发现了无坚不摧的至刚品格。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或胜），以其无以易之也。”（《道德经》七十八章）意思是说，天下之物，唯有水能因物之曲直、方圆而从之，故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也唯有水能流大物、转大石、穿陵谷、浮载大地，攻克坚强的东西，世上没有能超过它的。这是因为在老子眼里水是“几于道”的东西，即水是“道”及其存在形式的代名词。

那么，水的柔弱本性和“厚德”品格又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五点：

1. 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柔韧性

“投鞭断流”的故事，最能说明水的柔韧性。东晋初年，前秦的势力日趋强大，苻坚即位后，一心想消灭东晋，统一全国，他在朝会上就武力进攻东晋听取大臣们的意见。秘书监朱彤坚决支持，而左仆射权翼认为东晋有长江天险，不易进攻。苻坚决心以武力统一全国，发动淝水之战。他骄傲地说：“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晋书·苻坚载记》）认为只要百万雄师把马鞭投到长江里，就可以把长江断流，定能取胜。结果是事与愿违，“投鞭断流水更流”，百万强兵却被五万晋军击败。水虽柔弱，但它遇到高山险阻，都能避实就虚，避高就下，迂回曲折，直奔东海。这种“万折必东”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就是水的柔韧性的一种顽强表现。

2. 身处逆境、忍辱负重的忍耐性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深渊大海，总是以它宽阔的包容心态，既能容纳清澈之水，也能容纳污泥浊水，还能以自己的清水去净化浊水，具有容清纳浊的宏大度量。“忍”字的结构，就是“心”头上面加一把“刀”。由于柔弱而不得不忍受屈辱，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俗话说：“忍得一时之气，可消

百日之忧。”忍辱并非是一种怯懦，而是在忍辱中寻求“大有所为”。老子指出：“圣人之言曰：‘受邦之垢（承受全国人之垢恶），是谓社稷之主；受邦之不祥（承受全国人之灾祸），是谓天下之王。’”（《道德经》七十八章）《左传》宣公十五年，伯宗曰：“川泽纳污，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司马光说：“含垢纳污，乃能成其大。”所以，中国历代圣人都提倡“大丈夫能屈能伸”。为了成就大事业的目标，就要甘心忍受小的侮辱，做到“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见小辱就火冒三丈，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不足以成就志向高远的宏图大业。汉代张良圯桥纳履、得到《太公兵法》而成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帝王之师”的故事，就是忍辱负重、成就伟业的典型事例。这就是忍辱负重的人生道理。

3. 随机应变、迂回曲折的灵活性

柔弱之水所以能胜过刚强之物，因为水无常形，它可以随机变化，在大的地方可以奔腾咆哮，在小的缝隙也能慢慢渗入。在海洋中是海洋之形，在江河中是江河之形，在湖泊中是湖泊之形，在杯盆中是杯盆之形，在瓶罐中是瓶罐之形。水虽有形而无常形，但它却能够在有形中保持无形，这是战略家在“示形”中所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军事家孙子精辟地指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水有水之势，如决千仞之积水；水有水之速，如成激水而漂石。水处静而平和，动则乘势而发出雷霆万钧之力。

无形之水能够根据地质、地形及器皿的变化，因势利导，选择适当的途径和方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企业也应如此，企业经营唯一不变的是“权变”，如果把企业比为一条河流，那么企业经营的内外环境就是这条河流过的地质、地形，企业经营要根据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及时地调整其战略、战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防止核心竞争力的过度刚性化，防止掉入定性思维的陷阱。只有严格遵照“做人要厚道，办事要活套”的信条，聪明的商人方可能纵横于商场。

无论是汪洋大海还是江河湖泊，在阳光下蒸发，或变为云气，或变成

雨、雪，或化为大雾，或凝结成冰等，不论其变化如何，终不失水之本性。不管在商场上的竞争策略和管理模式如何变化，做人的原则是不能变的。这就是老子所说“大方无隅”（《道德经》四十一章）、庄子所说的“顺人而不失己”（《庄子·外物》）的圆通之道。

4. 柔弱处下、低调做人的谦让性

人往高处走，而水偏偏要往低处流，自居卑下之地。它把无限风光在险峰的美景，让于他人享有，而自己却甘心处在众人之所恶的低洼地方。水的这种品格和境界，从古至今，为人称颂。处于低洼，是为了达到“洼则盈”（《道德经》二十二章）的目的。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八章）又说：“是以圣人之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道德经》六十六章）所以，老子主张：“坚强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七十六章）宋常星释曰：“坚强者，过刚易折，生气已尽，故坠于下”，而“柔弱者，软嫩滋息，生气方旺，故升于上”。这完全是一种自然之理。

根据“柔弱胜刚强”的哲学智慧，老子提出了许多治国之道和处世之方。在大国与小国关系上，提倡“大国者下流”，主张治大国当居下流，不要自满自傲，“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小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大者宜为下”（《道德经》六十一章）；在治国上，主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道德经》三十九章）；在用人上，主张“善用人者为之下”（《道德经》六十八章）；在军事上，老子在“兵强则灭”（《道德经》七十六章）的背后，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指身体）。故抗（举）兵相加（加，相当），哀者胜矣”（《道德经》六十九章）的道理。所以，他根据“哀兵必胜”的原则，提出了“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道德经》六十七章），主张“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道德经》六十九章）。老子把“哀兵必胜”精神作为一种最高的武德原则和最美的武德风范加以褒扬，要求将帅“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

辱”、“知其白，守其黑”。如此，方可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上德若谷”、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上德若谷”是说上德之圣人，气度恢宏，虚怀若谷，涵盖天下，无所不容，无所不应。老子“尚谷”，在《道德经》中多次讲到“谷”字，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道德经》六章）；“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道德经》二十八章）；“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道德经》三十二章）；“旷兮其若谷”（《道德经》十五章）；“谷得一以盈”（《道德经》三十九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六十六章）。宋常星释曰：“江海能为百谷之王者，因江海之地形，善以卑下自安。众谷之川流，无不归之者，以其有容纳之量，故聚众流而成江海，为百谷之王也。”

“上德若谷”的包容性，告诫商人在经营企业时，要求企业员工树立服务意识，为下一环节服务，以服务为乐，通过服务别人以实现自身价值。因为从社会价值体系来看，市场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互为服务关系。每一个企业都是社会分工价值链的某一环节，企业中的不同岗位又是企业价值链的更小的环节，某一岗位价值的实现最终是企业其他环节服务的。同时，还要善于将新员工与老员工、本地人与外乡人、高学历的与低学历的人加以融合，要容忍异质文化的存在，要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只有按照“上德若谷”的精神，将不同文化要素和有效资源加以整合，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经济价值。

柔弱之水内在地具有上述五种本性和美德，通过柔弱的各种表现，积蓄力量，充实自己。“以柔克刚”，就是要善于“示弱”。示弱者，易得广泛同情，得道多助；示弱者，易使对方麻痹，出其不意，以达到“示人以柔而制其刚”的目的。一旦条件成熟，水就会乘势而发出雷霆万钧之力，去战胜貌似刚强的旧东西、旧势力。那么，如何“示弱”呢？《淮南子·原道训》释曰：“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所谓志弱而事强者，柔毳安静，藏于不敢，行于不能；恬然无虚，动不失时；与万物回周旋转，不为先唱，感而应之。是故贵者必以贱为号，而高者必以下为基。托小以包大，在中以

制外；行柔而刚，用弱而强；转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谓其事强者，遭变应卒，排患擗难；力无不胜，敌无不凌；应化揆时，莫能害之。是故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故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革固则裂，齿坚于舌而先之敝。”所以，从本质上，“柔弱胜刚强”是内刚外柔的人生成功谋略。正如《黄石公三略》所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柔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所以，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走上人生成功之路。

（二）“柔弱胜刚强”也是一种人生谋略

老子提出的“柔弱胜刚强”的谋略思想，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思想，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并在历史演绎中一再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在人生道路上，可以针对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谋略方式，达到“柔弱胜刚强”的成功目的。如在战争中，孙武指出：“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孙子兵法·军争》）从总体上看，“柔弱胜刚强”的谋略方式，主要有“避实击虚”、“以迂为直”、“后发制人”、“韬光养晦”、“以智克力”，等等。

1. “避实击虚”

要想达到“以柔克刚”的目的，首先就必须实施“避实击虚”的策略。所谓“实”，通常是指强大、坚固、有备、有形等；所谓“虚”，通常是指弱小、软弱、无备、无形等。什么是“避实击虚”？《管子·制分》篇释云：“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凡是作战，攻打强点就会受到阻力，攻打弱点就有神奇之功。如果攻打对方强点，

弱者也会变得强大；如果攻打对方弱点，强者也会变得弱小。孙子以水为喻，指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孙子兵法·虚实》）

那么，如何“避实击虚”呢？《孙子兵法·虚实》有精辟的论述，孙子曰：“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淮南子·兵略训》一书，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如“以生击死，以盛乘衰，以疾掩迟，以饱制饥”；“见敌之虚，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等等。

在中国战争史上，有关“避实击虚”的成功战例甚多。这里选择几个典型说明之。

孙臆的“围魏救赵”。公元前 353 年，魏国以其主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齐王命孙臆率兵前往救助。孙臆采取“围魏救赵”之计，齐国军队不直接去邯郸与魏国主力正面作战，而是乘机前去围攻魏国兵力较虚弱的都城大梁，迫使魏军不得不撤离邯郸，在赵、魏之间疲于奔命。这样，迫使魏国军队回救本国，从而达到了救赵之目的。毛泽东继承和发挥“围魏救赵”的哲学智慧，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如果敌人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们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以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韩信的“还定三秦”。当田荣、陈馥、彭越的反楚战争爆发后，韩信从战略上给刘邦全面地分析了楚、汉之争的形势，寻找楚国的“虚”、“实”之处，提出了有名的“还定三秦”的战略。他指出，“项王暗喑（怀怒气）叱咤（发怒声），千人皆废（偃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音吁，好也），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致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不忍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

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言何所不诛也）！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用东归之义兵击东方之敌，此敌无不散败也）！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豪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为二尺檄书以责所伐者）而定也。”（《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刘邦采纳了韩信的建議，遂下定“决策东向，争权天下”的决心，最终建立了西汉王朝。

毛泽东的“以弱胜强”的革命理论。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毛泽东避敌锋芒，不与强大敌人正面交锋，而是采取“避实击虚”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十六字诀”，以劣势兵力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持久战的核心是游击战和消耗战，而不是阵地战和大兵团的决战。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理论，也是建立在老子“柔弱胜刚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只有首先做好“战略防御”，“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去“战略反攻”，最终才能达到“以弱胜强”的革命目的。

2. “以迂为直”

无论江河还是小溪，不管流向哪里，遇到阻力则自行谦让：右面流不过去就转向左面，左面流不过去又转向右面，拐来拐去。所以，每条河流总是通过“以迂为直”的方式，不争不斗，循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行，形成了九曲十八弯。

当面对强大敌人时，弱势者不能硬碰硬，只能如同水一样，采取“以迂

为直”的对抗方式，遇到坚实的东西，不是直撞，而是绕开它，流向前方。这就是“以迂为直”的谋略思想。所谓“直”，是指直线、直达、直接、正面等；所谓“迂”，是指曲线、绕过、间接、非正面等。这一战略原则，充满着非常深刻的“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思想。正如老子所云：“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道德经》三十六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道德经》二十二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道德经》四十五章）歛与张、弱与强、废与兴、夺与与、曲与全、枉与直、洼与盈、敝与新、直与屈、巧与拙等矛盾，既是相反相成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以迂为直”（或“以屈求伸”），其基本思想都是通过“示形”、“度势”，避开敌方的锋芒，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为自己积蓄力量和创造有利的条件，并且造成敌方的错觉，麻痹敌方的斗志，松懈敌方的神经，减弱或消除敌方对抗的力度，最终达成“以柔克刚”的战略目的。这一战略思想包含有两个重要原则：一是不露声色的蓄力；二是出其不意的发力。以下略举几例：

魏桓子赠地弱敌。战国时期，掌握晋国大权的是四家大夫——智伯瑶、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智伯瑶自恃势力强大，胁迫其他三家各交出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及其户口，魏氏未答应。谋士任章问魏桓子：“为什么不答应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索要土地，所以没有答应。”任章根据老子的“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思想，劝他说：“无缘无故索要土地，这必然会引起邻国的恐惧；贪得无厌，必然会遭到天下的怨恨。您不如将土地给他，使他更加骄横。”于是，魏氏割地于智伯瑶，果然，智伯瑶更加目中无人，为所欲为。在智伯瑶的威逼下，韩、魏、赵联合起来，暗中结盟，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了强者智伯瑶，最终形成了“三家分晋”的政治格局。

魏王以迂为直雪耻。公元前 341 年，魏国在马陵之战中惨败。魏惠王召见相国惠施说：“齐国是寡人的仇敌，马陵之耻，至死不忘。魏国虽小，我还是常常想倾全国之兵攻打齐国，你看如何？”惠施说：“不可。我听说王者善于掌握法度，而霸者则深知韬略。大王这个想法，既不符合法度，也不符

合韬略。大王要想报仇，不如脱掉王服，放下架子，前往齐国朝拜。这样，必然会引起楚国的愤怒。然后，大王可以派人去游说楚王，进一步挑拨齐、楚关系，怂恿楚国攻齐。齐国连年征战，国力已疲。以国力正盛的楚国去攻打疲惫的齐国，齐国必败。”魏王听从了这个建议，立即派人到齐国，表示愿意向齐国称臣。魏惠王一连三次前往齐国朝拜，并尊齐威王为王。这些举动极大地满足了齐王的虚荣心，但也引起了楚、赵等国的忌恨。于是，公元前331年，楚王大发兵攻齐，赵国积极策应，徐州一战，大败齐军。在魏王看来，报仇雪恨只能是采取“直接战略手段”，即以直接的军事进攻达到目的。如果魏王果真倾全国之兵力与齐作战，肯定会遭到惨败。魏王听取惠施建议，不是直接以武力向齐报仇，而是通过向齐称臣，示之以弱，示之以敬，突显齐国之强威，从而使齐国成为众矢之的，最终达到了报仇雪耻的目的。这种“间接战略手段”是很高明的。

秦、赵两国相争。公元前260年，秦昭襄王依照范雎的建议，不急于同赵军直接决战，而是采取“以迂为直”的策略，先攻韩国之上党，使赵国失去依恃；又假意言和，使诸侯不再援赵；再施反间之计，使赵王撤换大将廉颇而任用赵括，最终大败赵军于长平。

张良辅佐刘邦灭楚。楚、汉相争初期，刘邦实力远不及项羽。刘邦以退为进，让出关中，进驻边远的巴、蜀、汉中之地。进驻后，依照张良之计，烧掉关中通往汉中的栈道，表示自己不再返回，既麻痹了项羽，也保护了自己。当刘邦准备向项羽发动进攻时，他派人明修栈道，向项羽发出进攻的信号，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又利用修复栈道工期长的特点，使项羽产生近期不会发动进攻的误判。在一切布置好以后，刘邦即派军迂回到陈仓，向项羽突然发起攻击，大获全胜，重新占领了关中。这就是有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典故。

3. 后发制人

以迂为直、以退为进的水“道”，实际上就是一种“后发制人”的策略。后发制人，是以逸待劳，避其锋芒，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回头猛击，自保而全胜。“后发制人”与“以迂为直”是相互联系的。孙子指出：“军争之难

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以知迂直之计者也。”（《孙子兵法·军争》）在战争中，我们常看到，有人根据老子的“后人发，先人至”的原则，运用“退一步，进二步”的“迂直之计”，在战争中往往取胜。那些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只知争先、志在必得的人，往往是失败者。而“后发制人”者则是笑到最后的人，因为他们往往是胜利者。

什么是“后发制人”呢？在老子看来，“用兵者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这里所谓“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就是两军相争不打第一枪，先行忍让，造成被迫还击的态势，使自己居于自卫还击的有利地位。即使有自卫还击之力，也要努力做到“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不轻易出击，以避免锋芒毕露，暴露自己的实力。“后发制人”的基本思想，就是避其锋芒，察见其形，先削弱敌人之力量，暴露敌人之弱点，在运动中捕捉和创造战机，等待条件成熟后，再果断决战，即可夺取胜利。“后发制人”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战略思想。

如何才能做到“后发制人”呢？《淮南子·兵略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视其所为，因与之化；观其邪正，以制其命；饵之以所欲，以罢其足。彼若有间，急填其隙，极其变而束之，尽其节而仆之。敌若反静，为之出奇，彼不吾应，独尽其调，若动而应，有见所为，彼持后节，与之推移。”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观察敌方的行为，顺应其变化而变化。观察敌方决策和行动的正确和错误，以控制其要害。用他所贪求的东西作为诱饵，使他疲于奔命。敌方出现空隙，就要尽快地乘虚而入。让他把各种花招都使出来，然后设法加以束缚；让他把各个环节都暴露出来，然后设法加以打击。敌方若反过来对我采取以静待变的方法，我就出奇兵袭击他。敌方若不做出反应，我就想办法调动他。敌方若采取行动回应，我能发现他的行为企图，就要抢先行动，使他处于被动地位。在与敌人的周旋中，以寻找战机。在这里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调动敌人，是“后发制人”战略艺术的重点。

楚军后发制人胜庸军。春秋时期，楚庄王三年（前 611），楚国发生了一场大灾荒，原本臣服于楚的庸国乘机反叛。楚国调动军队前去镇压，却被庸军打败。于是，有人主张，楚国应征集大军，连同楚庄王的禁军

也要一齐参战。楚国大夫师叔表示反对，他说：现在不能那样打，暂时还要以这些部队与敌人周旋，骄纵敌人。敌骄我怒，最后才能打败他。楚王采纳了这一建议，随后楚军又同庸军连续打了七仗，楚军都主动后退。当庸军连续取胜、将骄兵疲、军纪松懈之时，楚军主动退到临品（今湖北均县境内），与楚庄王主力会师，并取得秦、巴两国相助，又与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结盟。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和准备，楚军便分兵两路反击，一举克敌，大获全胜。

实施“后发制人”战略，要有“持久制胜”的思想，要经受住任何诱惑和冲击，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实力，分化和消耗敌方的实力，抓住有利时机和有利态势，一举击败对手。所以，要做到“后发制人”，还要牢记一个“挨”（拖延）字。《兵经》释曰：“天道后起者胜，兵法撓易不撓难。威急者，索也；锐犀者，挫也。敌动我能静，我起乘敌疲。敌挟众而来，势不能久，则挨之；其形窘迫急欲决战，则挨之；彼战为利，我战不利，则挨之；时宜守静，先动者危，则挨之；二敌相搏，必有伤败，则挨之；有众而猜，必至自图，则挨之；敌虽智能，中有掣者，则挨之……天时将伤，地难将陷，锐气将堕，则挨之。挨之乃起而收之，则力全势遂，事简功多。古之所为宁观，为徐俟，为令彼自发，皆是也。可急则乘，利缓则挨，故兵经有后之义。”这就是“挨”字蕴含的道理。

4. “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也称“弢（同韬）光匿迹”。“韬光”即是敛藏锋芒和才华，“养晦”（匿迹）即是隐藏踪迹。“韬晦之计”，即是把锋芒和才华收敛起来，把踪迹隐藏起来，等待时局变化，以实现宏图大志的一种谋略思想。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俯拾即是。

周文王装愚兴周灭商。殷商末年，周国在商朝西边逐渐强大起来，对商王朝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周文王即位后不久，即出兵伐商，以失败而告终，被商纣王囚于羑里。南宫适、散宜生等人贿赂商王，才使周文王获得释放。周文王获释之后，面时周弱商强的现实，问计于吕尚。吕尚对文王说：“鸷鸟将要发起攻击的时候，必先采取低飞敛羽的姿势；猛兽将要腾起搏杀的时候，必先采取贴耳伏地的姿势；圣人将要有所作为的时候，必先向人表现出

愚钝的样子来。如今商强周弱，要想推翻商王朝的统治，必先做出恭顺的样子，以麻痹商王。等到羽翼已丰，时机已到，即发起进攻。如此，就可以一举灭商。”周文王采纳了这一建议，表面上他对殷纣王百依百顺，尽力满足殷纣王的各种要求，并在国都“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不修政事的愚钝样子。这一“韬光养晦”策略，果然欺骗了纣王。他高兴地说：“西伯（指文王）改过易行，吾无忧矣。”于是，他对文王不再防范。文王乘他麻痹之机，广罗人才，整饬政治，发展经济，扩大影响，势力迅速扩大。文王还利用纣王给他的“征伐”之权，乘纣王用兵东南之际，指挥军队，越出周境，对与周敌对的方国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进攻，相继征服了犬戎、密须、共、黎以及商王朝的腹心大国崇，周势力东达江淮，南及江汉，西南至巴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诸方面，为周武王灭商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越王勾践与吴王打仗，战而不胜，国家灭亡，身困于会稽。越国被吴国打败后，越王勾践向吴王称臣求和。他内心怨恨，卧薪尝胆。为了复仇，他暗中选练甲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然而他在表面上却请身为臣，亲自拿着戈矛做吴王的马前卒，请妻为妾（女仆），亲自为吴王打扫家室三年，又向吴王送上美女西施。而吴王夫差则自恃强大，无视卧薪尝胆的勾践，率兵参加中原大战，争夺霸主，一度盛极一时。但是好景不长，二十年后，强大的吴国已外强中干，结果吴王在干遂被擒获，吴宫亦被越国三千甲兵夷为平地。

司马迁宫刑之辱。司马迁曾因上书为李陵事件说话而获罪被关进大牢。他在《报任安书》中谈到，他被囚禁在偏远孤寂的牢狱之中用“肠一日而九回”来形容自己当时所受的痛苦煎熬，最后惨遭腐刑（宫刑），这是一件令人耻辱的事。出狱后，他虽仍任中书令，但被人们所轻贱，朋友不出手相救，甚至连最亲近的人都不为他说话。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司马迁并没有因此而消磨了自己的意志，在他心中仍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他以历史上忍辱负重而成就大业的事例来勉励自己。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现在《史记》还没完成，自己的信念和愿望还没实现，不能轻易死去。因此，他能够“就极刑而无愠

色”，受辱而不后悔，最终完成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流芳千古、为人敬仰的文学家、史学家，被人尊称为“太史公”。

冒顿忍辱灭东胡。秦、汉时，驰骋于蒙古草原的匈奴，曾盛极一时。然而，在冒顿统一匈奴之前，匈奴却时常受到东胡国的欺侮。有一次，冒顿得到一匹好马，东胡王得悉后，即派人来索取。冒顿部下虽气愤，冒顿还是将好马送与东胡王。后来，东胡王得悉冒顿的妻子很漂亮，就派人来要人。冒顿部下更加气愤，表示士可杀而不可辱，纷纷誓言愿与东胡拼命。但是，冒顿又派人把妻子送给了东胡王。东胡王误认为冒顿软弱可欺，便放松了对他的警惕，整天饮酒作乐，不理政事，国势日衰。后来，东胡王又派人向冒顿无理索取土地。这时，冒顿已武力统一了匈奴，国力大增。于是，他斩杀了东胡使者，召开誓师大会，杀奔东胡。东胡就这样被匈奴亡国了。

司马懿忍辱取胜。诸葛亮六出祁山时，驻扎在五丈原，一再派人挑战，魏兵就是不出营应战。于是，诸葛亮便取来一套妇人服装，放在一个盒子里，并附上一封书信，派人送到魏营。魏将不敢隐瞒，将来人引去见司马懿。司马懿当众打开盒子一看，里面装有妇女服装一套，还有一封信，拆开一看，上面写道：你身为大将，统帅中原大军，不敢武力相斗，以决胜负，却躲在土巢之中，小心地防避着刀箭，这与妇人有什么不同？现在，我派人送去一套妇女的服装，你如果还不敢出战，就应恭敬地跪拜接受，如果你羞耻之心还没有泯灭，还有点男子汉的气概，就立即批回，定期决战。司马懿看后，虽心中大怒，但表面上却故作镇静，笑着说：“诸葛亮把我看成了妇人吗？”当即接受下来，并下令厚待送衣的使者。魏军众将得知后，气愤地来到大帐说：“我们都是魏国的名将，怎么能够忍受蜀军这样的侮辱？请允许我们立即出战，以决胜负。”司马懿说：“我并不是不敢出战而甘心屈与不争，无奈天子早有明确的旨意，令我们坚守不战。如果现在轻率出战，便是违抗国君命令了。”众将还是愤怒难平。司马懿说：“你们既要出战，等我向天子申报批准以后，大家同心协力迎敌，你们看怎样？”众将都答应了。司马懿写好表章，派遣使者前奏皇帝曹睿。曹睿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臣

才能低下，而责任重大，陛下曾经明确指示，令臣坚守不战，等待蜀人自己败亡；无奈，诸葛亮送来一身妇人服装，将臣视作妇人，耻辱太重！臣谨预先奏请陛下：近日臣将拼死一战，以报朝廷之恩，以雪三军之耻。曹睿看完后，对众大臣说：“司马懿既已坚守不出，为什么又上表求战？”卫尉辛毗说：“司马懿本来不想出战，必定是因为诸葛亮这一番侮辱，众将愤怒，才故意上了这道表章，希望陛下更明确地重申一下坚守不战的旨意，以遏制一下众将求战的心情。”曹睿认为他说得十分有理，便命令辛毗持着皇帝的符节，到渭水北岸司马懿大营传旨，不许出战。司马懿将他迎接到大帐之中，辛毗当众宣读道：“如果再有人胆敢提出迎战，便以违抗圣旨论处。”众将只好按圣旨去办。司马懿能像水那样屈与不争，不逞一时之勇，而是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充分展现了能屈能伸、能刚能柔的将帅才能。

明代大儒陈献章在《忍字箴》一文中写道：“七情之寡，唯怒为剧。众怒之加，唯忍为是。当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励。过一百忍，为张公艺。不乱大谋，乃其有济。如不能忍，倾败立至！”我们必须记住，忍辱负重的后面，必有一个光明的目标在支撑，有一个远大的前途在照耀，也要有一个健康的人格在保障。

5. “以智克力”

“柔弱胜刚强”既是以柔弱战胜刚强的思想武器，也是在强势和险境中保护自己的有力法宝。在成功人生的道路上，一刻也不能离开它。这里，仅举两例说明之。

郭淮以柔计免罪升官。三国时，魏文帝登基，群臣纷纷前来祝贺，唯独郭淮姗姗来迟。魏文帝板着面孔责问他说：“大禹招集诸侯于涂山，防风氏晚去被处死刑。今天是大喜大庆之日，你现在才来，是何居心？”大殿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郭淮面临着被杀的危险。在生死关头，郭淮经过字斟句酌，冷静地回答说：“大家都知道，五帝将教化放在首位，以道德教化人民。夏朝以后，政治衰败，才以刑罚治人。我和各位大臣都身处盛世，所以，我不会像防风氏那样遭到不测。”郭淮是在为魏文帝歌功颂德，并在歌功颂德

的柔计中，为自己寻求生路。文帝转怒为喜，提升他为雍州刺史，迁征西将军。

刘凤浩以智力荣登探花。刘凤浩虽一眼失明但才华横溢，进士考试得了第三名，荣列探花郎。进士均要皇帝“审批”后方能“生效”。乾隆帝发现他一只眼睛失明，心中甚为不悦，但转念一想，如果他有真才实学，一只眼睛失明倒也无妨。于是，乾隆帝出上联试曰：“独眼不登龙虎榜。”刘凤浩笑着答曰：“半月仍悬乾坤间。”皇帝又出一上联：“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朕乃摘星手。”刘凤浩不假思索地对曰：“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是探花郎。”乾隆听罢，心中甚悦，拿起朱笔便在刘凤浩名下圈上探花记号。

（三）弱势企业如何变成强势企业

在市场经济中，有强势企业与弱势企业之分。弱势企业是指人力、财力、技术、产品、管理和市场综合竞争力薄弱的企业；强势企业是指上述几个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那么，现代弱势企业如何才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严峻问题。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为我们回答与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

现代弱势企业要想完成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转变，企业家必须在“柔弱胜刚强”的理论指导下，完成三个转型：

1. 在心态上，由“浮躁”心理转变成“清静”心理

在浮躁与喧嚣的市场中，“柔弱胜刚强”的理论对于控制贪婪与恐惧的人性弱点，以及提高企业家树立理性思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利益竞争的市场上，如何解决“有为”危机，是一个常见而必须回答的问题。每个人进入市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欲望，正是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中小投资者为例，有一首打油诗真实地描

绘了他们在股票市场中的心情：“看好不买一直涨，追涨买进变熊样。气愤不过又卖掉，卖掉立即又大涨。”不管是因为对自我控制能力和内幕消息的过度自信而“盲目操作”，还是因为对自己缺乏自信，导致在买进与卖出之间，左右摇摆，无所适从，过度谨小慎微，总之，“有为之举”把人变成了身不由己的股奴。在股票交易过程中，如果能以“清静无为”作为指导思想，真正做到“买进时不急”、“卖出时不贪”、“赢利时不骄”、“亏损时不馁”、“等待时不躁”，就可以防止因贪婪与恐惧带来的各种损失。“清静无为”不但能化解因欲望与情绪所产生的主观性与非理性化，而且还能帮助企业树立返璞归真的平常心与平静心。正如美国“股神”巴菲特对他的股东说的那样：“假如我在开盘时间常常溜出去看电影的话，你们去年应该赚得更多。”良好的“清静无为”心理，是医治市场“有为危机”的一剂有效的良药。

在心态上，企业家应根据“清静无为”原则，树立以柔克刚的“慢慢磨”的信念。从某种意义上，经营企业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是一场企业家之间的心理之战。耐力强者胜，耐力弱者败。作为中小企业家，只能以“慢慢磨”来磨炼自己的忍耐性，克服自己的浮躁毛病，总有一天会由“小媳妇”磨成“婆”的。

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香港的移民浪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进行大手笔的地产投资，借此实现了他人生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腾飞。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形势，不仅投资了深圳的港口，而且在 1998 年又投资了印尼的港口，这都是以老子的“以柔克刚”的思想进行操作的。正如和黄集团前董事总经理马世民先生说的那样：“李嘉诚是一个玩 Cycle 的高手”，“李嘉诚的故事就是一连串的好交易”。可见，正是“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老子思想，使李嘉诚变成了一头“慈祥的狮子”，达到了“不疾而速”的人生境界。

所以，企业家特别是中小企业家，只有在心态上由“浮躁”心理而转变成“清静无为”的平静心，才能使企业逐步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逐步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型企业。

2. 在管理上，由“有为”的刚性管理转变成“无为”的柔性管理

老子以他的睿智目光观察到天地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道德经》二十三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道德经》七十六章）。正是从宇宙万物的强与弱的转化现象中，他得出了“爱民治国，能无知乎”（《道德经》十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道德经》二十八章）的结论。企业家应从这些至理名言中受到启示，在管理方式上，用“无为”的柔性管理改造过分“有为”的刚性管理，以克服其弊端。张瑞敏说：“在过去人们把此话看成是消极的，实际上它主张的弱转强、小转大是个过程。要认识到：作为企业家，你永远是弱势；如果你真能认识到自己是弱势，你就会朝目标执着前进，也就会成功。”美国斯坦福大学帕斯卡尔和哈佛大学阿索斯教授合著的《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一书，于1981年2月出版。在这部书中，作者认为软性管理（即柔性管理）是日本企业管理优于美国企业管理的关键所在。由此得出结论：软性管理优于硬性管理（即刚性管理）。

在由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的转型中，企业家必须把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当作是柔性管理的追求目标。老子所倡导的柔性管理，从根本上是以适应民众需要、追求民众幸福为最终目标的。海尔的“真诚到永远”，小天鹅的“全心全意”，都体现了“利万物”、“爱民”的思想境界。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说：“企业目标的唯一有效定义，就是要创造顾客。”他认为企业若不能满足用户需求，服务不佳，那就必然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在由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的转型中，企业家还必须对传统的组织结构进行创新与再造。美国管理学家哈默博士认为老子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道德经》五十六章），是一种组织结构的理想境界。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就是构建团体合作的组织方式才能够创造高效率。过去，企业组织结构的弊端，主要是过多的层级和过长的渠道，造成信息传递的缓慢和失真；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隔离，也容易形成信息壁垒。因此，要实施柔性管理，要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再造，就必须将传统的金字塔型的组

织结构转变为扁平化的网络状结构，最大限度地消除信息的不通畅，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和工作效率，从而增强企业适应市场的灵敏程度。具体来说，就是要打破因传统的部门划分和过多的层级划分而造成的每个部门职能单一且协作困难的局面。这样，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或企业就可以共享核心能力和资源，合力完成基于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工作团队或动态联盟要求个人或企业具有良好的合作态度，这是创造高效率和高效益的思想基础。为此，企业组织结构必须重视沟通和协调工作，努力避免组织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由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的转型中，根据“天下神器，不可为也”（《道德经》二十九章）的原则，企业家必须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重新改造，使其形成一种自然无为、不损害人性发挥的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包括人才录用制度、人事任免制度、劳动分工制度、绩效考核制度、报酬分配制度、教育培训制度、民主管理制度等。就现实企业来看，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普遍存在的弊病，是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工资水平低、不注重教育培训、权力集中、领导只能上不能下、人员进出困难、分工过细、缺少合作等，严重地制约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造成了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重新改造，必须建立任人唯贤、进出自由、能上能下、民主决策、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用人制度。柔性管理要求企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教育培训机会和相对优厚的薪酬待遇，以培养和激励员工；柔性管理还要求企业建立适应于工作任务和团队工作方式的绩效考核制度，以合理评价员工工作。这样，就可以充分而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水平。

3. 在战略和策略上，由传统的“红海战略”转变成柔性的“蓝海战略”

“蓝海战略”是 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教授在 2005 年合著的《蓝海战略》一书中提出的，它是相对于传统的“红海战略”而言的。那么，什么是“红海战略”与“蓝海战略”呢？“红海战略”基于产业组织经济学，而“蓝海战略”则基于新经济理论，也就是内生的增长理论。“红海战略”主要是在已有已知的显在市场中竞争，竞争各方围绕产品成本、价格和差异

化诸方面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结果必有企业惨败和员工失业，如同战争一样血染江海。“蓝海战略”主要不在已有已知的显在市场竞争，而是主要通过开辟满足人的未来需求的潜在市场（有时“蓝海”也可以在“红海”中开辟）进行竞争，并在新的市场中进行价值创造。竞争各方皆以柔性的“竞和理论”为指导，既讲竞争也讲和谐，力求最终达到“双赢”的结局。

弱势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既要有敢于竞争的精神，更要有善于选择和确立得当的竞争策略和战术。老子的“守柔曰强”的哲学思想，是弱势企业由弱变强、以弱胜强的精神内核。

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家必须依据“不敢为天下先”的“守柔”哲学，树立“老二哲学”意识。蒙牛乳业创立初期，面对着众多强大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实力雄厚、近在咫尺的内蒙古伊利乳业。伊利乳业既是蒙牛的强大竞争对手，同时也是蒙牛学习的榜样。于是，蒙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萌生了“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的战略思想。蒙牛提出的创立“第二品牌”的战略，不仅避开了自己以卵击石的危险，而且把所有其他竞争对手都甩到了后面，实在是一种高明的“守柔曰强”的战略。2003年10月16日，“神舟五号”飞船顺利返回地球，伴随着“举起你的右手，为中国喝彩”的口号，蒙牛“航天员专用牛奶”的广告，便铺天盖地出现在全国30多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这对于企业发展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搭载机会，谁占有它，谁就拥有无可比拟的制高点，从而实现了“柔弱胜刚强”的战略目标。

弱小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实施“为而不争”的策略，避免与强大竞争对手进行正面交锋。针对竞争对手尚未涉及或者是准备不充分的市场盲点，寻找从侧面进攻的机会，开发那些与之不同或是被对手所忽略的产品，然后集中所有的资源，打造在这一细分市场上的领先优势，等积聚了足够的实力之后，再向竞争对手进行全面进攻。

海尔集团就是通过“为而不争”的策略以弱胜强的成功例子。海尔创牌之初，一些传统名牌冰箱、洗衣机已为大企业长期垄断市场，产品供不应求，一般杂牌产品则无人问津，纷纷败北。他们针对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进行了大量的市场调查，发现冰箱、洗衣机正向环保型、智能化方向发展，

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于是，他们决定避开名牌大企业的垄断优势，不和他们搞全面竞争，而是避实就虚，集中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设计、生产出了海尔智能型冰箱，以低于名牌冰箱 5% 左右的价格打开了通向市场的道路，迅速占领了一个市场面，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为海尔的全面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美国超级市场的经理大都坚信“大即是美”的经营哲学，于是竞相建立拥有大面积停车场的大型超级市场。但是经营食品零售的 7-Eleven 店却依靠小批量种类和较长的经营时间与超级市场竞争，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该行业的佼佼者。

弱勢企业面对强大竞争对手时，还要尽量避免成为对方攻击的对象，若能与对方结成战略联盟就更有积极意义。微软公司初创时，只是一家小型企业，为了走上正规发展的道路，比尔·盖茨等人总在想法子成为老牌的 IBM 公司的合作伙伴。1980 年，微软公司与 IBM 公司签订了协助 IBM 公司开发软件的合同，从而借助强大的 IBM 公司的力量，实现了迅速起飞。这种“借力”、“借势”的竞争战略，是很高明的。

弱勢企业面对强大竞争对手时，企业家要有“卧薪尝胆”的忍辱精神，善于避开竞争者的锋芒，静观时局，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学会在缝隙中求生存。20 世纪 60 年代初，当美国的许多计算机生产厂家都把研制和生产的重点放在大型计算机上的时候，史蒂夫·乔布斯和斯蒂芬·沃兹尼克瞄准了机会，将注意力集中到个人计算机上。乔布斯卖掉了自己的汽车，沃兹尼克卖掉了自己心爱的计算机，凑了 1 500 美元。两位年轻人利用业余时间，在乔布斯父母的车库里辛苦地工作，直到 1976 年，终于研制成一种家用电脑，命名为“苹果 1 号”。当他们将这台电脑拿到俱乐部展示时，一下子就卖出了 50 台。于是，在 1977 年，他们成立了“苹果计算机公司”。1981 年，苹果计算机公司生产的个人计算机已占据了美国个人电脑市场的 41.2%，公司进入了世界 500 强，名列第 411 位。一年之后，年轻的苹果公司一举跃升到第 291 位，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叹。苹果计算机公司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系列谋略，都与老子的避锋蓄锐、待机而动的战略思想不谋而合。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香港的穆和利公司看准服装界将朝着更时髦、更休闲的方向发展，大胆地推出了一系列新颖时髦的牛仔装，并请明星葛罗利亚·范提堡来促销。这种新款的牛仔装，1981 年在美国市场创造了高达 6 亿美元的收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美国发明纸尿裤后，纸尿裤在市场上非常流行，但其吸水性较差。于是，日本一家公司便研制出可吸入比纸尿裤重 1 500 倍水的化学棉尿裤，结果是后来居上，击败了美国的纸尿裤，占领了约 85% 的纸尿裤市场。

企业经营战略，有“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之分。所谓“后发制人”，是指企业在产品开发上，当市场出现新产品后，立即调查、判断该产品的未来前途；当预测该产品前景好时，应立即动手仿制投产上市；同时，针对它的不足，仿制时就要加以改进、完善，力争仿中有创，比原有的新产品更具有竞争力。这种经营战略，产品开发投资少、风险小、开发时间缩短，便于后来居上。因此，“后发制人”的谋略不仅适用于多数“弱势”的中小企业，也适合于“强势”的大型企业。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就是运用这种战略获得成功的典型。松下公司一开始就不做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先驱者，而是做一个追随者。该公司建立了 23 个拥有最新技术的生产技术室，专门分析竞争对手的新产品，发现其不足之处，并从中找出改进的方法，设法做得更好，使产品的质量、性能更臻完善。例如，录像机技术是日本索尼公司发明的，该公司率先推出的“贝塔马克斯”牌录像机在市场上取得了最初的领先地位。松下公司通过市场调查，获悉消费者希望录像机的放映时间能更长一些。于是，他们就在“贝塔马克斯”录像机的基础上，设计出一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录像机。这种录像机，性能高度可靠，价格也比“贝塔马克斯”低 15%。结果，松下公司推出的“乐声”和“RCA”两个牌子的录像机，很快压倒了竞争对手，占领了日本录像机市场的 2/3。

第十二章

“方而不割”与“方圆之道”

“方而不割”命题，源自于《道德经》第五十八章。老子云：“圣人方（方角）而不割（损害），廉（棱角）而不刿（利伤），直而不肆（放肆）。”在老子看来，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本质的规定性，它的存在和变化都有一个许可的极限。“方正”品格的极限是“有割”，品行方正虽好，但不能因过度“方正”而损害他人，应随俗方圆；“廉洁”品格的极限是“有刿”，反对贪污腐化虽好，但也应避免过度刺痛他人，以免造成紧张的人际关系；“正直”品格的极限是“有肆”，行为正直虽好，但不可放肆、任意行事，应学会尊重他人。这些“内方外圆”的美德一旦超出了它们的限度，突破了它们的临界点，事物便丧失了原有的本质而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一切矛盾都是相互包含、互相渗透的，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和趋势。“方”、“廉”、“直”虽是好的品格，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向“割”、“刿”、“肆”等坏的方向转化。所以，深谙辩证法的人能够以“中道”自律，对自身的品格进行适时调节，力求控制在“不割”、“不刿”、“不肆”的限度内，真正做到“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方可达到为人处世的圆通境界。

（一）做人要圆，做事要方

“方圆之道”是一种为人处世的艺术，它的基本含义是“做人要圆”、

“做事要方”，把“方”与“圆”有机地结合起来，方可达到圆通的人生境界。

在人生道路上，每个人无非是“做人”与“做事”两件事。做事难，做人更难。如何才能做好这两件事呢？从古至今，这都是中外哲学家思考和探讨的永恒问题。

所谓“做事要方”，是说做事一定要遵循规则或规矩，切不可随意胡作非为。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做事既不能违法，也不能缺德，切不可逾越“法律”与“道德”雷池一步。每一种社会职业虽有自己的特殊行规，但是“诚信”则是商道的基本规则。遵之，一诺千金，为商必成功；违之，失信于人，为商必失败。“廉洁”是做官的基本原则，要求做官者不能以权谋私。遵之，即是清官；违之，即是贪官。“求是”（追求真理）是学者的基本要求，不能弄虚作假。遵之，积薄成厚，必有成就；违之，沽名钓誉，必成笑柄，不为人齿。

“做事要方”，但也要“通人性”、“合人情”，根据具体情况，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和人情味，努力做到方中有圆，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据《后汉书·吴佑传》记载：“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安丘官员追至胶东将其抓捕归案。如何法办呢？胶东侯相吴佑认为，从人情角度，“子母见辱，人情所耻”，杀人是理解的，“刑若不忍”。但是“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必须按国法处以死刑。在“法”与“情”的两难之中，吴佑在死刑执行上，采取了一种为毋丘长“留后”的灵活方法。吴佑问毋丘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也。”于是，允其将其妻子带至监狱，“解其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丘冬至尽行刑”。这就把“法”与“情”结合起来，既不违法又合人情，达到了圆通境界。

在治军和治国中，政治家和军事将帅既要刚正不阿，坚持原则，又要随机应变，灵活圆通，做到情圆理方，切不可让原则捆住自己，失去民心，招致失败。古人说：“圆若用智，唯圆善转。”道理就在于此。

前秦王苻坚的得力大臣王猛在潞州与前燕太傅慕容评对峙。王猛派大将徐成去探查燕军虚实，令他中午回报，而徐成却在黄昏时才返回，王猛按照军纪要斩徐成。邓羌为徐成求情说：“敌众我寡，明晨即要打战，最好是宽

恕了他。”王猛坚持说：“如果不斩徐成，军法威严难以树立。”邓羌回答说：“徐成违期该斩，但我愿与他一起拼死作战，以求赎罪。”在邓羌的劝说与威迫下，王猛才赦免了徐成。结果，邓羌与徐成奋战杀敌，大败燕军，以报主帅。王猛只讲军法而不讲人情，是一种理方而情不圆的做法，违背了道家的“大方无隅”的管理原则，是难以赢得部下人心的。而邓羌按照“理方情圆”原则，明知徐成违期该斩，但面对当前的敌我情况，要想战胜燕军，就必须在承认徐成违期该斩的前提下，又要请求宽恕，这是讲人情。这是“理方情圆”之道的一次成功运用。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坚持以武力统一中国，灭掉南方诸侯各国，这是政治原则，不能动摇。一旦南方诸国被灭之后，如何对待这些“孤身远客”呢？是杀掉他们、放逐他们还是厚待感化他们？赵匡胤按照“理方情圆”的管理之道，不但对降王赐官封侯，而且对他们的家属也百般关照。如西蜀被灭后，宋太祖拜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泰国公，死后，追封他为楚王。孟昶母亲初到开封时，赵匡胤即称她为母，并表示马上让她返回蜀地。孟母奏道：“妾身并非思蜀，原先本是太原人氏。得归老家并州，乃妾身所愿。”宋太祖说：“如此，待朕取得太原，便送国母归去。”宋太祖厚待降王的历史事实，说明管理者在待人接物上，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富有人情味，方可赢得下属的真心爱戴与拥护。这就是道家讲的“大方无隅，大直若屈”的精义所在。

所谓“做人要圆”，是一种宽容、忍让、圆通、融通的人生大智慧，绝非是世俗小人的圆滑世故、八面讨好、左右逢源的丑陋心态。在做人上，既要求不要随波逐流，随风摇摆，也要求不要咄咄逼人，强加于人。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既有貌似糊涂的智慧，也有形如疯傻的清醒，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这是人要追求的压力最小、张力最大、可塑性最强的人生境界。

“做人要圆”，有时会有牺牲，甚至要承受来自社会和亲朋好友的各种屈辱、误解、怨恨和伤害。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在一家大企业做副总经理时，虽处处受到排挤，为人所不容，他以“忍”的心态向企业提出辞呈，并没有火冒三丈，大吵大闹。当他创立蒙牛品牌后，不但在市场上处处受到抵

制，甚至有人将他在呼和浩特市四十多块广告牌全砸毁。当他得知砸毁者是谁时，既不辨是非，也不追究法律责任。正是这种宽容的“忍”的智慧为牛根生赢得了人心，使蒙牛产品的销售量猛增。

英国“维珍商业帝国”老板布兰森先生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把维珍定位为“补缺者”。他说：“我们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观察那些庞大的、洋洋得意的公司，思考他们的弱点在哪里，我们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努力寻找他们的软肋。”“与那些财大气粗且惰性十足的品牌相竞争，很容易做到让顾客感到在我们这儿消费是物有所值。”哪里有不合理的利润，哪里就有不满意的顾客，维珍就出现在哪里。他形象地把这种市场哲学戏称为“跟在大企业背后抢东西吃的厚脸皮的小狗”。“维珍商业帝国”虽不是产品的创造者，但它却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正是这种“做人要圆”的通融智慧，成就了他的“维珍商业帝国”的人生梦想。

“做人要圆”，不仅要求努力做到宽容、忍让，而且切忌以小肚鸡肠嫉妒他人。英国哲学家斯宾诺莎指出：“嫉妒是一种仇恨，这种仇恨使自己对他人的幸福感到痛苦，对他人的灾难感到快乐。”巴尔扎克也指出：“嫉妒者受到的痛苦比任何人遭受的痛苦更大，自己的不幸和别人的幸福都使他痛苦万分。嫉妒心强的人，往往以恨人开始，以害己而告终。”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这种不健康的嫉妒心理呢？古人云：“境由心造。”要克服自己的嫉妒心，不仅要超越自我，容得下他人的优点和成功，还必须有自知之明，学会正确评价自己。克服一份虚荣心，就会少一份嫉妒心。有一名武士向禅师请教天堂与地狱。禅师对他说：“你虽是一个武士，但没有人会重用你，因为你丑而且笨。”武士大怒，拔出宝剑就要砍杀禅师。禅师纹丝不动，细声对他说：“地狱之门由此打开。”于是，武士弃刀于地，向禅师道歉。这时，禅师微微一笑，说道：“天堂之门由此打开。”可见，天堂、地狱都是人造的，是天堂还是地狱，只是一念之差。天堂和地狱就在现实生活之中，就在自己的心灵之中。

有一位漂亮的好莱坞女演员，因失恋而产生的怨恨和报复心理，使她的面孔多了很多皱纹，她去找一位美容师为自己美容。这位化妆师诚恳地劝她说：“你如果不消除心中的仇和恨，我敢说全世界任何一个美容师也无法美

化你的容貌。”

“做人要圆”，要求我们学会赞美他人。在人际交往中，只要发自内心地多使用赞美语，就能搭起沟通的桥梁，使彼此沟通如沐春风，就会得到人间最珍贵的友谊。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的根源有一股被人肯定、称赞的强烈愿望，这是人和动物的最大不同点。一般说来，无论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都喜欢听好话，特别是那些自卑感很强、被压抑的“小人物”，更喜欢受到别人的赞美，这是人之常情。这些“小人物”虽然有无限的潜力可以挖掘，但是需要一个引爆点。赞美就是挖掘无限的潜力的最好引爆点。俗话说：“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只要从赞美他人开始，学会以幽默的语言“顺情说好话”，必能打动他人，开启他人的心扉，激活他们的活力，真可谓功德无量。这是“做人要圆”的秘诀，也是成功的管理之道。

从哲学上看，“做人要圆”，就是要走出“二分法”的思维困境，学会以“二合一”的思维程式思考问题。当你走进咖啡馆时，店内小姐问道：“先生是喝咖啡还是喝红茶？”“二分法”者在两者中必选择其一：或曰“咖啡”，或曰“红茶”。而“二合一”者则回答：“随便”或“都可以”。努力在矛盾的对立中寻找出二者的平衡点，以达到圆通的人生境界。在人际关系中，“二合一”者从不向别人追问对某人某事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样非此即彼的问题；一旦被人问起对某人某事是赞成还是反对时，他们也多不会直接表示其中之一，而多是兼顾赞成与反对而加以包容双方。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态度明确固然好，但有时态度模糊或许更好。

传说宋代苏东坡和秦少游在饭馆吃饭，一名满身虱子的乞丐前来乞讨。苏东坡认为虱子是从乞丐身上的污垢里出来的，而秦少游则反驳说：虱子是从乞丐身上的棉絮中出来的。各执其见，争执不下。于是，二人决定请佛印禅师当评判，谁输了谁请客。佛印禅师在评判的那天，按照佛教的“随缘”说，不慌不忙地说：“虱子的头是从污垢出来的，而虱子的脚却是从棉絮中出来的。所以，你们两位都输了，应该请我吃酒。”两人无话可说，哭笑不得。接着，佛印禅师又说：大多数人认为“我”是“我”，“物”是“物”，二者是对立的。在我看来，二者却是一体的，是完全可以调和的。比如一棵树，既接受空气，同时也接受水分和阳光，其生命才能达到统一的圆通境

界。不管虱子是从污垢中出来的还是从棉絮中出来的，只要把“我”与“物”之间的对立统一起来，就能达到圆通境界。“随缘”是一种心态，承认对立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从“二分”的对立中找出“二合一”的互补，这就是所谓的“随缘”。

“做人要圆”，就是要学会自我宽心，自己找乐。弗洛姆指出：“贪婪是一种会给人带来无限痛苦的地狱，它耗尽了人力图满足其需求的精力，可并没有给人带来满足。”为贪婪之欲所累，就永远不会有满足与快乐。人生许多痛苦与烦恼都是自己找的。比如有一位老太婆，晴天忧愁，雨天也忧愁。因为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卖雨伞，二女儿卖冰棍。晴天怕大女儿不赚钱，雨天忧二女儿不赚钱。有位智者劝老太婆不必忧愁，换个思维方式，就可变忧愁为快乐。晴天因为二女儿卖冰棍生意好而高兴，雨天因为大女儿卖雨伞卖得好而高兴。人生的喜和忧都是“外物”带来的两种心态。只要不钻牛角尖，认死理，善于转移“痛点”，找到“乐点”，就可以达到圆通而快乐的人生境界。

（二）“内方外圆”的圆通境界

“方圆之道”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艺术，同时也是人要追求的一种“内方外圆”的圆通境界。以水为例，水无常形，能根据客观环境的差异性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态，以适应不同的客观环境，如水在杯里即为杯形，在盘中即为盘形，在葫芦里即为葫芦形，等等。中国古代铜钱是内方外圆，古代建筑的础石也多半是“内方外圆”，这是中国人对“内方外圆”人生境界的形象说明。因此，要求为人处世应像水和铜钱那样“内方外圆”，在不同的客观环境里，应力求做到“随俗方圆”，以达到方圆有致的圆通人生境界。

放眼古今中外，某些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命途多舛，从处世之道上，就是只“方”不“圆”所致。唐代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清代富可敌国的和珅，虽然圆滑世故，八面玲珑，作威作福，风光一时，但最终还是被钉在了历史的

耻辱柱上，从处世之道上，就是只“圆”不“方”所致。

所以，只有善于把“方”与“圆”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方圆有致的圆通境界，才是人生成功的真谛。不管是商界巨富还是官场首脑，不管是世外高人还是潇洒文人，其中不乏精通“方圆之道”人生艺术的高手。中国历史上不少志士仁人用自己的行动演绎了这一人生真谛。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能在田园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李白不会“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是浪迹江湖，建构自己的诗意人生。现代中国最精通“方圆之道”这门人生艺术的恐怕要数周恩来总理，在外交活动中，他那真诚的笑容，细腻的肢体语言，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外国元首；他那刚毅的眼神，坚定的信念，一次又一次地传递出中国人的声音，赢得了世界的赞誉。有人赞誉他是岿然不动的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温柔和美丽，藏在水下的是刚强与自信。周恩来总理以他一生的言行，最好地诠释了“方圆之道”的人生真谛。

深谙“方圆之道”的人，是大智慧与大容忍完美结合的人。他们在面临危机和身处逆境时，皆能做到处变不惊，临危不惧，转危为安，以成大事。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危难之中，采取藏巧于拙、假装糊涂、全身而退的策略，较之那种有勇无谋的无谓牺牲要高明得多。

在中国历史上，刘备是一位精通“方圆之道”的高手。《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刘备落难时曾投靠曹操，以韬晦之计栖身于许都。为防曹操谋害自己，就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此迷惑曹操，放松他对自己的监视。曹操诡诈多端，有一天请刘备进府饮酒，议论谁是当今英雄。刘备认为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张绣、张鲁等人是当世英雄，均被曹操一一否定。在曹操看来，只有“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方是英雄。刘备问道：“谁称得上是英雄呢？”曹操答曰：“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啊！”刘备被曹操点破后，吓得把筷子掉在了地下，恰好当时大雨将至，雷声大作。曹操问刘备：为什么把筷子掉在地下呢？此时，刘备以冷静的头脑、从容不迫地拾起筷子，答道：“我害怕雷声，所以才会如此。”曹操说：“雷声是天地之间阴阳二气击搏的声音，有什么可怕的？”刘备回答说：“我从小害怕雷声，一听见雷声只恨无

处躲藏。”于是，曹操哈哈大笑。刘备就这样巧妙地将自己的惶乱之态掩饰过去。从此曹操认为刘备胸无大志，成不了什么大器，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放松了对刘备的警惕。刘备这才避免了一场劫难，如愿以偿地逃脱虎狼之地，终成三国鼎立之势。

俗话说：“鹰立似睡，虎行似病。”魏国司马懿也是一位足智多谋、精通“方圆之道”的高手。三国后期，他老谋深算，将自己佯装成要死的人，瞒过了大将军曹爽的防备和猜忌，保护了自己。待时机成熟后，司马懿以武力实现了统一天下的梦想。不管是刘备还是司马懿，都在进退出处上，成功地运用了“方圆之道”。

（三）胡雪岩的“方圆人生”

胡雪岩是晚清一位富甲天下的“红顶商人”，他的成功得益于精通“方圆之道”，对当代企业家经商仍具有借鉴意义。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过度方正，棱角伤人，势必头破血流。反之，为人处世过于八面玲珑，过于圆滑，也必将众叛亲离。要想赢得商道成功，就必须心中刻着一个“圆”字，坚持能伸能屈的“方圆之道”，做一个真正的“方圆之士”。胡雪岩有一句名言：“欲无办大事之难题，必先倾全力做到圆世道、圆身心。”在他看来，锋芒太露，必遭暗算。以柔克刚，迂回求胜，唯有圆道。只有依靠圆融哲学智慧，方可取信于人，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使自己走上成功之路。他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条：

（1）嫉妒心理是达到圆通人生境界的大碍。要想构建圆通人生境界，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的嫉妒心理。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出于众，人必非之。”平庸之辈，因为其无才也无德，不会对周围人的利益构成威胁，所以，不会引起别人对他的嫉妒。相反，一个有智慧、有才能的人，一旦在同事中做出突出的成绩，就可能会打破他与同事之间的平衡关系，直接影响别人的利益，就可能会引起个别心胸狭隘的人的妒恨，甚至由妒恨而引起彼此之间的倾轧，导致两败俱伤。这是现实社会中常见的事情。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的嫉妒心理呢？胡雪岩认为，一是学会“同行不妒”，二是善于保护遭人嫉妒的英才。

俗话说：“同行是对头（或冤家）。 ”如何将“对头（或冤家）”变成真心合作的伙伴呢？胡雪岩认为“同行不妒，什么事都办得成”。

光绪年间，在左宗棠的鼓励和支持下，胡雪岩开始做丝业生意，但他在丝业生意上是外行，于是，他寻求浙江丝业巨头庞云缙合作。由于两人的真心合作，他们的生意迅速发展，很快就垄断了蚕丝的国际业务。胡雪岩深知合作互惠的道理，在丝业生意上他得到了庞云缙的帮助，而在经营药业上他又向庞云缙伸出帮助之手，在南浔为庞氏开设了庞滋德国药店，与他设在杭州的胡庆余堂互相合作，关系甚密。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形势下，江浙地区大办团练，扩充军队，以守土自保。胡雪岩从中发现了军火生意的商机。当时，浙江已有一个由龚振麟主持的炮局，主要出售自己造的土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买进优于炮局的西洋炮，势必会顶掉浙江炮局的土炮，侵害炮局的利益，引起炮局的妒忌。于是，深谙人情世故的胡雪岩决定“买枪不买炮”。这一让步，虽然缩小了自己的市场，但是却开辟了新的市场。在新的市场中，既不会遭到他人反对，也没有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了更大的经营空间和更大的利润。胡雪岩在企业经营中，时时照顾同业同行的利益，既为别人留余地，也为自己开财路，从而达到了“双赢”的局面。

同行在市场中的是竞争对头，更是合作伙伴。具有辩证法头脑的胡雪岩认为，从战略眼光出发，努力做到利益分享，克服“同行是对头（或冤家）”的狭隘心态，生意才会越做越大。

（2）在人才使用上，胡雪岩始终有一个基本理念：“不遭人妒是庸才。”反过来说，常遭人嫉妒的人多是能成就大业的英才。因此，在人才使用上，企业家应不拘世俗之见，不以人非而非，应独具慧眼，从常遭嫉妒的人中发现人才，保护人才。这才是极高明的做法。

“不遭人妒是庸才”这一基本观念，首先，他是从自己的遭遇中体悟出来的。胡雪岩起初在“信和”钱庄当学徒，因才华出众和办事历练受到老板器重，擢升甚快，遂引起同事的忌恨。他们在老板面前总是说他的坏话，什

么“办事无能”，什么“欺上瞒下”等。王有龄本是一介书生，虽科试不第，捐官无路，穷困潦倒，但他有志向有骨气，胡雪岩断定他将来必有大作为。作为学徒的胡雪岩竟敢私自将“信和”钱庄的五百两银子借给王有龄，也是基于这一基本观念。钱庄老板知道后，又气又恨，钱庄伙计也借机造谣和报复，说胡雪岩“无法无天”，“如不把他赶出钱庄，钱庄还不得早晚关门”，等等。在众人的一片“妒忌”之声中，老板才最后下决心将他赶出了“信和”钱庄。胡雪岩虽被赶出，在时转运来之后，由于王有龄的有力支持，控制了浙江海运，赚了数十万银子，并把它存于“信和”。此时，“信和”老板才发现在“人妒”之中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始知“遭人妒者才是英才”的道理。

胡雪岩发迹后，在用人上，特别注意“不遭人妒是庸才”这一基本观念。古应春不仅是上海洋场里的“通事”，英语翻译水平极高，更是一位难得的爱国主义者。胡雪岩从他的言谈、举止、办事和见解中，看出他是一位多遭同行倾轧和排挤的难得人才。于是，他主动提出与古应春合作同洋人做生意的要求。在古应春的真诚合作下，胡雪岩不仅以合适价格从英商哈德逊那里及时地购买到两百支枪、一万发子弹，而且还将几万包丝在上海卖给洋人，赚了十几万两银子。

王有龄在湖州任上时，那里发生了攻县城、杀县官的民变事件。如何处理这一民变呢？王有龄征询办法。大多幕僚皆主“剿”，只有平时少言寡语、不为王有龄器重、为众人所不齿的司马松主“抚”。王有龄支持主剿派，结果大败。胡雪岩得知后，认为司马松是一位“大智若愚”的难得人才。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不仅为他还清了旧债，留下五百两银票以备司马松使用，还建议王夫人将养婢赠与司马松为续弦。这一切，深深地感动了司马松，主动要求去与“乱民”谈和。他舌战“乱民”，瓦解斗志，使民众各自散去。他在民变县城就任县令后，由于治理有方，民心归顺，生产发展，出现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此时，王有龄才认识到“司马松素日在同僚中备遭非议，原来果真是奇才！”

（3）胡雪岩认为，在生意场上，要想达到圆通人生境界，就必须学会“以情动人”，示之以诚，善于“感情投资”。以战略家的眼光，对陷入困境、

急需帮助的人，特别是将来有发展前途的英才，应实施“雪里送炭”，热情相助。一旦这些“失意者”在成功之后，早晚必定会有所报答。这种人生艺术，胡雪岩称之“烧冷灶”。当初，胡雪岩挪用东家五百两银子资助王有龄，并对他说：“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真可谓“慧眼识英雄”、“患难见真情”，这就为胡雪岩的商海成功之路奠定了人脉基础。

书生嵇鹤龄与商人胡雪岩结为挚友的故事也说明了这一点。胡雪岩认为，要想在官场或商场上得到有真才实学者，仅仅靠钱是行不通的，还必须以真情实意打动他们的心灵。嵇鹤龄虽有学问但怀才不遇，在仕途上只是个“候补”知县，何时能补上官缺又遥遥无期。湖州知府王有龄接到浙江巡抚黄宗汉交办的一件差事：平息新城县饥民造反。而嵇鹤龄是平息这一事件的最佳人选，但是他心中有气，不愿为王有龄效劳。作为王有龄朋友的胡雪岩，去嵇鹤龄处做“说服”工作。他是如何说服嵇鹤龄呢？首先，他真诚地祭拜嵇鹤龄亡妻。胡雪岩得知嵇鹤龄妻子新丧，还在“七七”之内。于是，他就备好香烛、纸钱等一应祭品，穿上丧服袍褂，戴上水晶顶子大帽，不等主人同意就“闯”进嵇家，摆出香案，十分真诚地拜祭嵇鹤龄亡妻，从感情上，深深地打动了嵇鹤龄。其次，为“要面子”的嵇鹤龄赎回为料理亡妻当出的衣物家什。最后，胡雪岩亲自做主，将王有龄夫人的贴身丫鬟嫁给了嵇鹤龄，结下了金兰之好。这一切，使嵇鹤龄由衷地佩服胡雪岩。数日后，在王有龄的安排下，嵇鹤龄亲赴新城，协同地方绅士，设计擒获首犯，解送杭州法办。大功告成后，在胡雪岩精心策划下，嵇鹤龄又接任了浙江海运局，皆大欢喜。

（4）正确处理“钱财账”与“人情账”的关系。胡雪岩在“钱财”与“人情”上，始终坚持一条原则：舍去近利，保留人情。认为同行友情高于眼前利益，这是胡雪岩“方圆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雪岩在“信和”做学徒时，薪水微薄，有一次他见到一位病倒于客栈中的朋友，已欠房租饭钱半月有余，看病还急需五两银子。他就毫不犹豫地借给了朋友之妻五两银子，并将一只手镯留在朋友妻子处备用。后来，这位朋友在生意上遭人暗算，胡雪岩就仗义相助，使朋友幸免于难。胡雪岩认

为：“钱财账背后的‘人情’，向来是比钱财更重要的。”他宁可舍去钱财，也要做个人情。人情是一笔不可估量的无形财富，不管是大还是小、是长还是短，总会得到或大或小的回报。因为前者是有限的，而后者带给自己的机会与钱财却是无限的。有时在钱财赚赔上大气一些，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成功。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开设之初，公开宣布：决不挤占“信和”钱庄的生意，浙江海运局的钱款仍由“信和”钱庄经营。不抢同行的饭碗，使他将竞争对手变成了合作伙伴。

有一次，胡雪岩以高价从外商那里购买了一批军火武器，后来得知这批军火早已以低价卖给了另一位同行，只是同行还未付款取货。于是，胡雪岩便主动要求同行将这批军火以外商价格“卖”给他，那位同行既不需出钱，更不担风险，只是吃个差价，他还马上将差价给了那位同行，深得同行的称赞。在市场竞争上，胡雪岩从不掠人之美。他对王有龄说：“银钱有用完的一天，朋友交情却是得罪了就没有救。”在市场竞争中，不抢同行的饭碗，不掠人之美，主张有饭大家吃。这样，虽失去了近利，却得到了无价的人脉，赢得了长远的、更加巨大的利益。

(5) 在资金和赚钱上，既要“变”又要“不变”。“钱眼里荡秋千”是胡雪岩赚钱秘诀的形象说明。胡雪岩创业时本无分文，他的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是从“荡秋千”中“荡”出来的。胡雪岩认为，钱只有在不断流动中才会增值，将资金闲置不用，钱是不会增值的，小元宝不会变成大元宝的。所以，“做生意一定要活络”。

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要善于“移东补西”、“借鸡生蛋”而“不穿帮”，这是一种赚钱的真本事。胡雪岩做生丝生意之初，决定在浙江湖州开设一家丝行，坐地收丝。但是，遇到了办理“牙帖”（即今天的营业执照）的麻烦。如果按照惯例，从自己申请、地方上报、京城审批，最快也要三个月时间。这就会错过新丝收购的最佳时机和最好进价。于是，他决定花上三五百银子租上一张“牙帖”，准时在湖州收丝。他之所以急于在四、五月在湖州收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要用湖州知府王有龄在湖州收到的现银，就地买丝，运到杭州卖掉变现，再解交藩库。这是一桩不损公家银两又可以无本求

利的好买卖。

胡雪岩在杭州开药店之初，资金甚为困难。他采取“滚雪球”的办法，向中饱私囊的贪官和官府军营筹集资本。杭州抚台黄宗汉是个贪得无厌的大官。正因为他“贪”，所以，胡雪岩投其所好，许以大笔军队所需的金创药和难民所需的常用药（如辟瘟丹之类）等进项，又跟黄宗汉说此举会赢来济世救人的好名声，如此，黄宗汉肯定会从私囊中拿出一笔钱投资的。浙江省设立的粮台，是后勤保障的军需机构。胡雪岩决定将防时疫的“诸葛行军散”以成本价卖给军营，让他们来定购。他的药店资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荡”出来的。

胡雪岩按照陶朱公“与时逐”的经营原则，要求商人要有战略眼光，及时发现行情变化，以调整自己的经营模式。他认为多变的市场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即在市场接近饱和时应大胆地抛售，千万不能犹豫；在商品价格接近低谷时，就要大量购进。胡雪岩在总结他的商道时指出：“世上随便什么事，都有两面。这一面占了便宜，那一面吃亏。做生意更是如此，买卖双方，一进一出，天生是敌对的，有时候进便宜，有时候卖出便宜，涨到差不多了，卖出；跌到差不多了，买进。这就是两面占便宜。”只知道占便宜不知道吃亏的人，被胡雪岩称之为“半吊子”人。经商一定要做“一进一出，两面占便宜”，千万不能做不漂亮的“半吊子”，因为“吃亏同时包含着便宜”，这就是市场运行的客观辩证法。

胡雪岩一生虽然善于在“钱眼里翻跟头”，在市场运行中把钱财盘活，从“变”中赚钱，但是“变”中也有“不变”，这就是做生意“一定要照规矩来”。所谓“一定要照规矩来”，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犯法的生意不做。不管交情多深的亲朋好友或合作伙伴，生意合同必须按规矩签订，以便有效地约束合同双方。二是经商要讲信义。只有通过货真价实和童叟无欺，做一个守信义的人，才能建立起自己的信誉形象。具体来说，要拒绝三种“会烫手的钱”：首先是触犯法律的钱（如走私、贩毒赚的钱）不能要，要了就必招灾祸，甚至有杀头之险；其次是坑害同行和欺骗顾客的钱不能要，要了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缺德行为，会流失大量的诚信资源，为自己留下灾祸之源；最后是虽不犯法、缺德，但要了就会得罪于朋友、结怨于他人的钱不能

要。所以，胡雪岩常说：“铜钱银子用得完，得罪一个人要想补救就不容易了。”胡雪岩告诫做生意的人必须学会“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也就是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心中要永远装着别人的利益。胡雪岩常对他人说：“天下的饭，一个人是吃不完的。”只有联络同行，要他们跟着自己走，这样，才能善结人缘，不留后患。做生意为了赚钱，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会烫手的钱”再多也不能要。这是做生意的规矩，这是不能变的。

第十三章

“大智若愚”与糊涂哲学

“大智若愚”（或“大智如愚”），也叫“大巧若拙”。“大巧若拙”出自《道德经》第四十五章。后人将老子的“大巧若拙”转变成“大智若愚”这一成语，最早可能是出自宋代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二七《贺欧阳少帅致仕启》：“大勇若怯，大智若愚。”清代章炳麟在《箴新党论》中亦指出：“执雌守黑，不敢自遂，大智若愚，于是乎在。”

这一命题，主要有三种基本解读：一是“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二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三是“难得糊涂”。“大智若愚”是一种高明的处世之道。

（一）“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一语，出自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告诉孔子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身。”意思是说，一个有道德的商人，深藏巨额财富，而外表上却是“若虚”，看起来好像空无所有；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内藏“盛德”，而外表上却不逞能显智，在举止、面容和言语上，愚蠢迟钝，好像傻子一样。去掉骄傲之气和贪婪之欲，去掉“态色与淫

志”，只有去掉这些“无益于子身”的东西，才能成为真正的大智者。从本质与现象角度，内藏“盛德”的君子，在本质上深藏大智大谋，是世上最聪明、最巧智的人，切不可因他的外表之愚而忘记其内在的大智大谋。这就是“大智若愚”命题的真实含义。

老子从俗人和圣人的比较中，揭示了俗人和圣人在“智慧”上的差别性，指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如婴儿无知无欲）；俗人昭昭（各炫聪明，各逞其能），我独昏昏（好像昏昧不明）；俗人察察（对各种事物皆能明察窥视），我独闷闷（闷然浑噩）。”（《道德经》二十章）这就是老子对“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命题的具体说明。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作者指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音留），所以蔽明；黈纆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中国古代帝王礼帽所以有玉串，是用以“蔽明”，两耳所以用黄丝棉塞住，是用以“塞聪”，使帝王“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从而达到“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的目的。不管是“冕而前旒”、“黈纆充耳”，还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讲的都是“大智若愚”的哲学道理。

深谙“大智若愚”精义的曹参是西汉时的一位名相，在相府“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他发现臣下有“细过”，不是以“俗人察察”的态度揪着不放，而是按照“宽而勿察”的原则，宽恕臣下，从而为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营造了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

宋太祖宰相赵普，在团结官吏、笼络人心上，也是按照“大智若愚”的思想，主张对官吏的错误采取宽恕态度，甚至有些小错误主张不予处理。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告发和揭短的文书，他连看都不看就扔进早已准备好的两个大瓮中，装满了就烧掉。这种做法有利于防止官吏之间的钩心斗角，有利于保持大宋江山的安定和稳固。

楚庄王的“一断了之”。楚庄王在宫中设宴，与大臣彻夜饮酒交欢。正当酒酣耳热之时，蜡烛突然被大风吹灭。有人趁机就拉扯了一下王妃的衣服。王妃急中生智，便将那人帽子的缨带扯断，并悄悄地告诉了楚王。楚王无意追究这一“细过”，便立即下令：今夜君臣痛饮，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缨

带拉断，就不能算是喝得痛快。于是，在场的官员纷纷把自己的缨带拉断，这件“细过”也就不了了之。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吴国攻打楚国的战争中，一位将领前后五次冲入敌营救护楚王。楚王召他来问，那人跪曰：我就是当年酒醉失礼的人，念你不杀之恩，今天才有机会报答。

刘秀“一烧了之”。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斩杀了在河北称王的王朗后，从王朗文书中发现了王朗与刘秀的一些官员相勾结的几千封信件。刘秀一封也没有看，当众把所有的信都烧了。他说：“让那些睡不着觉的人安枕无忧吧！”刘秀“一烧了之”的做法，好像是非不清、昏昧不明，实际上是一种凝集力量、争取人心的高超管理艺术。

宋太宗“一醉了之”。宋太宗在皇宫花园设宴，大臣孙守正陪之，由于孙氏喝得酩酊大醉，竟在太宗面前与人争功，大吵大闹，有失礼节。陪宴群臣甚为不满，纷纷请求宋太宗当场处罚，太宗未答应。第二天，孙守正上殿向太宗请罪，太宗笑着说：“当时，我也喝醉了，情况记不清了。”这一装糊涂的做法，使孙守正如释重负，安心地供职去了。

台湾省新竹市市长林政则先生，以新加坡的美丽与廉政为学习榜样，在“清清白白施政，实实在在建设”的价值观指导下，矢志把新竹市建设成“花园城市”，深得民众好评。在近年的民意调查中，林政则连续蝉联“整体施政满意度第一名”，成为台湾满意度最高的地方长官。他是一名深谙道家“大智若愚”智慧的政治家。林政则在手机面板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笨”字，时刻提醒自己资质弩钝，不要自以为聪明，听不进他人的意见。“笨”字拆开来，是以“竹节虚心”，时刻提醒自己务必谦虚谨慎，凡事“守拙”，不冲第一，甘当老二。林政则“笨”的哲学智慧，可谓深得道家管理思想的精华。

由上可知，“大智若愚”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法宝，也是凝聚人心、团结干部的道德基石。一般说来，明确和果断对于事业的成功，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有些时候，按照“大智若愚”的原则，含糊其辞，不置可否，不明确表态，往往比明确与果断更有价值。当领导批评部下时，含蓄与委婉比直截了当地批评效果更好。因为它容易使犯错者接受，有利于缓和紧张关系，减少不必要的防御心理；在激烈的冲突的僵局中，有意含糊其辞，可能

是一种润滑剂。反之，明确表态，粗暴处理，只能火上加油，可能引起爆炸性对抗。有些矛盾和冲突，马上处理，快刀斩乱麻，未必奏效；相反，稍等一些时间，“冷处理”或者不处理，效果可能更好。高超的管理艺术，就是要在明确与糊涂、果断与拖延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二）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所谓“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是宋太宗对“大智若愚”命题的一种解读。宋太宗经过考察，认为吕端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有意让吕端代替吕蒙正任宰相。有人对太宗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回答：“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毛泽东同志在点评“二十四史”时，对北宋名相吕端的“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管理艺术也十分赞赏。

吕端在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做官，在日常生活和个人名利上，心胸豁达，从不计较，别人伤害他也不放在心上，淡泊钱财，朋友有难，慷慨解囊。宦海沉浮数十年，吕端从不因升官而惊喜，也不为降职而丧气。

但是，在军国大事面前，吕端从不糊涂，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行为果断。吕端任宰相后，依然保持谦逊态度，凡事皆以大局为重。吕端任左谏议大夫，官位本在寇准之上，而他却主动要求把寇准之位摆在自己前面。先于寇准任宰相后，恐寇准心里不平，他请求才华横溢的寇准同他在政事堂轮流值班。保安军抓住了叛将李继迁的母亲，宋太宗和寇准商议拟将她斩首于保安军北门外。吕端知道后，马上找到宋太宗，以刘邦为例，指出凡做大事者都不会介意亲人安危，这只能更加激怒叛将李继迁，于国家十分不利。他主张以李母系住李继迁之心，使其投降。宋太宗依照吕端之计，刀下留情，善待李母，这一妙计果然奏效。

宋太宗逝后，宦官王继恩串通李皇后，密谋另立太子。吕端知道后，立即把王继恩扣押在房子里，马上进宫拜见李皇后。李皇后对吕端说：“皇上已经晏驾，你准备让谁继承皇位？”吕端严肃地回答：“先帝早已立太子，为今天做好准备。现在先帝逝世，尸骨未寒，难道有人要违背先帝之意另有图

谋吗？”在皇位继承上，吕端是非明确，态度果断，毫不让步，并随即带太子登基即位，从而避免了一场权力之争和宫廷政变。

这就是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真实写照。所以，赵普高度评价说：“吕端真是宰相之才啊！”

历史证明，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无论是明君还是贤相，凡能安邦治国者，皆推崇道家的“大智若愚”的治国艺术。玩弄小聪明者，只能陷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生怪圈。所以，“道商”只有遵循“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管理原则，不要小聪明，才能成就大事。有一位成功的管理者说过：“纵观古今中外，凡能做成大事者，都是返璞归真，大智若愚。小智小巧，做不了大事情。”“大智若愚”的管理艺术，是值得每位“道商”深思寻味的大道理、大智慧。

（三）难得糊涂

“难得糊涂”这幅字，是清代“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在 59 岁时写的，也可以视为郑板桥对自己人生境遇和“大智若愚”命题的诠释。这幅字，现在为不少智慧的人挂在自己的书房里，作为座右铭，津津乐道。那么，如何解读这四个字的哲学内涵呢？

1. “难得糊涂”是怎样写出来的？

据说，“难得糊涂”四个字是郑板桥在山东莱州云峰山写的。为了学习书法，他专程到云峰山考察郑文公碑，竟流连忘返。夜幕已降，只得借宿于山间茅屋。茅屋主人是一位儒雅老翁，自称“糊涂老人”。在他的茅屋中，有一块方桌大小的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良，郑板桥十分叹赏。于是，老人请郑板桥题字，以便刻于砚背。郑板桥从老人的言谈举止认定老人来历不凡，便题写了“难得糊涂”四字，并盖上自己的“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方印。因砚台还余有许多空白地方，郑板桥就请老人写一段跋语。老人便提笔写下：“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

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宝贵之门也。”他也盖上了自己一块方印，印上的字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板桥一看大惊，原来老人是一位隐退官员。有感于“糊涂老人”题字的启示，郑板桥见砚背上还有空隙，便也补写了一段话：“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报也。”

另外一种说法是，“难得糊涂”既是郑板桥的“自我解嘲”，也是对世俗社会的一种超越。乾隆十六年九月十九日，郑板桥在潍县衙斋无事，四壁空空，周围寂寂，仿佛方外，心中不觉怅然。他想：一生碌碌，半世萧萧，人生难道就是这样吗？争名夺利，逞强好胜，到头来又是为什么呢？看来，人还是糊涂一些好。无所谓失，也无所谓得；无所谓贵，也无所谓贱。万事都作糊涂观，这样心灵也就平衡宁静了。于是，他便挥毫写下了“难得糊涂”四个大字。因此，“难得糊涂”被后人视为绝顶聪明人吐露的无可奈何语，是面对喧嚣人生、炎凉世态，内心迸出的愤慨之词。

2. 聪明反被聪明误

从古至今，那些绝顶聪明的世俗之人，其结果总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红楼梦》里的“脂粉英雄”王熙凤就是一位典型人物。王熙凤极具管理才能，荣、宁两府的人，在她的刚性管理下，没有一个不怕她，没有一个不被她管得服服帖帖。她八面玲珑，内刚外柔，在微笑背后藏有奸计。为她的美色所惑的贾瑞，被她整得一缕孤魂上了青天；贾琏偷娶的二房尤二姐，被她逼得吞金自尽；脆弱的林黛玉，也被她用“偷梁换柱掉包计”送掉了性命。这位聪明过头的女强人，处处争强，事事争胜，说话尖酸，手段狠毒，树敌过多，仇怨甚多，特别是她得罪了自己的婆婆大太太。所以，在她的靠山贾母去世后，这位聪明绝顶的女人，终于落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的悲惨下场。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她为人处世不懂得道家的“糊涂哲学”真谛，锋芒毕露，争强好胜，处处树敌。她眼睛太亮，容不得一点沙子，对于生活中的小事，做不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因一点小事她就恼羞成怒，惩罚部下，积怨甚深。她牙尖齿利，言语苛刻，发现一点不如意的事，不能一笑了

之，而是穷追猛打，一查到底，批评过严，使下人对她恨之入骨。她好为人师，指手画脚，求全责备，横挑鼻子竖挑眼，总是讨人嫌，招人怨。如果王熙凤精通道家的“糊涂哲学”，具备宽容、忍让的美德，真正做到“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给人方便，与己方便”、“原谅他人，使己快活”，可能就不会导致那样的悲惨下场。

3. “难得糊涂”

一个才华横溢、智慧超群的人，在他人面前，无论在举止、容颜上还是在待人说话上，都切忌锋芒毕露，自我张扬。因为耀眼光彩使周围的人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越锋芒毕露，就越得罪于人。所以，做人应留有余地，深藏不露，不要咄咄逼人，使别人需要自己而又感受不到威胁。

人活在世上，太愚不行，太智也不行。只有“不智不愚”的“糊涂哲学”，才是聪明哲学；精通“糊涂哲学”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明代哲学家吕坤，以他丰富的阅历和对历史人物的观察，在他的《呻吟语》一书中写道：“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今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意思是说，人们对聪明、精明还是非常需要的，但关键是要在浑厚中悄悄地运用。古往今来得祸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些自恃聪明、卖弄聪明的人，喜欢外露的人，心里是绝顶聪明而表面上又深藏不露的人是不会招祸的。吕坤还说：“愚者人之，聪明者不疑之。聪明而愚，其大智也。夫《诗》云‘靡者不愚’，则知不愚非哲也。”意思是说：愚蠢的人，别人会讥笑他；聪明的人，别人会怀疑他；只有聪明而看起来又愚笨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智者。这里所谓“愚”并非是真傻，而是一种自我保护、不惹是非、不招怨恨的做人智慧。

在君臣之间，一定要牢记“功高震主”的古训，方可使自己免招杀身之祸。打江山时，各路英雄汇聚在君主麾下，一个比一个锋芒毕露，以实现君主图霸天下的野心。但是，当天下已定，虎将功臣的聪明才华，就成了皇帝的一大心病。此时，虎将功臣应当做到“光而不耀”，学会低调做人。如果继续锋芒毕露，威胁到君主的皇权，必然导致开国初期屡杀功臣之事。汉代韩信被杀、明太祖火烧庆功楼等，都是有力的历史证明。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刘备临死时，当着群臣的面，哭着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顿时身冒虚汗，手脚无措，跪拜于地，哭着对刘备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说完，叩头流血。诸葛亮深谙“功高震主”的道理，从此，诸葛亮一方面行事谨慎，鞠躬尽瘁，另一方面则常年征战在外，以防他人“挟天子”杀害于己。他锋芒收敛，显示本人老而无用，以免祸及本身。这就是一种聪明的韬晦之计。

传说有一个人向和尚请教为人处世之道，和尚就开了一个药方：热心肠一副，温柔二片，说理三分。“温柔”与“热心肠”好理解，为什么是“说理三分”而不是十分呢？你若有理，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不必说理十分；愚蠢者或死心眼的人，即使多费口舌也无用，还不如让他慢慢领悟；横不讲理者，本不讲理，即使讲十二分理，也无异于对牛弹琴。俗话说：“用意十分，下语三分。”这是为人处世的一大诀窍。占理十分只说三分，是指得理时也要学会让人。含蓄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大学问、大修养。为人处世不必太明白、太认真、大较劲。如此，人生视野就会变得分外宽广，成功之路就会变得坦荡无垠。“说理三分”是一种大智慧、大气度。

“难得糊涂”的聪明哲学，不仅中国人通晓此理，外国人也懂得此道。美国第九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出生于一个农村小镇，小时候是一个文静害羞的孩子。于是，有些人就把他看成傻瓜，经常捉弄他。他们经常把一枚五分硬币和一角硬币扔在他面前，让他任意捡一个，而他总是捡五分硬币而不捡一角硬币，于是大家都嘲笑他。有一位好心的人同情地问他：“你真的不知道五分硬币和一角硬币哪个值钱吗？”答：“当然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威廉慢条斯理地说：“如果我捡了那一角硬币，恐怕他们就再没兴趣扔钱给我了。”

深藏不露的“难得糊涂”，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世之道。在需要“装傻”的时候，要切忌恃才自傲，做到锋芒不露，免遭嫉恨和树敌。在人际交往中，有时装点傻，且“傻”得恰到好处，能够为自己找台阶，还可以假痴不癫，迷惑对手。

孙臧“装疯术”。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臧遭到庞涓暗算后，身陷绝境。他决定以“装疯术”对待庞涓。一天庞涓派人送晚餐给孙臧吃，送饭的人见孙臧正预备拿筷子时，忽然昏厥，不久呕吐起来，接着发怒，张大眼睛，乱叫不止。庞涓听后，亲身来查，只见孙臧痰涎满面，伏在地上大笑不止，过了一会儿，又号啕大哭。庞涓为了查明孙臧狂疯的真假，命令左右将他拖到猪圈中。孙臧披发覆面，倒卧于猪粪污水里。此后，庞涓虽然半信半疑，但对孙臧的看管比以前大大地放松了。孙臧整天狂言乱语，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白天混迹于市井，晚上仍然回到猪圈之中，庞涓终究相信孙臧真的疯了。不久，在“装疯术”的掩护下，孙臧逃出魏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成为齐国三军的统帅。

司马懿智斗曹爽。公元 239 年，魏少帝曹芳时，曹爽专权，完全架空了司马懿的兵权。司马懿虽然不满，但是又无能为力，只好告病居家，不问朝政。而曹爽派心腹李胜去探视司马懿，以查真假。当李胜来到时，司马懿装疯卖傻，躺在床上，有人正在喂他喝粥，米粥洒满了他的前胸。说话时，司马懿故意做出气喘吁吁的样子，耳朵听不见，话也说不清。李胜回去对曹爽说：“司马公不过是尚有余气的尸体而已，形神已离，大人不必再对他有何顾虑了。”曹爽听到他不会久留于人世，在朝中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同时，司马懿在“装疯卖傻”的掩蔽下，则加紧秘密组织力量。公元 249 年正月，魏少帝曹芳拜谒高平陵，曹爽兄弟及其亲信皆随同前往，司马懿乘机发动兵变，废免了曹爽兄弟，并将其全部处死。

袁凯装疯避祸。明朝建立之初，袁凯曾任监察御史。有一次明太祖朱元璋圈录应处决的囚犯，让袁凯送给皇太子审核。皇太子将名单删减了不少，惹得朱元璋很不高兴，就问袁凯：“朕与太子哪个正确？”袁凯一听此话，自觉双方都得罪不起，弄不好就要掉脑袋。他只好巧妙地答道：“陛下对囚犯处以极刑，从法律上说是正确的。而太子宽宥罪犯，说明太子心地仁慈。”朱元璋本来对人猜忌多疑、苛暴寡恩，一听此话，认为他在耍滑头。袁凯由此惹怒了朱元璋。他怕被杀头，便假装疯癫。在一次早朝时，袁凯诡称中风，仆倒在地。朱元璋说疯了是不怕痛的，便叫人拿木钻刺他的皮肤，袁凯咬牙不吭。回家后，他用铁链锁住了自己的脖子，蓬头垢面，满嘴疯话。朱

元璋还是不相信，便派人去探察，袁凯瞪着眼对来人唱“月儿高”的曲子，并趴在篱笆边吃狗屎。朱元璋听了使者的汇报，这才停止清查。实际上，朱元璋又受了袁凯的骗。袁凯知道皇帝不相信他真疯，一定会派人侦查，便预先叫人用炒面拌糖稀捏做狗屎状，散在篱笆下。每当侦查者一到，他便大口大口地吃，这才救了他一条老命。

委曲求全励志志，包羞忍辱是男儿。委曲求全，包羞忍辱，可以培养坚韧的性格，是心术的至高境界，也是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当自己处于困境或劣势的时候，必须学会以退为进的策略，暂时地委屈自己，适时地低头退让，不断地丰富自己，充实自己，以图东山再起，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伟业。在楚、汉之争中，刘邦的“善忍”与项羽的“不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为项羽不懂得包羞忍辱、委曲求全之道，才最终兵败垓下，乌江自刎。

由此可知，“大智若愚”，实际上是一种韬光养晦之术。有时，在政治斗争中，当自己处于极端危险境地而又无力反抗时，为了保全自己，免遭祸害，必须以“大智”设计出一些假象和骗局，掩饰自己的真实欲求、才能和感情，假装糊涂，以假象包裹真情，凡事态度暧昧，不置可否，借以迷惑对手，使之放松警觉，以便使自己在“愚”中静待时机，东山再起。“装疯卖傻”的精义是藏“大智”于“小愚”，而“小愚”则是实现人生“大智”的手段和秘诀。这是一种极为高超的人生艺术。

（四）“大智若愚”是一种高明的处世之道

如何才能做到“大智若愚”呢？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要“深藏不露”。只有八分聪明的人，却要表现出十分，必讨人嫌；只有六分聪明，却要表现出十分的人，那是装明白；有十分聪明，却只表现出六分，那是装糊涂；有六分聪明，表现出六分，那是实诚人；有十分智慧只表现出八分，才是大智若愚。二是要学会“故意装傻”。所谓“故意装傻”，就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明知故问，明明知道他在这一方面不如自

己，也要去向他请教；明知自己懂得很多，却把它藏在心底，表面上装出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对于冒犯自己的人，不争不辩，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就可以减少一些别人的攻击、中伤和报复了。“故意装傻”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只有那智慧超群、善于“装糊涂”的大智者才能做到。

只有善于不露锋芒，聪明才智施展适度，才有可能得到信任重用；如果锋芒太露，不仅易招他人嫉妒陷害，引火烧身，而且也会为自己的失败埋下危机的种子。只有善于收敛锋芒的人，才是大聪明、大智慧的人。

武松醉打蒋门神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人生道理。在电视连续剧《武松》中，武松手握酒杯，仰脖而干，身子东倒西歪，步履虚浮，蒋门神于漫不经心之际，鼻梁突遭一拳，尚未回过神来，又遭一腿，当其终于醒悟这绝非是酒鬼的“歪打正着”之时，其身已受重创而无还手之力了。在武林中，此谓“醉拳”，乃武术中“形醉神不醉”的拳术，委实厉害。“醉拳”之所以厉害，在于一个“装醉”，表面上看来跌跌撞撞，东倒西歪，踉踉跄跄，不堪一击，实际上，醉中却暗藏杀机，就在对手麻痹大意之时，却挨上了“醉鬼”的狠招。

真醉和佯醉、愚者和智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玩“醉拳”的，是“形醉而神不醉”，“醉”是“醉”在“虚”处，是迷惑对手，而拳却击在“实”处，招招致命。智者之愚，是“外愚而内不愚”，愚是“愚”在皮毛小事，无关大局。

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薛宝钗，也是一位善于不露锋芒的“人精”。元春省亲与众人共叙亲情之时，制一灯谜，令宝玉及众裙钗粉黛去猜。黛玉、湘云一千人等一猜就中，而宝钗对这“一见就猜着”的谜语，却“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此谓之“不露锋芒”的“装愚守拙”，颇合贾府当权者“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实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高招。

“故意装傻”被历代智者推崇为一种极高明的处世之道。“故意装傻”并非是真傻，而是做人要大智若愚，切忌恃才自傲，不知宽容待人。锋芒太露易遭嫉恨，更容易到处树敌，招致杀身之祸。在人际交往中，装傻也能够为人遮羞，自找台阶；还可以假痴不癫，迷惑对手。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

不管是从政还是经商，都不可不领悟“大智若愚”的神韵。

所以，智者在人生历程中，要做到“花要半开，酒要半醒”。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醒”，是说凡是鲜花怒放的时候，不是立即被人采摘，就是鲜花衰败的开始。人生也是这样。当你志得意满时，切不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无论有怎样的出众才华，还是收起你的锋芒吧！这样，既能有效地保护自我，又能在更广阔的天地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华。

第十四章

“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

(一) “道法自然”的生态价值

在当代社会中，凡是成功者，不仅要乐善好施，以自己的财富回馈社会，而且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以增进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创造绿色和谐家园，共同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当人类跨进 21 世纪的时候，为了推进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生态环保问题。由于天人关系的失衡而造成的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从根本上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正确地认识与处理天人关系，我们有必要从道家哲学和辩证法中吸取生态智慧，从而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道法自然”这一命题出于《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谓“自然”，并不是指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界。它有三层含义：一是形容“道”和宇宙万物的“本然如此”、“本性如此”、“自然而然”的天赋状况，犹如“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民）莫之令而自均”（《道德经》三十二章）。天“降甘露”并不是他者（人或神）的命令，而是天地和谐运行而自降，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这里，“自然”是一个副词，而不是一个名词。二是指“道”和宇宙万物的“天

性”、“本性”或“真性”。三是指“道”和宇宙万物因其自然本性而具有的存在形式与活动规则。这是“道”和万物的最根本的法则，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要受到这一法则的制约。“道法自然”是老子及其道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

“道法自然”的生态环保思想虽说是朴素的，但是在两千多年前道家能够提出人与自然相协调的伟大思想，甚至能为解决当代生态环境危机提供有益的思想启迪和历史借鉴，不能不令当代人叹服。现代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高度称赞道家的这一生态观念，认为道家的“人要征服宇宙就遭到失败”的认识，是一种“宝贵的直觉”（《展望二十一世纪》）。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卡拉认为在东方传统文化中，“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日本著名学者汤川秀树指出：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态，使人感到惊讶的总是生活在科学文明发展以前某一时代，老子怎么会向近代开始的科学文明提出那么严厉的指控”（《创造力和直觉》）。这些当代著名学者称赞“道法自然”的生态思想，是要在历史的回忆中为人类提供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寻求解决当代科学文明危机的新的思维方法。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能够为现代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新的哲学根据，用以补充和修正西方长期以来流行的“天人对立”的思维模式，引导人类把尊重、爱护自然转化为内心的道德律令，自觉地顺应自然、师法自然、亲近自然，真正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就是“道法自然”生态思想的现代社会价值所在。

（二）“道法自然”的两层含义

老子根据“道法自然”的价值观，提出了他的生态环保思想。从生态环保层面，所谓“道法自然”，主要有两层含义：

第一个层次，是从正面要求“以天合天”。这里所谓“天”，就是“自然”，“以天合天”就是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六十四章）。即人只能辅助、成全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人类改造自然要遵循因性

而行、顺性而动，切不可为了达到某种人类的功利目的而妄为而强为。“梓庆削木为鐻”的故事，即是“以天合天”的最好说明。《庄子·达生》篇曰：“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巧匠梓庆制作钟鼓，钟鼓作成后，人皆惊叹为鬼斧神工。为什么能够达到鬼斧神工的水平呢？因为梓庆制作钟鼓的心态，完全进入了“忘吾”的心斋境界。从一开始，梓庆即以安定心灵为念，不敢耗神劳想，既没有“庆赏爵禄”的欲求，也没有“非誉巧拙”的意图，完全忘却了“小我”的存在，而与天地合为一体，这就是“坐忘”的工夫。由于梓庆始终能够保持自然无为的心态，“以天合天”，顺应树木的自然质地制作钟鼓，遂成浑然一体的艺术作品。

第二个层次，是从反面要求“无以人灭天”，即不能按照人的私欲和主观愿望去随意地改变自然。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本性及其生存方式，不可随意加以改变。人的行为应当合于自然，顺乎性命之情。庄子指出：天地间的生物，“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岐（歧）；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意思是说：足大指与第二指并联，旁生的手指，都是出于自然本性。所以，结合的拇指并不是骈联，分出之指并不是有余，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如果根据人的愿望逆性妄行，合者分离，枝者骈联，长者切断，短者接长，必将事与愿违，造成“骈于拇者，决（决裂）之则泣；枝于手者，斲（音合，咬断）之则啼。二者或有余于数，或不足于数，其于忧一也”。真可谓之“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庄子·骈拇》）。这是一种“残生伤性”、破坏自然多样性的错误行为。

这里，有一个“鲁侯养鸟”的故事。《庄子·至乐》篇记载：“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迎）而觴（音伤，宴饮）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指牛羊豕）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禽，不敢饮一杯，三

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中国古代有一个鲁国，是一个小国家，在今天山东曲阜一带。有一天，在海边发现了一只海鸟，长得非常漂亮，被认为是一种神鸟，鲁侯很喜欢它，就叫人把这只鸟捉住以后，迎进到国君的太庙里去。鲁侯又是怎样喂养这只鸟呢？他采取“以己养养鸟”的方法，即按照国君的生活方式来养这只鸟。每天把这只鸟关在笼子里面，送酒给它饮，供给鸟吃的是太宰之食，也就是国君吃的最高级最丰盛的牛羊豕食品，甚至拿整头猪喂这只鸟。鸟听的音乐是《九韶》之乐，也是鲁侯享受的最高雅的音乐，演奏给这只鸟听。结果海鸟吓得目眩心悲，整天打哆嗦，肉也不敢吃一块，酒也不敢饮一杯，音乐也听不进去，三天就因恐惧而死。鲁侯把国君的生活方式强加给鸟，完全违背了鸟的自然本性，是一种残杀生命的愚蠢行为。如果能够顺其鸟的自然本性，采取“以鸟养养鸟”的方法，把海鸟放归大自然里，使海鸟“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即湖渚），浮之江湖，食之鰋鳅（小鱼），随行列而止（上息），委蛇（油然自得）而处”。《九韶》之乐，人虽爱听，“鸟闻之而飞”；“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人与鸟的本性、好恶、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都是相异的。所以圣贤“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清代郑板桥 52 岁得子，甚为宠爱，但因在山东潍县做官，不得不把儿子托付给弟弟照看。有一天，家人带回一个鸟笼，关了一只小鸟，给郑板桥的儿子玩。这孩子却说：“我图愉悦，囚鸟于笼。何情何理？”说得大家连连称是。正在这时，信使送来了郑板桥的家书，信中恰巧写道：“所云不得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鸟，但养之有道耳。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辗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披衣而起颊面漱口啜茗……目不暇接，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大率平生乐趣，欲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于是，大家一齐植树，创建“鸟国鸟家”。几年后，郑板桥的老家绿树成荫，众鸟云集，成了鸟儿的乐园。他的养鸟之道是什么？不是在笼中养鸟，而是多种树。认为要养好鸟，就要在房屋周围栽上几百棵树，让它们长得茂密，成为“鸟国鸟家”，让它们在密林中自由自在地生活。“欲养鸟莫如多种树”，是郑板桥生态环保、爱鸟护林思想的一句至理名言。

类似“鲁侯养鸟”的蠢事，我们现代人也做过不少。比如说“围湖造田”，我们长江流域形成的五大湖泊，那是经过沧海桑田的变迁自然形成的，每个湖泊多大的面积，那也是自然形成的。但是，我们在上世纪“以粮为纲”的时代，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到处“围湖造田”，结果湖泊面积越来越小，破坏了长江生态环境，酿成了多次的水灾。还有上世纪的“除四害”，当时人们认为麻雀是害鸟，其实害鸟、益鸟，是根据人的利益来区分的，在自然界中，本无所谓“害鸟”，无所谓“益鸟”，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生存的权利。老鼠当然被列在“四害”名单上，到处捉老鼠，其结果怎么样呢？有的地方出问题了，在自然界，蛇跟鼠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自然存在的食物链，老鼠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把老鼠打死了，结果是鼠少了，蛇多了，失去了自然平衡。于是，蛇到处泛滥，甚至爬到屋里面咬小孩，对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这就是“以人灭天”的严重后果。

“围湖造田”、“除四害”告诫我们，人类再也不能按照自己的私利随意地改变自然，任意地宰割自然。任意宰割了自然，大自然虽不会说话，但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是无情的。谁“以人灭天”，谁就会受到自然的无情惩罚。

第十五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与崇尚简单生活

“治人事天莫若嗇”这一命题是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九章提出的。所谓“嗇”，即是简朴、节约、珍惜之意。老子认为，只有以“嗇”这一理念去修身治人和敬畏自然，才是“长生久视之道”，从而达到天人和谐的人生境界。

（一）“治人事天莫若嗇”是一种生态环保思想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和片面强调高消费的生活理念，人与自然出现了严重对立，生态环境也出现了严重危机。西方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发展=经济增长”的线性发展模式。这种线性发展模式以国民生产总值 GDP 为唯一指标，完全忽视了资源、环境和社会进步的和谐发展，既不注意自然资源的消耗，又不计算废物排放量及污染程度。他们错误地认为自然资源是无穷的，可以任人自取；认为地球是无限大的，可以任人摆放废物。他们错误地提倡盲目的高消费，造成了资源匮乏、生态失衡、土地沙化、全球升温、人口爆炸。

如何解决人与自然这一严重对立呢？这是一个系统综合工程。道家从“天与人不相胜”的角度出发，认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

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四十六章）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一书中也认为，天人对立是由“嗜欲多，礼义废”所造成的。各种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总是有极限值，而人的欲望则是无限的。人的无限欲望一旦超过它的临界值，经济发展必然停滞或倒退。所以，老子指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四十四章）意思是说，人过分地珍爱声名，必然要付出巨大的耗费；过多地收藏财货，必定招致厚重的损失。所以，人要知足，知足便不会因过分地珍爱声名而导致“大费”、而受辱；人也要知止，知止便不会因过分地多藏财货而导致“厚亡”、而危困。这样，就可以保持自己的长久发展。由此，道家提出了“治人事天莫若啬”（《道德经》五十九章）的命题，主张“圣人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二十九章）。老子认为不管是代君治民还是辅助自然，没有比节约、节俭、知足、知止精神更重要的了，他极力主张去掉穷奢、过分的私欲膨胀，因为私欲过于膨胀就会向反面转化，造成生存危机和生态环境破坏，由好事变成了坏事。

仅有几十万人口的不丹，虽是一个小国，但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幸福和快乐作为治国的根本理念。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政府每一个重要决策，都要在详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人民的幸福和快乐作为取舍的标准。不丹在教育、医疗上实行全民免费，在自然环境保护上也极为出色。旅游虽是国家的重要收入，但他们从不把 GDP 视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每年旅游人数控制在 5 000 人左右，游客签证亦由国王亲自审批。他们认为人民的幸福快乐指数比 GDP 更重要、更有价值。

“治人事天莫若啬”这一理念，是建立在道家的“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道家认为“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庄子·刻意》）。“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庄子·天道》）把“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自然人性视为“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是“合乎天德”的。因此，要求道德之至的帝王圣人应“返朴归真”，使自己处于至朴无邪的童真状态。只有通过“无知无欲”的道德修养，将自己塑造成“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德经》五十五章）的理想人格，才能最终进入人与自然毫无逆忤的至善境界，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

协调、持续发展的理想境界。

根据“治人事天莫若啬”的生态环保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应大力提倡与宣传“崇尚简单生活”的理念。印度圣雄甘地讲过一句名言：“简单是宇宙的精髓。”那么，什么是“崇尚简单生活”的理念呢？就是道家所提倡的“守简”、“守易”，即倡导去除穷奢极欲的奢华生活，过一种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居、适情而行的简易生活。因为在道家看来，过度地占有、享受物质财富，整天逐物于外，为物所役，导致与自身内在的精神生命日益疏离，只能使人陷入无穷的烦恼、焦虑和痛苦之中，以及由于名利得失而导致的无尽的情绪波动，引起多种心理疾病。

“崇尚简单生活”是一种新的环保理念。在现代社会中，有些丧尽天良的人，为了满足无穷的“私欲”，贪得无厌地占有金钱和财富，只知大量地砍伐森林，毁坏农田，开矿设厂，污染江河、湖泊和农田（如紫金矿业污染、墨西哥湾石油污染、康菲渤海石油污染等），只知在商品中加入损害人体健康的有害物质和毒素（如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等），只知大量杀害各种动物（如捕杀海洋中的鲸鱼，非洲大陆捕杀老虎、黑猩猩，中国捕杀穿山甲、藏羚羊等），只知野蛮地开采地下矿物（如山西小煤矿的乱开掘）等等，将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废物排放在大气中和地球上，形成了大量的工业垃圾。过度的商品豪华包装，过度的奢侈生活方式，造成了极大的物质浪费，出现了难以计数的生活垃圾。所以，只有崇尚简单生活，转变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控制大量垃圾的形成。这也是生态环保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崇尚简单生活”是一种幸福快乐的美德

“崇尚简单生活”是人的一种美德。宋代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中指出：“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

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这就是“成由俭，败由侈”的道理。

司马光一生清廉俭朴，不喜华靡，把节俭当作重要的核心价值和立身处世之道，自觉地摒弃奢侈浮华生活。在考中进士的御赐喜宴上，只有他一个人不戴红花。这件事，被司马光晚年写进家训，教育儿子司马康注意节俭。宋仁宗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诏，要赏赐司马光等大臣一批金银财宝，司马光领銜上书，陈述国家穷困，不愿受赏。几次上书，未获批准，于是他将赏赐自己的一份交给谏院，充作公费。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都主张借钱好好操办一下，但司马光不同意，并教育儿子立身处世应以节俭为本，不要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操办了一个俭朴的丧事。这就是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十分注意家庭教育。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教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经常教育儿子“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他援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由于他的言传身教，司马康从小就能俭朴自律，虽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如同其父一样，以博古通今、廉洁俭朴而著称。

晚清状元张謇一生皆以“啬”为修身做事的信念。张謇号“啬庵”，生前自喻为“啬翁”，其墓地亦被后人尊称为“啬园”。他曾出任民国政府实业总长、农商总长等要职。他从 1895 年开始在家乡南通兴办实业、教育、慈善事业，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获得了当时中外瞩目的成就。他对“啬”字格外地关注，从张謇的一生中也可以找到多处佐证。1907 年张謇在《师范学校开学演说》中说：“俭何以是美德？俭之反对曰奢。奢则用不节，用不节则必多求于人，多求于人则不愿，至于人不愿则信用失而已亦病，妨人而亦妨己，故俭为美德。苟能俭则无多求于世界，并无求于国家，即使适然为官，亦可我行我意，无所贪恋，而高尚之风成矣。”张謇不仅把节俭作

为美德来推崇，还把节俭列入他所创办的学校的校训。他对自己、对家人的要求，身体力行，一直细微到饮食、起居、服饰等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他在《家书》中嘱咐夫人：“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每日一脔一素已为不薄……衣服不必多，做裁缝即可省”，做到“能少奢一分好一分”。他在信中要求其子“除书籍外勿浪费”，还让儿子由海门返回南通的路上，自带点心，到茶馆买开水就食。要求儿子转告其母亲晚上早些就寝，因为这样可节省灯火。

“崇尚简单生活”是幸福快乐的最高人生境界。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当代社会中，相当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物欲所役，将金钱视为人生的唯一目标，把自己变成了没有灵魂、只有躯壳的金钱奴隶。他们为了贪得无厌地占有一切自己需要和不需要的物质财富，整日行色匆匆。没有亲情，没有友情，没有仁爱，没有健康，没有安详的面容，也没有淡定的悠闲，快乐的生活早就被贪欲抛到九霄云外了。

现实生活一再说明，简单的物质生活，丰厚的精神生活，才是获得人生真正幸福与快乐的源泉。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历史学教授阿夫纳·奥费尔在其《富裕的挑战》一书中指出：“我们的敌人不是失业、贫困、恐怖主义或禽流感，而是伴随我们的成功而来的财富。社会的富裕正在破坏它带来的幸福，成功带来富裕的生活，富裕生活又孕育了无止境的期望。”他根据大量案例指出：“我们匆匆摘下成功的果实，但却忘记品尝它们的味道，最终我们失去了享受简单生活的能力，陷入不断追求成功的漩涡，陷入急躁和忧虑的漩涡。”由此他得出结论：选择简单生活是现代人“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向快乐的道路”。只有选择简单生活，才有助于现代人摆脱身外之物对心灵的桎梏，节制过度的富、贵、显、名等世俗欲望与喜、怒、哀、乐、爱、恶等情绪对心灵的损害，克服挫折、失意、痛苦、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减轻精神压力，获得“致虚守静”的心态。整天争名逐利，花天酒地，不可能达到超然物外的“致虚守静”的人生境界。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尔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一个旅行者在意大利偏僻的小渔村，看到一位青年渔夫在船上晒太阳打瞌睡。旅行者对他说：“你这么年轻，不应该躺在这里，应该出海打鱼。”渔夫问：“然后呢？”“卖钱。”渔夫又问：“然后呢？”“买一条大渔船，

然后再打鱼，再买一条更大的渔船。”渔夫继续问：“然后呢？”“然后……可以在船上晒太阳打瞌睡。”渔夫笑着对他说：“我现在不就在晒太阳打瞌睡了吗？”生命越单纯、生活越简单，人生也就越幸福越快乐。

（三）“崇尚简单生活”是一种绿色生活

“崇尚简单生活”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绿色生活。它贯穿于人类的衣、食、住、行之中：

（1）“绿色食品”。随着工业文明和化学技术的发展，在食品行业中，为了充分满足人对“美色”和“美味”的需求，出现了大量的色香味俱全的“人造食品”以及各种精加工食物。这些人造食品和精加工食物，虽然能够满足某些人的需求，但是它也给人类健康带来了严重危害。所以，人类要求向大自然回归，极力追求“绿色食品”，即追求未受污染的新鲜的农副产品或只经过粗加工而未添加任何化学成分的食品。

（2）“绿色服装”。在现代市场社会中，人工合成纤维以及由它而制成的各种服装，往往会放射出许多化学有毒物质，诱发人类各种疾病。所以，人们对化纤衣料失去兴趣，极力追求以棉花、蚕丝等农畜产品为原料的“绿色服装”，已成为时尚。

（3）“绿色装修”。目前家庭装修污染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室内环境污染，主要是因为人造板、油漆、黏合剂、墙纸、地毯等装饰材料释放出的甲醛、苯等有毒气体超标所致。此外，还有各种家用电器的电磁波。这些污染物和辐射线，会造成人体免疫功能异常、肝损伤及神经中枢受影响；对眼、鼻、喉、上呼吸道和皮肤造成伤害；引起慢性健康伤害，减少人的寿命，严重的可引起癌症、胎儿畸形、妇女不孕症等；对小孩的正常生长发育影响很大，可导致白血病、记忆力下降、生长迟缓等。家庭装修污染已经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安全的“隐形杀手”。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不含甲醛和苯的健康植物胶已得到国家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验认证，并投入生产，将慢慢取代含甲醛和苯的化学

胶。目前国家已经制定了10种《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强制性标准,消费者进行装饰装修时一定要按照国家标准选择无污染或者少污染的绿色产品。

(4)“绿色交通”。所谓绿色交通,从狭义上是指为节省建设维护费用而建立起来的低污染、有利于城市环境多元化的协和交通运输系统。从广义上是指采用低污染、适合都市环境的运输工具,以完成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交通概念。从交通方式来看,绿色交通体系包括步行交通、自行车交通、常规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从交通工具上看,绿色交通工具包括各种低污染车辆,如双能源汽车、天然气汽车、电动汽车、氢气动力车、太阳能汽车等。绿色交通还包括各种电气化交通工具,如无轨电车、有轨电车、轻轨、地铁等。

绿色交通是一个全新的交通理念。这种新理念是由三个重要元素所构成:一是通达有序;二是安全舒适;三是低能耗,低污染。

从“人造食品”向“绿色食品”、从“化纤服装”向“绿色服装”、从“污染装修”向“绿色装修”、从“传统交通”向“绿色交通”的过渡,充分地反映了21世纪人类在老子的“道法自然”观念启迪下,在生活方式上向大自然回归的一种表现。现代人类经过对工业文明反省后正在向“生态文明”新的生活方式过渡,即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食品、绿色服装、绿色装修、绿色交通、绿色奥运、绿色世博等,努力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肩负的重要的社会责任。

最后,我想着重阐述人类期盼的绿色生态建筑。在现代建筑上,人类根据道家的“崇尚自然”和“治人事天莫若啬”的哲学智慧,正在由“科技建筑”向“生态建筑”过渡。现代科技的发展给人类的物质生活虽带来了好处,但是科技建筑也滋生了建筑物综合征。尤其是在城市,无论是家庭住宅还是医院、餐厅、办公室、歌舞厅、厂房、教室和摩天大楼等建筑物,都可能导致人们患上建筑物综合征。美国科学家初步估计,美国约有2%的建筑物内含有石棉和氡,10%的建筑物带有病毒、细菌等微生物感染,这些建筑物本身就是人类疾病的重要诱发源,是“隐形杀手”。氡是石头和土壤中的铀在衰变过程中释放出来的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它可以导致肺癌。美国大

约有 800 万人的住房处于氡气污染的环境中，每年大约有 2 万人死于由氡气引起的肺癌。发生在 1976 年美国费城饭店的“军团病”，死亡 27 人，其病源即是弥漫于会议室内的一种传染性病菌。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发达国家大约 30% 的现代建筑可能使人患上建筑物综合征。

室内除了人所共知的吸烟污染外，还有富丽堂皇的墙纸、墙布、各种人造瓷砖和化纤地毯等的污染。这些化学物质会产生有毒物质或难闻的气味，使人们处于化学物的毒害之中。在室内安装空调器固然可以使人们在炎热的夏天享受到清凉的感觉，但是使用空调设备要使建筑物处于密封状态，遂造成自然空气不足和污浊空气的渗入、循环，以及室内负离子的缺乏，导致病原微生物的滋生。人在这种环境中呆久了，会有头昏、头痛、嗜睡、眼花耳鸣、咽喉疼痛、皮肤发痒、食欲不振等感觉，形成所谓“空调病”。如果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内再加上复印机、清洁剂、书写剂、各种印刷品、陈旧图书报刊等，更会增加室内空气污染，形成所谓“办公室病”。各种家用电器使用时产生出的电磁波辐射污染，也会致人头晕、乏力、恶心、嗜睡、记忆力衰退，甚至会使扁状体蛋白质凝固形成“微波白内障”。室内过多使用电热毯还是妇女生育畸形儿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电力技师死于脑肿瘤。

今天，人类面对高楼大厦和豪华的室内设备所带来的建筑物综合征，在回味老子的“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古训过程中，提出了“生态建筑”理论，即把建筑作为“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加以改造和建设，创造出完美的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生态建筑工程。比如，以往的中国居民多喜欢朝南、朝东的房间，这种单一进向格式，已成为现代新建小区合理发展的障碍之一。从生态学角度，在一套住房内，多朝向可以形成自然温差，促进空气流动，对人体有益无害。实践证明，中国式的四合院、欧洲的别墅小楼，都是多朝向的生态建筑的范例。英国伦敦大约 100 公里处的伯格霍尔特村的老厅别墅，现居住着 60 多名公社社员，过着如痴如醉的桃花源式的田园生活。现代英国人厌倦城市里乏味的生活，要求回归自然，向往田园环境，他们将在英国诺丁汉郡霍克顿周围修建一个真正自给自足的生态定居点。这个生态定居点建在绿化地带的农田里。居点的人不再使用产生二氧化碳的矿物燃料，他们保

护野生动植物，种植矮林，栽培树木，喂养山羊、鸡、鸭、鹅、猪，修建水池、湖泊和芦苇塘，还要管理一片土地，进行小规模的自然食品生产。在设计房子时将考虑冬季能够让阳光进入房内，夏季则可以避免房内受到强光照射。定居点的能源主要来自风力涡轮机、太阳电池板、阳光以及居住点的居民——每人每天可以用体温发电 300 瓦。

工业区也需要生态工程。上海市宝钢集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宝钢集团建成了一个既讲生态美化、净化，又讲企业经济效益的生态园林企业。目前，单是护厂河以内的厂房区，就栽种了 500 多种名贵植物，其绿化总面积为 449.9 万平方米，绿化率达 32.74%，已高于中国旅游城市绿化率的国家标准。近年来，宝钢还从上海植物园引栽了 119 种植物，并将其中的法国冬青、凤尾兰等 40 余种“抗逆植物”直接植于厂内粉尘或化学污染较集中的区域，有效地抑制了厂区的环境污染。

第十六章

道家哲学智慧与科学技术发展（上）

随着当代文明危机的暴露和科学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向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道家文化寻求新的哲学智慧和思维模式，以推动当代科学的向前发展。

（一）“道”的智慧与当代物理学发展

科学史证明，任何时代的物理学的发展，都是与当时的哲学思维模式直接相关的。当代物理学的大厦，不只是建立在西方古代原子论和近代笛卡尔、牛顿力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同时，它也是建立在东方文化特别中国道家哲学的思维模式之上。

西方近代物理学是建立在古希腊的原子论基础之上。原子论属于构成论的思维模式，它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变化都是由不变的原子的结合与分离造成的。根据这种思维模式，西方近代物理学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人类的物质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这种构成论的思维模式，在当代物理学的进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它难以解释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新现象，导致物理学的危机，使当代物理学家不得不从东方文化特别是道家哲学宝库中选择新的思想武器，为推进当代科学发展服务。

在道家的宇宙生成论中,“道”是一个最基本的哲学范畴。老、庄的道论不同于西方的原子论,实际上是一种宇宙生成论模式,认为“道”是“万物之宗”(《道德经》四章),宇宙间的一切都是由混沌之“道”生成,主张一切变化都是“产生”和“消灭”,或者是一种存在形式向另一种存在形式的转化。在老子看来,“道”是“有”与“无”的统一。“道”产生宇宙万物,实际上是一个从“无”到“有”、从隐到显的过程,是由形而上之“道”向形而下之“物”的转化过程。这就是所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十四章)。所谓“道”之“无”,并不是牛顿力学所谓“绝对真空”,而是指“道”的质朴性。老子常以“无名朴”来形容“道”的原始无名的质朴状态,即认为“道”是浑然一体的无名之“朴”。用老子的话说,就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道德经》十四章)。它是一种“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超验的混沌之物。但是,“道”并不是绝对之“无”,而是一种实有。所谓“道”之“有”,是指“道”的潜在实有性。在老子看来,“道”虽是超验的混沌之物,但它只是一种尚未显现的潜在之物。老子常以“道隐无名”来形容“道”的潜在实有本质。用老子的话说,就是“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经》二十一章)。这就是说,“道”虽是一恍惚之物,但其中“有象”、“有物”、“有精”、“有信”,是一种“无”中之“有”。正因为“道”蕴含有产生万物的潜能,所以,它能够化生出形形色色的宇宙万物。

当代科学实验证明:这种生成论的思维模式优于西方原子论,便于发现当代物理学中出现的新问题,更便于解释当代物理学中出现的新问题,有利于推动当代物理学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一幅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趋势相吻合的宇宙生成模式。正如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1901—1976)在《普朗克的发现和原子论的基本哲学问题》一文中所说:“卢瑟福的实验和玻尔的理论指出:化学家所谓的原子,是由一个核和一个壳组成的。30年代的核物理学告诉我们,应该把原核看作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一种结构。这样,我们终于认识到三种最重要的基本粒子,即质子、中子和电子,是一切物质的最终组

成部分。可是后来的实验指出，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基本粒子。这些基本粒子和前面提到的那些基本粒子的差别，首先在于它们只能生存很短的时间；因为它们会很快发生放射性衰变，也就是说，转变成另一种粒子。这样，介子、超子被发现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约有三十种各种不同的基本粒子，其中大多数只有很短的寿命。”这段话说明，海森伯不但认识到基本粒子的转化问题，而且也认识到基本粒子在互相碰撞中所产生的分裂，“实际上不是基本粒子的分裂，而是从相互碰撞的粒子的功能中所产生的新基本粒子”。基本粒子物理学所揭示的这些新的物理现象，依据西方古代的原子构成论是难以解释的，但是依据中国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许多物理学家便开始怀疑与抛弃西方原子构成论这个僵化的思维模式，而转向中国古代道家的宇宙生成论模式，并试图以此来摆脱当代物理学面临的困境。

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由于他在现代物理学研究中提出了核力的介子理论，于1949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从中学时代起就酷爱道家哲学，对老子的宿命论观点颇感兴趣，特别在他中年以后的科学研究中，总是自觉地从道家哲学中获得思想启示，开展自己的物理学研究。他说：“自从我进入中年时期以来，老、庄思想已经毫不含糊地又在我的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从公开承认他的“空域念”即“一个对应于最小时空量子的极限”，是受到唐代道家信奉者李白的“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思想的启示而提出来的。指出：“我们就可以把四维时空连续域比喻为一种可以容纳天地万物的逆旅。这种观念也许保留了老、庄哲学的某种精神。”他曾在基本粒子的研究中，突然想起了《庄子·应帝王》篇中的“中央帝混沌”的故事。这则故事是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息食。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为什么他会突然想到这一则寓言故事呢？他在1961年写的一篇叫《庄子》的短文中指出：“我研究基本粒子已有多数，而且，至今已发现了三十多种的不同基本粒子，每种基本粒子都带来某种谜一样的问题。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深入

一步考虑在这些粒子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想达到最基本的特质形式，但是如果证明物质竟有三十多种的不同形式，那就是很尴尬的；更加可能的是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可能是有着分化为一切实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还未分化的某种东西。用所习用的话来说，这种东西也许就是一种‘混沌’。正是当我按这样的思路考虑问题时，我想到了庄子的寓言。”（《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庄子所谓“混沌”，实际上就是老子所谓“道”的形象说明。这就是说，当汤川秀树试图探索三十多种基本粒子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即进一步探求基本粒子的终极本原时，他想到了老、庄的混沌之“道”。因为如前所述，只有这种质朴性与潜在性相统一的“道”，才能合理地说明这一当代物理学的重要问题。汤川秀树正是从老、庄的道论吸取哲学智慧而思考着现代物理学的新课题，寻求新答案。他指出，老、庄的混沌之说“提示了我们在基本粒子方面遇到的那种形势。我不希望过分夸张这种观点。但是，看来现代物理学似乎在许多方面带来了古代哲学的回声。事实上，我们有时确实发现，古代世界的某一个学者思想中的一次灵感闪光，会在很晚以后的一个发现上渲染一种惊人的光辉”。从汤川秀树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道家哲学的智慧之光。

当代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在他从事理论粒子物理学研究的同时，也对东方的印度教、佛教和中国的道教作了深入研究，系统地探讨了它们与现代物理学之间的关系。他撰写的《物理学之道》（1975）、《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1982）、《非凡的智慧——同不平常的人的谈话》（1988）等著作，就是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重要成果。在《物理学之道》一书中，他着重论证了东方古代哲学的科学精神同现代物理学的变革趋势的一致性，证明了道家所谓“道”的观念与现代物理学所谓“场”的概念的相似性。在他看来，老、庄所谓“道”就是现代物理学中所说的量子场。他在该书《再版前言》中指出：“对于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与东方神秘主义世界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和谐性的认识，看来只是一场更大的文化变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转折点》一书中，他把当代科学文明的危机归罪于西方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认为仿效笛卡尔—牛顿的思维模式，才

导致了现今世界的各种困境和灾难。并且进一步说明了新的科学世界观与中国古代道家的“道”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在《非凡的智慧》一书中，他对老、庄的“道”的概念评价甚高，指出：“在伟大的精神传统中，在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老、庄的“道”观念是一个“非凡的智慧”，指出道家为克服当代物理学的危机和开拓新的研究途径上提供了新科学世界观。卡普拉的观点，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物理学的变革趋势。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对当代物理学的发展是极重要的。

美国当代物理学家惠勒教授提出的“质朴性原理”，认为物理学家是从几乎一无所有达到几乎所有一切。在他看来，“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物理学已经从很少几条原理导出了如此多的结论，要从几乎一无所有中导出每一件事情。物理学曾是科学中最质朴者，它应当更加质朴”，他试图从一条代数拓扑原理，建立他的“没有定律的定律”的质朴性物理学体系。他决心从一无所有中导出整个物理学。“因为几乎整个物理学大厦是建筑在一无所有之上”，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惠勒的“质朴性原理”与老、庄“道”的观念有着惊人的一致。惠勒教授从宇宙创生论承认宇宙的开端，并且推论出物理学定律也应是从“无”到“有”的创生过程。这与老子所谓“道”的质朴性是不谋而合的。在物理学上，“质朴性原理”充分体现了老子的“道”的质朴性。惠勒教授提出的“质朴性原理”虽说不是直接从道家思想中得到启迪，但是他依据现代物理学的成果所作出的结论，却是与道家的“道”的观念相吻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惠勒教授 1981 年来中国讲学的一则故事中得到说明。1981 年，惠勒教授应邀来中国讲授他的“质朴性原理”。在讲学期间，他观看了一场名叫《凤鸣岐山》的舞剧。在剧中，姜子牙手持“无”字旗指挥一切。当他从主人那里得知“无”的真正含义后，非常高兴，因为他认为他的“质朴性原理”可以在中国古代道家哲学中找到它的理论先驱。姜子牙所持“无”字的含义，实际上也就是道家本体论意义上所谓“无”的含义。

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中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把“道”分成“常道”与“非常道”两种，可道可名的不是“常道”。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在他多年从事的物理学研究中，发现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与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也有相合之处。在“测不准原理”中，如同场论和质朴性原理一样，一再体现了“道”的智慧与力量。汤川秀树认为，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论、相对论以及宇宙学等新科学，都不是老子说的“常道”。他依据《道德经》第一章的科学思想，指出：“也许我之热爱这段译文，是因为我是一个物理学家。在伽利略（1564—1642）、牛顿（1643—1727）于17世纪发现物理学的新“道”以前，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就是公认的概念。当牛顿力学建立起来并被认为是正确的‘道’时，牛顿力学就又成为唯一得到的公认的概念了。20世纪现代物理学从超越‘常道’并发现新‘道’开始。今天这种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形式下的新‘道’已经变成‘常道’了。甚至像第四维和几率幅这样奇特的概念，现在也几乎变成惯常的了。找出另一种非惯常的‘道’和另一些非惯常的概念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照此理解，那么，老子在二千三百年前所说的这些话就会获得一种非凡的新意。”老子的“道”的科学精神，对于开拓现代物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现代物理学中，英国科学家霍金的“宇宙创生于无”的理论，最能体现老子的“道”的科学精神。世界万物是从哪里来的？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宗”。“道”又是如何产生万物的呢？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四十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这在老子时代虽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猜想，但是今天现代宇宙学的科学成果，为老子的这一天才猜想提供了科学论据。霍金提出的“宇宙创生于无”的理论，与中国古代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最为接近。霍金为了使自己不陷入阿奎那和牛顿的第一定律的科学说教，就必须依据他的“宇宙自足”理论来说明宇宙的初始条件由宇宙自身决定。他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宇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宇宙的开端。所谓“没有任何东西”，亦即是“无”的意思。这种“无”只是宇宙初始点的“奇异状态”，具有实在的物理性质，只有这种“无”才能够创生出宇宙。老子为了破除上帝创生的宇宙说，而把“道”抬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承认“天下万物生于

有，有生于无”。霍金也是为了扫除西方神学在宇宙论中的地盘，而把“无”作为宇宙的开端，并赋予“无”以物理学意义。这同老子的宇宙模式论是极相似的。这说明现代宇宙学不一定总是沿着 17 世纪笛卡尔、牛顿力学的方向前进，恰好是按照道家的思维方式前进。

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看，东西方文化具有某种契合性，证明道家文化正在现代物理学中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它不仅对于现代物理学摆脱西方原子构成论模式所造成的困境，而且对现代物理学的重大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开拓当代物理学研究的新领域，都是极为重要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道家文化必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二）“崇尚自然”与“有机建筑”理论

有机建筑学派是当代世界重要的建筑流派之一。美国建筑大师赖特（1869—1959）是有机建筑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赖特先生对中国古代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极为推崇，他经常用《道德经》的话来阐述他的建筑理论。有一次，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访美期间去拜访他。两人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到美国来的目的是什么？”梁思成回答说：“是来学习建筑理论的。”赖特先生听后把手一挥说：“回去。最好的建筑理论在中国。”紧接着，他就背诵了《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全部内容。他还把《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作为校训，写在自己创办的学园的墙壁上。这一切说明，老子思想在他的心目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赖特先生所以如此推崇道家哲学，不只是因为道家“崇尚自然”的观念与他的“有机建筑”理论非常吻合，同时也是因为道家的“崇尚自然”的观念与当代人类要求“回归自然”的强烈愿望是相一致的。

“自然”是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之一。所谓“自然”，是指“道”体以及由“道”而派生的天地万物都“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而“非人为而如是”的一种本然状态。所以，道家要求人们“以辅万物之自然”，即要求人们尊重自然、亲近自然、顺从自然，人工的东西要与自然的

东西相协调，切不可人为的力量破坏自然界整体的和谐性，破坏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崇尚自然”是中国道家学说的基本观念之一。

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有着不同的情趣和模式。一般说来，西方建筑由于受到人与自然对立思想的影响，较为重视建筑物实体本身，强调人工雕饰。如西方园林建筑，总是喜欢把花草树木修剪得整整齐齐，按照人的愿望和需要将它修剪成各种图案；经人力改造过的自然物即人造建筑环境多过“天之自成”的环境，人工雕饰之匠心随处可见。而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由于受到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在创造人造环境的同时，更为强调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注重建构“山色湖光共一楼”的意境，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之目的。所以，中国古代著名的寺院、道观多半都建在林木葱郁的山峦峰谷之中。满山青翠之中透出一簇簇的红砖青瓦，把人工建筑与大自然的景色融为一体，宛如一幅“天然图画”。皇家陵园多依山傍水，因山就势，借助于大自然的秀丽景色，为陵园建筑增添了无限的艺术魅力。中国的园林建筑（如北京的颐和园）在“崇尚自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多融于自然环境之中，山巅之处建“阁”，峰回路转之处设“亭”，临水之处造“榭”，通幽之处建“馆”，使各种建筑形式与自然环境有机地统一起来。园林中的各种花草树木亦顺其自然，很少进行人工修饰。中国各种传统建筑，虽是人工建造，但它又似“天之自成”，具有浓郁的自然情趣。

20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与自然的对立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城市人类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人们向往大自然、重返大自然的要求，日益成为现代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许多建筑学家面对现实的挑战，在回味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韵味的同时，要求冲破城市火柴盒子式建筑的局限，重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强调建筑必须与自然相结合。赖特先生所提倡的有机建筑理论，实际上就是“自然的建筑”，使“建筑成为环境的一个优美部分，它给环境增加光彩，而不是损害它”。

赖特一生所从事的建筑实践，都是以他所提倡的“有机建筑”理论为指导的。当赖特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事建筑研究与实践的时候，正是美国科

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到处都是现代摩天大楼。所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郊外别墅与草原住宅的设计上。这些别墅与住宅，多坐落在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在布局上与大自然相结合，使建筑物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如他在威斯康星州建造的半工半读的学园——“塔里埃森”，就是隐蔽于绿树丛中的一座宁静的庭院，完全融合在大自然之中。他在亚利桑那州建造的“西塔里埃森”，是用当地的石头和水泥筑成厚重的矮墙和墩子，上面使用没有油漆的木料和白色帆布板遮盖着。有的地方像石头堆砌的地堡，有的地方像临时搭设的帐篷。在房子内部，有些角落如洞天福地，有些地方则开阔明亮与沙漠荒野连通一气，颇有山村野味的气息。1936 年，他为美国匹兹堡市百货公司老板考夫曼设计的“流水别墅”，更是一件建筑与自然相结合的成功之作。在匹兹堡郊区，有一条熊跑溪，溪水从天然的垒石上跌落石下，形成了一条宛如银带的瀑布。赖特就把考夫曼的别墅建筑在这个瀑布的上方，使别墅立于流水之上，建筑物与周围的地形、林木、山石、流水有机地融为一体，相互辉映，别有情趣。他曾在 1932 年提出过一个“广亩城市”的构想，即构想建成带有田园风光的城市。这是重建与改造现代城市的一个独特构想和大胆尝试。可以断言，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和环境科学的逐步建立，道家哲学特别是它“崇尚自然”的理论，必将对现代建筑提供哲学智慧和思想启迪，它将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第十七章

道家哲学智慧与科学技术发展（下）

（一）“道法自然”与“自然农法”

《道德经》经过不同的文化交流渠道，早已传到日本，并且对日本国民和学者都发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日本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从小就酷爱《道德经》。他 1913 年 2 月出生于日本爱媛县伊予市大平，1933 年毕业于岐阜高等农林学校农学科。毕业后曾在冈上县立农事试验场、横滨海关植物检验科、高知县立农事试验场等地工作。在这期间，他面对着近代“科学农法”的失误和弊端，依据老子的“自然无为”哲学研究了自然的本质，在否定“科学农法”的同时，也初步提出了“自然农法”的设想。从 1947 年归农后，他一直致力于“自然农法”的理论研究和实验，著有《自然农法》、《一根稻草的革命》等书。

近代的“科学农法”固然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和进步，但是也给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所谓的“科学农法”，主要内容是多施化肥、多用农药、勤于机械作业等。多施化肥固然可以增产，但是也会造成土地结构和自然力的破坏，其最终结果不是增产而是减产，这较之利用既便宜又安全的自然化肥（如绿肥、家畜类肥料等）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在田地里多次撒放农药，固然可以消灭病虫害，但是也杀死了许多益虫，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是惊人的。比如在日本水稻田里撒放农药，在杀死病虫害的同时，使大量蜘蛛、萤火虫突然消失，也杀死了许多害虫的天敌——小蜂虻、蜻蜓幼虫、蝌蚪和泥鳅等。给野外苹果和温室草莓喷撒剧毒农药，固然杀死了许多病虫害，但是也把传播花粉的蜜蜂全部消灭了。取代蜜蜂的是人类自己采集花粉，进行人工授粉，其苦无穷，这是一种多么徒劳而无益的行动啊！

使用农机具翻耕土地，固然可以松土透气，达到增产的目的，但是它也会使土壤恶化，破坏土壤团粒结构，危害农作物生长，最终导致减产的恶果。

近代“科学农法”正在依靠科学的力量发展温室农业和大型建筑农业，以人工控制的办法，生产蔬菜和稻米；还在仿照动植物细胞中的蛋白质构成制造人造肉；用石油制造奶油和干酪。实践证明，食用这些劣质的人造食品，往往会使人发育不良，体弱多病，甚至造成死亡，对人的身心健康极为不利。

近代“科学农法”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福冈正信根据老子的“周行而不殆”的循环论思想，认为地球是一个动物、植物、微生物共同构成的统一体，它们之间既有食物链关系，也有物质循环关系，处于反复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一旦人类随意地插手于自然，就会对自然的统一体造成严重破坏。比如，人们为了栽种大量价值较高的松树和杉树，往往砍伐山林杂木。但是，随着山林杂木的砍伐，鸟类的饵料也随之减少了。鸟类减少后，天牛大量繁殖。天牛是线虫的传毒媒介，线虫能使松树枯萎。松树枯萎后，山白竹增长。矮竹茂盛后，老鼠大量繁殖，老鼠反过来又咬食杉木苗。由于“科学农法”的施行，造成自然秩序和生态平衡的破坏，最终将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所以，福冈正信先生认为“科学农法”不但是一种浪费型的无效益的农法，而且也是一种病态型的农业。

那么，现代农业的出路在哪里呢？是沿着老路走下去还是进行一次农业革命呢？福冈正信先生的回答是后者。他在对“科学农法”的否定中，从老

子的“自然无为”哲学中吸取智慧，逐步地萌生了“自然农法”的思想。他说：“我的专业是植物病理，从岐阜高等农林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冈上农场、横滨海关植物检验科等地工作过。我的脑海中突然想起这样一个问题：所谓人是什么？人生价值是什么？反复思考的结果，我开始考虑‘无为’的哲理。从这一哲理出发，逐步产生了今天的‘自然农法’。”又说：“‘自然农法’是基于‘无为’的哲学观点，主张还原于任其自由的自然。‘自然农法’的实践将解决‘科学农法’所暴露的一切弊病。”（《自然农法》）在福冈正信先生看来，未来的农业必将以“自然农法”代替“科学农法”，这是不以人类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自然农法”呢？福冈正信先生指出：“‘自然农法’是自然之道”，简言之，“即不耕地，不施肥，不除草，不用农药”。认为“‘自然农法’具有节能、省本、高产、无公害、土地越种越肥等优点，这一切都是‘科学农法’无可比拟的”（《自然农法》）。

福冈正信先生所以提倡不耕地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大量使用农机具耕地，破坏了土壤团粒结构和表土草皮，造成土壤板结，致使土壤腐殖质欠缺，封闭了微生物的通道，降低了肥力，同时也加剧了水土流失，不利于保肥保水；二是土壤本身具有自耕能力，无需人类来干涉。他发现未经开垦的土地上树木挺拔高大而茂盛，而多次耕耘过的“熟化土壤”则只能培育出矮小的农作物。这是因为农机具耕地深度只有10~20厘米，而绿肥植物和杂草的根系深达30~40厘米。根系越深，水肥可深进下层；根系死后，又增加了土壤的腐殖质，促进了微生物的繁殖和土壤结构的形成，使土壤既疏松又肥沃。未经耕耘的土壤所以能够使幼苗长成巨木，主要依靠自然力本身，靠土壤中的蚯蚓和鼯鼠等承担起改善土壤和耕耘土壤的重任，这比单靠人为手段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

所谓“不施肥”，主要是提倡不施化肥。因为在田地大量使用化肥，就会杀死土壤中的大量微生物，破坏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循环，使土壤发生混乱，导致农作物生长弱化，减少其抵抗性，易罹病虫害，祸害无穷。施用化肥还会导致微量元素的欠缺。一旦微量元素失衡，施肥再多也是无用的。农业科学研究证明，土壤本身具有自肥的能力。地球表面的岩石，经过风雨作

用而形成土壤，栖息着各种微生物，杂草丛生，巨木繁茂，使土壤变黑，成为肥沃的土壤。相反，人们耕种的土壤，尽管年年增施大量化肥，土壤却越来越贫瘠。这说明，不设法增强土壤自身的增肥能力，单凭人工施用化肥而促使农作物生长的想法是根本错误的。福冈正信先生虽反对施用化肥，却提倡大量施用绿肥（如我国南方稻田里的红花草等）和农家有机粪，因为它们对于改善土壤、增加肥力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是值得提倡和发展的。

所谓“不除草”，就是反对使用除草剂除去杂草。换言之，肯定杂草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以人的功利眼光看，自然界所谓杂草是相对于某种有用的农作物而言，其实，从自然眼光看，是无所谓杂草的。如在茂密的群体森林中，上有乔木，下有灌木，灌木之下有杂草，杂草之下又有苔藓，它们之间形成有机的合理的生态结构，构成一个立体的生物圈。在田地里，各种农作物与杂草之间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如果在田地里不长杂草，也就不可能形成肥沃的土壤。同时，也会招来风蚀、水蚀，造成水土流失。农田沙漠化的道理也就在于此，以除草剂除去杂草，可能造成原有杂草的抗药性，迫使人们再去开发新的除草剂，使除草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杂草过多，影响农作物生长，适当除去是必要的。但是不能采取除草剂，而要采用“以草除草”的办法。从“自然农法”看，自然界有多种杂草，彼此之间是相生相克的，人类经过科学研究，完全可以利用一种杂草而除去其他杂草。采用草生栽培和绿肥栽培办法，不但可以免去除草工作，而且还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例如在日本把小麦和三叶草同时播在稻田里或在麦行间播种水稻和绿肥，均可使稻麦生产向着有利于生产和提高产量的方向发展。这种稻麦不除草栽培的直播法，证明是可行的，其产量也是可以与普通栽培法相匹敌的。

所谓“不用农药”，是指不用有毒农药杀死植物的病虫害。所谓益虫与害虫，是以人类的功利观点做出的价值判断，从自然观点看，是无所谓益虫、害虫的。

实践证明，用农药杀死害虫，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例如，利用飞机喷洒杀虫剂，虽说抑制了树木的黑斑病，同时也杀死了分解落叶的许多微生物和细菌，使枯枝落叶得不到分解，直接影响松树的生长。使用农药防止白菜、萝卜的细菌性软腐病，虽说杀死了软腐病菌，同时也杀死了抑制软

腐病发生的其他细菌，反而使软腐病更加猖獗。由于喷撒各种杀虫剂，杀死了栖息于土壤中的各种细菌和微生物，必然造成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所以，开发和使用杀虫农药，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

福冈正信先生反对以农药杀死害虫，主张“以虫治虫”，即利用天敌来消灭农作物的害虫。在他看来，田间的小动物世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有机统一体，有害虫存在，就有害虫的天敌存在，保持着田间的生态平衡。在日本的稻田里，最大的害虫是飞虱。福冈先生经过多年研究，发现蛇、青蛙、蜘蛛等是飞虱的理想天敌。所以，他在稻田里用麦秸覆盖水田，使这些天敌有很好的栖息环境，稻丛中有青蛙在跳跃，空中有蜻蜓在飞翔，从而抑制了飞虱的蔓延，取得了巨大成功。蜗牛是农作物的主要害虫之一，主要危害棉苗、蔬菜和小麦的嫩叶。过去主要依靠农药诱杀防治，现在他发现黑虫是蜗牛的天敌，可以通过人工繁殖、培育、放养黑虫，以捕食蜗牛。这样，既能克服农药成本高、收效低的弊病，又能减少农药治虫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益于农作物的生长。可见，“以虫治虫”是一条既省力又能防止病虫害的理想途径和方法。

福冈正信关于“自然农法”的构想与实践，完全是他自觉地以中国道家哲学为其世界观指导的。在道家看来，不论是“道”的本身还是由“道”派生的宇宙万物，就其本性来说，都是“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五十一章）。所以，人类在自然面前应采取“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六十四章）的态度。福冈正信先生正是按照道家的这种“道法自然”的思想来建构“自然农法”的。他说：“我数十年来，致力于与‘科学农法’相对抗的‘自然农法’的研究，在稻麦和果树栽培方面，确信自然的力量，排除人类主观行为，实行无为政策。结果不论是生长还是产量，不论是暂时还是长远，也不论是局部还是整体，都证实了‘自然农法’比‘科学农法’优越，并从中更清楚地看到‘科学农法’的缺陷和潜在危机。”又说：“科学的农法是以自然的外因作为研究目标，而‘自然农法’则是什么也不进行的不战而胜的方法，彼此之间是相对应的，科学农法所采取的一切方法手段往往是增加割裂自然的众多过程。‘自然农法’则是一切手段无用论，要求人们真心实意地亲近自然，放弃一切人为手段，以自然取代人为，这都是基于

‘自然农法’的哲学观念。”正因为福冈正信先生所赖以建立“自然农法”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的道家哲学，所以完全有理由这样说，“自然农法”是中国古代的道家哲学在现代农业中的一次大胆的实验和成功的运用。

（二）道家哲学与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

1. 现代医学模式转型

自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社会和医学实践的长足进展，人类的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中国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疾病，居于前四位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结核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20 世纪后半叶，居于头四位的疾病则是脑血管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意大利 1987—1990 年与 1957—1960 年相比，传染病、寄生虫病减少 95%，消化系统疾病减少 86%，呼吸系统疾病减少 86%。美国 1990 年与 1970 年相比，脑血管、心血管等疾病的死亡率，由 20/10 万增加到 690/10 万。中国和世界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根本变化使传统的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不得被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代替，开始由单一的生物模式向综合性的医学模式转变，这是人类医学健康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型。

现代医学模式不同于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病因上，由单因果模式向综合因果模式转变。现代医学不再简单地把人看成是纯生物学的人，而是把人看成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整体人。发病原因不只是唯一的化学因素（有毒化学物质、变态反应原、机体所需要化学物质的过剩或缺乏）、物理因素（放射线、高温、噪音等）、生物自然因素（病原微生物、寄生虫），而是从整体的人出发，既注意研究人致病的物质因素，也注意研究有害于人体健康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环境污染、社会公害、职业病、酗酒、吸毒、交通事故等），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在诊断上，要求医生不只是利用各种医疗仪器和化学检验，还要求医生

通过耐心的询问与沟通，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家庭境况。第三，在医疗手段上，要求医生对于病人不只是给予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帮助，还要求医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治疗，把医学与当代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道德、管理等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疾病的综合防治，是保证人类健康的最有效的手段。

现代医学模式固然产生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医学实践，同时它也可从道家哲学和东方传统医学中吸取辩证思维模式和中国医学智慧。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中，道家哲学和以它为指导的中国传统医学，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2. “形神双修”与心理疗法

汉代河上公注《道德经》曰：“营魄，魂魄也。人载魂魄之上得以生。”（《老子河上公章句·能为》）即认为人的生命是魂（精神）和魄（形体）的统一。只有使精神和形体合一，人才能长寿。《淮南子·原道训》亦认为：“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位失，则三者伤矣。”根据道家的“形神合一”原则，中国传统医学非常强调“形神相即”，反对形神相离。《黄帝内经》说：“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类经》亦说：“无形则神无以生，无形则神不可活。”明代医学家高濂指出：“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由此出发，他批评说：“夫人只知养形，不知养神，只知爱身，不知爱神。殊不知形者，载神之车也，神去人即死，车败马即奔也。”（《遵生八笺·清修妙论笺》上卷）所以，道家在养生上主张“形神双修”，这比西方医学单纯注重“养形”要高出一筹，更符合于现代医学模式。

那么，如何“形神双修”呢？老子认为“少私寡欲”（《道德经》十九章）是“形神双修”的奥秘所在。庄子所谓“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就是“少私寡欲”的形象写照。在道家看来，各种物质欲望虽是人的生理需要，但如果过分追求，就会造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道德经》十二章）的恶果。所以，老子从贵生立场出发，极力主张“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二十九章）。

根据道家的“少私寡欲”的养生原则，中医学把“形神双修”贯穿于病因、诊断、治疗等各个医学环节。在病因上，除了注意生物学原因，如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气外，还必须通过“少私寡欲”的途径和手段，在精神上做到“恬淡虚无”，才能使精神处于安静、乐观的良性状态。《太上老君养生诀》指出：“善摄生者，要先除六害，然后可以保性命延驻百年。何者是也？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财，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忌”。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教诫篇》中指出：“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乃养性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智，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悴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亦认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五者不去，心虽希寿，亦不能挽其夭且病也。五者能绝，则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祈生而有神，不求寿而延年矣。”不管是陶弘景的“除十二多”还是孙思邈的“去五难”，都是根据老子的“少私寡欲”思想从社会心理因素角度探索病因的。这较之西方传统医学只注重生物学原因而忽视社会心理因素，自然要高明得多。

在诊断上，中医学根据老子注重“养神”的原则，向来重视“望、闻、问、切”等方法，强调从病人的神色表情、语言气息、眼神、动作等方面考察病因；认为形健则神旺，形衰则神惫。《黄帝内经》要求医师“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强调诊病时必须注意这些致病的心理和社会因素。这种形神统一的诊断方法，同西方只是偏重于化学检验、透视等技术，单纯考察生物性病因的医学理念，是迥然不同的。

在医疗上，中医学非常重视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作用。中国传统医学理论认为不但生理因素可以影响心理因素，人体有病心理必定出现异常现象（如肝病使人善怒），而且心理因素亦可以影响生理因素（如怒伤肝、恐伤心

等),应当采取各种不同的相应的心理疗法。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四种心理疗法:第一,以情胜情法。中医不仅承认人的生理与心理因素之间互相影响,而且不同情态之间亦有影响,如“悲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恐胜喜”等。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讲到范进中举后,因狂喜而致精神失常,其丈人以恐吓方式使他精神恢复正常的故事,就是“以恐胜喜”的典型例子。中国古医书记载:一位新婚女子,因丈夫外出经商久未归,思夫成疾,百治不愈,后来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告诉这位女子说,你的丈夫在外面赚了大钱,正在归途,不久就到家。这位女子听后喜悦万分,思念病很快散之九霄,这是“以喜胜忧”法。世代为农的李大谏突然考上举人,其父捧腹大笑;第二年,李氏又考中进士,其父更是大笑不止,历十年笑病不愈。某太医得知后,派人告诉其父:你的儿子已患病而死。其父听后,哭得死去活来,如此十日,大笑不止的病即不再犯了,这是“以悲胜喜”的一个突出例子。第二,语言开导法。从西方医学史看,心理咨询仅是20世纪40年代末兴起的心理疗法,而中国古代医书历来都非常重视语言开导在疾病防治中的作用。认为良好的语言可以促进人的思想变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心理平衡,对治疗疾病有明显效果,曹操的“望梅止渴”的典故,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反之,不良的语言刺激亦可影响人的健康,导致疾病产生,《黄帝内经》指出:“人之情,莫恶死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适之人,岂有不听者乎?”这种语言开导法,同现代医学上的心理咨询的精神是一致的。第三,移情易性法。所谓“移情”,是指人们采取某些方法来分散或转移注意力,消除或减轻恶劣的精神刺激,使病人的思想重点转向其他事物。明代眼科医生李瞻曾治疗一位红眼病人。这位患者不但火大,而且性情急躁,久服药物无效。李瞻诊知病因后,告诉患者:你的眼病并不难治,可怕的是十天之内眼睛的毒火将会流窜到屁股上,长个一脓疮。患者听后,把对眼病的担忧转移到屁股脓疮上,过了几天,眼病减轻,又吃了几剂药,红眼病便好了。所谓“易性”,是指人们采取有益于健康的某些活动,摒弃不良习惯或思想杂念,提高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吴师机在《理渝骈文》中指出:“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也。”习书作画,听音乐或自己演奏、种花、

赏花、养鱼、钓鱼等，都是陶冶情操、除忧解愁的好办法。按照中医理论，角、徵、宫、商、羽五音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合，故可以用角音治肝病，用宫音治脾病，心情忧郁可选听《光明行》，失眠可选听《春江花月夜》等。宋代欧阳修曾患有忧郁病，久治不愈。后来学琴，“久而乐之，不知疾在体也”，恢复了健康。科学家对 19 世纪末以前出生的 96 位作曲家和 119 名演奏家的健康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的寿命比一般人要长，这是音乐家多使用“音乐脑”，使体内情绪机能活跃的结果，这叫音乐疗法。古今中外的书画家多长寿的事实，说明习书作画也是长寿的重要方法。这种“移情易性”的心理疗法，已为现代医学广泛用以治疗精神病等。美国的《现代诊断治疗学》要求医生在治疗精神病人时，“要转移病人的爱好，鼓励病人去发展其他方面的爱好或技能”，特别对于那些空闲时间较多的病人要“转移重点”，这种“转移重点”、“转移病人爱好”的方法，同中国传统医学的“移情易性”的方法是相通的。第四，利用紧急状态法。中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特殊力量，并利用这种特殊力量来治疗疾病。据《浙江通志》载：明代医学家俞用古曾为一名女子治病。这位女子打哈欠时，两手伸直不能放下。经俞用古诊断后，认为治病必须用艾针灸丹田，一边说一边灼艾，并亲自去解其裙带。该女子见此情况，思想情绪顿时紧张，便不顾一切地用双手护裙子，那伸直不能放下的双手就这样被治好了。（《医部全录》卷五百十）这种利用紧张状态下产生的特殊力量治愈病症的方法，在中医书中不乏其例。

中医学在老子的“形神双修”特别是在“养神”思想的指导下，非常重视对患者的心理—社会致病原因的探索，并且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心理疗法，这与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基本精神是吻合的。日本森田正马博士依据老子思想创造了“森田疗法”，颇为当代医学所推崇，风靡于世界。“森田疗法”并不是引导患者去消除病状，而是引导患者在症状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在无所谓精神状态下，顺其自然不知不觉地再也不去介意症状的存在，逐步恢复了健康。这证明以道家哲学为指导的中医学必将能对现代医学模式的建构作出积极贡献。

3. 气学理论与气功疗法

“精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用以标志人的生命本质的哲学范畴。它是从《道德经》一书中脱胎出来的。老子既讲“气”，也讲“精”。讲“气”的地方，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十章），“心使气曰强”（五十五章）等；讲“精”的地方，如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精之至也”（五十五章），这些都是从人的生命上立论的。但是，老子还没有把“精”与“气”联系起来，提出“精气”这一概念。到了战国时期，管仲学派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才正式提出“精气”这一概念，认为人的形体和生命都是由精气所构成。“凡人之生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管子·水地》）汉代王充发挥道家的精气思想，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精气”是人的生命的物质基础的思想，指出“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论衡·论死》）。

道家提出的精气理论，早已被中国古代医学家引入医学领域，用以解释人的生命本质、疾病发生和医疗诊断。《黄帝内经》作者较早地将道家的精气理论用以说明人的本质，指出“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匱真言论》），“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经脉》），精气（气）“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化，终而复始”（《灵枢·脉度》）。肯定人的生命是“气”的一种高级运动形式。《黄帝内经》作者还具体谈到80余种“气”，用以证明人的生理活动、精神意识、病理变化、临床诊断、针药治疗等都是统一于这个物质基础。尔后，中国历代医学家如元代李东垣之论“胃气”、汪机之论“营卫之气”、孙一奎之论“宗气”、喻昌之论“大气”、张景岳之论“先天后天之气”、吴又可之论“杂气”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证明“气”是人的生命的物质根源。

中国古代医学家根据道家的气学理论，认为人体之“气”始终处于不断

地运动状态之中。“气”的运动状态保持平衡叫做“和”，畅通无阻叫做“通”。只要能使“气”保持“和”与“通”，人就健康；若“气”“雍闭不通”，人就会生病。《黄帝内经》指出：“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为痛。”（《灵枢·脉度》）隋代巢元方明确提出了“百病皆生于气”的命题，他说：“夫百病皆生于气，故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忧则气乱……思则气结。”（《气病诸候》）宋代《圣济总录》卷一九九亦说：“人之五脏六腑，百骸九窍，皆一气之所通，气流则形和，气戾则形病。”都是用道家的气论思想来说明人的病因的。

既然人的生命和疾病都是由人体之“气”的运动状态如何而定，那么在治疗方法上就必然提出气功疗法。老、庄不但提倡“养形”、“养神”，而且也提倡“养气”。从“养气”这一原则出发，老、庄提出了一系列的行气导引之术。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这里是指修炼气功的基本方法，即要求练功者把“气”结聚起来，全身放松，呼吸自然，从形体到精神，做到如同婴儿那样。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元牝。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舍。”（《道德经》六章）近人蒋锡昌认为“此章言胎息导引之法”：谷字“用以象征圣人之腹，即道家所谓丹田”，“神者，腹中元神或元气也”，“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是说“有道之人，善行腹中元气便能长生康健”（《老子校诂》）。以鼻口呼吸，当绵绵不断，若可存复若有无，不当急疾勤劳也。老子讲的“为腹不为目”和“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实际上都是指意守脐下腹部丹田，讲的也是气功。庄子所谓“真人之息以踵”（《庄子·大宗师》），是指真人一呼一吸之间，通过经络，可以直达足底涌泉穴，即气功所谓“大周天”也。庄子所谓“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当为身），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郭嵩焘援引王船山的话，指出：“奇经八脉，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缘督者……循虚而行。”讲的也是古代练气功的一种方法。《庄子》一书中讲的“心斋”（《庄子·人间世》），“坐忘”、“朝彻”（《庄子·大宗师》）等，也都是练气功的一些具体方法。气功治疗本是道家的养生方法，后被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用于防治疾病。中医学根据老子的“静为躁君”和“致虚极，守静笃”的原则，要求通过意守丹田和气息锻炼，排除一

切杂念，做到“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虑之患”，使大脑活动完全处于虚无、宁静状态，增补元气（精气），流通百脉，改善呼吸循环、消化神经、内分泌等系统的生理功能，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道家多讲静功，亦讲动功。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非常重视导引按摩对“养气”的作用，指出：“人身流畅皆一气之所周通。气流则形和，气塞则形病。故《元道经》曰：元气难积而易散，关节易闭而难开，人身欲得摇动则谷气易消，血脉疏利……按摩导引之术所以行血气、利关节……故延年却病，以按摩导引为先。”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刻意》已指出：“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伸），为寿而已矣。”所谓“熊经鸟申”是指如熊吊颈、如鸟伸脚，即是古代气功中的动功，对后世导引按摩之术影响颇大。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导引图》中有“龙登”、“鸱背”、“熊经”、“猴状”、“虎扑”等形象。《淮南子·精神训》亦有六禽戏的记载。三国华佗还提出了五禽戏。晋代更出现了燕飞、蛇屈、兔惊、龟咽等模仿动物动作的体操。《抱朴子内篇·杂应》载有“龙导、虎引、熊经、龟咽、蛇屈、鸟伸”、“猿据、兔惊”等导引之术，以期达到“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而增年”（《抱朴子内篇·对俗》）的目的。除了模仿动物的动作外，中国古代医学还根据人体生理状况和病理变化设计出许多旨在活动周身肢体和疏通元气的导引按摩之术，如南北朝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导引按摩篇》中提出的八节导引方法，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的老子按摩法、天竺国按摩法，宋代《圣济总录》中提出的神仙导引法，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出的肝脏导引法、《灵剑子》导引法、胆腑导引法、脾脏导引法、肺脏导引法、天竺按摩法、婆罗门导引十二法等等。在古代的各种导引按摩术中，虽有模仿各种动物的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等，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明代出现的太极拳。

不管是静功还是动功，都是根据道家的气学理论，用以“养气”的重要方法。中医学的气功疗法是以道家的气学理论为哲学基础的，气学理论与气功疗法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理论。这一独特的医学理论与实践，对于现代医学模式的构建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早岛正雄先生所著的《道教观相导引术与健康》一书，也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成功地

结合道家思想和中医学的合理因素，为建构现代医学模式一次有益的尝试。

4. “道法自然”与自然疗法

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在医学中出现了自然医学这一分支。自然医学的理论，认为只有使人的生命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只有使人体与自然保持和谐才能得到健康，否则即会引起疾病。自然医学是以自然界存在的东西（如空气、水、阳光和食物等）和利用人体本身的潜在能力（如睡眠、休息、清洁、希望、信仰）等，来保持或恢复人体健康的一门医学。

“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老子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按其本性都是自然而然的，并非人为的，只有当人体与自然保持和谐，达到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才能保持人的健康，人与自然之间若失去平衡，就可能发生疾病，导致死亡。人的生命过程是一种自然过程。所以，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中医学根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人的养生如同治国一样，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唯顺而已矣”（《灵枢·师传》）。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亦指出：“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黄庭经序》）从“道法自然”思想中引出的自然疗法，在我国古代医学中，早已获得广泛应用。现将其中的生活起居、饮食食疗和房中之术等内容，作一扼要说明：

第一，生活起居。《黄帝内经》作者依据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出人应根据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指出：“夫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苟（重）疾不起，是谓得道（得养生之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要求人的生活起居合乎自然之道，切忌过分，应与自然保持平衡。如“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坐伤肉”。明代高濂按照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在《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中，依据春、夏、秋、冬气候变化的不同，分别介绍了不同季节的养生之法。在《起居安乐笺》中，他还围绕“节嗜欲，慎起居，远祸

患，得安乐”这一中心思想，详细地阐述了“恬适自足”、“居室安处”、“晨昏怡养”、“溪山逸游”、“宾朋交接”等内容，对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乎自然”的养生之法。在中国古医学书中，以卧床休息和慎调饮食等自然疗法治病的事例，多有记载。陆以湑在《冷庐医话》中记载：“海盐寺僧，能疗一切劳伤虚损吐血干劳之症。此僧不知《神农本草》、《黄帝内经》，唯善于起居得宜，饮食消息，患者在此寺中住三月半年，十愈八九，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可见，慎调生活起居有时比服药效果还好。

第二，饮食和食疗。中医根据老子的“五味令人口爽”（《道德经》十二章）的原则，认为饮食不当（差失）非但不能养生，反而能导致疾病，《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只有做到“饮食有节”，才能达到养生目的。如“以酒为浆”，溺于饮食，必定“半百而衰也”。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食诫篇》中亦指出：“养性之道，不欲饱食。”主张“先饥乃食，先渴而饮”。根据四时季节之不同，规定“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咸”。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单列《养老食疗》一篇，规定老人“每食必忌于杂”。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专列《饮馔服食笺》一章。他根据“日用养生，务尚淡薄”的原则，对饮茶知识作了详细说明，对汤、粥、面粉、蔬菜、甜食等也都作了扼要的介绍。

中医既重视饮食，更重视“食疗”，主张根据性味和归经来选择食物以治疗疾病。陶弘景有“食诫”之说，列出食疗法一百多种。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多种《食经》；《隋志》录有《神仙服食经》；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服食法”的记载；隋唐以后，除了《七卷食经》、《新撰食经》外，若马琬、卢仁宗、严龟、孟诜、张鼎、陈士良等各有《食经》、《食法》、《食疗本草》、《食性本草》等著作。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绿豆具有解砒霜、草木诸毒之功能。这些说明，中医学的“食疗”之法也是自然疗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房中之术。道家、道教根据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在房事上，提出的“性欲不可绝”、“性欲不可早”、“性欲不可纵”、“性欲不可强”、“性欲有所忌”、“性欲有所避”等观点，都属于自然疗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5. 辩证思维与现代医学模式

中医学所以具有现代医学模式的原始模型，与道家的辩证思维方法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因为中医学与现代医学模式在思维方法上有契合之处，所以它在现代医学模式建构过程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我们把中医学的辩证方法与现代医学发展的思维方法相对照，就会发现：依据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矛盾观，中医学承认在医学领域里不仅充满着矛盾，如生死、刚柔、强弱，盈虚、虚实、阴阳、寒热、表里、上下等，而且这些矛盾是相反相成的，也是相互转化的，如寒者热之，虚者实之，“寒极生热，热极生寒”等，中医学的矛盾观念与现代医学思想是相通的。中医学根据道家关于“和”的观念而产生的阴阳平衡的思想，与现代医学关于人体形态的学说是契合的。中医学根据老子关于“有物混成”的思想而产生的整体观点，与现代医学强调整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中医学依据道家关于“和”的观念而提出的综合性功能作用的观点，与现代医学关于多学科相互渗透的主张是一样的。从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道家的辩证思维对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依据道家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中医学原始模式，无论是它丰富的医学内容，还是辩证的思维方法都恰好弥补了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和弱点。同时，这也是中医学能够迈向现代化的内在根据，如没有这一内在依据，我国中医学的现代化将是难以实现的。正因为中医学的医学模式和辩证方法独具特点，所以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中，必将发挥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第十八章

“自胜者强”与管理者的“无为”品格

老子针对儒家的“以德治国”、兵家的“以奇用兵”和法家“以法治国”，大力提倡“无为而治”。从现代管理角度，道家所谓的“无为而治”，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在管理主体上，要求管理者应具备“自胜者强”的“无为”品格；二是在管理方法上，反对儒、法两派的“有为而治”，提倡“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三是在管理境界上，追求“不知有之”的最高境界。

老子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三十三章）意谓能战胜别人的是最有力量的人，而只有首先战胜自己的不足和缺点、管理好自己的人才才是真正的强者。商人的成功与失败，主要取决于自己能否战胜自己，能否管好自己。只有首先战胜自己、管好自己，才有资格去管理好他人。

商人的“无为”品德，主要是指“无为”、“好静”、“无事”和“无欲”。只有管理主体具有这四种美德，在管理上才能达到“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和“民自朴”的“无不为”的社会效应。老子指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这里所谓“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完全是在管理者“无为”品格的感化下产生的一种自觉、自然的行为。管理者的“无为”品格是造就民之“无不为”的主要精神动力。

(一) “四不”美德

要想做到“无为而治”，人应具有“四不”的“无为”品格。什么是“四不”美德呢？

从正面说，即主张：“自见者不明（聪明），自是者不彰（彰显），自伐者无功（功劳），自矜者不长（长久）。”（《道德经》二十四章）这些“自见”（自我表现）、“自是”（自以为是）、“自伐”（自我炫耀）、“自矜”（自高自大），都是违背“道”的“无为”本性的表现。从道的“无为”本性看来，这些都是“余食赘形”（如剩饭，形体上的骈拇、枝指、肉瘤之类），“故有道者不处”。争强好胜，违背自然，令人厌恶，其结果“适得其反”。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辩证法。

从反面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道德经》二十二章）。从企业自我管理角度，人要以“四不”的“无为”品格来保证企业成功。

(二) “三宝”之说

在管理主体的修养上，老子进一步提出了“三宝”的要求。老子指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六十七章）即主张管理者应具有仁慈、节俭、谦让三种美德，这也是“无为”中的应有之义。

“仁慈”是老子的第一宝。所谓“仁慈”，即要求管理者对自己的下属和社会民众要有慈爱之心、关怀之情。中国自古以来，皆知仁慈与威严是管理者不可或缺的两种重要手段。在两种管理手段中，曾国藩更倾向于“仁慈”，他说：“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子弟之心，当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

知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之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曾国藩对仁慈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讲得十分精彩。老子曰：“慈故能勇。”这是说，管理者的仁慈之心会激发部下的非凡勇气，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的社会效应。吴起带兵即是一个典型事例。战国初期的名将吴起，有一次见一名士卒腿上生了毒疮，便亲自用嘴给他吸出脓血。知道此事的人无不称颂，而那位士卒的母亲反而悲叹：“这孩子不会活着回来了！”她解释说：“以将军之尊贵，亲自给他吸吮毒疮，他还不感恩至极，死在战场上吗？”面对将军如此体贴入微的关爱，作为属下，必然纷纷勇猛杀敌。

以仁慈待人，实际上是一种高超的柔性管理。刘秀以柔道治天下，使东汉达到“光武中兴”的太平盛世。但是，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些领导不懂得柔性管理，在他们心目中，管理就是“修理”员工。他们俨然是专横的“独裁者”，或是家长式的管理者，只知威严而不知慈仁。有些人甚至把企业员工视为会说话的“机器”，而不是有情感、有理想、有智慧的人。所以，他们动辄以势压人，以制度卡人，以粗暴态度训人，毫不尊重企业员工的人格。如果不能尽快地改变这种思维定式和管理方法，就一定会失败。因为“仁慈”之道，是凝聚人心、团聚员工的一块“磁石”。

“崇俭”是老子的第二宝。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老子提出的“崇俭”思想，对于治国、持家和修德都是极为重要的。它早已凝聚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个人修身、养德和国家兴亡的重要保证。

从国家兴亡看，墨子后学认为国家“节约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韩非子也认为国家“以俭得之，以奢失之”（《韩非子·十过》）。唐代李商隐在总结历代治国成败经验时，亦指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咏史》）

从家庭兴衰看，明代杨继盛提倡勤俭持家，告诫儿子“衣服要朴素，房屋休高大，饮食使用要节约”。清代钱琦认识到“贵败于骄、富衰于奢”的道理，指出：“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钱子测语·

巽语篇》)朱柏庐在《朱子家训》中,提倡“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近代曾国藩在致其弟的一封信中也指出:“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这些都是人生哲学的警世良言。

从个人健身、养德看,东汉经学家郑玄在一篇教子的文章中,勉励儿子要“非饮食,薄衣服”。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曹操针对东汉以来的奢侈靡靡风气,要求自己活着的时候,“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死后“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谆谆告诫儿子“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唐代于志宁认为俭奢是产生善恶的根源:“克俭节用,实宏道之源;崇侈恣情,乃败德之本。”(《贞观政要·规谏太子》)诗人白居易亦云:“奢者狼藉俭则安,一凶一吉在眼前。”(《草茫茫》)邵雍依据“物极必反”的道理,认为过分奢侈必然招来凶祸,指出“侈不可极,奢不可穷,极则有祸,穷则有凶”(《奢侈吟》)。宋人田况认为“俭生善,善生福,俭必福;奢生恶,恶生祸,奢必祸”,指出“俭则常足,常足则乐而得美名,祸咎远矣;侈则常不足,常不足则忧而得眚恶,福亦远矣”(《儒林公议》)。

现在民间流行的一些谚语,如“勤可补拙,俭以养廉”,“一日积一文,十年头算晕”,“一日节约一根线,百日就能把牛拴”。由广东省委组织编写的《新三字经》亦云:“阅古今,国与家,成由俭,败由奢。”这些谚语,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者的俭朴美德。今天我们应当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传统美德,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企业,这是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重要保证。坚持俭朴作风,不搞奢侈腐化,不讲究体面排场,既有助于自身品格的升华,又能凝聚人心,感化民众,为社会积聚财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这就是老子所说“俭故能广”的真实含义。

老子的第三宝是“不敢为天下先”。在现实生活中,人皆知“不敢后人”、“争上游”、“争第一”、“敢为天下先”的道理,主张凡是利国益民之事,皆应奋勇向前,不甘居后。这是一种积极做事的奋进哲学。而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六十七章)思想则是一种“进道若退”(《道德经》四十一章)的人生智慧。从表面上看,有德之人谦退居下,“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若退”;从本质上看,“退”是为了“进”,“退”是“进”的

一种手段。所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七章）。古代帝王皆以“孤”（孤立无德之人）、“寡”（寡德之人）、“不谷”（不善之人）自称，用这些“人之所恶”的名词来称呼自己，这是谦退居下的表现。“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三十四章）老子以江海为例论证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道德经》六十六章）这是说，从做人的角度，管理者应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上，即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上应“敢为天下先”，而在个人物质享受上“不敢为天下先”，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是道家管理哲学的高明之处。

中国亚都公司总经理何鲁敏先生在谈到亚都如何由“小型巨人”变成民办高科技实业集团时，指出树立“谦和巨人”的企业形象是十分重要的。所谓“谦和巨人”的形象，一是强调道德诚信原则，“业大易骄”，切不可盛气凌人，切不可有暴发户心态；二是在商战中尊重他人，懂得“五岳之外，另有他山”的道理。正是这种“谦和”精神，使亚都在商战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就是老子说的“以其终不自大，故能成其大”的道理。

台湾省佛教领袖星云大师极力倡导“老二哲学”，正是道家“不敢为天下先”精神的表现。他说：“如想要展现成功的人生，必得先从‘老二’做起，不强出头，随缘随分。在服务奉献中，成就他人，实现自我，那么不管现在或将来是否能当上别人的‘老大’，至少你已经做了自己的主人。”台湾宏碁集团董事长施振荣的经营策略，即是采取“不争先”的“老二哲学”，他说：“我之所以打出‘老二哲学’的口号，用意是想从老三、老四的地位，向前推进。事实证明，国人的开发能力绝不逊于外人，如今已可争得一席之地，在确立老二地位后，可以拿出一、二成的心力，再来争取第一的荣誉。”

实践证明，老子的“三宝”思想，对于现代道商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无怪乎西方管理学家将其奉为现代管理学的“金科玉律”。

第十九章

“无为而治”与 modern 企业管理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世界上许多管理学家都把注意力由西方的管理模式转向了中国道家的管理原则与管理方法，特别是《道德经》一书中的“无为而治”思想，更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并将它广泛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

(一) “无为而治”的含义

什么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呢？这一命题是由三部分组成。

(1) 人道来源于天道。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从老子的天道论中引申出来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老子看来，“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三十七章）。这就是说，作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道”是自然运行、无虚妄、无偏执、无妄为、无思念，“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道德经》三十四章），这就是道的“无为”本性。但是，宇宙天地万物，其中包括地球和地球上的人类、花草树木、鱼虫鸟兽等，又都是由“道”演化出来的，并且是由“道”主宰的，这又是“道”的“无不为”本性。实际上，老子所说的“道”，是“有为”与“无为”的辩证统一。

(2) 由道而派生的天地万物也是“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五十一章),“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庄子·至乐》)。

(3) 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应用于治人、治国与管理企业,就必然引出“无为而治”的管理科学思想。在道家看来,既然圣人“惟道是从”(《道德经》二十一章),对于天地人就理应要求“上德无为而无以为”(《道德经》三十八章),即只能从客观上辅助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既不妥为亦不强为,更不要企图达到某种人生功利的目的。

(二) “无为而治”管理的三层意义

从现代企业管理角度看,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至少包含有如下三层意义:

“无为而治”思想的第一层含义,是企业决策上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即要求管理者在“小事”上有所不为,而在“大事”上有所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然后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在现代企业中,随时都会碰到两类事情,一类是事关全局和长远利益的大事,另一类是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部门层次的增多,即使是精明能干、智慧超群的领导者,也无法事事躬亲、样样“有为”。因为企业领导者也是能力有限的“人”,而不是法力无边的“神”。所以,一个高层次的企业领导者应不拘泥于小事,善于在小事上“无为”,而在大事上“有为”。

什么是管理者的“大事”呢?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就现代企业而言,一个高层次的领导者的“有为”,不应是直接指向目的活动,而应是直接指向被领导者的活动。对于企业领导者的最基本要求,应是他能够组织企业员工“为”什么,而不是他本人能够“为”什么。他应成为料理大事的“导演”,而不是扮演具

体角色的“演员”。具体地说，企业的高层次的领导者要正确处理“管向”（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引导）与“管事”（对企业具体事物的管理）、“管总”（对企业全局的管理）与“管分”（对企业局部事务的管理）、“管帅”（厂长、经理、董事长）与“管将”（企业副职领导干部及中层干部）以及“管兵”（普通员工）的关系。只有正确处理好上述关系，才能确保领导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比如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如果放弃制定作战计划、放弃组织战役和实施调兵遣将，而去参与肉搏式冲锋，那他就不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因为他把作为一位高级指挥员的“有为”与“无为”的关系颠倒了。这样的领导者只能是一位事无巨细、忙忙碌碌的“事务员型”的领导，是一位头脑糊涂、事无成效的官僚主义者。

“无为而治”思想的第二层含义，是要求高层领导者在识贤、求贤上有所为，而在用贤上则有所不为。一个高层的现代企业领导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就必须在使用干部上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在中国古代，人们从历代治国成败经验中，早已认识到“君闲臣忙国必兴，君忙臣闲国必衰”的道理。所以，在管理之道上，黄老学派主张“君无为而臣有为”。《淮南子》作者指出：“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主术训》）在《淮南子》作者看来，“以天下之大托于一人之才，譬若悬千钧之重于一木之枝”（《说山训》），是难以胜任的。正因为君主个人才智难以治天下，故君主必须“因臣资，用众能”，方可达到“无为”的目的。君主所以能够“无为”，是因为贤臣的“有为”。只要君主能够思贤如渴，用人得当，即可达到“无为而治”。这就要求企业的最高领导者必须具备伯乐识马、刘备三顾茅庐、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精神，并且在用人上对于贤臣必须高度信任，充分放权，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充分调动与发挥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而不是越俎代庖。在这里，有三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由于不信任下属而包办下属工作，二是由于不了解下属而去干预下属工作，三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指挥才能，而去干涉下属指挥。在企业管理中，这些错误做法，应力求避免。因为这些做法不但使企业领导者陷于杂乱无章的“小事”之中，而且还会压抑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整个企业受到影响。

实践证明，只有敢于“无为”，才能大有所为。这就是企业管理的辩证法。

“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企业管理思想，也为世界各国管理学家所采纳，被他们视为管理科学的珍宝。

美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指出：“主管之职能，首在成事，而非做事，授权是成事之有效分身术，如主管把持过甚，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必无法成事。”

美国管理学家 W. J. 鲍莫尔在谈到企业家的素质和能力时，指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要“精于授权”，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主要抓战略决策，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主要授权下边去办。

劳伦斯·米勒所著《美国企业精神》一书，谈到一位企业总经理的领导艺术时说：“管理人员必须完全摆脱幻想。完全控制，事事都插手，既不可能又不需要，有趣的是，我们的管理人员发现，不试图完全控制，反而能得到更大的权力：完成事情的权力。”这里所说的正是“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最佳管理境界。

法国法约尔先生指出：一个企业经理应“去引导部下而不代替他们”。

美国 H. 米勒认为：“真正的领导不是要事必躬亲，在于他要指出路来。”

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一位最佳的领导，是一位知人善任者。而在下属甘心从事于其职务时，领导者要有约束力量，切不可插手干涉他们。”

日本松下幸之助说：“我虽然是经理，但是我并不是站在前头拼命工作，而是站在后面由各从业人员来替我做事。”

英国大出版家诺思克利夫虽然事情很多，但他始终从容不迫、运用自如。其诀窍在哪里呢？他回答说：“我只担任指挥工作，一切事务性工作都交给那些能够胜任的人去做。我自己把精力放在计划创新上，一旦计划出笼，我又去考虑新的计划。”

美国国家计算机公司经理帕特森认为，一个高明的企业领导人应该是机器的设计者而不是机器的制造者。他有句至理名言：“不要去做可以交给别人做的事情。”

美国凯罗柯电气公司负责人有一条领导原则：交给下属的工作，绝不再故意察看，只有最后验收工作结果。这种高度的信任感，使下属更加努力工

作，工作效率提高，下属心情也舒畅。这叫“抽身谋大计”。

道家主张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思想，同现代管理学家所提倡的“分级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美国管理学家怀尔德在《管理大师如是说》一书中提出“分级管理”的原则。日本土光敏夫在《经营管理之道》一书中也主张“分级管理”。他指出，“一般说来，首脑提出‘目的’，各级主要负责人将它变成‘目标’（达到目的的战略），中层管理者将它转为方针（达到目的的方法），一般工作人员将它转为工作步骤。”在这里，现代管理学家要求企业家要善于识别、选择人才，一旦选定录用，就要充分予以信任，通过授权和分权，实行分级管理，逐级监督，各司其责。

“无为而治”思想的第三层含义是提倡“顺其自然”之为，“不采取反自然的行为”。这并非是禁绝一切行动。“自然”是“道”的本体，也是“道”的本性，故由“道”派生出来的天地万物也是“自然而然”而非人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即宇宙万物都是以“自然”为其本性的。这里所谓“自然”，并不是指存在于人之外自然界，而是指“道”和由它而派生的宇宙万物的“本性如此”、“本然如此”的自然状况和天赋的存在形式与运作方式。把这种“道法自然”思想，运用于治理国家和企业管理上，要求管理者“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六十四章），提倡“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

在企业管理中，只要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不任凭主观想象去发号施令，就能获得企业成功。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在回答“你的经营秘诀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指出：“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在他看来，只有“遵照超越人类智慧的伟大的天地自然法则与道理去经营，才能获得成功”。“倘使人类以其微小的聪明才智去思考问题，依照自己所想的平庸方法去处理事务，违背了天地自然的道理，其失败与挫折乃是意中的事。”（《实践经营哲学》）

“有无相生”和商品寿命周期本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如能按照这一客观规律，采取“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的经营方针，根据市场经济形势，善于及时地将“无”转化为“有”，又及时地将“有”转化为“无”，不断地制造出适应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就能保持企业的青春活力。相

反，如果违背这一客观规律，企业迟早会被淘汰。这类事例，在我国几十年的经济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

根据“以民为本”的企业宗旨，许多企业家已经认识到“顾客是企业的上帝”、“顾客是企业的衣食父母”、“顾客是企业的最终裁判者”的道理。长虹公司总裁倪润峰讲过一句名言“得人心者得市场”，市场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在无形的市场面前，任何企业家都不能随意而行，必须顺其民心而为之，广泛调查市场，真正了解顾客喜欢什么、关心什么、认可什么、讨厌什么，并且根据顾客的心理和愿望，生产出品质优良的产品，努力做好售后服务，一切为顾客利益考虑，才能赢得顾客的心，占领市场。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也要善于根据被管理者的兴趣、爱好，而采取相应的激励方法，理顺职工情绪，以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达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中国古代道家所主张的“顺其自然”的无为管理思想，同现代管理科学提出的“自动化管理”有某些相似之处。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需要“顺其自然的智慧”。在企业管理中，有些事情也要顺其自然而成，切不可人为地勉强去做。违背自然法则，没有不失败的。这证明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三) “有为”与“无为”

选择“有为”与“无为”的时机，对于企业家来说，至关重要。企业高层领导者在有些事情上只需要在开始时“有为”，不必参与其全过程，如参加奠基仪式、开工动员等；有些事情则只需在中间环节上“有为”，以促进高潮的到来；有些事情只需在最后阶段“有为”，如竣工剪彩、庆功表彰会，以鼓舞士气，以利再战。企业高层领导者并非什么时候都“有为”，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无为”。该“有为”时一定“有为”，使自己的文韬武略付诸实践，以促进企业成功；不该“有为”时有为，不仅会影响下属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且还会妨碍、干扰下属的工作，使下属养成照抄照

搬的依赖心理，缺乏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该“有为”时有为，必然会破坏整个领导机构的系统功能，影响各级领导者在“管理场”中的固定位置，导致工作秩序紊乱，使“金字塔”式的领导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不该“有为”时有为，还容易将领导的不成熟的意见强加于人，从而造成工作失误，祸害无穷。所以，企业的高层领导者只有真正站在“金字塔”尖上，考虑全局，掌握方向，出主意，用干部，而在具体事务上则持超脱态度，当“甩手掌柜”，才算是一位聪明的企业家。只有在具体事务上“有所不为”，才能在全局问题上“有所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由上可见，“无为而治”并不是凭借权力、法律和道德而实施管理，而是凭借“顺其自然”的哲学智慧进行科学管理。这是一种以最小的领导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果的高超管理艺术，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十章

“无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无为而治”不仅是一种管理手段或方法，而且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最高管理境界。

管理境界有主观成分，亦有客观成分。所谓管理境界，主要是指管理主体通过不同的管理手段所要达到的理想管理状态。根据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感受、评价与对策，老子把管理境界分为四种类型，即“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道德经》十七章）。在这里，老子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人类依次递进的四种管理境界。根据现代社会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可以自下而上依次对老子的“管理四境界”说，作出现代诠释，说明“无为而治”是人类所追求的管理最高境界。它对于构建现代管理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侮之”管理境界

所谓“侮之”，是说管理者主要依靠权势随意羞辱被管理者，从而激怒被管理者对管理者亦施之以轻侮，彼此之间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之中。处于这一境界中的管理者，我们将他们称之为“草商”，一般既非出身于经商世家，也未受到系统的管理学教育。他们或因某种世袭特权，或因某种社会机

遇，处于管理者地位。他们在道德修养上既无能又腐败，既浅薄又自负；在管理机制上既不懂“以法治人”，亦不懂“以德感人”；在使用人才上既不懂“任人唯贤”，也不懂科学决策。他们错误地把“管理学”简单地视为“修理之学”。所以，他们不仅以高压管理法、囚徒式管理法“修理”他人，而且还以诡诈手段蒙骗被管理者，使被管理者不仅在经济上得不到任何实惠，在人格上还经常遭受迫害（例如私设公堂、打骂员工等）。他们俨然是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独裁主义者。

老子认为，在这一管理境界中，不但是“其政察察（严苛），其民缺缺（缩手缩脚）”（《道德经》五十八章），而且“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七十五章），甚至会发展到“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强盗头子）。非道也哉！”（《道德经》五十三章）。这种管理完全违背了老子所说的“无狎（排挤）其所居（居处），无厌（厌弃）其所生（生活）”（《道德经》七十二章）的谆谆告诫。

所以，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道德经》七十二章），被管理者对管理者恨之入骨，民怨沸腾，纷纷起来反抗，任意地轻侮他，甚至以暴力驱之而后快。正如严复所说：“将亡之民，无不侮其政府者。”蒋锡昌亦说：“为君者见刑罚不足以立威，则以巧诈为事，故下侮之也。”在这里，老子从“无为而治”的理念出发，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历史上由昏君、贪官的贪婪无能而造成的这种“侮之”的对立管理状态。

这种最低层次的最糟糕的管理模式，不但存在于古代社会，而且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也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每一个铜板都滴着无产阶级鲜血”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所具有的一种野蛮的管理现象。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在某些简单粗糙的密集型群体劳动的企业中，这种毫无人性的管理现象也时有发生。

这一境界中的“草商”，对于企业管理缺少最起码的理性认识，主要是依靠个人权势和主观主义实施管理。一旦管理者出了问题，整个企业马上就陷入盲目的无序之中。所以，有待于进一步从盲目的、无序的实践层面向理性的、有序的法治层面超越与升华。

(二) “畏之”管理境界

法家针对“草商”的盲目而无序的混乱管理，从制度层面提出了“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进入了“管理科学”的境界。

在这一“管理科学”境界中，管理者不再停留在盲目而无序的实践层面，已从理论上懂得了“循法而治”的科学道理。他们根据“自为”的人性假定，凭借权势，不但“以术治吏”，而且“以法治民”，全面地实施“法、术、势”相结合的刚性管理，造成了“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通悚）惧乎下”（《韩非子·主道》）的管理态势，使臣民皆敢怒而不敢言，从而达到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的君主高度统一控制的理想境界。政事虽分散在地方，由臣民去做，而大权却集中于中央。君主紧握“赏”与“罚”的权柄，使四方臣民不得不忠心于他，尽力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是法家以“循法而治”手段造成的“畏之”的社会效果，具有一定的科学管理意义，较之盲目无序的管理状态，是一种社会进步。

但是，在这种管理境界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犹如猫与鼠的关系一样，彼此既缺乏相互关爱，亦无信任可言。他们之间只是一种“恃势而不恃信”、“恃术而不恃信”（《韩非子·外储说下》）的冷酷的利害关系。管理者傲视群小，虎视眈眈，被管理者畏首畏尾，唯命是从。管理者的虚荣心和成就感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却受到了极大的压抑。管理者整天疲于奔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组织一旦离开管理者，被管理者便手足无措，整个管理系统就有可能停止运转。组织的成绩和荣誉归功于管理者，一旦出现失败和错误，则归罪于员工，毫无共享管理成果之可言。由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仁爱与信任，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疏离和对抗，使被管理者“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旦有机会便立刻跳槽。“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只能管住员工的“身”而管不住他们的“心”，得不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正拥护。正如孟子所言：“以力服人

者，非心服也，力不赡（足）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是法家“循法而治”刚性管理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所以，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立足于他们的“无为而治”的理念，对法家的“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五十七章）

所谓“多忌讳，而民弥贫”，宋常星释曰：“一多忌讳，令烦则奸出，禁多则民困，必有妨民之事，使民不得尽力于生产，安得不贫乎？”所谓“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成玄英释曰：“利器，干戈也。滋，甚也。昏乱之世，不崇文德，唯事干戈，伤害既多，荒乱日甚。”所谓“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王弼释曰：“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故“以智治国，国之贼”（《道德经》六十五章）。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成玄英释曰：“刑名彰著，法令滋繁……不堪苛虐，逃窜者多，因生滥窃，盗贼斯起。”不管是“多忌讳，而民弥贫”，还是由它而引发的“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或“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人多伎巧，奇物滋起”，都是由于“有为而治”造成的。治国者虽然竭力以各种法令设防，非但无济其事，反而“盗贼多有”。在老子看来，“多忌讳”、“多利器”，“盗贼多有”，这些都是外在于人性的异己力量所引起的，都是违背“自然无为”法则的。

老子又指出：“民不畏（畏惧）死，奈何以死惧（恐吓）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行为诡奇乱世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斲（削）。夫代大匠，希有不伤其手者矣。”（《道德经》七十四章）

据明代哲学家薛蕙在《老子集解》中所释，刑名法度不仅是“杀人之无益”，而且是“杀人之有祸”。既然“民不畏死”，企图以刑法杀人，使民屈服，非但“无益”，反而“有祸”。这里所谓“司杀者”，是指“天”（自然）。老子认为人的生死是顺应自然的，生死是由天主宰的。如果人不自量力地欲代天杀人，犹代大匠斲木一样，必将“伤其手矣”。

庄子及其后学从根本上也反对“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庄子·天道》篇指出：“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

也。”又指出：“刑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这里，所谓“教之末”、“治之末”、“治之具”，是指刑名赏罚或礼法度数只是治国的一种辅助手段，不可能真正达到治国的目的。所谓“治之道”，亦即“教之本”，是要求统治者顺乎人之性命之情，实行“无为而治”，方可达到真正治国的目的。

这一境界中的管理者，我们将他们称之为“法商”。他们虽比“草商”管理有所进步，但还只是处于重“技艺”而忽“道德”的“管理科学”境界。所以，在“管理科学”境界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实施以道德感化为主、制裁为辅的管理方略，由法家的“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转变为儒家的“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

（三）“亲而誉之”管理境界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同拱，环绕）之。”这里所谓“为政以德”，有两层含义：一是从管理主体上要求以德“修身”，将管理者培养成“智、仁、勇”三位一体的管理者，使之达到“三忘”的道德境界，构建“义以为上”的道德人生；二是从管理手段上，要求管理者实施“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只有如此，方可使管理者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共之”，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一种“同心多圆式”的管理境界。

儒家的“为政以德”管理，强调的是管理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这一人文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管理者的道德感化基础之上的，认为管理者的道德越高尚，对于被管理者的感应性也就越大。它强调主动引导式的感应性，强调内在控制，而不是被动的、强制式的外在管理。只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来服耳”，只是“不生事扰民，但为德而民自归之”，只是“圣人行德于上，而民自归之，非有心欲民之服也”（《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这完全是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内在的形象管理。

在这种道德境界中的管理者，通过“正己正人”的感化效应，善于以德

化民、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他们既不以权谋私，亦不生活腐化，勤政廉洁，克勤克俭，事必躬亲，兢兢业业，讲诚信，求和谐。他们在人格上尊重员工，在经济上能给员工以实惠，在工作上能为员工搭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从而受到员工的真心拥护、爱戴、亲近和赞扬。老子所谓“亲而誉之”，是儒家通过“为政以德”而达到的社会管理境界，从而形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良性对应关系。

日本著名企业家土光敏夫将孔子的“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管理境界，形象地比喻成一个同心多圆实体。他认为企业的最高领导人（董事长、厂长、总经理）就是这个同心多圆的核心。他说：“组织的真正机能，最好用圆周关系来表示：居于中心的，是首脑；他的周围，是主要负责人……小圆都向着大圆，形成一种向心关系……都围绕着中心相互依存，沿着轨道永不休止地运动着。”（《经营管理之道》）企业组织的这种圆周关系，能够保证企业经营决策由核心内圈出发，再由里圈向外圈传达、辐射、扩散；执行的情况和结果，迅速地从外向里，将信息反馈到核心层，形成永不停息的双向对流循环，使企业充满生气和活力。

儒家从“为政以德”的基本理念出发，通过“循法而治”与“为政以德”两种管理模式的对比，认为“为政以德”胜于“循法而治”。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所谓“道”即“导”，“政”即法制禁令。意思是说，如果以法令引导而民违之，则以刑罚齐之，这种外在控制手段，其社会效果是“民免而无耻”，即以外在暴力手段，只能使民苟免刑罚，而民心无所羞愧。“礼”即制度品节，大至国家典章制度，小至社会乡约家规，既含有道德意义，也含有法律意义，是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一种控制手段。如果奉行以道德价值为导向的内在控制，再加上以礼义为本质的教化型的外在控制，那么人们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心悦诚服。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的意思。在这里，儒家并不一般地反对“外在控制”，使用刑罚，而是主张把内在控制的道德导向与外在控制的法律约束结合起来。但是，从管理效果看，在“道之以政”与“道之以德”的对比中，儒家更为强

调以“德治”为核心的内在控制。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立足于他们的“自然无为”的核心价值观，猛烈地批评了儒家的“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管理之道）。他们认为：

（1）仁义道德是“大道废”后才出现的一种文化倒退现象。老子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十八章）正如老子所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三十八章）《庄子·天运》篇作者亦指出：“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劳役其真性）者也，不足多（不足尚）也。”

（2）老子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道德经》三章）。这是针对儒家的贤人政治而发的。他认为社会上的争逐名位之乱象，是由儒家提倡“尚贤”而引起的。庄子认为“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各用其玄德，无为而治，何贤之可足尚呢？“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三十八章）河上公注曰：“言礼废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礼者，贱质而贵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乱日以生”。庄子后学亦认为“夫仁义慝（通惨）然，乃愤（乱也）吾心，乱莫大焉”，“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庄子·天运》）。“毁道德以为仁义”，都是自作聪明的“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道家认为天下大乱都是由于儒家的忠、信、礼、乐所造成的。

（3）仁义道德不但是天下大乱的祸根，而且是统治者一种欺世窃国的工具。庄子后学在《庄子·胠篋》篇中指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增益其利）盗跖也。为之斗斛（音胡）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而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腰带环）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随）于大盗、揭（高举标示）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古时大夫所乘之车、所戴之帽）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诸侯本是窃国大盗却要打出仁义的招牌，这是多么虚伪啊！

基于上述理由，道家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认为只有“攘弃仁义，而天

下之德始玄同矣”（《庄子·肱篋》），并大声疾呼：“爱民治国，能无知乎？”（《道德经》十章）在这里，老、庄并不一般地反对“爱民治国”，只是强调“爱民治国”应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正如王安石所说：“爱民者，以不爱爱之乃长；治国者，以不治治之乃长。唯其不爱而爱，不治而治，故曰无为。”

处于儒家这一“管理道德”境界的管理者，我们将他们称之为“儒商”（或“德商”）。在道家看来，他们虽比法家的“管理科学”境界又提升了一步，但是儒家的“为政以德”如同法家的“循法而治”一样，都是属于“有为而治”的范畴，都是人性的异化、道德的坠落。只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殫残天下之圣法”，实施“复归于朴”的“无为而治”，方可摆脱人为物所役、人为名所役的束缚，消除人性异化和社会混乱现象，从而实现人类“玄同”的理想社会。由“有为而治”管理模式转向“无为而治”管理模式，是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管理境界，也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管理境界。

（四）“不知有之”最高管理境界

道家所谓“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道德经》六十三章）。无为、无事是相对于有为、有事而言，要求管理者顺应万物之理和人的自然本性而不恣意妄为。正如《文子·自然》篇所云：“所谓无为者……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至理名言，是对“无为而治”的一种形象说明。“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三章），说明“无为”是一种绝对的“为”、至上的“为”、纯粹的“为”，是一种以最小的管理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果的高超管理艺术。

处于“无为而治”境界中的管理者，我们将他们称之为“道商”。“道商”善于“以正治国”，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百姓心为心”，对于民众从不干涉、迫害，使民众各顺其性，各安其生，过着愉快、幸福的生

活，而民众好像没有感到管理者的存在。这一“不知有之”的社会效应，是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最高奖赏，也是道家实施“无为而治”管理所达到的理想效果。所谓“太上，不知有之”，也就是老子所说管理者“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十七章）的意思。元代吴澄释曰：“最上谓大道之世，相忘于无为。太上，圣人无为之治也。”

处于这一“不知有之”境界中的管理者，在“管理科学”和“管理道德”的基础上，已进入了“管理艺术”的阶段。这是一种有别于儒、法、兵、墨的“有为型”的“无为型”管理。在道家看来，只有这种“无为型”的管理，才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最理想的管理境界。

帝尧是道家树立的“无为而治”最高管理境界的典型。《列子·仲尼篇》以“尧治天下”为例，指出：“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不知亿兆之愿戴己欤？不愿戴己欤？顾问左右，左右不知。问外朝，外朝不知。问在野，在野不知。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庄子在《应帝王》篇中进一步阐释了“无为而治”的管理境界，他把这一管理境界称为“明王之治”。他描绘道：“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功劳广被天下却好像与自己无关），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教化施及万物而百姓不觉得有所依恃）；有莫举名（他虽有功德却不能用名称说出来），使物自喜（他使万物各得其所）；立乎不测（而他自已却立于不可测识的地位），而游于无有者也（游于虚无境界，行其所无事）”。

这里所谓“明王之治”，也就是道家所孜孜追求的理想管理境界。由此出发，庄子及其后学既批评了儒家的“以德治国”，也指责了法家的“以法治国”。在《庄子·徐无鬼》篇中，有人问尧的老师许由为什么要逃避尧呢？许由认为“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但是，“爱利出乎仁义，捐（弃）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即无视于仁义者少而取利于仁义者多。以仁义治国，只能造成虚伪，人就会把仁义变成“禽贪者器（工具）”。“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在《庄子·缮性》篇中，道家认为儒家“以仁义治国”是“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可说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在《庄子·天

地》篇中，禹王问伯成子高为什么“辞为诸侯而耕”，伯成子高答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这是庄子后学假借伯成子高之口对法家“以法治国”的批评。

据《贞观政要》记载，唐代名臣魏徵告诉唐太宗：“舜在位的时候，老百姓受到天子含养，吃饱喝足，却说：‘帝王有什么功劳！’如今陛下这样含养百姓，百姓也是日日享用，却不认为是你的恩德。”在魏徵看来，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已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民众过着自由、富足的美满生活，却感觉不到唐太宗的存在，这是管理的最佳境界。

日本蛇之目缝纫机工业株式会社顾问鸠田卓弥一生极力追求这一目标，他说：“日本的企业不应该把每个员工弄得整日头顶着钢盔干，气氛窒息沉重，总有一天会变成积重难返，就要吃大亏。管理方式应该不轻不重，最好是不知不觉，事情就办妥当。我个人一生都是朝着帝尧的方式为目标而努力的。”

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非常推崇老子管理境界的思想。他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引述了《道德经》十七章并评论道：“老子说，不好的领导者，会被人们瞧不起；好的领导者，会赢得人们的称颂；伟大的领导者，是让大家在事情完成时说：‘是我们自己完成这件事情的。’”他认为现代领导者是组织的设计师，好的领导人懂得创造有利于人们发展自我的环境，虽然不一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一定会赢得人们的称颂；反之，不好的领导人，依赖严苛的控制手段，使人心生畏惧，最终会被人唾弃；至于最高明的领导人，是透过理念沟通，建立愿景，引导人们发挥主动自发的精神，为目标全力以赴，自然会在不知不觉中成就事功。从彼得·圣吉的引文和诠释来看，他确实掌握了老子“无为而治”的精义，现代领导人需要秉持“清静”的心态，纵观全局，遵循“自然无为”管理原则，化解管理中的矛盾，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老子这种“太上，不知有之”的最高管理境界，同现代管理科学所说的“象征性管理”、“渐进式管理”有某些相似之处。德国管理学家曼弗雷德·马丁和加比·波尔纳在《重塑管理形象》一书中，把管理者和管理境界分为

“棍棒式”、“家长式”、“权力控制式”、“协作式”、“权威式”、“想象力式”、“全球责任感式”七级。其中“全球责任感式”是最高的管理境界。在他们看来，具有全球责任感的管理大师的活动是渐进的，帮助别人是自己的本分，从不张扬，制造领导效应。领导方式是潜移默化的，好像春风化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们为被管理者悄悄谋福利、做好事却从不希望被管理者对他感恩戴德。可见，“无为而治”的管理境界，是古今中外管理者所追求的最高管理境界。

第二十一章

王屋山与全真教

2011年3月，我有幸参加了由济源市政协组织的第一批王屋山道教碑刻实地调查。

在文献资料和社会考察的基础上，我从全真教在王屋山的传播和发展、重建和修葺道教宫观、全真教与编纂《大元玄都宝藏》、全真道士与王屋山代祭与投龙简、高道辈出与皇室支持等五个方面，系统地证明王屋山不仅是宋以前上清派道教活动的中心，而且也是宋、金、元以降全真教传播与发展的重镇。研究王屋山道教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我们应当加大开发与研究力度。

（一）全真教在王屋山的传播和发展

据初步调查，在北宋王朝的大力扶植下，王屋山道教得以初步复兴。北宋初年，重修了济渎庙和王屋山道教三宫。宋真宗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清皇帝”，并召奉仙观道士贺兰栖真（897—1010）进京，问以修身治国之事，并赐号“真宗大师”。宋真宗梦见仙人降授天书，敕建济渎庙内的天庆宫。宋徽宗自称“道君教主皇帝”，求仙访道王屋山，于崇宁二年（1103），在迎恩宫敕封药王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并赐王屋山道观庄田和道士官俸。

宋徽宗于政和二年（1112）册封东晋许逊为“神功妙济真君”，并在江西南昌西山许逊修道处修建玉隆万寿宫。现存济源市济渎庙内的“济渎庙灵符碑”，建于宋徽宗政和六年九月九日。根据张广保教授对它的解读，认为这通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崇拜以许逊为主的道教净明派的系列活动之一。宋徽宗于宣和七年（1125），在《宋徽宗封济渎诏》中，特封济渎神为“清源忠护王”。

金元之际，随着连年战乱和朝代更迭，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等新道教兴起。太一教由萧抱真于金天眷年间（1138—1140）创立，传授太一三元法箓，以符箓为人治病驱鬼，用斋醮求雨止雨，是北方唯一的符箓派。二代祖师萧道熙遍游王屋山，慕民风淳厚，遂在县城北岸（今纸坊）创建太清宫布道，乐善好施，远近弟子万人。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授于萧志冲传代秘箓，定为太一道嗣教第三代祖师。五祖萧居寿于元中统四年（1263）奉元世宗忽必烈圣旨，谒太清宫，朝廷追封二祖萧道熙为“重明真人”（《碑记》）。元泰定元年（1324）遣太一教萧天助驰诣济渎庙投奠。上方真元派于金章帝泰和年间（1201—1208），在王屋山兴起，并在王屋山阳台宫东侧创建泰和道院，金崇庆二年（1213）改名为通仙观。金末诗人元好问《通仙观》碑载：“……世乃于宫东侧建通仙观。通仙观者，初为泰和道院，郝志朴居之，崇庆癸酉年更为今名。宫宇廊庑，以次而居，历兵乱不得废，今其徒袁守素守之。郝平阳人，淳素有守，披荆棘，拾瓦砾，不阶一簣之功，积数十寒暑，而后得成。”上方真元道派由该派法师时雍及其门徒子假托司马承祯两篇唐代丹诀，编造《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等经文图书而传承道法，主要活动于13世纪王屋山和开封等地。（详见王卡：《王屋山与上方真元道派》，载《中国道教》，2000年第2期；2011年第二届王屋山道学文化研讨会论文《王屋山上方真元道派续考》。净明道在济源的活动情况，详见张广保：《对河南济渎庙所藏净明道碑刻的释读》）

王屋山除了太一教、上方真元道派、净明道等活动外，几乎是全真教派独占的宗教活动场所。

据199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屋山志》记载：金正隆四年（1159），王重阳（1113—1170）在终南山弃家悟道后，于金大定七年

(1167) 离陕西经济源北邙山，寓居玉阳山灵都观布道。不久，即赴山东宁海传教，创建“全真堂”，相继收“北七真”弟子。金大定九年（1169），王重阳携“北七真”弟子西归，朝天坛，谐阳台，栖息于玉阳山灵都观，创建重阳庵，并开创了全真道士“阳台受戒”教规，遂使王屋山成为当时北方全真教早期的受戒圣地。

马钰（1123—1183）于金大定九年随师西归，在玉阳山全真庵受全真秘诀，遂成为全真教布道继承人。后徙居白涧口丹阳洞修炼，并赞助丘处机创建长春观，死后传说葬于王屋山南岭长春观东侧。

丘处机来过济源吗？目前在学术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清乾隆年间《济源县志》卷十二《人物·仙释》篇云：丘处机“寓济源长春观，学道于灵都真君王志佑（可能有误，应是王重阳——引者注），昌明元教，多著述”。《元史》卷五十八《志·地理一》云：“元初治下孟州。宪宗八年，复立上孟州，河阳、济源、王屋、温四县隶焉。设司侯司。”这说明元初河阳、济源、王屋、温四县属孟州所辖。据《玄风庆会图》卷一《筠溪笔录》记载：丘处机“是冬，仙驾盘于桓山阳伊洛间，与门人创苏门之资福、马坊之清真、孟州之岳云三观基业。又增置洛阳长生之地，兴定间并请额为观”。丘处机于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八月路过孟州时，曾建过岳云观，这说明他曾在孟州、济源一带从事过传道活动。近年，在轵城镇柏林村发现的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长春观重修碑记》亦有明确记载：“此处乃真人（指丘处机）憩休之所，非修炼之处。”丘处机仙逝后，其弟子清虚周真人、洞真子解志通等先后在长春观修炼。第一洞天灵山洞北口和西口，至今仍刻有“东接蓬莱迎海市，西望瑶池涌金莲”、“七朵金莲在此处，邱刘谭马郝王孙”两副对联。《王屋山志》现存丘处机《题天坛》诗两首：一曰“峨峨峻岭接云衢，古柏参差数万株。瑞草不容凡眼见，灵禽只傍道人呼。凿开洞府群仙降，炼就丹砂百怪除。福地名山何处有，长春即是小莲壶”。二曰“四面诸山若附庸，突然中起最高峰。每看晴日移坛影，常说寒潭卧黑龙。沆瀣要和千载药，茯苓先斲万年松。拟寻活计参真趣，又隔烟萝第几重”。两首诗是丘处机游览王屋山、柏林村所作。在丘处机的诗歌中，还有《过怀川》等，也证明他到孟州、济源一带。由上可知，丘处机来过济源布道应该是没

有疑义的。

金大定八年（1168），王处一在山东拜王重阳为师，号玉阳子。据其《云光集》中《谢恩师·赠众道友》和《苏幕遮·丹阳祠堂》推断：金大定二十七年，王处一受诏入京前，曾到过王屋山布道。他在玉阳山灵都观道院，与道友们论道，得知王重阳东行山东路过王屋山时，曾在这里收徒授道，遂有“玉阳一遇疑云断”的感慨。“玉阳子”道号，或许与他到过济源玉阳山有关。金元之际，全真教由于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和支持，大批全真道士从山西、山东和河南洛阳、汴梁等地，纷纷云集于王屋山，主要有卫志隐（1189—1283）、周颐真（？—1240）、宋德方（1183—1247）、秦志安（1188—1244）、张志谨（？—1305）、李志全、解志通（1198—1292）、单志静、张惠全等，重建和修葺因战乱而荒废的宫观，开宗授徒，名观林立，遂使全国道教活动由低潮逐步转向高潮，真可谓是“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

（二）重建和修葺道教宫观

最早进入王屋山的全真道士，是马丹阳的再传弟子栖神子王志佑。他受教于丹阳席下潘真人。（参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重修岳云宫碑记》）据金人李俊民《重修王屋山阳台宫碑》载：王志佑于金正大四年（1227），从山西来到王屋山，“周览胜区，感叹陈迹，慨然有动于心”。由于受到邑令及司帅昆季的敦请，他决心重修和住持王屋山阳台宫。“废始于戊终于戊，兴始于亥终于亥，一纪而废，一纪而兴。”即阳台宫甲戌年（1214）毁于兵火，废毁时间持续到丙戌年（1226），兴建从丁亥年（1227）到己亥年（1239），废兴各12年。王志佑“以起废为事。不募而役集，不鸠而材具，变污以洁，易故而新，宏大殿堂，修直廊庑，复灵官之位，列斋厨之次，接遇则有宾馆，招纳则有道院”。为躲避金、元战火，他又率门徒于城外白家庄重修岳云宫，并升仙于此。天坛阳台宫后被赐名为兴国大阳台万寿宫，由全真道士纯清子刘道清及其弟子王德仁相继住持。

同一时期，在阳台宫之左，全真道士郝志朴、李存道等人在泰和道院基础上新建了一座通仙观。据元好问《通仙观记》，郝志朴于“崇庆癸酉（1213），以恩例得今名，始大为崇建，堂宇廊庑，斋厨库厩，以次而具。历兵乱得不废，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志朴“淳素有守。披荆棘，拾瓦砾，不阶一簣之助，积数十寒暑，而后得成”。其规模可与阳台宫相媲美。《通仙观记》是其弟子袁守素通过奉仙观道士元明道介绍，于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秋请元好问撰写的。

周颐真，号莹然子，山东密州人。十六岁出家，拜长生真人刘处玄为师，为一代名师高道。据《天坛尊师周仙灵异之碑》记载，元太宗九年（1237），应王屋山总帅司荣之礼请，他主持王屋天坛上方院，总帅司荣并施舍了洞宫社清虚宫、蔡村灵仙宫、护驾堡游仙观土地。他立即率门徒开土耕种，将紫微宫田亩四至报请总帅公证认可。他委任门下刘志简提点此事，并组织十方修真徒侣相继重修了天坛三清殿和上方紫微宫。周颐真仙逝三年后，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的弟子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院事，多招集十方道众，特出财力，修建琳宇，“其宫内尊殿祖堂、斋厨静室，略有次序”（《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同时，他还将清真庵改名为龙祥观。宋德方除了主持紫微宫和龙祥观院事之外，据《玄都宏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载：宋德方还“建立宫观于燕赵秦晋间，凡四十余处，门下传道者不啻千百数”。据《重修长春观碑》碑阴《长生辅化明德真人宗枝图》载，刘处玄一系在王屋山周围还有大小观庵十余处等。

《重修天坛灵都万寿宫碑》载：张志谨，号宁神子，河南温县人。偶于云中遇长春真人，再授以口诀，赐“宁神子”之号，“礼掌教长春真人为师，亲炙训导，日就月将”，终成高道。蒙本郡长官礼请，主持济源灵都观，“公睹其殿宇廊庑，阶砌名物，悉为废坏”，决心率道众重修灵都观。最后，由其弟子孙志玄完成重修任务。公主皇后懿旨云：“据代州神岗观、孟州王屋县灵都宫宗主宁神子张志谨，系早遇真师，参承正法，广修善行，德业清高之士，可赐‘广玄真人’名号。”（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

解志通，号洞真子，山东莱州人。曾向丘处机问道于栖霞滨都观，遨游于汴洛王屋天坛之间，经丘处机推荐，拜王屋山周颐真为师，深得其真传。

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自长安路过济源柏林坡，见有长春观遗址，以为终栖之地。“遂披荆棘，拾瓦砾，因阜为台，引水为池，植松为盖，凿崖为庵，蒲团之外，一无长物。”（《重修长春观碑》）他在长春观志行苦修，以药术济人，遐迩推重，深得官民爱戴。在多方化缘、积累财力的基础上，终将长春观修复，“构玄元殿于前，玉皇殿于后，三官、四圣翼列于庑，斋堂、厨库轮奂一新。又别建道院四处：西仁和长春观、谢封长春观、北陈北白云观、孟津县感圣庙威灵观是也”。长春观规模闳丽，为元代中期济源一所重要的全真道观。

王志瑞（1208—1277），号通玄子，闻丘处机门徒郭志玄道高，遂拜为终身之师。他在云游西府东州数十年后，终于元定宗三年（1248），还归济源，修建龙泉观。济源赵村龙泉观，也属于柏林长春观一系。

单志静，学承多师，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为其赐号“开真子”的王处一。据《重修太清万寿宫碑铭》载：单志静虽“历事丘、刘、玉阳三真人，亲承训诲。然于玉阳真人所得妙道志趣尤深，受其号曰开真子”。为避河南兵乱来到王屋山，在济帅杨公的支持下，重修太清宫。羽化后，其弟子李志昂、张志微、姚志古等，秉承师志，兴葺功成，殿宇雄伟，掌教真常真人赐额号太清万寿宫。其弟子张志微曾任孟州道正、覃怀道提点等要职。

全真盘山派由郝大通弟子王志谨开创，本山在汴梁朝元宫。元代中期，全真盘山派在汴梁、洛阳一带颇为盛行，出现了姬志真、徐志根、李志居等高道。济源奉仙观是盘山派在王屋山的传播重镇，据《崇宁葆光大师卫公道行之碑》（此碑现立于济源奉仙观旁民房院内，立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李谦撰文、寇元德书丹）载：元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卫志隐受“要官暗散忽都虎暨尚书田阔阔以礼延致，居济源之奉仙观”。他住持奉仙观后，“以身表众，不妄丐贷，不事襁衿。弟子讲学以外，俾耕桑以给衣食，种蓺以供蔬菇，创为碾硃以补助常费。岁积余赢，则为兴修土木之资，敝者补之，阙者增之。五十年间，凡为殿四，一奉三清，一位玉皇，次则列三官及前代高真，皆象设事之。讲授有堂，集会有所，门宇庥泽，莫不毕具”。元宪宗时期，赐卫志隐道号“无为引道真人”，并改奉仙观为奉仙万庆宫。卫志隐营建宫观五十余年，门徒甚众，其中佼佼者杨道素，担任河南孟

州道正兼奉仙万庆宫提领，赐号“远尘崇德大师”。另外，在济源东北阳洛山，还有一处道观——桃花洞。据元至元十八年（1281）张道亨撰写的《桃花洞记》载：女冠张惠全十五岁寻道，拜金粟太清观女冠李守正为师。女冠李守正师承栖云真人王志谨。李守正仙逝后，张惠全寻访栖息之所，寓于桃花洞。女冠张惠全为王志谨三传弟子，也属于郝大通的盘山派一系。

（三）全真教与编纂《大元玄都宝藏》

全真教在王屋山编纂《大元玄都宝藏》和庋藏明朝《道藏》，为保存道教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宋德方于元太宗九年（1237），遵从其师刘处玄、丘处机遗志，主持编纂《大元玄都宝藏》。据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载：宋德方对秦志安说：“丧乱之后，图籍散落无几，独管州者仅存。吾欲力绍绝业，殫木流布，有可成之资，第未有任其责者耳。”秦志安立即表示愿承担此任。于是，以秦志安为总编辑，在全国设立 27 个雕印局，役工五百余人，三个县供应纸张。在 27 个雕印局中，洛阳、怀庆有 5 个局；3 个供应纸张的县中，济源龙祥万寿宫是其一。李志全撰《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云：“诸路置局雕印玄都宝藏、三洞四辅之经……共议就于济源、河中（山西蒲州）、终南祖庭三处，制造上品精洁复纸，以供百藏经卷使口印，此铁岸龙祥万寿宫其一也。……是后与供大藏经纸，抄造历年。”这为雕印《大元玄都宝藏》提供了重要的人力和物质保障。局置“道口之士，典其储校，俾高弟秦志安总督之，役功者无虑三千人”（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碑》）。宋德方广搜各地道藏经籍，携弟子李志全、秦志安等寓居灵都观、紫微宫，披阅手抄散落经书。在山西平阳玄都观（今山西永乐镇）设立总编局，秦志安本人不仅校正了八千余篇道经和修正了多部道家传记，而且还“增入《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绛仙》、《婺仙》等仙附焉”。这一文化工程历时八年，刊成《大元玄都宝藏》，共计 7 800 余卷。秦志安积劳成疾，仙逝后，其弟子李志实、郭志熙等奉宋德方之命将其师衣冠葬于紫微宫西北隅松台道

士坟。秦志安弟子刘志玄“跋涉千里”，到山西礼请元好问为其师作《通真子墓碣铭》。秦志安后被迫赠为“玄通弘教披云真人”。由此可知，王屋山是编修《大元玄都宝藏》的重要基地，编修这套书是王屋山全真教进入全盛期的标志之一。

王屋山不仅是编修《大元玄都宝藏》的重要基地，而且也是庋藏《大元玄都宝藏》的名山宫观。据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碑》云：“真人首制三十藏，藏之名山洞府。既而附诸印者有百余家。”这百余家庋藏处，至少有两处在王屋山。一是祥龙万寿宫，据李志全《济源十方祥龙万寿宫记》云：祥龙万寿宫是法赐安置新版《大元玄都宝藏》之所，所谓“□本□法赐安置琅篇□□□，永为矜式”。二是紫微宫，元至大三年（1310），据李志全《重修天坛碑铭》载：“谨安置三洞琅篇一藏（即《大元玄都宝藏》），贮之高阁，永镇方维，期于不泯。”元泰定三年（1326）二月，元帝钦颁道经于天下名山宫观。“道经于全国著名大山宫……《道藏》一部，储于王屋山紫微宫”。王屋山重要宫观多建有藏室，用以庋藏《大元玄都宝藏》。

但是，由于元至元十八年（1281）佛道论辩的失败和元末战火的焚毁，到明朝初年，王屋山宫观所庋藏的道藏散落无余。所以，作为明代皇家道场的王屋山，在明正统、嘉靖和万历年间，多次受到御赐道藏的宠遇。据《王屋山天坛大顶总仙宫修造白斋道人张公太素行实之碑》载：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曾颁《赐紫微宫道藏经诏》，赐《道藏》一套，诏曰：“兹以一藏安奉河南怀庆府济源县王屋山紫微宫，永充供养，听所在道官、道士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釐（音希，通禧，福），下与生民祈福。务须祇（音支，恭敬）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褻渎，致有损坏遗失。违者，必究治之。”明弘治六年（1493），紫微宫庋藏的这套《道藏》仍保存完好，可供学道者查阅。明嘉靖年间，明世宗重印《道藏》，并颁赐给紫微宫诸品经（详见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世宗谕旨碑》）。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李濂《王屋山记》载：紫微宫内通明殿“环列朱龕，贮国朝御赐《道藏经》若干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又御赐王屋山紫微宫《道藏》一套。现存济渎庙内的圣旨碑云：“特命御马监左监丞张忠恭赍宸悃，请送《道大藏经》一藏，前诣王屋天坛紫微宫安供。”并特命道众启建

金篆大斋三昼夜，以祈福消灾。王屋山紫微宫是保存明版《道藏》的重要宫观之一。

（四）全真道士与王屋山代祭以及投龙简

据《元史·祭祀志》载，国家规定，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和后土十九处，作为由皇室祭祀的岳镇海渎。金、元、明统治者虽然重视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和后土的祭祀，但是名山大川远离大都，甚为劳苦，故多为高道代为祭祀与投龙简。在国家祭祀活动中，王屋山全真道士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正大七年（1230），河南大旱，王屋山全真道士于志道奉诏祭祀于济渎。

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十月，时任全真掌教的李志常至济渎代祀。《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载：“冬十月，遣中使诏公至阙下。……陛辞之日，锡公金符，及倚付玺书，令掌教如故。公至祭所，设金篆醮三尽夜，承制赐登坛道众紫衣，暨所属官吏预醮者，赏赉有差。”

元中统元年（1260），全真道士王志坦随李志常奉诏代祭于济渎，以祈天永命。

元中统五年（1264），时任全真掌教的张志敬至济渎投龙简。

元至元十三年（1276），全真道人李德和奉诏代祭于济渎。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全真道大掌教玄逸真人张志仙奉诏致祷济渎庙。

据《道家金石略·大朝投龙记碑》记载，元至正元年（1341），元世祖命道教宗师张诚明先于中都大长春万寿宫举行七天“周天大醮”，然后再到王屋山行投送龙简之礼。四月十七日，张诚明至济渎祠，十八日举行三献之礼，“观者如堵”。四月下旬，在天坛紫微宫举行醮事后，将金龙玉璧及刻有名刺告文的金银玉简投埋于名山大川。这是帝王向神灵传达心愿的信物。

明洪武二年（1369），太祖朱元璋“今命以古定制，凡岳、镇、海、渎，

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称济渎为“北渎大济之神”。

明洪武十年（1377），明太祖特遣大臣谢成以及道士郑允存、曾彦成奉牺牲祝帛代帝祭祀济渎、北海之神。

清雍正三年（1725），在《加封济渎神号诏》中，命所司加封济渎神号曰：“北渎永惠大济之神”，“祈福以庇民”。

全真道士在王屋山的频繁代祀与投龙简的宗教祭祀活动，以及他们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充分地说明了金、元、明时期王屋山已成为全真教宗教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五）高道辈出与皇室支持

从北宋至明清，王屋山全真教派高道辈出。除了宋代的贺兰栖真以及金元时期的王重阳、马钰、丘处机、宋德方、秦志安等人外，还有以下重要高道：

济源龙翔观道士苗道一（1264—？），是宋德方的再传弟子。驸马高唐王闻其名声，以礼相聘，进见元武宗于军中，所献计策应验如神，深得元武宗器重。于是，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命其主持大都长春宫，授玄门演道大宗师，诰命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人。

天坛山守坛道人完颜德明（？—1335）系金皇室后裔，重整天坛山殿宇，著述布道。元元统三年（1335）任大都长春宫总教真人，为终元之世全真教第十七任掌教大宗师。

张太素（1445—？），号白斋道人。明天顺八年（1464），虽官至武略将军，但酒市遇全真道人，看破红尘后，遂栖身于天坛山绝顶修炼。明正德十一年（1516）至嘉靖二年（1523），重建天坛山绝顶殿宇，著有《十难诗》和《长春真人仙派传授图》。

明、清两朝，全真教虽在王屋山日趋衰微，但全真教龙门派代表王常月（1522—1680）师从全真派第六代传戒律赵复阳为师，密于天坛王母洞，授于

戒律。清顺治十三年（1656），奉旨主讲于白云观，御赐紫衣。他一改秘密传戒旧规，前后三次登坛公开传戒，度弟子千余人，被全真道龙门派尊为“中兴之祖”。清康熙十七年（1678），卒葬白云观，赐号“抱一高士”。

王屋山所以能够成为全真道教的重镇，与皇室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敕令免去奉仙观田赋。元大德八年（1304），元成宗铁穆耳敕令“地方军民易近掩护紫微宫及其山林”（《天坛王屋山圣旨碑》）。元至大二年（1309），元武宗颁旨“令地方军民易近掩护阳台宫及其庄田”。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明世宗朱厚熜赐“周王府建灵岩穴山门、熬头洞天门、九天门、七宝门”。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皇帝敕谕碑》：诏令保护紫微宫及其山门。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明神宗朱翊钧准赐洛阳万安王在天坛山建“无极玄窍门（即南天门）”。

由上所述，金元以降，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以及新道教的产生和发展，王屋山已由唐代司马承祯为代表的上清派主导的宗教场所转化为以金、元丘处机及其全真教主导的道教圣地。这是王屋山道教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性转变。

第二十二章

王屋山道教文化的社会价值

（一）道教文化是一种“软实力”

在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硬实力”的同时，我们更应该重视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软实力”。从战略上看，“软实力”比“硬实力”更为重要。以“软实力”促进“硬实力”的发展，是一种更有价值的新的战略思维。

道教文化是一种文化“软实力”。发掘与弘扬王屋山道教文化，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王屋山道教文化，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至今我们对它的发展还是知之甚少。金、元以来，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悟道于陕西终南山，创教于山东胶东地区。而后王重阳、“北七真”及其历代弟子多次往返于河南开封、洛阳、河内、王屋山和山西芮城等地，建宫观，讲道经，传播和发展全真教，使王屋山成为全真教的重镇。从目前全国道教研究的现状看，由于陕西、山东省的领导和学者的重视，研究成果丰硕，全真教在该地的产生、创立和发展的线索较为清晰，而以王屋山为代表的河南省的全真教的来龙去脉、宫观建设和经典传播、道教代表人物等重大问题（比如王重阳和“北七真”在王屋山是如何布道的？大道教、太一道在王屋山又是如何传教

的?在《大元玄都宝藏》上,王屋山与九峰山有什么关系?),都不甚清楚。这是目前中国全真教研究中的一个瓶颈。这一瓶颈问题如不能尽快解决,就很难编写一部全面地、科学地反映中国全真教的发展史。从全局眼光看,摸清王屋山全真教的发展全貌,为中国全真教研究提供丰富而真实的资料,补充、纠正甚至局部地改写现已出版的道教著作和资料汇编,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在我们已知的极不完全的王屋山道教历史文献和碑刻中,含有极具现实意义的人生哲学智慧和做人的道理。我们只有以时代精神对这些人生智慧和做人道理进行现代诠释,才能使之走进民众、贴近生活,转化成现代人构建精神家园的文化资源,从而为建设现代精神文明服务。

1. “韬光晦迹,盛德若愚,不自伐其功”

北京大学王宗昱教授编的《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一书中,收录有元至元十八年(1281)三月河内阳洛山《桃花洞记》一文。该文记载女真张惠全“厌市廛,乐山水”、“昼则清风满榻,孤鹤唳空;夜则明月当轩,猛兽拥户”。她省吃节用,将其募捐的钱财积蓄起来,用以“募工凿石,开龕设像”。设像三座,中曰元圣祖太上老君,左曰西王金母元君,右曰正口纯阳三真君,“绘以金碧,眸容严然”。落成之日,弟子前来祝贺,欲刻诸琰,张惠全批评说:“修真之事,当韬光晦迹,盛德若愚,不自伐其功,有违老子之教乎?”

这里,张惠全说的“韬光晦迹,盛德若愚,不自伐其功”的人生智慧皆源于老子的《道德经》,讲的都是如何低调做人的道理。

人生有逆境与顺境之分。不管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处之的态度问题。

当人处于逆境之中,正确态度应是“韬光晦迹”,也称“韬光养晦”。韬光即是敛藏锋芒和才华,养晦(晦迹)即是隐藏踪迹。“韬晦之计”,即是把锋芒和才华收敛起来,把踪迹隐藏起来,等待时局变化,以实现宏图大志。

《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诈病赚曹爽”的历史故事,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司马懿(179—251),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今属河南温县西)人,本是

“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的人物。魏明帝曹睿病重，拜曹爽为大将军，总揽朝政。面对曹爽集团的咄咄逼人之势，司马懿采取“韬晦之计”，不仅自己“推病不出”，而且也令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皆退职闲居”，暂避曹爽锋芒。但是，司马懿并非甘心退让，岂能容忍曹爽为所欲为？他只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含忍示弱，窥测时机，以图再起。曹爽独揽魏国大权后，虽沉湎酒色，纵情享乐。司马懿此时已经磨刀霍霍，乘曹爽兄弟随魏主曹芳到城外高平陵祭祀明帝之机，发动政变。在诛灭曹爽集团后，曹魏军政大权全部落到了足智多谋的司马氏手中。

当人处于顺境时，正确的态度应是“不自伐其功”。老子认为“自见（自我表现）者不明（聪明），自是（自以为是）者不彰（彰显），自伐（自我炫耀）者无功（功劳），自矜（自高自大）者不长（长久）。”（《道德经》二十四章）

2. “盛德若愚”

君子为人做事，应持“盛德若愚”的正确态度。“盛德若愚”是“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一语的缩写。“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出自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从本质与现象角度，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内心虽藏“盛德”，而外表却从不逞能显智，即在举止、面容和言语上，愚蠢迟钝，好像傻子一样。这就是“盛德若愚”命题的真实含义。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故意装傻”、“难得糊涂”等，讲的就是“盛德若愚”的哲学道理。在待人处世上，道家主张“盛德若愚”，小事要“宽而勿察”，大力提倡“糊涂哲学”。只有“小事糊涂”或者“故意装傻”，才能保证“大事不糊涂”。

“盛德若愚”命题所阐述的道理，是人生中的“智”与“愚”的辩证法。这也是现代人走向成功的重要保证，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坦荡逍遥客，无拘自在仙

济源灵都观现存“宗主宁神广玄真人像”碑刻一通。碑身上部为广玄真人像，即丘处机弟子、金元时期灵都万寿宫住持张志谨的刻像，下部刻懿旨

一道。在碑身右侧刻真人遗颂：“坦荡逍遥客，无拘自在仙。身似钻泥藕，心如出水莲。”在这里，张志谨发挥先秦庄子的《逍遥游》和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从心境层面形象地说明了人如何在物欲诱惑面前达到自由、快乐、幸福的人生最高境界。

刘处玄弟子、天坛上方院住持周颐真在回答什么是“安乐法”时，答曰：“减嗜欲。”所谓“减嗜欲”，就是人在追求物质生活上实行减法，方可幸福。山西芮城县九峰山纯阳上宫《吕仙翁百字碑》云：“本性好清静，保养心猿定。酒又何曾饮，色欲已罢尽。财又我不贪，气又我不竞。见者如不见，听者如不听。莫论他人非，只寻自己病。官中不系名，私下凭信行。遇有不轻狂，如无守本分。不在人彀中，免却心头闷。和光且同尘，但把俗情混。因甚不争名，曾共高人论。”吕祖的“百字碑”，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对“减嗜欲”作出了全面的、具体的阐述，对于现代人构建幸福、快乐人生都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二）开发道教文化是一项文化工程

开发和弘扬道教文化是一项文化工程。那么，如何认识和开发这一文化工程呢？我以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道教文化为例，着重讲两点不成熟的看法。

1. 正确认识道教的本质和功能

开发王屋山道教文化旅游，首先对道教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国著名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早在 1918 年致许寿裳的信中指出：“前曾言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小杂感》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鲁迅先生是在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充分观察、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这一科学论断。这一论断，不仅纠正了国内外以儒学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学术偏见，而且也批评了有人把道教与封建迷信画等号的错误认识。实际

上,土生土长的道教是一种文化。它包括道教经典著述和金石文献、各式各样的道教文物、道教宫观建筑艺术(如王屋山奉仙观三清殿的荆木梁、枣木柱、柿木梁、桑木柱,“荆、桑、枣、柿”的选材,实为罕见)、道教塑像和壁画、道教音乐与武术、道教修炼与养生、道教中医药学、洞天福地文化、道教哲学、道教诗词文学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与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生物学、矿物学、化学、中医学、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有密切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道教文化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道教文化在我国激烈的社会转型中,通过宗教伦理和各种宗教戒律,可以抵御各种物质诱惑和拜金主义思想,提高信教群众和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平,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以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道教对于某些现实生活中的人群也有一定的抚慰心灵的调适功能。恩格斯指出: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当人们面对社会上的不公平而又无力改变时,以宗教化解内心矛盾与痛苦,是一种自然的选择。道教具有爱国爱教、慈悲济世、造福人群的优良传统。实践证明,道教根据“普济群生,遍拔黎庶”的价值理念,在救灾赈灾、希望工程、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都作出过积极的贡献。道教始祖老子的“和谐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形成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当环境污染和各种有毒食品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时,道学中的“道法自然”、“身重于物”和“绿色生活”的价值理念以及“形神双修”的养生之道,已逐步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生活方式。道教的“重生戒杀,清静寡欲”的生态理念,为构建“天人合一”理想境界,提供了理论根据。

天坛上方院住持周颐真十六岁拜刘处玄为师,刘处玄恐其天资聪颖、博学强记、英华外露,有碍求真。尚企贤撰《修建长春观记》云:“唯刘真人住持莱州神山武观……有周老者,颖悟不羁,博学强记,为当世之大儒。愿

立下风，敬闻妙教。真人曰：‘口当如此英华口藻，恐饰外丧真，当以憨自处。’稽首再拜，敬事斯语，因目之曰：‘憨周。’”周颐真敏遵师嘱，凡事“当以憨自处”，终日如愚，兀兀痴痴，似无所知，故号曰“憨周”。这则“憨周”故事讲的是“大智若愚”的哲学智慧。“大智若愚”是现代人走向成功人生的重要保证。

因此，我们必须在承认宗教消极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道教的积极因素，使道教及其信众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田野调查与旅游开发

那么，如何设计与开发道教文化呢？我认为开发道教文化应分为两步走：

第一步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道教文化的田野调查，摸清“家底”。在推进 20 世纪学术研究中，由国学大师王国维于 1925 年提出，陈寅恪、陈垣、胡适等人推动的“二重证据法”，是极为重要的学术方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即是“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我们除了继续广泛地查阅与收集各种方志（如《王屋山志》、《河内县志》、《河南郡志》以及 20 世纪有关王屋山道教的碑刻新编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的“纸上之材料”外，更要重视现在还沉睡于王屋山的多座宫观和流失于民间的王屋山道教碑刻等“新材料”。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樊光春研究员著的《西北道教史》、山东师范大学赵卫东教授编的《山东道教碑刻集》，都是 21 世纪成功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之作，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治学榜样。

2011 年 3 月至 5 月，由济源市政协组织全国 30 名著名道教学者分几批对王屋山道教碑刻进行了初步的田野调查，这在济源市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我建议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指导下，组建由全国道教学者、市政协、市文物局、宗教局和旅游局组成道教碑刻调查团，制订详细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实地调查。

第二步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研究成果具体地转化为富有文化含量的旅游开发和推进济源市人民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开发模式上,必须善于将各级政府官员的政治资源、企业家的经济资源、学者的学术资源和道教界的宗教资源整合起来,走“四位一体”的综合创新之路。

从字义上看,所谓“旅游”,是现代人的一种短期性的“吃、住、行、游、购、娱”的特殊生活方式。现代旅游不同于古代文人的游山玩水或者徐霞客式的科学考察。现代旅游主要分为消遣旅游、商务和会议旅游、宗教旅游、体育旅游、互助旅游(如“驴友会”)以及科学考察等,它已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含量很高的“社会旅游”。现代旅游是一种高级的文化精神享受,是在物质生活条件获得基本满足后出现的一种追求愉悦的精神需求。旅游者普遍具有“求新、求知、求乐”的心理要求,在旅游中,使自己的思维和心情进入幸福和快乐的人生境界。

要想科学地开发济源市的道教旅游资源,最重要的是对济源市的旅游资源作出科学定位。比如王屋山既有奇峰、峻岭、幽谷、秀坪、古树、奇花、名木、奇石、珍稀动物、天象奇观(如天坛云海和倒影、天坛日出与日落、王母仙灯和北斗灵光等)的山文化,又有遍布于山中的灵泉、飞瀑、碧潭、曲阳湖、五龙口以及黄河小浪底的水文化,还有历史悠久、文化含量极高的宗教文化资源。据初步统计,在风景秀丽的王屋山镶嵌着500多座宫观庙院。除道教文化外,还有古代神话传说(如女娲文化、愚公移山、二郎担山等)、炎黄文化、蚩尤文化、大禹文化、庙街的夏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民间庙会文化、卢仝的茶文化、佛教文化、民间宗教文化、古墓群文化、楹联文化、诗词艺文、红色旅游等多种文化资源。王屋山是一座“山文化”、“水文化”和“道文化”三者结合、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名山大川。所以,王屋山旅游不只是游山玩水的消遣性旅游,也不是单一式的宗教旅游,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社会旅游。济源市在开发自然景观的同时,必须大力开发道教及其他文化资源。只有全面地摸清济源市的旅游资源,才能科学地设计与制定济源市的旅游规划蓝图。

附录一

深入挖掘与复兴王屋山的道教文化

——葛荣晋教授访谈录

2008年4月19日至22日，由济源市政协、中国道教协会、中国实学研究会、济源经济合作促进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王屋山道学文化研讨会在河南省济源市召开。第十届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钮茂生、副主任黄璜，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刘怀廉，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王平，济源经济合作促进会会长傅翠和，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葛荣晋，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孚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吕大吉等50多名领导和学者，对王屋山道教圣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开展了学术研讨。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向研讨会发来贺信。会后，就王屋山道教的有关问题，记者采访了葛荣晋教授。

记者：筹办王屋山道学文化研讨会，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考虑？

葛教授：我们筹办这次研讨会，其目的就是为了推动王屋山道教文化的开发与复兴。今天，我们提出开发与复兴王屋山道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我们个人想开发就能开发、想复兴就能复兴的。马克思讲过一句名言：哲学的命运，决定于它满足时代需要的程度。我们提出开发与复兴道教，正是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它。道教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和谐文化。2007年在西安、香港举办的《道德经》国际论坛，提出的会议主题就是八个字：“和谐社会，以道相通”。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道教文化是构

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文化资源。同时，道教文化又是养生之学，用牟钟鉴教授的话来说，是独特的东方生命之学。今天中国的全民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为什么现代人有那么多的心理病？为什么博士生还要跳楼自杀？我就不理解，在物质生活如此丰厚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抑郁症？学习一点道教的潇洒智慧与生命哲学，我想对于医治现代人的心理病是绝对有用的。有人说道教文化是中国老百姓的精神大餐，一点都不假。所以，无论是从治国还是养生方面，复兴道教都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记者：开发与复兴王屋山道教，当务之急是什么？

葛教授：首先是观念要转变，特别是领导的观念要转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你计划再好，一点用都没有。事情是人做的，只有人的思想观念转变了，事情才能做好。

这次会议从宗教学的理论高度，提出一个非常明确而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即什么是宗教，道教的本质和社会功能是什么，你必须从正面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信奉宗教是鸦片的理论，而且把这种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一块基石，赞成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赞成者是非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改革开放了，人们不能不思考这个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或者说过去是对的，现在时代变了，还能不能用这个观念来看待宗教呢？现在，不仅经济上改革开放了，思想上也在改革开放，要求从过去许多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来思考与回答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以吕大吉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经过若干年的艰苦探索，写了那么多的书，其实就是论证一个基本命题：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这是一个新的命题。我们必须把宗教看成是一种社会文化，而不要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一种鸦片，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观念转变。我们讲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含义是多方面的。就拿王屋山来说，王屋山的道教宫观，是一种建筑文化。奉仙观的建筑材料和建筑风格是全国绝无仅有的，这是文化而不是迷信。阳台宫的壁画模糊了，但是经过技术处理后还是可以看清楚的，这是艺术而不是迷信。道教中还有极具人生真谛的哲学智慧，如我们看到的长春观的碑文，那里面记载了丘处

机非常有名的一段话，他认为道教是“修治之学”。具体来讲，就是修身治国之学，修身是“清心寡欲”，治国是“敬天爱民”。他的话在今天依然是真理，这是哲学而不是迷信。我们今天社会很浮躁，当官的想一天升几级，经商的想一夜暴富，今天挣一万，明天还想挣两万。不少股民都套进去了，主要的也是贪心太重。现在，从上到下，不少人被四种魔鬼纠缠着：第一种是求官之欲太强，官欲是需要的，太强就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第二种是经商的，也是贪欲太强，想着办法骗钱，很多广告是欺骗性的；第三种是求名，为了“名”，不少人伪装自己，虚伪之名在折磨着多少人，英年早逝的惨剧大有人在啊；最后一个“色”，通过自由恋爱娶一个媳妇就可以了，为什么又是小秘、二奶、三奶、四奶，你有那么大的精力吗？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吗？结果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我把它叫做“四鬼闹中华”。在这里提出一个人生的大问题：人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这四样东西吗？老子讲得很清楚：“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你生活在世界上，应该如水那样“利万物而不争”，有了钱你要回馈社会呀。我讲了这么多，都是为了印证丘处机的话是正确的。如何修身呢？丘处机提出的“清心寡欲”四个字就够了。这四个字就是从哲学上来医治我们今天浮躁病的一剂良药。上面所讲，无非是证明不要简单地把宗教看成是一种迷信，一种鸦片，你要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这个观念一定要转变，这个转变我认为是战略性的转变，不是战术性的转变。如果不转变，还是从鸦片论的认识出发，你就会对宗教采取批判和消灭的态度；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文化，你就会以一种同情和敬畏的态度看待宗教。

另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宗教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宗教的社会功能，我认为是满足人性的精神需要的文化产物。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不只是简单的吃饱了饭，穿几件好衣服，买一幢别墅，不是这样子的。人的一生所追求的是构建两个家园。第一个是物质家园，包括衣、食、住、行等，第二个是精神家园。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在构建两个家园上错位了。有人在财富上是巨人，而在精神上则是矮子，这是一个严重的错位现象。钱财不能没有，但是只为钱为利，把人变成赚钱的工具和守钱的奴才，那是可悲的。宗教是构建人的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资源。当你很疲倦的时候，到寺庙里，到道观里，

住上几天，吃几天清淡的饭，然后在那里静静地养一养，心灵就会马上净化许多。当我走进欧洲教堂的时候，看着神灵，在肃穆的环境里，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红尘的那些东西，马上消逝了很多，整个心灵就净化了。人的精神世界，既需要动态的思维，更需要静态的思维。人的大脑思维活动，有高潮也有低潮，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如果你每天用得过度，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的。在道观里静坐，也是一种最好的静态休息。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宗教看成是鸦片，要用新的理念来看待它。

记者：这次会议对王屋山道教文化的研讨，有哪些新的成果？

葛教授：要开发王屋山道教，就必须对王屋山道教本身作一个正确评估。这几天学者们的发言很精彩，我把大家的观点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王屋山道教是中国道教的一个缩影。如果你把王屋山道教的历史解读清楚了，那么你就对中国道教发展的基本线索掌握了。为什么这么说？中国道教的产生、发展、兴起和衰败过程，在王屋山都有所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有，道教的重要教派在这里也都有，有的教派是在这里产生的，有的教派虽然不产生在这里，但在这里也有它的势力和活动踪迹。这就是王屋山道教所独具的丰厚的道教文化资源的特点。不少名山道观不具备这些条件，有的道观可能兴盛于某一小段历史时期，或是出现过某个代表人物，而王屋山高道之多、教派之全、历史之长，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我们必须对王屋山道教文化资源有充分的肯定。

第二，从王屋山道教的发展来看，在这个会上，我们提出了两个“高峰”、两个代表人物的新观点：我们认为唐代是中国王屋山道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为什么是高峰？因为出现了在全国有影响的国师级人物司马承祯。后来，到五代的时候就衰败下去了。金元时期，随着道教的创新改革，丘处机的全真道出现了。全真道到现在已经有七百多年历史了，是中国后期道教发展的主流教派。全真道虽创建于山东，但它创建以后的走向，基本上是在陕西、山东、河南这几个省来回转。这是第二个高峰。现在，从中国道教史的现状来看，全真道在山东的活动比较清楚，在陕西也比较清楚，唯一不清楚的就是河南的全真道是怎么传来的，又是如何活动的，这是目前道教史上

的一个空白。我们这次考察了济源市轵城镇柏林村的长春观。在老百姓眼里，长春观只是个破庙，没什么好看的。在学者眼里，它可不是破庙，而是文化含量很高、很有学术价值的古迹。我和任主席、郝书记，还有几位教授，三次去那里考察。第一次发现了几通碑，第二次任主席就找了几个年轻人，将小河边的残碑翻过来一看，弄清了长春观是什么时候建的。以前没人知道，碑文写得很清楚，创建于大元国至元二十九年，以往说不清楚的问题，那个碑说清楚了。后来，我和市政协、文物局的同志又考察了轵城镇赵村的龙泉观，也发现了几通关于全真道在王屋山传教的残碑。可以这么说，通过对这几通碑的解读，全真道在王屋山这个地区的传播情况，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元朝全真道在河南传播的状况。除了灵山洞、长春观、龙泉观外，就我们目前的了解，还有五龙口镇白涧河里的马丹阳修炼洞、蟒河口的马丹阳的道观、克井镇的万寿长春观等。有人说不止这些。只有以后再考察了。总之，这些新的发现如果解读清楚了，对现行中国道教史可以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甚至中国道教史某些部分就得改写，这是多么宝贵的东西啊！这还不是金子吗？从“一个高峰、一个代表人物”转到“两个高峰、两个代表人物”的观念上，是我们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

此外，是从“小王屋山道教”向“大王屋山道教”的转变问题。我们过去所讲的王屋山道教主要是指以阳台宫为中心的紫微宫、清虚宫等小的范围，大体上是在王屋镇的范围内。其实这只是王屋山道教的核心地带，而不是它的全部。这次我们通过对全真道的初步考察，发现这个观念也需要改一改。王屋山道教群就像济源市的车牌，呈 U 字型，是一个范围很大的道教群：北端沿着王屋山、克井、孔山，一直到五龙口镇，以老君顶为中心的大的道教群。我是当地北官庄人，小的时候父母告诉我，那里有几百座道教宫观，每年三月三的庙会，周围的十几个县，甚至外省的人都来赶庙会，非常热闹。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衰败下来了。北端这些道教群是王屋山道教群不可分割的部分。南端是以长春观、龙泉观等为代表的南岭一大片的道教宫观。所以，千万不要将王屋山道教局限在阳台宫周围，它是一个面积很大的道教文化群。在观念上，我们要从“小王屋山道教”转变到“大王屋山道教”上来。

记者：这次会议对开发与复兴王屋山道教提出了哪些具体建议？

葛教授：我把大家的发言概括为九个字：“全方位、高起点、高层次”。我们在北京召开座谈会的时候，学者们提出的命题是“道教中心，复归王屋”。这次会上河南丁巍教授又以“复兴王屋，再创辉煌”的方式表述了同一个思想。我想这两个命题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对王屋山道教的一种期盼。这就是说，王屋山道教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两度辉煌，两个高峰，出现过两个划时代的代表人物。可是，从明代到现在，王屋山道教是败落了。这两个口号的提出，就是标志着我们现代人呼唤王屋山道教，是一种美好的追求，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要满足这个追求，要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就必须“全方位、高起点、高层次”地开发王屋山道教。全国有的景区只有自然景观而没有人文景观，有的地方只有人文景观而没有自然景观，而王屋山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完美结合的宝地。王屋山的含金量如此之高，开发它，就必须站在“全方位、高起点、高层次”的战略高度。具体来说，我认为王屋山道教的开发与复兴有三个不可分割的重要层面：

第一是宗教信仰层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大胆地提出“道教兴山”的口号。这个口号，过去原有升等同志就提出来了，但是一直没有落实。提出“道教兴山”的口号，要理直气壮，不要羞羞答答。那么，到底如何“道教兴山”呢？

(1) 恭请高道进山。会上专家提出一个命题：“道教兴山在人不在观”。意思是说，王屋山道教的复兴，不在于你把宫观修得如何漂亮，神像塑造得多么神奇，道路修得多么宽平，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恭请高道进山。为什么呢？“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从历史上看，王屋山之所以成为全国道教中心，就是因为高道进山主持宫观，没有司马承祯，哪有唐代道教的兴盛？没有丘处机，哪有元代道教的兴盛？今天我们复兴王屋山道教，就要请那些道德高尚、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具有很高的修炼功夫、在国内外广有影响的高道大德进山主持宫观。这一条如果做不好，你修的观再好，我看也不行。一个家庭的兴衰靠的是人才，一个地方道教的兴衰靠的也是人才，这是一个真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目前假道士占领王屋山的局面。去年，我做了一次“微服私访”，一个人进庙，一个假道士说，你的

相貌很好，你要发财呀。忽悠了我一顿，我心里有数啊！接着那人又对我说，你要花钱做好事呀，开口要钱。宗教道观不能搞承包制，承包就是一种买卖行为，我承包给你钱，我能不从香客、游人那里骗取钱财吗？这种现象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宁可暂缺高道也不能让假道士骗钱，这一点一定要坚持。

(2) 尽快普查与抢救王屋山道教文物碑刻。司马承祯的《坐忘论碑》是在紫薇宫的菜地里发现的，我看了以后，有点心疼。这次在阳台宫，李立政同志指给我看，又发现了一通碑，躺在那里没人管。这是一通唐代的碑呀，就这么在角落里躺着。长春观多通有学术价值的石碑也是在小河边发现的，这些碑刻都是价值连城的啊。你说王屋山很重要，凭什么呢？你必须靠这些石碑来说话呀。所以，我强烈地呼吁，今年要利用文物普查的机会，文物局、宗教局和济源王屋山道学文化研究会等，组织一个强有力的班子，对王屋山道教的“家底”进行一次认真的、彻底的普查。只要是与道教有关的石碑、遗物、书法、绘画等，都要先收集起来，然后再做研究。一定要尽快地抢救王屋山的道教碑刻资源，进行有计划的调查研究，广开座谈会，询问群众古碑都在哪里，在河里的、水库里的要捞出来，在猪圈底下的要挖出来。在对王屋山道教碑刻调查的基础上，我建议修建一个道教碑刻博物馆，这是开发王屋山道教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要研究中国道教，你就要来我这里看东西，因为我有资源，特别是某些碑刻，就只有济源有。周吉善先生建议在济渡庙建立一个御颁济水诏文碑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3) 开发与复兴王屋山道教，必须制度化，不能够因人而异。我的建议是，即使市委书记升迁了，新市委书记来了，既定规划仍继续去办，我们要把它制度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在向外地学习的基础之上，经过专家充分科学论证，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有计划地、逐步地开发与复兴王屋山道教。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比如大家会上讲的山东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问题，现在是骑虎难下，不修吧，花了那么多钱，修吧，全国一片骂声。我们开发王屋山道教千万不能这样做。这个规划要细致，论证要充分，措施要有力，在规划上非要下点功夫不可。

(4) 王屋山道教文化的开发，需要大量资金，光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是不够的，需要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来开发王屋山。我建议采用市场经济机制。

我和黄书记参加了济源水文化开发项目发布会。在道教文化规划定型后，我们也可以召开一次道教文化项目推介会，招商引资。

(5) 还有一个建议，凡做事都需要造舆论。我们济源市的报纸、电台以及有关的宣传工具，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就要有计划地宣传、普及王屋山道教。我们也可做一些有关王屋山道教的片子，在中央台播放，在全国大造舆论，这个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是学术研究层面。道教有宗教层面，因为它是一种信仰。同时，还有一个学术层面，即它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我非常高兴的是，由于济源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成立了“济源市王屋山道学文化研究会”。在几天时间之内，从申请到报批，再到聘任顾问、名誉会长，大概不到十天时间，如此之速度，在全国我看是第一。我们报批中国实学研究会，前前后后是四年时间；报批的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前后将近20年。你们十天就成立了道学文化研究会，这也是个奇迹。学会成立后，第一点，我建议认真地制定一个学术研究的规划，先从哪里开始，怎么研究，要做个规划。第二点，成立道学研究院。就目前来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该是儒道互补，但是现在是“儒盛道衰”，这里有一个文化失衡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成立道学研究院是弘扬道学文化的重要措施。第三点，我建议创办一个地方性的《王屋山道教》杂志，申请刊号目前有困难，我们先在内部发行，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有个发表的园地。通过与外界的交流，外边的人知道了，就能使王屋山道学文化研究会变成活水，从而发展我们自己。第四点，建议两年召开一次王屋山道教文化研讨会。如果明后年召开，我们就干脆开个国际研讨会，把日本等国和港澳台地区的道教大师和专家都请来，扩大王屋山在国内外的社会影响。最后一点，我建议在王屋山道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要组织力量着手编写《王屋山道教史》。现在学术界已由主要编写道教通史转变为编写地域道教史。在地域道教史方面，据我了解，茅山、武当山等都写出来了。我们着手写一本王屋山道教发展史，或许可以进一步充实与修改通史。王屋山道教的研究，光靠济源的学术力量恐怕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资金充足的话，可以设立若干道教研究项目，在全国公开招标，由我们来选择，谁的学术力量强、信誉好就交

给谁。

第三是旅游产业层面。根据会议的发言，在全国范围内，道教文化的开发，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建议组织一个王屋山道教文化考察团到成功的宫观取经。如湖北武当山、山东崂山、江苏茅山、广东罗浮山、四川青城山等，都有很多经验教训。我们为什么不做？但是，也有许多教训需要我们总结。我们要复兴王屋山道教，有几个时髦的口号值得重新反思，第一个口号是“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就是把宗教简单地看成赚钱的工具；第二个口号是“经营道教”，道教是经营出来的吗？这两个口号都是把道教作为赚钱的工具。如果这样来开发道教的话，那势必是对神圣道教的一种玷污，造成道教的神圣性和世俗性的严重错位，我们开发王屋山道教不能走这条路。20 多年来，道教文化开发始终都存在宗教的神圣性和宗教的世俗性的矛盾，我们要力求避免它们的错位。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文化道教与世俗道教的问题。我们开发王屋山道教，不是走世俗道教道路，把王屋山道教简单地变成一个赚钱的工具，有些地方举办道教节、老子节，不管是假道士还是真道教，只要交钱，就可以在这里算卦赚钱。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算卦，只是反对把神圣的道教文化变成世俗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开发王屋山的目的。我们要坚持走文化道教的道路，而不要走世俗道教的道路。

第二，创新道教还是守成道教的问题。道教是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但是从中国的道教发展史来看，道教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汉代创立天师道，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创立的。丘处机创立全真道，是针对当时元代对中原民族文化的践踏，而提出的一种“救世渡人”的宗教改革。这一点，牟教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道教的生命就在于创新。人文道教如果不能满足时代需要，反映时代精神，不断地寻找它和当代社会需要的结合点的话，这个道教就是没有前途的守成道教。所以，我们要创新道教，而不是守成道教。道教是一种高雅的文化产业，就王屋山来讲，你可以搞医学兴教，王屋山是个大药库；你可以搞功夫兴山、茶文化兴山，搞道教音乐和正常宗教法事活功等等。这样开发王屋山，就可保障王屋山道教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附录二

《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引论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这部学术著作，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当前时代精神的反映。一则是对前几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批评，二则是对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道家热”或“老子热”的回应。正当中国某些人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道家文化）的社会价值的时候，由于人与自然鸿沟的加深和当代文明弊病的暴露，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憧憬“返璞归真”的理想，回味道家文化的韵味，像淘金一样，精心地发掘它的现代社会价值。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反差。我们并不想用几句空话来反驳别人，只想从这一反差中，以大量雄辩的事实，证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幼稚与荒唐。这便是我主编《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思想动机和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这部著作也可以说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矛盾和斗争的结晶。

长期以来，在老子与道家的思想研究中，人们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于道家思想本身，诸如道家的哲学思想、文艺思想、科学思想、军事思想、养生之道、处世哲学等，却很少把目光投到道家思想在当代的社会价值这一新领域。这样，老子及其道家思想的研究就变成了一个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纯学术的问题，使老子思想研究失去了现实意义。一旦突破这种纯学术的框架，由对道家思想本身的研究转向对道家思想的当代社会价值的研究，跨进现实生活领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老子及其道

家思想的灵魂还在以各种不同方式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渗透在生活 and 学术等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我们只有把这些社会价值揭示出来，才能把道家思想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道家思想具有强大的时代生命力。

老子及其道家思想，从本质上说，如同儒家思想一样，也是一门“人”学。

第一章《人生旋律与处世奥秘》，旨在说明老子对人生奥秘的深刻揭示，以及由他所提出的“身重于物”、“少私寡欲”、“柔弱胜刚强”、“上德若谷”等处世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在现代人的生活旋律中，特别是当人处于逆境之时，老子揭示的人生哲学智慧，总是一再地闪现，把人们从逆境中解脱出来，起着调解人的心理平衡的作用。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人生哲学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生哲学，是人生全过程的不同侧面（顺境与逆境）的反映，二者是互补的，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生处世之道，其价值是永恒的。

第二章《老子思想与中医》，旨在从各方面阐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都深深地打上了老子及其道家思想的烙印。如果没有老子思想的指导，中国人赖以保健的中医学是难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老子思想的孕育下而产生的中医自然医学，同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到 2000 年，人人享受医疗保健”这一全球性卫生战略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它将会对全人类的保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现代医学证明：西方的生物医学模式，经过现代转换，将会被中医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代替，而中国这一独具的医学模式正是在道家思想的孕育下逐步建立起来的。

第三章《老子思想与养生》，旨在说明中国传统的养生学完全是在老子《道德经》思想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老子所提出的“道法自然”、“少私寡欲”等养生原则及由此而推导出来的具体养生方法，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是行之有效的保健方法，必将对现代人的健康作出贡献。

第四章《老子与气功》，旨在说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人们赖以保健的气功学，包括健身气功、医疗气功、功能气功等，都是从道家思想中推演出来的。在中国，不管是历史上的气功经典，还是当今众多的气功流派，都承认老子是中国传统气功学和人体科学的奠基者之一。庄子本人就是一名气功

大师。

第五章《老子与中国文学之魂》，旨在重点揭示中国文学之魂特别是现代文学与老子思想的某些历史联系。我们进入文学艺术领域，随处都可以逆向地捕捉到道家思想的灵魂。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现代意象派及其朦胧诗，企图在意象的排列与组合中去领悟那种不可言状的人生哲理，追求民族的未来，这和两千多年前《老子》的散韵意象的流风有着密切的联系。以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为源，历史上陶渊明曾构思过《桃花源记》、历代文人咏赞过山水诗，而且延伸到现代中国文坛，孕育出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和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追根”潮流（如王蒙的《在伊犁》，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永志的《黑骏马》，阿城的《棋王》、《孩子王》、《树王》，孔捷生的《大林莽》，以及莫应丰的《桃花梦》等等）。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艺术追求，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诗学的神韵说、元人杂剧、明清传奇、近代京剧等，而且在现代改革大潮中出现的所谓“现代派”、“伪现代派”、“新潮小说”、“先锋小说”（如张承志的《胡涂乱抹》、残雪的《苍老的浮云》、莫言的《红高粱》、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王蒙的《海的梦》等），也都是试图从西方现代派小说中借鉴某些审美观念和表现方法，而创造出一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艺术境界。

第六章《老子思想与中国书画》，旨在说明老子的道体论、“正反相成”、“返朴归真”等思想，为中国和东方书画开拓了特有的时空观念、思维方法、审美理想、艺术追求和艺术个性，使中国绘画在世界画坛上独树一帜。老子及其道家思想，既孕育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绘画流派和画家（如唐代张怀瓘、张旭、王默，宋代马远、米芾，元代倪云林，明代徐渭等），也为中国现代画坛上的一代大师，如傅抱石、关山月、齐白石、潘天寿、吴作人、李可染、贾又福等，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使他们的艺术精神得以翱翔于天地寰宇之间。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老、庄及其道家思想，也就没有中国独具风范的书画艺术。

当我们离开文艺领域，涉足于企业管理和军事科学时，同样会发现老、庄及其道家思想在那里起着人们意想不到的作用。

第七章《老子思想与企业管理》，旨在揭示老子的“自然无为”、“有生于无”、“反者道之动”等思想与企业文化、企业管理之间的联系。《老子》一书反复阐述的“道”的多层意义，对于揭示企业内部所蕴藏的价值观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无论是中国鲁南化工厂、长江动力公司，还是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以及美国、日本运用老子思想于企业管理而获成功的经验，都雄辩地说明：老子思想是当代治理国家和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之一。正因为如此，老子及其道家思想，正在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企业家所重视，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八章《〈老子〉与用兵之道》，旨在阐明现代战争中的“用兵之道”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思想之间的联系。老子虽然提倡“不以兵强天下”，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但是他所揭示的“以弱胜强”、“以奇用兵”和“胜而不美”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仍然是现代战争的重要战略与战术。毛泽东等无产阶级军事家在领导中国现代革命战争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老子所阐述的“用兵之道”，经过批判性继承，仍闪耀着成功的智慧之光。

《老子》及其道家思想不但是“人”学，而且也是探索宇宙奥秘的“天”学，即“自然之道”。当我们跨进广袤的宇宙时，就会发现一个带有时代趋向的现象：现代科学不只是在古希腊和古典力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在摆脱西方传统思维模式，而向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的道家思想寻求哲学智慧和新的思维方法。现代科学在向东方文化及其思维模式回归的道路上，老子及其道家思想，正在发挥着引人注目的作用。

第九章《〈老子〉与“自然农法”》，旨在说明在老子思想指导下，农学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变革。日本著名农学家福冈正信针对当代科学农法的弊病，自觉地依据老子的“自然无为”理论，提出了“自然农法”的构想。所谓“自然农法”，其要点是：不耕地、不施肥、不用农药、不除草。“自然农法”是以抛弃人类智慧的过度干涉，以一切顺从于自然为最终目标。它完全顺应大地自然生命的法则，捍卫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创造一个美好、清静的自然空间，为人类造福。福冈正信在几十年的农业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第十章《老子哲学思想与环境保护意识》，旨在揭示老子哲学与当代环保意识之间的某些联系。本文通过“道”的范畴与整体观念、“知常曰明”与人类环境、“知和曰常”与生态平衡、“知止不殆”与适度增长、“知足不辱”与持续发展、“知不知上”与学无止境的对照，说明老子哲学思想与当代环境保护的关系极为密切。面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人们在“回归自然”过程中，正在回味着老子哲学思想的韵味，并努力从中吸取智慧与力量，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作出贡献。

第十一章《〈老子〉与建筑》，旨在探索老子思想特别是他的“有无相资”、“崇尚自然”等观念，对现代建筑学的巨大影响。独具一格的中国传统建筑（包括园林、寺院、道观、陵墓、住宅等），强调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和谐，这是脱胎于《老子》的“崇尚自然”的思维模式。当代世界许多建筑大师，已不满意西方传统建筑过于注重建筑物的实体的陈旧观念，而把老子的“有无相资”、“回归自然”的思想转变成现代建筑的灵魂。他们针对后工业化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人们要求“回归自然”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以意大利建筑学家赛维、美国建筑学家赖特为代表的现代有机建筑学派，以及英国建筑学家查尔斯·詹克斯为代表的后现代建筑学派，正是在老子智慧的启迪下而出现的反映当代建筑发展新趋势的重要建筑流派。老子思想被当代建筑大师赖特誉为“最好的建筑理论”，是当之无愧的。

第十二章《“道”的幽灵与“无”的科学》，旨在揭示以“道”为核心的老子思想与现代科学发展之间的某些联系。在数学中，“0”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数学系统中，“0”就是“无”，其他数字就是“有”，从而把“0”同“无”的哲学联系起来。现代物理学表明，“真空”并不是没有任何东西的虚空的空间，而是类似于老子哲学中的“道”的基态量子场。人类对真空的认识过程，是从古希腊构成论的“虚空”概念，经过曲折的道路，又回到老子的生成论的“道”的概念上来。美国当代物理学家惠勒教授所倡导的“质朴性原理”，与老子的“道”或“无”的概念是不谋而合的。在当代宇宙学中，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所提出的“宇宙创生于无”的理论，最接近于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这些最新的科学成就，说明老子

及其思维模式与当代科学发展趋向是一致的，具有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

第十三章《〈老子〉与科学的未来》，旨在说明老子思想对科学未来的重要意义。西方建筑在构成论上的传统科学思维模式，正在受到现代科学的严峻挑战，遇到很大的困难。于是现代科学家便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中选出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并从中吸取智慧与启示，道家智慧可能对世界未来科学作出无法估量的贡献。老子所提倡的怀疑精神与直觉思维，可能是科学未来发展的推动力和法宝。任何新科学领域的拓展，都是以对僵死理论的怀疑为起点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文明使人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大，使当代科学文明的危机日益暴露。正是面对这一科学文明危机，西方人才把目光转移到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对于道家思想的推崇，必将对人类开辟科学未来作出新的贡献。道家思想在科学未来的发展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十四章《〈老子〉、老聃与道教》，旨在揭示老子其书其人与道教的内在联系。在意识形态中，宗教与哲学比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远离于经济基础，更具有抽象的特点。但是，当我们离开人间此岸而过渡到宗教彼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老子其人其书在宗教领域有着它的不可忽视的价值。本文不但具体地阐述了老聃由人到神、《老子》由一部哲学著作到道教圣经的异化过程，并且列举出大量事实说明老子其人其书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道教中，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较大的宗教价值。这一点，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都不应当忽视它。

第十五章《老庄与西方诗人哲学家》，旨在通过老庄与西方诗人哲学家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等人在价值观、思维方式、本体论诸方面的横向比较，说明他们之间的某些相通或契合之处。在价值观上，通过“绝仁弃义”与“价值重估”的比较，说明他们都是以批判的眼光进行价值转换工作的。在思维方式上，通过“涤除玄览”与“直觉之灯”的比较，说明他们都对理性加以限制或贬抑，高扬直觉主义。在本体论上，通过“道”与“存在”的比较，说明他们都反对以知识论或科学的眼光看待“存在”，力图从存在的直接性入手解决本源性问题。从中西哲学对比中，可以发现曾被忽视了的老庄哲学的现代意义。

上述所揭示的道家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尽管是初步的，不完全的，甚至某些地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却以铁的事实说明：老子及其道家思想并没有死亡，这一优秀传统正在或隐或显地在当代社会中发生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们并不否认道家文化的消极作用，但在这本书中，我们的着眼点是发掘道家文化的积极因素。只要我们在这一新开拓的学术领域下功夫，老子及其道家思想的社会价值，就会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呈现在人们面前，为改造社会和促进科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这部著作是中国各方面专家、学者潜心研究与精诚合作的结晶。对道家思想的研究，正在由单科研究转向综合研究（或整体研究）。长期以来，在对老子及其道家思想的研究中，由于研究者所从事的领域不同，往往局限于单一学科，或只研究老子的哲学思想，或文学艺术思想，或管理思想，或治国之道，或用兵之道，或科学思想，或中医与养生，或宗教思想等。而这些学科之间，彼此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未能对老子及其道家思想形成完整的统一观念。本书试图突破这一单科研究的程式，集各方面专家、学者之智慧，不但对道家思想进行整体研究，较完整地再现了道家思想的整体性及其内在逻辑结构，而且进一步揭示了道家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从而把道家思想研究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我们对道家思想的整体性的研究尽管是初步的，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为了使更多的读者了解道家思想及其社会价值，本书在文风上力求有一个较大的转变。在写作中，尽量避免使用生硬的政治套语和晦涩的学术概念，切忌冗长的古文引证和空泛的议论，力求文字通俗、流畅、易懂，增加富有趣味的故事、典故和丰富的生活内容，使文章富有生动性、趣味性与可读性。只有把学究式的文风转变成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文风，才能收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效益。

由我主编的《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一书，1991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第1版发行近万册。1991年9月第二次印刷发行。1997年4月收入李文海主编的“人文丛书”，1997年1月第二次印刷发行。本书共计15章，由13位专家撰写。字数为234千字。

该书出版后，不仅深受读者特别是道学界同仁的认可和欢迎，发行量不

断地增加，而且在境外也深受出版界青睐。1992 年，日本东京地涌社以《老子は生まている》（《老子还活着》）为书名，译成日文出版发行；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3 年 4 月以繁体字精装本在台湾出版发行，1996 年 7 月 20 日韩国法仁文化社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发行。